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落泪是金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引子：白鹿原下的祭奠

探究别人的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痛苦。

这件事是我不愿去做的，但这件事我又必须去做。从我踏进大学校园的第一步起，我的身心与灵魂就再也不能安宁。本来这部专为大学一个特殊群体而写的作品，可以早些封笔，但陕西方面又传来一则震惊的消息：陕西蓝田县汤峪镇白家坡村一对农民夫妇因惧怕孩子上大学后无力承担高额的费用，于今年4月4日晚，服下剧毒农药后双双自杀身亡。为此，我不得不再次抽出时间到陕西跑一趟。

我去的那天正好是6月1日，阳光灿烂的西安城内处处沉浸在“儿童节”的花和歌的气氛之中。然而同属西安市管辖的那个蓝田县白家坡村却见不着一丝一毫的喜色，相反依旧因白引明夫妇的惨死而笼罩在悲恸的重云间。一路上，陪我前往蓝田的友人指着紧搭在小秦岭山脉的那条横亘百里的黄土高坡，说这就是陈忠实写的《白鹿原》里的白鹿原。白家坡村就在白鹿原下的一个丘湾，离西安不足两个小时的车程，但这里的农民生活水平却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蓝田县隶属西安市，这里不仅有驰名的“蓝田玉”，也是与北京周口店古猿人发迹并驾齐驱的中国“蓝田古猿人”发源地。可蓝田人没有因此而走向富有，相反却在今天被国家列入全国10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省辖市管区内的贫困县。

蓝田人很友善，但当他们把我领进那一排破旧不堪的平房，当我坐定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那间办公室后稍一环视，就如同回到了记忆中的70年代生产大队部的那种情景。地，是坑凹不平的碎砖所铺；房顶，则依旧是散落的竹棚；一堆煤球和一台铁制炉子是这间屋里除了办公桌椅之外的全部用具。“我参加工作近30年了，到现在每个月的全部工资收入为520元。

可就这份月收入还长期不能按月兑现，今年春节过后干部们只领到一次工资。”王战科副部长的话，使人能够想象得出这儿那些靠天吃饭的农民的生活水平。

白家坡村离县城有30来里路，一条公路延伸至村边，交通不算闭塞，农民住的房子大多是新房，地里麦浪翻滚，看不出它是想象中的那一类贫困村落。但当村民们得知我是去采访近两个月前自杀的白引明夫妇之事时，许多人见后都躲进了屋。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先把我领到村党支部书记家，意在请村支书带我们到白引明家采访可能要顺利些。可是等了很长时间不见村支书的面，家人忽儿说他在地里干活，忽儿又说上集市去了，总之一直没有露面。

已是下午三四点了，不能再等了，我们便从支书家出来直接打听白引明家，准备自己去。正在这时，我们迎面遇见了村委会主任。说明来意后，不想那村主任一脸的不高兴，说什么也不愿给我们带路。

无奈，我们只得自己往村里走。白家坡村是个二三百户的大村，有人告诉我们白引明家在村的最里头，而那条通往村里的土路泥泞得不能再泥泞。

当我们快要走到白引明家时，突然迎面走来一对30多岁的农民夫妇截住了我们，并将我们引进了一个小院子。

“我叫白引旗。白引明是我哥……”那位男子一边自我介绍，一边非常热情地引我们进了他家的内屋。就在这时，外面进来好几个人。

“这是我三哥。这是我侄女。”白引旗又向我介绍一个男子，并特意把那位被他称作“侄女”的姑娘领到前面。“她刚从长沙回来一星期，她爹妈出事后开始一直没告诉娃……”

“你就是在长沙读中专的白引明女儿？”

“是。我叫白敏娟。”这姑娘比我想像中的要坚强得多。

“知道你爹妈出事的原因和过程吗？”我说了来此的目的。

姑娘马上低下头，极为难受地说最好问她四叔。于是她四叔白引旗随即介绍了白敏娟父母出事的过程：“……今年春节过后，我哥嫂觉得自己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打元旦到敏娟和她上高二的弟弟上学走之前的两个多月里，一家人连一滴油都没沾过，外面还欠了2800多元债。我哥嫂便在3月份里连续几次把在县城读高中的我侄儿叫回家，劝他别再一门心思考大学了。我侄儿上的是县重点中学，成绩也不错，所以说什么也不想放弃考大学的念头。这么几次劝说无用后，我哥嫂心里压力越来越大。大女儿也是今年中专毕业后还不知能不能找上工作，儿子又要上大学，别说十几年来为供儿女上学已经欠下的一屁股债没法还，现今儿子如果考上大学，一年至少还得四五千元钱，四年下来就是几万元！我哥本来身体一直就不好，嫂子又是不能下地的残疾人，全家仅靠三亩果树和一亩多地，哪生出那么多钱供儿女们找工作 and 上大学呢？这不，俩人越想越背，4月4日夜，就把家里两瓶除果树害虫的农药给喝了……”

白引旗在叙述自己哥嫂的死时说得很平静，但当时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听了都像心里堵着一团棉似的那样难受。

“你哥嫂多大年龄？”

“我哥51，嫂比他小几岁。”白引旗说。

“平时你们没有感到你哥嫂他们要走绝路的什么迹象？”

“我嫂虽说是残疾人，但从来很要强。就我哥平时在我们几个面前老在念叨啥现在城里人也到处在下岗，将来我俩侄就是上了高中、大学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啥的，心里压力看得出一直是很大的，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往绝路上走。这不，年前我哥还让我们兄弟几个帮着一起将他家两棵大树锯下段成板，准备给儿女交下学期的学费。可还没等到用上，这些树板成了他们自己入葬的棺材木，而且仅够一口棺用料……”白引旗说到这里咽住了。

全屋的人都跟着低泣起来。这是一幕无法想象出的悲恸与凄怆的场面。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不因父母的死而影响学业，做叔叔的白引旗和其三哥等，便一直让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的侄女白敏娟住在他们家里，在县城上高二的白敏娟弟弟则自埋葬父母后便没有回过家。出殡的第二天，白引旗便送走了侄子，并对他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今年考大学，这是对你亡父亡母最大的报孝。”据说，白敏娟的弟弟回到学校后得到了政府和同学的一笔捐助。但在今年高考时他却意外地落榜了，现在他正在人生的交叉口徘徊……

天色已暮。在我执意坚持下，白家人带我来到白引明夫妇生前住的小院。这里自4月6日出殡后便一直被锁闭着，当亡者的兄弟把紧锁的门打开那瞬间，我感觉屋里头有股凉气透彻肌肤，随即是心深处的重重寒意：空荡荡的三间屋子里，除了那座落满尘埃的土坑与灶台外，只有墙上那幅毛主席

的像仍依旧挂在那儿……这一景况实在大出乎我所料。因为在进屋之前，我以为在屋子里定会有这对可怜亡者的专设祭台，可事实上没有，于是我也无法以一个远道而来的探访者身分向白引明夫妇的牌位鞠个躬。

面对人去房空的农家小院，我不知如何是好……

离别白家坡时，白敏娟和她的叔婶们远远地为我们送行，就像第一次感受有人在为他们分担不幸。这使得我心头更加沉重。

在我国几百万在校大学生中，家境贫困的比例并不低。与许多贫困大学生家庭相比，自杀身亡的白引明夫妇一家，其实在五百多万在校大学生家庭中并不算特别困难的。他们的所在村有 318 户人家，去年人均收入 1800 元，按照国家划分贫困地区的标准已经属于脱贫的农民了。然而在这个村算得上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白引明一家，却在因供两个子女读书造成债台高筑的重负下，走上了本不该走的绝路。他们的死，在当地引起轰动，人们在纷纷议论穷人家还能不能供得起子女上大学。其实，在我所采访的数百名贫困大学生及他们的家庭情况看，没有一家不是与白引明家庭经济情况相类似，而更多的家庭远比白引明家困难得多。

那么这成千上百万家庭又是怎么在供自己的子女上大学的呢？而那些家庭境况比白引明还要艰难得多的贫困大学生们，尤其像今年长江、嫩江、松花江全线出现大水灾之后的灾区学子们，又如何争取并努力在校走过 4 年甚至更长的求学之路，他们的现实与未来命运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我想向大家述说的。

第 1 章：九月，独木桥前“状元”泪

7 月，又是一个异常炎热的月份。每年高考考得学生都把它叫作“黑色的七月”。

早晨起来，石开就觉得老天一点不讲情面，如此“重大决战”，还不作美些？真是的，干嘛大学考试每年都非得放在这又热又燥的几天？

不行不行，管这些做啥，别影响了考前的情绪。

石开强制自己集中精力，但越是这样，心里却越烦乱。于是他赶紧借洗漱之机清醒了一下自己的头脑。

好了，一切恢复正常。

石开觉得有些饿了，于是情不自禁将手伸进了口袋。可是他马上就像触电一样地抽了回来。不吉利，妈的，太不吉利。石开心里暗骂了一句，这话只有他一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同学们不会知道，老师也不清楚。

但石开清楚。就在前两日，紧张的复习进入最后阶段了，距高考仅两三天时间，别的同学忙着让家长买营养品、准备氧气瓶什么的，可石开却又在为自己的吃饭问题四处借钱，偏偏又到处碰壁。正在他又一次陷入困境时，百里之外的父亲托人捎来一包东西和 110 元钱。

当时石开真有些激动不已，可一点钱数，心头猛地打了个寒颤：110，父亲是给我报警的呀？石开吓出一身冷汗……

别人不知父亲是个什么样，石开太了解了，打他懂事那天起就知道父

亲是不支持儿子念书的。石开有 4 个哥哥，他们都在小学没毕业时就休了学，所以在父亲看来他们金家门里出不了有能耐的人，干脆在家种地挣点钱。石开至今记得自己第一天上学的情景，那天他书包都已经背在肩上了，可父亲就是不让他出家门，还说穷人家的娃，念也念不出大学问，上几年学又有啥用？村上的小朋友都在村口等着，石开就大哭，不停地跟在父亲后面哭。父亲被哭恼了，端着一只大饭碗，一边喝粥，一边不停地骂，最后看着实在没法，气乎乎地扔下 3 块钱，说中，看你小兔崽子能念出个啥名堂！

石开就这样上了学。庆幸的是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老师特喜欢他。

但家里穷，父亲与母亲要拉扯 5 个秃小子，所以他仍然几次不让石开念下去，甚至有一次农忙时跑到学校，要拖石开回家干活。老师看到了，说老金啊老金，要是我有这么个好娃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念下去，直到他上大学！父亲听这话后愣了半天，最后一句话没说就回了家。打这以后，父亲就再没提过让石开休学的事，相反觉得五娃儿有盼头，于是干起活来特别卖命。虽说日子还是那么苦，但看到石开贴得满墙的奖状，父亲心里乐滋滋的，看得出，他暗暗在企盼金家有那么一天真的出个光耀祖宗的大“状元”哩！为了这一天，父亲瘦小的身躯默默承受着一个八口之家的重负。当时石开的奶奶还在世。

那几年，石开是幸福的，因为不用每天看着父亲的脸色，像小偷一样地悄悄上学去。他甚至非常辉煌地做了好几年学校“小智星”，只是因为家穷，在这辉煌中不自然地留下一些颇为寒心的笑料。有一次他只穿一条脏兮兮的短裤，赤着两只脚丫丫就走进了教室。老师没顾上跟他说几句，就将他推到一辆载沙的拖拉机上，说你代表学校到乡里参加抽考去吧！

石开一听自己是代表学校去考试，顿时浑身气昂昂地来了精神。可当他大步走进考场时，竟引来其它学校的同学哄堂大笑。抽考的老师也生气了，拉着他就往外走，结果弄得带队的老师十分无奈。老师苦笑着朝石开摇摇头，说金石开啊金石开，你是俺校成绩最好的学生，可也是家里最穷的学生，说哪一天让你到北京上学看你怎么去？石开回去把老师的话给父亲说了，父亲开始没吱声，后来说你要是能到北京上学，我金家金山银山任你搬。石开觉得父亲真够爽气，他把这话牢牢记在心底。石开还有一件事在村小是有名的，有一段时间为了控制夜里看书做作业不要太长了，他用小药瓶自制了一盏油灯，每夜就学一“灯”油。老师把这一做法向同学们推广后，小朋友们给了石开一个诨号：“一灯油”。

石开后来以全乡第一名成绩考入初中，之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县中，就在他一年一年往上念书时，家里的景况却一年年地往下降，几度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从奶奶的去世，到大哥、二哥、三哥相继盖房结婚，本来就干瘦的父亲被榨得只剩皮包骨。越穷的地方，婚丧嫁娶还越讲排场，等石开念高中时，家里的债务已经不堪重负。按照县中规定，高中生必须住校，可石开出不起住宿费，就只好每天在学校与家之间来回跑。几十里路程，石开记不清遇过多少个炎炎烈日，多少次刺骨寒风，更记不清月亮多少回伴他走山崖……

但是，所有这些在石开看来并不感到什么，他感到绝望的是高三毕业后的第一次高考，他的分数本来已高出河南省本科录取线 23 分，却因为在填报志愿时没把好关，结果名落孙山。一向要强的石开接受不了这不公的残酷现实，独自跑到一家武校，企图用严厉的体罚来折磨自己。父亲更接受不

了这一打击，几乎一夜间便丧失了劳动能力。恰在这时，石开的四哥又到了盖房娶媳妇的年龄。金家5个儿子，除了不断积起的债台，没有一个可以让老父亲感到可以在别人面前抬起头走路的。

但哥哥们认为弟弟石开不该自暴自弃，他们凑钱让石开去补习，争取来年再考。石开接过哥哥的钱，心头更加沉重。他自幼好强，硬是到了一个至今仍不想让人知道的地方去悄悄补习。他当时这样做是为了以防万一，万一补习后再考不上真让村上人知道后不就无法活了嘛！石开知道这样脸上的事并非关系到他一人，还有老父亲呢！

独处异乡的日子非言语所能描述。面前困境，石开也尽量在别人面前装得轻松。有一次，他吃完中午饭后身上再也找不到一分钱。恰巧三哥寄来一封信，不知何故，三哥的信里夹着4张邮票。石开眼前一亮：对金石开同学说：“我从不屈服于贫困对我的困扰。”呀，邮票也可以变钱嘛！

于是他真的拿着3张邮票（留下一张是给家里回信用的）去“变钱”了。生意不错，一切如愿。石开笑笑，因为他又一次躲过了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异样目光……

时间过得真快，这天石开是第二次参加高考，他不止一次告诫自己，这回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其实，远在家乡的父亲最明白儿子的心，只是感觉无能为力。刚刚借得100元钱后，父亲便赶忙让顺道的人捎去。慢！父亲突然叫住那捎钱的人：这儿还有10块，一起带给他吧。110元是这么出来的，可石开仍然愿意相信这是父亲给自己敲响的报警号。

石开顺手伸进父亲托人捎来的东西，一摸，是鸡蛋。这么多呀？

1个、2个、3个……共18个。18是什么意思？是“你要发”的意思嘛。嘿，这回吉利。石开想这肯定也是父亲鼓励他的话。对，3天考试，每天6个。

嗨，天天“六六顺”！

石开顿觉精神大爽。

一个小时后，他与所有参加高考的同学一起进了考场。之后连续3天都是这样，他没有忘记进考场前的一件事：吃3个鸡蛋……

“开儿——快来听呀！”山弯弯里，父亲突然举起耳边的小收音机，欣喜若狂地叫喊起来：“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名字呀！”

“真的？哈哈……我终于考上大学啦！我终于考上啦——！”

金石开简直兴奋得快要晕过去了。他看到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四嫂都冲着他在笑。对，还有爸，还有妈。妈笑得最开心，连平日布满皱纹的脸都像绽开的花。

“我早说过，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人。”晚上，煤油灯下，母亲乐滋滋地又开始夸耀起当年的事：“你刚生出来时，全身发紫，吸气也难，你爸一看又是个小子，就说不中，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正好有个医生路过这儿，我那时就说，小五娃是有福之人，这不现在真中‘状元’了！”

“得得，要没有我那回扔给他3块钱，他能把书念到现在？”堆满笑脸的父亲也抢功说。

石开笑了，不过鼻子很快又酸起来。他看到昏暗的灯光下，自己的父母都苍老异常。此刻的石开只有一个念头：再不能让二老为自己读书的事操心了。

几天过去，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被人送到了村上。

石开看到信封上自己的名字，心都像要跳出来似的。然而几乎在同一时刻，石开的眼里刚刚闪出的喜悦，即刻消失了……

怎么啦，娃儿？父亲接过通知书，急急往下看，当目光扫到“学费”一栏时，脸色也倏然变了。

小村里的人并不知道金家父子心中想的什么事，依旧嘻嘻哈哈不停地前来祝贺道喜，而石开呢每当看到父亲在众乡亲面前露出的那副尴尬笑脸，心头更如刀割。

夜已深，热闹了一阵的乡亲们终于都走了，屋里只剩金家老父亲和石开哥几个。一阵很长的沉默之后，父亲终于咳了一声，缓缓地说道：“都听着，我知道你们几个现在都不易，老大的房子被修路的扒了要重新盖，老二也有俩娃在念书，老三、老四的媳妇也快要产了，可你们的弟上大学是大事！是我们村上的‘状元’！可不是，谁家的娃上了大学？谁家的娃能有他考得这么好？”父亲停了片刻，声音低了下来，“唉，可我和你们妈老了，不中了。

这回你们弟上大学的学费，我和你们妈得求你们啦！

求你们啦！”

“爸——”石开听父亲说到这儿，再也忍不住地哭出声来：“要是实在没钱，我就别……”

“混账！”父亲一个巴掌将石开的嘴给封住了。

就这样，金家四兄弟当晚根据父亲的意见，商定贷款为石开上大学。老大贷了800元，老二、老三、老四各500元。

这一夜，金家的十几口人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呼呼大睡外，没几个是合眼的。石开听得仔细，父亲和母亲不停翻身叹气，四哥的房内打熄灯起就没断过声，没几支烟功夫，那边突然响起嫂嫂的哭声，而且整整一夜没停……

第二天早晨，石开醒来，见自己的枕头边湿了一大片。他顾不得自己的事，赶忙跑到四哥的屋里。

“哥，嫂子呢？”

“回娘家去了。”

石开见四哥独自抽着闷烟，不知如何是好……

（金石开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机化专业学生。他把4个哥哥贷的款交完学杂费后，只剩455元。开学一个星期后，听说学校能为部分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减免学费，于是他赶紧写申请……）唐丽霞是金石开高一级的同学，高考成绩也是当地的“状元”。但她没有金石开那样有4个哥帮他。她只有一个妈，一个弟，和一个患糖尿病在身的后爸。

这样出身的女“状元”，注定了她的大学路要比别人艰难得多。

唐丽霞的家在安徽贵池的一个渔村，离长江很近。父辈都是渔民，河边的那两间并没有多少年头的茅棚，记载了她家并不长的半渔半农的历史。唐丽霞对童年的回忆特别充满感情，因为那时有她亲生的父亲。

在唐丽霞呱呱落地的时候，北京正在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而她父亲遇上了好机会，由原来的划小舢打鱼，改成了承包大机帆船跑运输。童年时的唐丽霞很幸福，父亲每次远航回来总能带好多城里人才能吃上用上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她在同龄的小孩中自然而然成了“头儿”——她靠小玩艺赢得了大多数小伙伴儿的拥戴。于是她养成了“疯”毛病，不知啥是委屈啥是苦。父亲说，女孩家太野了不好，于是到处给联系上学的事。后来她

就进了一家子弟小学。父亲还是那么爱她，每次回家总先到学校看她，再就是放下很多她喜欢的食物。放假时，父亲还把她带到船上，整整在南京呆了一个月。每次上岸，父亲总拉着她，一看到哪单位的门楣标牌，就让女儿念一念。“不会的都记下，回去查字典。”父亲说。她因此在假期多识了好些字，开学时直被老师夸。

9岁那年的冬天很冷，那天小丽霞睡得早。一睡下去，她就想起父亲，因为父亲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回家了……时过半夜，睡梦中她突然听到有人在堂屋悲痛欲绝地大哭。她“噌”地从床上坐起，定神又听——不是梦，是有人在哭！她赶忙穿上衣服往堂屋走，结果被姥姥一把抱住。“儿啊，我苦命的儿——”姥姥放声嚎哭。半晌，小丽霞才明白是自己的父亲死了。

“爸爸，爸爸——！”小丽霞拼命地哭喊着，可连父亲最后的一面也没见着。后来她才知道，父亲因长期在外风餐露宿，得了严重肺结核。

由于没能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大人怕传染孩子，故没让她和弟弟上医院与父亲见最后一面。唐丽霞对此感到终生遗憾。母亲告诉她，父亲临终时拉着母亲的手不知说了多少遍这样的话：“我只牵挂两个孩子，他们都很聪明，是读书的料。你无论吃多少苦，也要让他们念书，念中学，念大学。”母亲在那天晚上，一手搂着小丽霞，一手搂着儿子，一边流泪，一边不停地说：“你们一定要听话，妈就是做牛做马，就是挨家讨饭，也要供你们上学……”

孤儿寡母的生活艰难异常。没有文化的母亲，只能靠仅有的宅前一亩鱼塘和二分自留地养家。看到母亲天天从早忙到黑，小丽霞也仿佛一下长大了。上学回来，她就动手帮妈洗衣服、做饭和收拾屋子。女孩子手脚灵巧，小丽霞学会了上面的事，又开始琢磨起帮妈挣钱的事儿，她知道父亲去世时还欠了一笔债，如今她和弟弟念书也要不少学费啥的。

“妈，我也去抓螺逮虾！”一到四五月份，母亲每天都是早上4点起床下河，然后再等天亮上街去卖。这一天，小丽霞向妈提出要求。

母亲看了看她，点点头。十来岁的女儿从此踩着母亲的脚印，不管是春还是夏，是秋还是冬，只要能下水，她就下水；只要不耽误上学，她就把手所有本该属于天真烂漫的童趣时光，全都用在为母亲减少一份负担的辛勤劳作上。她因此有几好次险些被滚滚激流冲走，又无数次在大街上受人欺凌的经历，但她都顽强地挺了过来。

上初二时，继父来到了她家。老实巴交的继父除了整天埋头干活，对小丽霞和她弟弟都不错。但要强的女儿，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帮大人做些事，因为她想把书读下去，中学的学费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也并不轻松。

唐丽霞决心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打这起，她开始做买卖。河塘里的鱼虾因污染而捕捞不到了，她便上岸跑码头。人们看到，唐家的小姑娘不是在夏天推出板车卖西瓜，就是在冬天沿路摆摊卖瓜子。唐丽霞呢，不管别人用什么眼光看着，她的心里总是那么灿烂，因为她看到自己能用自己挣的钱交学费和买些学习用品了……

上高中了，本该应当集中精力，偏偏继父又日趋消瘦，一查，是糖尿病。有人背后说唐家的孩子都是苦命，可唐丽霞没有流泪，她把满腹的苦涩留在肚里。她知道，在所有这些不幸中，母亲是最苦的，她要为母亲承担痛苦。

她不得不继续边上学边做小买卖，学习是不能放松的，挣钱也是一点

不能少的。她几次在做买卖的路上晕倒醒来后又背上书包赶到学校，又有几次在放学的路上因做买卖而遇雷雨交加，被通体浇得瑟瑟颤抖。她不是不想哭，可她想到家里比她还辛苦的母亲和躺在床上的继父，以及也在上学的小弟。她不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走……

1996年7月，唐丽霞以580分的高考成绩，荣获所在中学的“状元”。

知道录取的那一天她哭了，母亲也哭了。“好孩子，你亲爸可以在九泉之下开心地笑一笑了。”母亲对她说。

女儿抬起头，像突然发现什么似地惊叫起来：“妈你的头发呢？”

啊，怎么剩这么几根了？”

“掉的。妈老了。”母亲苦笑道。可女儿知道，她才42岁呀！

“妈，你太苦啦！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去北京念书呀？”女儿忘情地伏在母亲的怀里“呜呜呜”地痛哭起来……

（唐丽霞，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大三学生。她到学校报到时，继父把自己治病的钱全给了她。交完各种费用后，只剩200多块钱。

她没有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别人，学校因此也一直不知道。她说学校贫困生很多，还有比她困难的。并说自己从小做工干活惯了，能养活自己。故在这之后的两年多里，她靠打工和母亲寄些钱来维持。但后来继父病情越来越严重，今年4月中旬，母亲急电催她回家，她火速赶回安徽贵池，看到了一个已似骷髅的继父。孝女的一声“爸爸”，使垂危中的继父从死神那儿转了回来。“好囡囡，不要惦记爸。回去读书吧。”继父使出最后的一丝力气想让女儿放心地走。4月23日唐丽霞回到北京，第二天下午6时，她给老家打电话，让邻居的人叫一声母亲。母亲在电话里告诉她：“你爸……

在你走后就……”唐丽霞一听，脑中“嗡”地一下成了空白。许久，她重新拿起电话时，对方是弟弟的声音。弟弟告诉她：“妈说让你只管好好念书，她去给爸办丧事去了……”唐丽霞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她哆嗦着嘴唇对弟弟说：“你今年一定要考上大学，否则对不起妈。”弟弟说：“会的。我一定争取像你考个‘状元’！”安金鹏太幸运了！他是代表中国高中学生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被“中国第一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免试直接录取的1997年新生。那天他接到北大“入学通知书”后，给第一个看的人就是自己的母亲。

“妈，你看，我终于可以上大学了！而且还是北大！”儿子喜出望外。

母亲一边擦着泪，一边双手颤抖着看那份烫金字的大学通知书，她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十分自信地对儿子说：“小鹏，妈知道你一定能考上北大的！这回，妈还要陪你到北京，送你进大学门！”

9月5日，安金鹏早早起了床，因为再过一个来小时他就要离开自己的家，到北京去报到了。他发现自己在此生活了十几年的那幢破旧不堪的农舍里早已腾升着袅袅炊烟，跛着腿的母亲则在灰暗的锅台前忙上忙下。

“快来吃，妈给你把面煮好了。”母亲像往常一样麻利地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

儿子端起碗，怎么也吃不下去。他知道这碗里的面是母亲昨天用5个鸡蛋从邻居那儿换来的，而母亲那只跛腿也正是前天为了多给他筹点学费，推着一平板车蔬菜去赶集时扭伤的。安金鹏想到这里，顿觉手中的筷子重如千斤。他放下碗，走到母亲的跟前跪了下来，他抚摸着那条肿得比馒头还大的脚，哽咽着问道：“妈，你的腿好疼吧？”

母亲将儿子扶起，轻轻为他擦泪，摇头说：“不疼，妈看到你考上大学，心里比蜜还甜。真的……”

“妈——”儿子再也忍不住了，那赤子的哭声惊动了四邻。

家在天津武清县大友岱村的安金鹏同学确实是中国 5000 多万中国中学生中最幸运的一位，这倒不是他今天能考上北大这所著名学府，而是他有一位比泰山更伟大的母亲始终如一地在他追求“大学梦”的路上，给他作着背脊，给他架桥铺道——同所有贫困农家子弟一样，安金鹏从生下那天就开始与苦结伴。

小时候，他便知道父母为了给有支气管哮喘和半身不遂的爷爷奶奶看病而拖了一身债。

7 岁上学那年，几块钱的学费也是母亲从别人家借来的。可小金鹏发现自打他上学后母亲反倒一直不爱坐在他身边看他做作业。后来他明白，他手里常使用的用细线捆在一根小棍上的铅笔头是从同学扔在地上捡的，练习本则是用橡皮擦了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用了的旧本本……母亲不愿看到这些，看了她更伤心。不过好在母亲也有高兴的时候，因为学校每次考试，儿子总是全班第一名。聪明的小金鹏，上初中就把高中的数理化课程给学完了。1994 年 5 月，天津市举办的初中物理竞赛中，小金鹏是市郊五县学生中唯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娃，并因此被天津一中破格录取。当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报喜时，万没想到家人竟没有一点儿喜色，反而密布了一层愁云。原来奶奶刚去世，久居病榻的爷爷又紧接着生命垂危。

一万多元的外债像一座高山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懂事的小金鹏默默地回到自己那间小屋，然而他怎么也忍不住心头的酸苦，眼泪整整流了一天。

傍晚，小金鹏在里屋听外屋的父亲和母亲争吵不休。原来，母亲要把家里的那头怀上驹的毛驴卖掉好让小金鹏到天津上名牌一中，而父亲怎么说就是不同意。而正是这一阵高过一阵的争吵声，让久病的爷爷听到了，老人家知道孙儿是因为自己的拖累而无奈的，他觉得再活在世上是全家无法摆脱的枷锁，便选择了一条绝路……

第二天醒来，小金鹏得知爷爷已永远离他而去，哭得死去活来。

他明白这一切的发生都与他的上学有关。当他伏在爷爷那冰冷的尸体时，他真想对父亲和母亲说一声我这个书不读了，可他没这勇气——他太渴望读书，太渴望将来上大学了。

埋葬爷爷后，债台高筑的家里又多出了几千元债务。过了两天，小金鹏和父亲一同发现家里的那头小毛驴不见了。父亲马上猜到了，于是铁青着脸问母亲：“你真把毛驴卖了？以后盘庄稼、卖粮食你用手推、用肩扛啊？这一头毛驴也才几百块钱，能供得起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

那天母亲哭了，她几乎是吼着回答父亲：“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

他考上市一中在咱全县是独一份，咱不能让穷家把娃的前程给耽误了！明白吗？我、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一辈子，也要让他上学、上大学……”

金鹏捧着用毛驴换得的 600 元钱，真想给母亲跪下磕上几个头。他发誓一定好好学习，读好中学，考上大学，报答父母之恩。

秋天到了，金鹏回家取冬衣，他一进门就愣了：“爸爸，你的脸咋这么黄？人也瘦了好多……”

病榻上的父亲苦笑了一下，没有理会儿子的话。可懂英文的儿子一看桌上的药瓶说明书，顿时吓了一跳：爸吃的可都是些抑制癌细胞的药呀！

他找到了母亲，悄悄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一脸痛苦地告诉儿子，在金鹏到天津念书后，爸就开始便血，一天比一天严重。母亲急天急地借了6000元钱，到天津、北京给父亲查了一遍，最后确诊是肠息肉，医生说要尽快做手术，可父亲死活不同意再借别人家的钱。

“医生说不动手术病会更难治，我寻思就是踏破天也要为你爸把看病的钱借来。这事千万别对你爸说，他穷怕了，一提钱就整夜整夜睡不着。”

那天金鹏帮母亲在田头干活时，邻居告诉他，说他的母亲一个人既要为父亲看病，又没人帮她种地，一个女人家没足够的力气把地里的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没钱雇得起人使用脱粒机，于是她只得熟一块镰一块，然后用平车拉回家里，等晚上再在自家的院子里铺一块塑料布，搬来一块大石头，用双手抓起大把麦秆在石头上抡打着将一粒粒麦子脱尽。整整几亩地，母亲全是靠这样……金鹏没等别人说完，便飞身回家一下搂住为他补衣的母亲大声哭泣着说：“妈，我再也不去上学了，我要在家帮你干活……”

母亲转过头，那双含着泪花的眼盯着儿子，坚定地摇摇头：“好孩子，妈顶得住。你在学校好好念书，念出好成绩，考上大学，妈就有力气，明白吗？”

金鹏点点头，他知道母亲多么看重自己的儿子将来能上大学！他也明白，对一个农家子弟特别是贫困的农家子弟来说，考上大学才是最大的希望所在。儿子的前程，在母亲的心目中比她自己的生命还要重百倍、重千倍！金鹏终于懂得了只有自己好好地读书，才能对得起母亲，除此别无他路。

他回到了学校。由于家庭负债累累，安金鹏的生活费每月只有60元到80元，这么点钱在大城市里生活怎么过呢？可他知道，就是这几十元钱，也是母亲每天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攒，把全家所有可能积攒得出的现钱给他送来，而她和有病的父亲及弟弟只能在家吃腌菜拌汤过日子。母亲知道儿子在城里不容易，又是长身体的年岁，便每月都要步行十几里路去批发20斤方便面渣给金鹏送去。每次送方便面渣时，母亲还特意赶到6里外的一家印刷厂讨一包废纸给儿子作演算草稿用。除此，母亲的布包里还有一件金鹏熟悉的推子，那是专为儿子理发用的。母亲对儿子说：“你现在是在城里读书，出去得像个样。可咱家没钱让你上理发店，所以妈每个月来为你理一次发，省下钱你就多买个馒头什么的，把肚子填饱。”

啊，听到了吗？”

金鹏点点头，什么话都说不出。

在学校，金鹏是唯一在食堂连素菜都吃不起的学生，馒头、方便面渣和咸菜就是他的一日三餐。母亲捎来的废草稿纸用完了，他便到校内外捡那些一面没印字的废纸用；他进中学从没用过一块肥皂，洗衣服时便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然而这样艰辛的学习生涯从没有使安金鹏自卑过，因为每当苦难压得他喘不过气时，他便想起了母亲。是母亲给了他力量，给了他智慧，给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而他也无愧于母亲那大海般的慈爱，成为出类拔萃的学子。

安金鹏终于笑着走进了大学门。那是因为他身后有母亲那一片无比灿烂的阳光照耀着……

现在就读中国农业大学的王文喜同学也有一个母亲，但却与安金鹏的命运几乎相反。

1998年4月29日凌晨，不知为什么我怎么也睡不着，其实到农大采访

是前两天我就给自己安排好的，然而我却一直被一种说不清的心境搅得睡不着，4 点来钟就再也无法入眠，后来就等着天亮“打的”到了地处北京西北郊的农大。在京的几十所大学中，农大无疑是离京都城区最偏远的院校之一。出租车司机在出圆明园西路后指着沿街两边的房子说，“过去在这儿呆的都是京城最穷的人家，现在在这儿呆的都是些穷单位。”我不知他的话对不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农业大学的学生则大多来自农村，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村居多，故而这里的学生会比其他十几万京城大学骄子的家庭境况要困顿得多，他们的“大学梦”自然做得更苦、更酸涩……

王文喜同学就站在我的面前，文静、内向，一副很虔诚的学子样。

他扯扯衣角，说一年前你看到我肯定不会认为我是个大学生。

“为什么？”我问。

“穷呗。”

“穷？但穷并不能改变你实际的身份呀？”我有些不解。

“能的。”王文喜肯定道，“给你说吧，告别家乡到了首都北京，向学校交上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一笔数目的钱后，我手里几乎空空如洗。

开学第一个月每人交 100 元钱办理一张饭卡后，我口袋里只有 69 元，这是我的全部‘可动财产’。在北京一个月基本生活伙食费像我们学校也得 200 多元吧，可第一个月过后我那 69 元竟还留下好几元。你说我吃什么这么省？

嘿，你能想得出来……其实你们北京人想都想不出来。2 元钱过一天你说我咋个过法么！别提了。”王文喜往上一仰头，把话停了下来。

我静静地等他擦了擦鼻子。他说：“新生刚进校就是军训，那些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是咬着牙挺起来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一个从小吃尽苦的农村娃儿竟连军训这样的事都挺不过来，我好自卑，恨不得自己抽自己嘴巴。可我有什么办法？一天 2 元钱买饭买菜，大小伙子一个，又要那么强的运动量，能不垮么？别的同学吃一顿花的钱我得用一天两天。于是为了躲避难堪，每次吃饭时我总远离同学，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躲着大家。一天又一天，这样，渐渐我养成了一种习惯似的，什么事、什么场合都这样，而且又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自己因为穷才这个样，人家以为我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而我自己又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始终摆脱不了穷的阴影。其实我想摆脱也是摆脱不了的，我就是没钱么！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内心还有一桩比口袋没钱更重的负担，那就是因为家里没钱而从小不让我上学的母亲。你不知道，在离开家乡到首都北京上大学的那一瞬间，我就曾暗暗发誓再不让母亲为我上学而愁花钱了。可我知道母亲她还是那样的担忧我来北京后的日子怎么过。那些日子里，我时常为这事在梦中哭醒。后来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上是这么说的：‘……妈妈，我深深地理解您的苦楚，儿现在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一切都够用了。如今您老身患重病，我将有计划地节省一部分钱给你寄去看病和生活……’”“你上大学哪来什么工资？”

王文喜同学苦笑道：“我妈哪知道这个？都说上了大学就是进了天堂，当了圣人。”

“那你也不能用这样的话对老人家说，你自己在学校本来就过的什么日子么？”我摇摇头，有些责怪道。

“这些我都知道，可你不知道我为了读书、为了进这个大学门，我有多难！我妈有多苦！”王文喜说完这话，长久地没跟我说一句话。

他再跟我说话时，早已泪洒满面。后来他给我细说了——一个出身在当代中国贫困农民家庭的大学生所走过的那漫长而凄怆的求学路——1974年6月2日，我出生在祖辈居住的一个窑洞里。我们那儿地里不长啥庄稼，十年九旱。自我懂事就记得没什么吃的，妈为了住我们姐妹兄弟5个的嘴，只好经常到地里铲野菜，她唯一的一条洋棉裤子补丁加补丁，不知穿了多少年。父亲告诉我，说妈生下我的头天就出门左边一头驴、右边拉根绳地在田里耕种起来。当妈的这个样，似乎也就注定了我这当儿子的命运从小将与苦难相伴，同样也注定了母亲过度劳作而重病缠身的一辈子痛苦。七七年，外婆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树棒送给了她可怜的女儿。

我父母就这样凑合搭了两间小屋，我们全家从此结束了住窑洞的日子。虽然窑洞不住了，可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相反，父亲在当年12月份因患胃癌无钱医治而突然离我们而去。我和姐姐们趴在父亲冰冷的身上哭啊哭，但父亲再也不跟我们说话了。自然遭到打击最大的还是我妈，因为她要独自带我们5个娃儿。我最小，当时才不足4周岁。没有人能帮妈干地里的重活，所以一到农忙时，我常见妈哭。咱家乡缺水，辛辛苦苦种一年地，收不上来几斤粮食。“种了一袋子，收了一抱子”，这句俗语正是我家乡的真实写照。可这种几乎是几千年不变的景况，苦了我可怜的妈，她凭全家唯有的一头驴，耕作着贫瘠的田地，从年初干到年末，却连我们几个小孩的嘴都不饱。后来母亲发现旱地里能种土豆，于是就种了不少土豆。收了土豆后，她使用锅煮熟晒干，再用袋子盛起来。等没吃的时候就拿土豆片来喂我们，我们姐妹兄弟就是这么活下来和长大的。家乡的穷苦人家都是用嫁女儿的聘礼给儿子娶媳妇，因此我妈也是每出嫁一个女儿，就用收得的聘礼再娶回一个儿媳。

生活在这种家境里我怎么能上学呢？到9岁时我还没进过学校门。

后来村上办了个学校，不要交学费，一学期只花两块钱买本子和铅笔。村上的娃儿都上了学，我就跟着上，可妈她不同意，说我去上学后谁给她在耕地时“放样”？谁帮她捡柴火？母亲伤心地哭着，懂事的我明白后，就说我不去上学了。10岁时，村上又有人来劝导，出嫁的姐也做妈的工作，这次妈松口了。我终于第一次进了学校——古坝村小学。上了学，可我心里仍惦记着帮妈做事，所以每天不等放学，我就拼命往家赶，放下书包背上竹篓子，一边放羊，一边沿路捡柴火。因此我一年级时，考试常常得零分。二年级时老师鼓励我、帮我，于是我放学后虽然还放羊，但也带上书本，我的成绩因此也上去了。可家里没人识字，我成绩好不好他们都不知啥意思。但要是等我把学习用的本子和铅笔用完了向妈再要钱时，妈装着就是听不到。有一次我死缠着她要两毛钱，因为我的本子早已经用完了。

妈生气了，说她能养活我们几个娃儿都不容易了，你还要这要那？她操起门后的扫帚就打我。我当时哭得好伤心啊！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几乎每次在我提出要买铅笔、本子时，妈总是要打我一顿，打得我心惊肉跳。

我疼得哭，妈就坐在一边摸着我的脑袋也哭……

到三年级时，对有些事我开始懂得了。因为家太穷，又没爹，一些同学就骂我“开头”、“穷死鬼”。我那时已13岁，大小也知道点面子。

别人骂我、逼我，没法，我就跟他们打架，可总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妈从不让我辩解，抄起家什就打我。我小小的心灵里感到有吐不完的苦处，我哭，我疼，可我没办法向谁诉说，真有几回想死了得了。但我知道死了就不能念书了，于是只好抹把泪，忍着。

有一次我又与骂我的同学打架，人家的家长知道后堵在路上追着打我，打得我鼻口流血。母亲一气之下就再不让我上学。我好懊悔，可知道自己在别人欺负我时吞不下气、管不住手的毛病。从此我便跟着妈一道起早贪黑下地干活，农忙时倒不觉得啥，每天在地里干累了回家往炕上一睡就天亮。可到了农闲，我心里就难受极了，天天跟在毛驴后面，双手扶着犁把，眼神却一直往学校那个方向瞅……那时我觉得世上最幸福的事就是在学校上课，而且暗暗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再让我上学，别人再怎么骂我，再怎么打我，我也决不回嘴、回手，因为我只想上学读书。后来村上搞“扫盲运动”，使我有幸第二次进了校门。我当时已 14 岁，在班上年岁最大，个最高。这回我学习特刻苦，成绩也好，常受表扬。可就这么大年纪，我还成天穿着开裆裤，家里穷得为我做不起一条裤子。这么大的人穿开裆裤，同学们自然会嘲笑我，连老师都另眼看我。有一次一个代课老师当众嘲笑我，我顶了几句，没想被那老师打得站都站不起来。

上完四年级，要到离家 15 里的另一所小学——塘坊村完小上学。

这时我妈觉得自己的儿子要出远门了，才用乡里救济的棉布给我缝了一条新裤子。穿上新裤子，我好像顿时觉得自己是个人似的，天天走十几里路也不觉啥。看到同学们有家长用车接送，我走累了见过路的拖拉机便往上趴，等别人一发现就赶忙往下跳。有一次跳车时急了些，摔得就差没断骨。

塘坊村完小是我第一个远离家乡求学的学校。这个回民学校不但不收学费，且每人每月补 6 元钱。这个钱对我来说可不算少，我感到太幸福了。不过时间长了也有了难事。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房，冬夏都睡在地上，夏来热死，冬来冻死。头一个冬，我的两腿就冻出了冻疮，手也冻得脓血常流，痛得钻心一般。最使我难受的是，每月大家回家后同学们总是大包小包地带回许多馒头到学校，而我就连一点盐都带不起。我们是自己开伙，每次我只能是把面条放入锅里白水一煮就吃了，且都是两顿一起煮好。看到同学们吃白馒头，我真是直流口水。在塘坊村完小的两年中，母亲曾几次不让我再上学去，可每次她一提我就拔腿往学校跑。有一次班主任在课堂上针对几个同学学习成绩不好说了一句话对我印象极深，老师说：“贫苦农家的娃娃，只有靠读书才能走出苦难生活。”这句话我至今仍深深地烙在心里。

而同时，我似乎也悟出了了一些人世间的道理，为此我开始深深地同情起我那受难的母亲了，再不跟她顶嘴作对。尤其每次回家看到母亲白发满头，驮着背在地里独自干苦活累活时，我心里好酸好酸。那年正好出嫁的姐姐送了我一辆自行车，于是我便每天不等放学就骑车赶回去帮妈干活。老师为此批评我，因为我的成绩因此而下降了。母亲知道后就天天在我耳边唠叨着说干脆休学得了。我不同意，但成绩掉下来是要命的事，眼看辍学又一步步逼过来。最后还是班主任和我姐说服了妈，使我又继续学下去。当时快要考初中了，我发愤赶上，终于考上了当地的河坝中学。

上完四年级，要到离家 15 里的另一所小学——塘坊村完小上学。

这时我妈觉得自己的儿子要出远门了，才用乡里救济的棉布给我缝了一条新裤子。穿上新裤子，我好像顿时觉得自己是个人似的，天天走十几里路也不觉啥。看到同学们有家长用车接送，我走累了见过路的拖拉机便往上趴，等别人一发现就赶忙往下跳。有一次跳车时急了些，摔得就差没断骨。

塘坊村完小是我第一个远离家乡求学的学校。这个回民学校不但不收学费，且每人每月补 6 元钱。这个钱对我来说可不算少，我感到太幸福了。

不过时间长了也有了难事。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房，冬夏都睡在地上，夏来热死，冬来冻死。头一个冬，我的两腿就冻出了冻疮，手也冻得脓血常流，痛得钻心一般。最使我难受的是，每月大家回家后同学们总是大包小包地带回许多馒头到学校，而我就连一点盐都带不起。我们是自己开伙，每次我只能是把面条放入锅里白水一煮就吃了，且都是两顿一起煮好。看到同学们吃白馒头，我真是直流口水。在塘坊村完小的两年中，母亲曾几次不让我再上学去，可每次她一提我就拔腿往学校跑。有一次班主任在课堂上针对几个同学数学成绩不好说了一句话对我印象极深，老师说：“贫苦农家的娃娃，只有靠读书才能走出苦难生活。”这句话我至今仍深深地烙在心里。

而同时，我似乎也悟出了一些人世间的道理，为此我开始深深地同情起我那受难的母亲了，再不跟她顶嘴作对。尤其每次回家看到母亲白发满头，驮着背在地里独自干苦活累活时，我心里好酸好酸。那年正好出嫁的姐姐送了我一辆自行车，于是我便每天不等放学就骑车赶回去帮妈干活。老师为此批评我，因为我的成绩因此而下降了。母亲知道后就天天在我耳边唠叨着说干脆休学得了。我不同意，但成绩掉下来是要命的事，眼看辍学又一步步逼过来。最后还是班主任和我姐说服了妈，使我又继续学下去。当时快要考初中了，我发愤赶上，终于考上了当地的河坝中学。

上中学不再像小学那样简单，光学费就好几十元，妈妈硬着头皮找到学校领导，给我免了学杂费。但偏偏这所中学学风太差，同学们不好好学习，老师在外面做生意，几天不来上一课，盼星星似的上一课就给你灌几节课的内容。回家我对妈一说，妈就接过话茬说，这种学校你还上它干啥？回家吧，过两年妈给你娶个媳妇，持家过日子。我听后连说了几个“不”字。其实在我们那儿比我稍大些的人就娶媳妇的事很普遍，妈说的也是实话，可我怎么也不想走那样的路。我要读书。这回是姐救了我，她给我转了一个中学，离姐家近的中宁县长山头机械化农场中学。这个学校要好些，所以我也特别卖命学习，多次获得竞赛奖。

上学的日子就这么艰难地拼争着，我妈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如以前了，病魔一直折磨着她，而她仍要下地耕作。我唯一能做的也只是每周回家力所能及地帮她干些活。初中毕业后，母亲在病榻头长一声短一声地对我说，你要是再想念书，就只能报中专。我知道报中专是许多农村家长希望子女走的一条路，因为这条路既可满足子女们上学的愿望，又可解决家长们的负担。中专出来后就可以参加工作挣钱了，而上高中如果考不上大学在家长们看来是极大的浪费，不值得。看着妈那满头白发和满脸的皱纹，我无言可语。然而我的内心又多么想现实自己的“大学梦”。考中专和考高中偏偏又是在同一天，而且只能报考一样。那天我的两条腿紧张得直抽筋，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往哪儿走？后来我还是进了考高中的教室……

但出了考场，我知道尽管自己作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可要过妈这一关太难太难了。果不其然，在我上高中的头一天，妈拖着重病，从40多里外赶到学校，硬是把我拖出了教室。当时我完全不知所措，只有眼泪在我脸颊上流淌。我多么不愿意离开学校，可看着母亲那近似乞求的目光和不可抗拒的神色，我无可奈何地跟着她走出学校……

当走出校门时，我知道这回可能是永远告别读书生涯了。那之后的日子里，我天天同母亲一起下地，可站在田野里的我，望着苍天和黄土，整天发呆。母亲或许看出我的心思，便开始给我张罗相亲的事。有一天，她带着

我越过一道又一道丘，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来到海原县的一个农户家。我见到了那个“对象”，她比我还大两岁，一看那傻乎乎的样，我心里就别扭。回家的路上就对妈说我不同意这门亲事。妈则开导说，山里的姑娘聘礼要得少，我们穷人家能娶上一个媳妇就是造化了，你还有啥嫌的？

可我说什么也不愿。没法，我便偷偷跑到学校找到了高中的班主任，诉说了自己的心思。班主任同情我，他又找到我姐，俩人坎坎洼洼跑了几十里路找到我妈。那天他们在屋里说事，而在外面的我就像经历了一场命运的生死抉择。我记得清清楚楚，天快黑的时候，班主任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见我蹲在墙角处，便直径走过来。他说的话让我整个心儿都感到震颤：“你妈太不易了！王文喜，好好学习吧，千万不要辜负了她老人家……”

我听后呜呜地大哭起来，我是跪在地上哭的。当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再比我母亲更伟大的人了，她的那份恩爱我一辈子都还不完！

这是我第四次辍学后又重新进了校门。但是，穷人家的孩子进了校门未必就能把书读完读好。说句实实在在的话，高中三年，为了不再使辍学的恶梦在我身上发生，我完全是用自己的肉体验证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新上的学校是中宁县鸣沙中学，离我家很远。平时没有钱买回家的车票，所以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我都不回家。我是这个学校唯一的外县学生。同学们一周回家一次，带足了伙食再来上课。可我一个学期只回一两次，每次从家背一小口袋妈炒好的熟面和一壶咸菜要准备过好几个月。学校里同学们吃饭都得把自己带来的食物蒸好后上灶去端，每逢这时，我可怜极了。

因为我总是两手空空，所以开饭时同学们争先恐后去灶前端饭时，我就装着自己根本不饿似的跑到教室里伏在桌子上睡觉。实在饿极了，我就等课间同学们玩的时候一个人悄悄跑到宿舍抓一把炒面用水冲一冲、搅一搅便吃了，也不管水开不开。日久天长，我的胃得了病，现在还没好，一疼起来浑身冒汗。一到星期天、节假日，同学和老师们回家后，宿舍里就孤单地留下我一个人，日子便更难过了。一两天吃几把面糊糊是常有的事，夏天还好些，有些同学家里需要人手干些农活，我就跟他们回家帮忙也能填个肚子。可冬天就惨了，白天吃不上，晚上宿舍里冷得厉害，我只好夜里起来到操场上跑步取暖。时间长了，到高三时，我身体顶不住了，经常头发晕。后来好心的班主任看我实在太可怜，便让我到他家，每周末使我能吃上一顿饱饭……

就这样我读完了高中。由于长期在贫困与压抑的状态下学习、生活，又临场没发挥好，第一年高考没考上。妈知道后说什么也不让我再进校门了。

这回我又忍忍心没听她的，重新补习，终于在95年以当地前几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又是惊喜又是悲伤，惊喜的是我终于考上了大学，悲伤的是妈妈此时已成了个躺在病床连说话都没多少力气的69岁老人。在我离开家准备到北京上大学与她告别时，老妈只有流不尽的眼泪和一双颤抖不止的手在拍打床铺……

王文喜说到这儿再没往下讲，那发颤的双唇叫人看后钻心地疼。

“你妈现在怎样？”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她了。姐姐来信说她病一直很重，就是舍不得花钱去看病。”

“她有钱看病吗？”

“有些。我给的。”

“你？你连填自己的肚子都成问题，拿什么给她寄呀？”

“总是有办法的。再说学校和同学们给我不少帮助……”

“寄多少？”

“每月 50 来块吧。”

我觉得这事发生在一位几个月只吃百十来元伙食的大学生身上，简直不可思议。但他确实坚持这样做到了。

“姐来信说，妈拿着钱从来不用。邻居去看她时，她便把钱拿出来，你们看，我娃上大学挣钱了……”

“老人家多么可怜哟。”我对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知如何表达对这样一位中国母亲的感情。斜阳下，校园绿色的草地上，倒拖着王文喜细长细长的身影，“瞧你这个样，何必非那样做么？”我指的是他寄钱回家的事。

王文喜坚定地说：“我只想苦了一辈子的母亲知道儿子是有出息的……”

唉，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让人心疼的母亲。

一个让人心碎的儿子。

“李骏，祝贺你成为我市今年高考状元！”1997 年度的高考成绩在市报上公开后，以 672 分高分取得理科第一名的李骏，一时间成了苏北盐城的“新闻人物”。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前来向他祝贺。

“状元有什么好的？念不起还不照样白搭！”谁知李骏把高高兴兴的一帮人给噎了个闷棍。

“李骏，这是怎么回事？你不仅是咱盐城市状元，而且也是全江苏第三名，复旦大学又以第一志愿录取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呀！”李骏的班主任有些生气了。

“老师，我不是成心的，你不知道我家……”李骏说着，鼻子就酸了起来。他把头扭到一边，不想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伤心。

“家里怎么啦？”

“您就别问了，我根本就念不起……”李骏知道再说下去，非哭出来不可，便借故甩下老师和同学径直回了家。

唉，这就是我的家！李骏望着自己家的那间即将搬迁的小平房，强忍住泪水。他弯下身子走了进去，见奶奶正在吃力地从小阁楼上把他 6 年中学期间获得的一大叠奖状证书取出来整理收拾。“孙儿，听说快要搬迁了，奶奶帮你把这些宝贝给理一理！”奶奶一边用布轻轻地擦着那些红皮的、蓝皮的、烫金的各式各样证书，一边用欢喜的口吻问孙儿：“都在说你成状元了，状元可了不得呀，旧时那状元郎要接到皇宫里，皇上还要亲自颁匾哩！孙儿啊，现在兴啥？就兴让你上啥复旦？复旦是哪儿？”“奶奶，在上海。”李骏大声在奶奶耳边大声说道，然后反问道：“奶奶，你说我们上得起复旦吗？”奶奶不明白，问为什么考上了大学咋还上不起？“奶奶，入学通知书上说了，一年光学费就是 4000 元，还要每月好几百元的生活费呢！”李骏尽量给奶奶说得清楚些。“咋这么多啊？”“对，所以，奶奶，我们上不起大学了！”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不明白这个理：“那你状元还算不算了？”孙儿无奈地朝老祖宗说：“算！状元还算！”“算就好。

算就好……”奶奶一听这，就放心地继续干她手上的活。李骏则长长地叹着气，两眼无神地落在这间伴他度过了 20 年的小屋。这是他和父母及奶奶 4 口人长年居住的家——一间不足 15 平米的小屋。因为拥挤不堪，从中学起的 6 年里，李骏便住在用一块木板架起的“小楼”上。那是一块上不

能伸头、下不能蹬腿的蜗牛地——李骏这么称自己的天地。但就在这块小蜗牛天地里，李骏默默苦学，先后拿下了 16 项（次）全国、全省的数理化竞赛奖，成了班上年年优秀的好学生。李骏知道自己家贫寒，所以他从不嫌弃自己家里的每一块地方尤其是那小阁楼，只是如今想到自己无力去上大学而觉得有愧于为他学习作出了那么多贡献的一板一凳……

李骏的父亲李立林是下乡知青，回城时，小李骏才 6 个月。母亲蔡苹虽然解决了户口，但一直没工作，且有先天性残疾。全家的经济来源只有靠在锅厂工作的父亲那几百元的微薄工资。李骏的父亲后来因腰椎间盘突出而长期请病假，工资就更少了。3 年前锅厂又因效益不好，基本停发了李骏父亲的工资。打那以后，全家人就靠上街卖报纸为生。李骏懂事，虽说他生长在这么困难的家庭里，但他从不自卑，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为了帮助父亲分忧解愁，他用稚嫩的双肩分担家里的重负。

放学回家，他帮奶奶洗菜做饭，吃完饭后又上街替换卖报的母亲。别人家的小孩子，逢年过节又是玩来又是吃，他李骏就一整天一整天地跟着父母在大街上卖报吆喝。就是在高考前 3 天，李骏还在帮着母亲卖报。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在参加高考的 3 天里，李骏天天还要抽时间替换母亲回家吃饭。

然而现实对这位勤奋而贫苦的“状元”太不公平了。他接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下，即被上面的 4000 元学费和未知数的生活费给惊呆了。哪来那么大一笔呀？父母栉风沐雨、起早摸黑一个月也就是三四百块钱，仅维持全家 4 口的生活就已经极其艰难。李骏学的是理科，他对自己家眼前的景况和一旦上大学后的这两笔帐太清楚了，所以从接到入学通知书那阵起，他的“状元”之喜，早已烟消云散。

当那些比他成绩差一大截、录取学校也非重点的“准大学生”，一个个喜气洋洋地串门走客、设宴宴请时，李骏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照常跟着他的妈妈在大街上卖报吆喝。倒是一些好心人却在为他悄悄做着事……不几日，《盐阜大众报》记者将他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进复旦大学的事刊登在报纸上。一时间，引起盐城人民强烈反响。与此同时，一位在盐城工作的复旦校友给母校领导反映了李骏的情况。

李骏的命运一下发生了巨变。

“你是李骏吗？我是复旦大学学工部应岳林老师啊，你的情况我们学校已经知道了。校领导非常重视，让我转告你三点：只要你努力学习，我们复旦不会让经济困难的学生辍学的；二是我们有减免学费的政策，你的情况我们核实后一定会妥善解决好的；最后我们学工部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其它事你来了再说。记住：一定要来报到……”9 月 13 日，李骏突然接到这一令他喜出望外的电话。虽然当时他心里仍没底，但第二天他还是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后，直奔上海。

15 日早晨刚到 7 点，复旦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应岳林家的电话便已经响起：“什么？你是李骏同学呀！好好，你在校门口等着，我马上去！”

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李骏就像是在做梦：他先被领到学工部新生报到处报到，然后又在应老师的协助下把宿舍安顿就绪，中午前他刚到校门口品味一下自己是否真的进了“复旦”，即被几位记者团团围住，请他讲讲作为一个新大学生对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的感想。

“我……我要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为新世纪祖国建设而读书！”

李骏终于激动地掉泪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真的进了大学，而且在代表复旦万余名大学生向祖国倾诉衷怀。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刊出了李骏在复旦校园的大幅照片，这回“状元”真的露脸了。

李骏的“状元”没白当。但像他这么幸运的人毕竟不多。赵永均就比李骏的命运差多了。

赵永均在内蒙古赤峰老家的那块地方，成绩也是响当当的。方圆几十里，哪听说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而且是名牌大学？

可赵永均那天到南京的东南大学报到时他好心酸。

场面好热闹，他赵永均长这么大还真是头回见：如潮的汽车，如潮的人流……赵永均开始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后来反应过来都是家长们成群成队来送新生报到来的！乖乖，车真好！瞧，那学生的后面简直是个“运输大队”呀！啧啧，不知哪个地方来的娇小姐，跟爸妈分手时还来个吻别！

好奇。新鲜。目不暇接……但等赵永均清醒过来，他猛然发现自己与这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看看，人家也是新生，却在父母和亲人们的簇拥下个像进宫殿的小皇帝那样趾高气扬，而我赵永均孤零零地穿着一身绉巴巴的衣服，手拎两只塑料旧包，整个就像“流浪汉”，充其量也是被人看作“打工仔”。他顿时脸上火辣辣的，慌乱地低下那颗从不轻易低下的头，像做什么错事似地靠着路边走。兴许因为只顾盯着自己的脚尖而没有注意前面，他突然猛撞了一个与他同年龄的新生。那新生嗷嗷娇地尖叫了一声，于是旁边的一位满身珠光宝气的中年妇女看样子定是作母亲的，狠狠地朝赵永均白了一眼：“走路怎么不看人哪？”说完，那女人拉起自己的宝贝大学生远远地躲开赵永均，嘴里嘀咕道：“怎么大学里还让叫花子进来么？”这话赵永均听得清清楚楚，他顿时全身像被触电似地僵在那儿……

许久，他那颤动的手不自觉地伸到口袋里——没错，是与别人一样的入学通知书！赵永均仿佛一下有了救命的力气，他看看从自己身边匆匆走过的人流，张开嘴巴就喊：“我不是叫花子，我也是大学生！”

可他发觉怎么也喊不出声，只有那苦涩的泪像决堤的潮水涌出眼眶……

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我的这副行当寒酸么！不就是因为我没有父母护送着跟来报么！我父母……赵永均一想起在大草原上的父母，再也没了想喊的力气。

赵永均忘不了那天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的情景。

“妈、爸，我被东南大学录取了！”赵永均最先把入学通知书给了妈看，然后又给继父。他想这回得让辛辛苦苦好几年供自己上学的父母大人好好高兴高兴，但却半天不见老两口说一句好听的，继父干脆长叹一声后背着手出门去了。

母亲更怪，躲到一边竟抹起眼泪来。

赵永均一愣，问：“妈你咋啦？”

母亲抬起泪眼说：“孩子，家里哪付得起那么多钱呀？”

儿子听这话，才明白了一切。父母是被入学通知书上的4000多块学杂费给闹的。赵永均低下方才还是那样骄傲的头颅，泪水一下溢满了眼眶，但他倔强地没让它流出来。他轻声地说道：“我知道这……”

赵永均确实知道父母在哀叹中没有说出的苦处与难处。6岁那年，赵永均的生父去世，当时母亲一个人带着连他在内4个小孩，最大的还不能帮她

干活，最小的才刚刚会走路，日子过得非常苦。许多年后，继父才走进了赵永均家。在这片贫困的草原与山丘组成的边远乡村，人们祖辈过着以放牧养畜为生、自给自足的部落式生活，交通的闭塞、信息的落后等等客观条件制约，即便你守着一座金山又能怎样呢？何况赵永均知道自己家连像样的几头马都没有，家人的生活每年都有三四个月的短缺。如果不是他自己咬着牙坚持上完小学上初中，上完初中又上高中，他早该到了跟人去远山相媳妇去了。赵永均心里明白，在他家乡，在他家里，像他这样一门心思想上学的人，除自己想法子外，不会有其它办法。至于家里，能不拖你后腿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第二天开始，赵永均就开始自己想辙。

他赶了几十里路，先到了乡政府，人家告诉他乡里没地方拿出这笔钱，再说也不能补你一个人。看着人家根本没把他这个“状元”放在眼里，他发誓再不进这衙门。

他还是采用了像上高中时的老办法——上亲朋好友那儿借。

“你怎么老借没见还呀？”朋友早已生气了。

“我、我不是刚高中毕业嘛。”赵永均每逢此时，总觉自己的底气特不足。

“那就赶快上山里圈个草场啥的，要不出山上南方打工挣大钱去嘛！”

“我都去不了……”

“咋？”

“我考上大学了。”

“嘿你小子，有出息啦！”

“所以想借些钱……”

“多少？”

“学费共 4000 多块，你看着给借吧。”

“唉！这一借是没个期限啦！”朋友长叹一声，拿出 500 块钱：“日后发达了可别忘咱山里兄弟呀！”

“不会。谢谢了。”

赵永均又跑到亲戚家。

“伯伯、伯母好。我考上大学了，想借……”赵永均刚说这儿，伯伯、伯母就把门一关，里面传出一句难听的话：“咱家又没菩萨，以后别老来！”

赵永均“扑通”双膝跪下：“伯伯、伯母就是菩萨，侄儿我给你们磕头了……”于是，他的额上留下一片红肿与泥块。

门，“吱嘎”一声终于沉重地打开。“苦命的孩子，我们也是没法呀！”

“侄儿知道。等上我完大学了，一定加倍偿还。”

“你就别嘴上说好听的了，上高中时你不也说过类似的话？”

赵永均顿时无言。

就这样，赵永均用了整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挨家挨户到亲戚朋友那儿借得了他认为可以上路钱，于开学报名前来到南京……在 97 级同班同学中，他路程最远，却没有一个家人送他上学，为此他悄悄流过泪。

（赵永均现在是东南大学大二学生。他说学校大概看他独立能力强，一进校就让他当班长。他因上学欠一万多元债款，没让家人知道，学校也不清楚。现在他主要靠假期打工解决学费和生活问题，日子过得仍极艰难。）今年 4 月，我到上海采访的第一个学校是华东理工大学，这个学校是上海几十所高校中贫困生最多的一所。学生工作部的老师特意给我介绍来了该校化

学专业的曾祥德同学。在我面前坐着的这位瘦小的同学身上，看不到一点点在东方大都市上学的那种特有的上海大学生风采。他穿得上大下小，似乎蛮新的罩衣和很旧的球鞋，以及低着头、搓着手说话的情态，一看便明白地告诉你这是个“山里娃”。

只有知识和语言属于这座著名大学的学子。果不其然。

“我到上海读大学一年多，没上街出去过。只有在香港回归那天学校组织上了一次南京路，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了。”曾祥德同学说。

“老师说你是95年考上大学的，怎么你现在才是96级生呢？”

“我考上大学后整晚了一年才有学籍的。”他说。

“为什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里没有钱，我就出去打工，给耽误了。”

“那——你当时没怕失去学籍？那样不就遗憾终身么！”

“我当然知道。可……当时什么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时，两眼泪汪汪。

“能给我说说吗？”我轻轻端过杯中水，怕触痛他的伤痕。

曾祥德同学稳了稳神，说：“可以。”

下面是他的话：我的家在四川丘陵山区，全家6口人，种4亩地，丰年时够吃，能卖点农作物换些油盐酱醋的现钱，一到灾年就有四五个个月靠东借西挪过日子，所以我的同龄人中一般初中毕业就休学了，不是在家干家活，就到外地打工。我6岁上学，同时也开始帮人家干活。8岁时就能挑水、打猪草，10岁便能下地与大人一起干农活。父亲在一家窑厂帮活，后来弄伤了身体，花了不少钱，家里因此欠了很多债。中学毕业后，父母让我去广东打工，说村上的小孩都去了，你也该为家挣钱了。我没听，因为我心里有个“大学梦”，为此可想而知我的高中三年是怎样结局了。我在家里是老二，老大出去打工挣钱了，家里就剩我是主劳力。记得读高二时，父亲正巧在农忙时把脚扭伤了不能下地，母亲本来一直有病躺在床上。地里所有的活就我一个人干，十四五岁的人，在城市是“花季、雨季”的宝贝儿，可我们不行，不仅要干繁重的活，而且还得挑起全家生活与劳作的重任。那12天里，我不分日夜地干，硬是一个人又是收割，又是播种。乡亲们一提那年“二娃”的事，至今还能说出个一二。我的小名叫二娃，他们说二娃将来准出息。可不，高考我一下考取了，被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录取。爸妈对我上大学并不怎么高兴，他们觉得上大学还不如去广东打工。说你上大学4年，一分不能为家里赚钱，还要一年花几千元的学费，这里外里，4年家里要损失多少？就说大学好，可以后毕业了还说不准连工作都找不到，不还去打工吗？所以劝我别上了。我哪能同意嘛！穷山沟沟里十几年上学你不知有多苦！我绝对不会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可是总不能两手空空去上学呀！入学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学费和学杂费几项加起来得4000多块！上哪儿弄出这么多钱？亲戚朋友也没富人，自个儿家里连吃饭都成问题，当时我真觉得走投无路。父母毕竟心疼儿，最后悄悄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给卖了。当我从他们手里接过那几百块钱时，我就有自己上大学是一种罪过的感觉。可几百元的耕牛钱与几千元学费之间还差远着呢！不得已，我流泪告别家人，踏上了漫长而遥远的打工攒学费的艰辛之路。

我搭上四川到福建的火车，到了福建永安的舅舅家。我选择这儿是希望舅舅能帮我一把，因为我必须在一个多月之内把4000多元的学杂费挣到手。结果一到永安舅舅家，心里就凉了：舅舅家比我家好不了多少，更主要

的是我的舅娘是他的第二个老婆。那女的太厉害，舅舅干什么事都得看她的脸色。我这么一个外乡人突然进了她的家，吃着住着，她哪会有好脸色嘛！没几天，我已经觉得再不能在舅舅家呆了，便决定搬出来。舅舅好心，背着舅娘给我弄了辆三轮板车，说永安城内交通不便，你有个板车可以拉点活能养活得了自己。我失望地看着自己的舅舅，可又能说些什么呢？

后来我租了一间小破房，每月 30 元，小得只能仅够我躺下伸直。住定后，我就开始找活打工。先是到建筑工地搅拌水泥，后来又卖菜。可永安是个小市，啥都不是那么景气，干啥都赚不了大钱。我很着急，越着急则越不灵，人生地不熟的，好挣钱的活也轮不到我呀。

于是我又做起收破烂的活，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一直穿巷走街到天黑。就这么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人家说省吃俭用，我是常常不吃不用，到头来也才挣了 1400 元。这时已到开学的时间了，我原本认为出来打工一两个月就能把学杂费挣回来，然而我千里颠沛、受尽苦难，仍然计划落空了。当我在永安街头收破烂时见到人家扔下的报纸上说全国的大学已经全部开学时，我呆呆地坐在大街上欲哭无泪……一些新开学的小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扔下几个“可乐”瓶，说：“收破烂的，送你吧！”然后哈哈大笑走了。我当时正想告诉他们，别搞错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名校大学生！可我说得出口吗？说了又有谁信呢？我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样，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子，凄凉地沿街吆喝着：“有破烂卖喔——！”我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吆喝声，因为我心中仍然编织着“大学梦”% 12月8日，当我怀揣3000多元钱，来到上海，找到我心中久已向往的华东理工大学时，老师惋惜地告诉我由于来得太晚，他们不能再准许我注册入学。我一听差点当场晕倒，好在后来他们说可以给我保留一年学籍。有这话就行，我就开始在学校餐饮服务公司打工，但又有人不让干了，说学校有规定不是本校的人不能在学校打工。我好伤心，因为从情理上我也该算是学校的人呀！无奈，我把3000元钱存在学校的储蓄所，又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

在走出校门的那一瞬间，我回头向学校默默地说了一句：“明年，我一定要上学……”

1996年9月，曾祥志如愿以偿，成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正式学生。只是这一程，他走得太艰难太漫长。其实，在每年近百万的新生中，像他这样的又何止一个！与此同时，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当他们历尽心酸迈进大学门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一个又一个不曾想到的沟谷与坎坷呵……

不过比起另一些同学，曾祥志仍算是幸运者。

1998年初，北方重镇沈阳闹市区的街头，突然连续冒出一群从贵州山区来的少男少女在沿街乞讨，引起了不同一般的围观者——“真可怜，考上了大学还念不起书。唉！”

“得，把我这下岗前的最后一次工资也捐给你们吧！”

“谢谢叔叔伯伯、阿姨婶婶们的菩萨心……”

捐助者与受助者这一幕幕场景无不催人泪下。一位退休老工人甚至义务招呼过往的人群：“都过来看一看这些苦孩子们，让我们一起拉她们一把吧！救一个大学生就是为国家植一根建设栋梁呀！”这样的鼓动词谁还忍心匆匆离去？

看一眼吧：天，现今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善良的沈阳居民们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她（他）们下岗失业者更苦的人。快看，这些孩子也就十七

八岁，胸前一个个挂着一块用硬纸做的牌，那纸牌上是叫人揪心的“乞文”：“我是一个处于山穷水尽的贵州山区农村的学生，很荣幸在 1996 年考中黔东南州民族师范学院，学制三年，每年要交学费 1800 元。由于家庭经济来源很差，加上弟弟去年也考上大学，父母只好去富裕人家借钱。在进校的一年里，全靠贷款度日……去年夏季，我家乡受到有史以来的特大水灾，洪水无情地冲走了我家的三间木房和所有财产，如今家中一贫如洗。为了保证弟弟上大学，我只好以泪洗面，沿街乞讨，惟望各位同情者伸出友谊之手，见难相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掏吧，不救这样的孩子救谁？沈阳市民纷纷解囊……但没过几日，报纸上披露一则惊人的消息，原来这些沿街乞讨的少男少女，是个假冒“贫困大学生”的诈骗集团。共 31 人，全都来自贵州山区。她（他）们在一位叫王勇的人指使下，一路行骗至沈阳。现今这 31 人中除 2 人外逃外，全部被公安部门关押收容。

沈阳市破获的这例冒充“贫困大学生”行骗的案件，在中国过去从未发生过。王勇他们的案件被曝光时我正在华东采访，不想真的遇上一位为了上大学而几度当乞丐的华东某大学学生。

我得首先感谢我老家的几位朋友提供的线索，因为没有他们提供线索我根本找不到那些隐姓埋名在大学城里的“乞丐”，正是这些好心人使我了解了故事外的故事。

苏州是我的老家，在这片富饶的江南水乡，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三、四十位后来都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金科状元，因此这儿的父老乡亲们对读书人一直极为珍重。大概也正是这一点，被一些出于无奈的“今日状元”所看中。我故乡的朋友告诉我，曾在 1995、1996 年两年的八、九月份里，富裕一点的乡镇街头和车站码头边，出现过好几位前来乞讨的大学生。江南人本来就心善，加上家家户户富裕，这些讨钱的大学生几乎都能如愿以偿。后来街头路边这样的“乞丐大学生”多了，于是便引起了当地公安派出所的注意。某日，在锡沪公路沿线的名镇支塘一带，公安人员突击出动，把一名正在街头举着“乞文”的大学生“请”进了派出所——公安人员：“你叫什么名字？”

学生：“我叫 XXX。”

公安人员：“什么地方人？”

学生：“安徽 XX 人。”

公安人员：“为什么要到这里乞讨？”

学生：“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家庭困难，交不起 4000 多元的学费……”

公安人员：“拿出你考上大学的证明材料。”

学生便从口袋里拿出学校录取通知书和高考分数单等。之后，候审室里除了一名看守的警察外，其余公安人员不知为什么进了另一间屋。方才还并不在乎的这位学生开始紧张起来，看着墙上“滴滴”走动的闹钟，他忍不住“呜呜”大哭……

“对不起，XXX 同学，让你委屈了。”屋里又突然进来好几位公安人员，其中一个当官模样的异常亲切地对他说：“你可以走了，因为刚才我们与录取你的某大学取得联系，证实了你的身份。”

学生听后，先是一惊，继而更加放声嚎哭起来：“完了！我还没进大学校门，学校就知道我在外当乞丐，我的脸放哪儿呀？……”

公安人员赶忙说：“我们并没有把你在这儿的事实真相告诉学校嘛！”

“真的？”

“这还有假！”

学生顿时破涕为笑：“谢谢你们。”

“先别忙走。”有人叫住他，并郑重地交给他一个红包：“这是我们全所同志刚刚集得的 1200 元钱，一点心意，祝贺你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

学生接过红包，“扑嗒”一下，跪倒在全体干警面前，早已泣不成声……两年后，我几经周折才与这位学生见上了面。

“真对不起，如果不是知道你也是曾经给予我大恩大德的苏州老乡，肯定你的采访会失败。”见面第一句话他便这样告诉我：“尽管如此，在学校里还是没一个人知道我曾经是靠做乞丐来上大学的……”

“为了面子？”

“不！”他非常严肃地回敬道：“你完全说错了。”

“哪又为什么？那些钱来供我上大学。政府帮助？不行，乡里、县上都靠吃国家救济，你跪下来求人家也没用。一天夜晚，我跟父亲坐下来认真地作了次对话。我说爸你只要说一声同意我上大学去，其它的事你就甭管了。父亲说你考上大学也不易，但家里这个样原本还想让你帮着支撑，可现在你要走，求个出息，我不反对，只是希望可能的话在上大学后能帮家里搭一把手。当时我听了太伤心，想上大学又不是去打工，一年几千学费让我这个两手空空的人对付就已经难上加难了，哪儿还能有啥办法帮家里搭把手呢？可我知道父亲说的是心里话。村上像我这个年龄的青年，都到外地打工挣钱去了，父辈们生在山里长在山里，他们只听人说山外面能挣大把大把的钱回来，并不知道那钱在外面也不是好挣的。为了不让父亲失望，我违心地点头同意了。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第三天，我就像村上的打工仔一样，背起铺盖，离开了家乡。父母所能给我的是卖掉了奶奶那口寿棺的 150 元钱和 20 个熟鸡蛋……”

走出大别山，我没敢直接到我所要上学的那座城市，而是直径到了苏南的一个乡镇找我在该处打工的同村老乡。当时我有两个打算，一方面早知那儿的经济发达，乡镇企业多，看能否找份既现成又能挣大钱的工打。

另一方面想到几位要好的同乡那儿借点钱，凑够我的学费。但一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才发现自己临出家门时的想法过于乐观。要说在苏南一带找个工打并不算难，可想一个来月里挣够能让我跨进大学门的钱就不容易了。同村打工的老乡那儿几乎也没有什么钱可借的，因为他们工资的大部分要等年底才能拿到手。我初中的同学很仗义，听说我借钱是为了上大学，就到他的老板那儿想提前把工资要出来，没想第二天他被炒了鱿鱼。之后我再不敢轻易到同乡好友那儿提借钱的事，便琢磨着想别的辙。

后来我发现苏南一带那些有钱的家庭妇女、特别是上些年纪的妇人，很爱烧香拜佛。于是我从一个小摊上花了 5 块钱买了一本“八卦算命书”，并用了一夜功夫熟读了几遍。第二天我就悄悄来到一个小镇的服装小市场，挨摊向那些上年纪的妇女问要不要算命。还真有人前来凑热闹。或许是我心里老惦记着能挣钱上大学的事，所以每次给人看相说事时我特别认真，尽量把自己以前学到和听到的那么一点半玄半虚的所谓“积累”都用上，因而时不时能让几个心事重重的算命对象相信一二。第一天尽管口干舌燥胡说了十来个小时，最后还是挣得了 20 多块钱。有了第一天经验，第二天我的“生

意”翻了一倍，得钱近 50 块！夜里，我躺在同乡的宿舍里，暗暗思忖着如果照第一、第二天的水平，不出一个月，我就有可能把上大学的学费全部挣到手哩！哈，看来我上大学有救了！那一夜，我睡得特别的香……等醒来时，发现已经大天亮。

第一部失泪大学城《3》“小半仙，起来起来，快请我们撮一顿吧！”新一天正好是工厂休息日，我的几位同乡硬要我请他们吃一顿。我想了一下也该酬谢酬谢他们给了我一个立足之地，于是便痛快地答应了。一进饭店，看几位同乡像几年没闻到油香味似的，我心头一阵酸疼，咬咬牙，把刚得来的 70 元钱一下花去了整 60 元。吃完饭，同乡们回到厂子又去加班，而我重新开始“算卦生涯”。偏偏这天乐极生悲，来了霉运——当地公安、文化部门联合“打非扫黄”，把我这个“嫌疑犯”也一起抓了进去。执法人员查问半天，我也没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用意，咬定是为了混口饭吃。虽然在里面没受啥罪，可蹲在小黑屋里的那六七个小时直叫我心惊胆颤，想这回钱没挣到，弄不好还把自己一生前程给搭进去。执法人员搜了一通，看我身上除 10 块钱外，就是一本脏兮兮的“八卦算命书”，便扣下书后放了我出来。在走出铁门的那一瞬间，我的两腿都软了。你问为什么？我庆幸啊！我庆幸那天把自己上大学的那些手续全放在了同乡宿舍里，要是那天带在身上被查出来多丢人！

我再不敢干骗人的“算命”勾当了。当我迈着沉甸甸的步子路过那个服装市场时，有人突然猛地抱住了我的双腿，我吓得大叫一声。低头一看，原来是个面相丑陋、身体佝偻、失去双足的乞丐，爬在地上可怜巴巴地向我行乞：“我、我知道你是仙人，行行好吧，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家里还有一个可怜的老母，你要不信我这里村里、乡里的证明……”那乞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份盖着红印的绉巴巴的纸要我看。还有什么说的，也许是同病相怜，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 10 块钱扔给了他。

那乞丐在我身后“扑哧扑哧”地磕着头，我怎么也不敢回头再瞅他一眼……

那一夜，我转辗难眠，眼前总是晃悠着乞丐的影子。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自己虽然四肢齐全、五官发达，可骨子里连那乞丐都不如。人家有难处，明明正正向人要、找人讨，我呢，却假装斯文给人算命骗钱。又不知是哪根弦牵动了一下，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奇怪念头：何不干脆亮出自己是上不起学的大学生！听说这儿的人历来尊重读书人，兴许他们能帮我大忙哩！主意一定，我就从同乡那儿借得一纸一笔，把自己的情况往上面如此这般的一写。你不要笑话我，当时我往纸上写下那段话时几乎没费任何脑子，就像往外倒苦水似的，眼泪跟着墨水走……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我知道苏南一带的人爱上早市，于是便早早来到某小镇，选择了一个人多的十字路口，开始了我的乞丐生涯。

你问我第一次当乞丐什么感受？唉！一句话两句话真是说不清。这么说吧，我当时把贴在一块硬板上的“乞文”竖起后，自己的头就再也没有抬起过，甚至连眼睛都不敢张一张。

我惧怕别人走近，怕人家当我一个无赖，一个只会向别人伸手的懦夫。可我又希望很多很多的人走近我，向我问这问那，直到最后掏钱……唉！我心里矛盾极了，说实在的，当我低着头、坐定街头那冰冷的地面时，我就后悔死了，如果不是听到已经有脚步声走到跟前，我可能就扛起讨钱的那块牌

子逃跑了。但已经晚了，我感觉已有很多人将我团团围住。最初听到的是有人奇怪地在问为啥年纪轻轻的当起乞丐来了？后来就有人开始读起我的“乞文”来，随即是一片喧哗与惊叹声……之后几乎都是这样，有人认认真真、反反复复读一遍“乞文”，紧后便又有一些人在大发慨叹或议论。虽然他们谁也没有碰我一下，而我则仿佛在这时起起伏伏的慨叹与议论声中，被人无情地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地将身上的衣衫扒个精光，什么尊严，什么羞耻，统统被各式各样的锐利目光所吞噬了。不知咋的，好像前后还不足十来分钟，我的额头却已大汗淋漓，而身上却冷得瑟瑟发抖。我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咬着牙关告诫自己挺住！挺住！可越这样就越不能自控，完了完了，我明白自己只有最后一点力气了，就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我扛起那块行乞的牌子，冲出人群，不知用了每秒多少米的速度跑到了一块无人过往的玉米地边，扑通一下瘫坐在田埂头，抱着牌子，情不自禁地大哭了一场……当眼泪再不能流出来时，我发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了。你想，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当乞丐更低贱的？而我连一个乞丐所应有的那么一点勇气和能量都拿不出来，我还能做什么呢？还能朝大学的路上迈开步子嘛？想到这里，我像疯了似的狠狠用拳头揍了自己，当我再次出现在街头时，我真的成了一个实足的乞丐——既可怜又污秽，既颓废又有些垂死挣扎。

如果不是亲身体验，谁也无法想象得出一个乞丐内心所感受的那种痛苦与扭曲。有一天我在某小镇的一家服装厂门口行乞，那时已近下班时分，在毒日下烤坐了好几个小时后，我感觉已经快要虚脱了。这时有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街头闲逛人走过来，他们先是围着我数落一通，然后其中一人拿出一张 10 元钱的票子在我面前晃悠着，阴阳怪气地说考上大学的人都不简单呀，肯定你的脑子很灵了，这样吧，你跟我们玩几把麻将，如果赢了，这钱就归你怎么样？我一看他们不是正经想帮我，便回答说不会麻将。

他们便说那就玩抓阄，谁输了谁付钱。我知道今天不陪他们玩几把就别想有好果子吃，于是只得搁下行乞的牌子，开始跟他们试几把。当时我想凭着双方各百分之五十的输赢概率，我也该有些机会。但开战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赢的可能，我越着急，就输得越快，结果没两支烟的功夫，口袋里乞讨来的 50 多元钱全部掏空了。等我发觉自己上了别人当时，那几个人却得意忘形地拿着赢我的钱在一个西瓜摊上狂吃了一通，最后他们把一堆西瓜皮扔在我的跟前，说像你这样智力低下的大学生只配吃瓜皮。

被嘲讽数落和烂西瓜皮淹没的我呢，又懊悔，又羞愧，简直无地自容。我心里不知哪头一下涌出的气，抓起西瓜皮就狠命地朝自己头上砸，一直砸得浑身泥污，泪流满面……街头的行人以为我疯了，远远地躲着，那些顽皮的小孩则用瓜皮和饮料向我扔来，嘴里还一边冲我说着脏话。可我已经不在乎了，并装成疯子似的跟他们逗乐嬉闹。这时的我，脸上露着阿 Q 式的笑容，用夸大的动作在街道上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而心头却在一点一滴地流血……

如此几天以后，我感觉自己的脸皮厚了，神经也不再那么敏感了。

别人怎么损、怎么挖苦，我都麻木了，惟有我的心境依旧，那就是凑满足够的钱，我要上大学！而正是为这，我行乞了数十个城镇，走遍了苏南大地。期间，我露宿过，也为躲过市容执法队的搜查而屡次装扮成小贩。但我也碰上了无数好心人，特别是一次在我半途中暑昏倒在街头时，几位好心人把我送进了医院。当我醒来发现口袋里多了几百元钱，却找不到一位留名

留址的恩人。

9月初，大学开学了。当我拎着一书包鼓鼓囊囊的钱票到学校报到时，学生处的老师一边点钱一边很不耐烦地问我是不是做买卖挣来的钱，我告诉他们说是，我是卖我自己。他们奇怪地看着我，不明白我说的什么。我心想，这个秘密永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

这位同学给我讲完他的“乞丐生涯”后，留下一句“代为保密”的话后，便消失在大学城内。在后来的调查采访中我才知道，像这位学生有过乞丐经历的，在每年的大学新生中不止一两人。在他（她）们沉重的脚下，都留有一串凄怆悲凉而又执着的足迹……

第2章：失落的“天之骄子”

1997春节刚过，像所有大学生一样，英子匆匆地收拾起行李，踏上了返校的归途。春风拂面的新学年校门内，刚刚从父母身边归来的同学们一个个欢天喜地地倾诉着回家的新闻以及过年的开心事。唯独英子坐在教室的一角默不作声，她的脸上丝毫不见喜色，反而比放假前多了一层深深的愁云。

“英子，你怎么啦？这么不开心，是不是回家相了个对象分手几天就害相思病啦？”同宿舍的女同学拿她开心，想让英子露一点笑容。

谁知，英子不但没有笑容，竟伏在桌上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全身都在发颤。同学们害怕了，远远地躲到一边。大家知道英子有个苦命的家，天下的好事似乎从来就没有降临过她的身上。唉——，同学们无奈地长叹一声，方才的那份欢快已荡然无存。

老师走进教室，新学年宣布开始。英子抹去泪痕，与同学们一起打开书本。

“英子英子，快快，你的急电！”

才离家不到10天，又出什么事了？英子的心七上八下，赶紧展开电文，上面明白无误地告诉她：家里有急事，务必让她回家一趟。

英子急急地请了假，从成都连夜上火车，直奔千里之外的山西资中的那个偏僻的老家。

一进门，英子迎面看到的是母亲那双含着泪水的目光。

“妈，出什么事了？”英子急促地问。

“孩子，妈对不住你……”母亲还没开口，就呜呜地先哭个不停。

“说呀，妈！”英子用力摇晃着母亲的双肩。

母亲终于抬起了泪眼：“英啊，前些日与你定亲的那个小伙子不是你的真对象，他是你定亲对象的哥。”

“啥？啥啥？”英子眼前一阵晕眩。随即，她定了定摇晃的身子，抽身出了家门，直奔那个媒人家。

“骗子！骗子——！”此时的女大学生英子像头发疯了怒狮，一边骂着，一边举手奋力向那媒人的脸上狠狠抽去……

“天哪，我为什么这么苦命啊——！”面对苍天，英子失声嚎哭。

英子是成都某大学的在校学生，不应该有对象，更不应该发生定亲一类的事，然而英子却真的有了一个在广大农村普遍公认为“既成事实”的已经走完相亲定亲程序的婚约，且这个“既成事实”才刚刚发生于她新学年开学的前十来天时间内。已是大学三年级的英子，已是受现代高等文明教育的英子，尽管死也不想记住这个日子，但那屈辱无奈的一幕又使她无法忘却这个日子：1997年2月14日。

这一天，异常料峭的寒风肆虐着英子的家乡。父亲江泽高和无主张的母亲忙里忙外地张罗村上乡邻和亲戚们在院子内胡吃海塞着“订婚酒”，在他们心里似乎在里屋那哭得死去活来的大学生女儿英子根本不存在一样。

哭吧，英子，你本不该放假回来，你更不应该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答应一桩为了学费而牺牲青春、牺牲前途的草率婚约。哭泣中的英子此时更没有想到在这桩无奈的婚约中还隐存着一件比眼前的“订婚酒”更愤懑的事……

英子哭，她哭自己的命。父亲老实巴交，但老实得叫人有时拿他没有办法。英子有一个姐，一个弟，一个高龄的奶奶和一个多病的母亲。能为家里帮个忙的大姐远嫁后，父亲便一个人背起全家生活的沉重负担。好学上进的英子从小学到初中，在班上的成绩始终名列第一。本来为解家庭困难而考中师、中专的英子在考试时大病一场，最后只得到县上念普通中学。但只读到高一的英子因见父亲数天借不到学费而忍着心酸办了停学手续，装上几本书籍，带着仅有的10元钱，只身闯到成都打工，以求日后挣得学费再进教室。

打工妹的辛酸可以用泪作书，而一心想重返学门的英子打工岁月则可以用血撰书。一天，英子在一家个体纺织加工点织毛衣，别人忙里忙外正在搬运货物，老板娘李姐找不见英子，左喊右叫，最后在厕所里发现英子正如痴如醉地在看书。

“你这个不要脸的！别人都忙出尿来，你却躲在尿堆里看臭书！我让你看！我让你看——！”老板娘愤怒地抢过英子手中的书本，撕了个两半，狠狠地扔在地上。

英子望着破碎的书本，心也跟着碎了。

是夜，经规劝后的老板娘李姐来到英子的宿舍，默默地把自己动手撕坏的书擦了又擦，然后从口袋里拿出300元钱，对泣不成声的英子说：“妹子，姐刚才做得不对……你，还是回去读书吧，这打工不合你的心境。

先把这钱拿了，以后有难就找我李姐。”

这是英子所没有想到的。她要跪下给好人磕头，但被李姐扶了起来。

入夜，英子左思右想，300元虽是个不小的数，但还是不能供自己读完一年的学业呀！

于是英子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拿这本钱，做点小买卖。就这样，1993年春节一过，英子满脸笑容地重新走进了高二的课堂，这回她自豪地告诉同学和老师：是自己打工挣来了学费。

1995年，英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曾经洒满泪水的成都某高校。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英子满面春风地向西南方向的那座遥远的城市深情地遥望了许久，她心里一次又一次对那座城市说：成都，这回我可以昂着头向你走去，我不再是以一个打工妹身分去请求你的施舍，而是以一名光荣的大学生去拥抱你！

春风中，英子笑得那样开心。而此时，远天正掩着一股浓重的阴云向她刮来……

父亲江泽高这一夜也很兴奋，但兴奋之后他掰了掰手指：一年 3000 元学费，3 年就是 9000 元哩！这还没算其它日常生活啥子一大堆费用呢。老江发起愁来，他推醒一旁的老伴：我看英儿考上大学也太不易了，咱再穷也得让她上这个学。是喽。老伴说，要不把圈里的那几头猪给卖了，凑凑。老江说，行。

第二天天黑时，老江回到家，见老伴便说：猪儿卖了，这回英子上学的钱差不离了。说完便伸手去口袋里掏钱。这一掏不要紧，老江的脸一下灰了：呀，我的钱到哪儿去啦？钱，我的钱！钱到哪去啦？！

老江跳了起来！老伴闻讯更是吓得惊惊颤颤地围着老头子直转：你咋整的么！咋整的么呀！

顿时，哭声、嚷声、嚎声，震荡了整个小山村。英子看着绝望中的父亲和母亲，突然大声吼道：“你们、你们不要吵了！我、我不上大学行不行了？！”说完，英子冲出院子，消失在无边的夜幕之中。

江老汉丢钱的事后来传遍了四方乡邻，农家女子英子姑娘刻苦求学的精神也感动了乡亲们。一位好心的乡干部以自己的房子作押，帮江泽高家贷了 2500 元款。这回受感动的是英子，她带着父母和乡亲们的重托与亲情日夜兼程赶到成都，就是这样的速度她还是比学校开学时间晚了整 20 天，是全校新生最后的一名报到者。老师和校长听了英子的诉说，没有多余的话：“你的情况特殊，什么事都别提了，进教室上课去吧！”

英子终于走进了大学圣殿，这是她向往了多少年的梦，当她坐在明亮的教室时，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同学们很快发现英子常常在课余间不知去向，甚至有时星期天节假日整天无影无踪。同寝室的同学问她上哪儿去了，英子不是推说上亲戚家便说探访好友什么的。然而同学们对她的特别行踪总是放不下心。一日，英子离开校门向外面出走时，几位同学悄悄跟在了后面……“秘密”终于发现了，同学们感到震惊的是，英子这位农家弱女子竟与一群壮小伙子混在一道当起了卖苦力的“搬家工”。

“英子，那么重的家具你当心啊！”望着瘦小的同窗好友吃力地搬着沉重的家什一步一步挪动在楼梯的情景，躲在后面“侦察”的同学们不禁心疼地喊出了声。% “是、是你们呀！”英子听到熟悉的声音，转头一看是自己的同班同学，顿时全身一阵抽动，手中的家具顿时脱落而下，重重地砸在了脚上……

“英子——！”同学们呼喊英子的名字，将倒在地上的英子扶起时，楼梯内已是一片泣不成声。

学校得知了英子的事，很快为她在校园内安排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业余在图书馆管理图书，每月 20 元。20 元对一位普通的城里姑娘来说，就是多吃或少吃一两个冰淇淋而已，但对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大学生英子来说，可就意味着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至少，一天可以让肚子能进上一汤半勺呀。英子在艰难与感激中读完了第一学年，但新学年开学不又要交 3000 多元吗？要强的英子暗暗下决心：利用暑假狠狠地挣它一笔。她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暑假打工之上，英子心里明白，如果不打工不赚足钱，就等于失去重返大学门的机会！

这是一个穷家学子的命运生死战。

英子为了赢得这场“命运生死战”的胜利，真是急红了眼。这时，她正好碰上当年一起在成都的几位“打工妹”欲南下广州“挣大钱”去。

“我也去！”一听那边有大钱挣，英子义无反顾地跟着姐妹们搭上火车。

辗转多日之后，凭着大学生的独特优势和熟人介绍，英子终于在一家电子加工厂有了一份工作。老板不错，每月出薪1000元，另加30元的生活补助和提供简易宿舍。这对外出打工的英子来说，就等于遇见了“焦裕禄”。正当英子好高兴好卖力时，她抬头看了看日历牌，一下愣了：距开学只有10多天时间了！咋办？英子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也寻觅不出一个好办法，最后她一横心：挣足了学费再说！

干起活来的英子不要命，而老板也格外欣赏这个山西妹子，便提升她为车间班长，薪水更优于别人。

正当英子卖苦力欲挣大钱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老汉家突然接到成都那所大学来信，询问英子为何不去上学？“这鬼丫头，上哪去疯了？”江老汉夫妇差点急出毛病，左打听右打听才知道原来“鬼丫头”上广州打工去了。有病的母亲一听更是一卧不起。医生诊断说如不及时治疗，就有终身瘫痪的可能。

江老汉跑了几里路，给远在广州的英子发去一封急信。

接信的英子见母亲的病讯，心如火焚，上老板办公室乞求着提前要回了自己的工资，星夜兼程赶回山西老家。一进家门，英子见了二老，立即掏出自己的血汗钱：“爸，快去请最好的医生，一定要给妈治好病！”

卧在床头的母亲老泪纵横：“英啊，妈妈不中用了，你爸他年岁也大了，你把钱留着还是去成都上学吧，啊？！”

英子两眼溢满了泪水，但她强忍着没让它流出来。她安慰妈：“妈您啥都别想了，看病要紧。”

不知是英子的孝顺感动了老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母亲的病情真的缓解了。

成都。某大学。

班主任黄君蜀老师正在又一次寻思着英子的事，一位农家老妇却突然出现在面前。

“您就是那个大恩大德的黄老师？”老妇人这话让黄君蜀一惊。

“正是。我就叫黄君蜀。您是……？”

“我是英子她妈，从山西赶来的。”老妇人说。

“啊哟，大娘您快坐，快坐。”黄老师忙让坐、倒水，“英子呢？

她怎么没来？”

“老师哪，英子她命太苦。都是我们家穷，害了她呀……呜呜，呜呜呜呜……”英子的母亲再也忍不住地痛哭起来。她用最简单的语言向老师诉说了自己那个穷家和英子为挣学费而南下广州打工的事。

“老师，我求求你，行行好，千万让我英儿再来上学，她太爱读书了，不让她上完大学我和她爸这一辈子就别想心安了。”英子妈屈下双膝，要用她所能做到的大礼求老师为她的女儿开恩。

“别别，快起来，起来。”黄老师赶忙将她扶起，“我马上向学校汇报，你先等着。

”学校领导听了黄老师的汇报，十分同情英子，决定破例恢复她的学籍，降一年级。

还有什么能比重返大学更好的了？英子妈满口言好。当把这个好消息带回家时，老人家没有料到一件比她千里迢迢上成都求黄老师给英子恢复学籍更难的事正等待着她。

原来，英子那 21 岁的弟弟前些日子相了门亲，姑娘家这一日突然托人带信说要 5000 元彩礼，否则扬言说要断了这门亲事。贫苦的农家娃相门亲不易，江老汉一听这就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英子妈正是这个时候从成都回到家，她不知其情，只顾先把英子能重新上大学的事给家人说了。本来这几天就发愣的儿子为女方退亲一事愁眉不展，一听娘说姐还要在大学念 3 年书，他原本想全家咬咬牙兴许能想个办法把 5000 元的彩礼给凑齐了。这回完了，姐还要念三年大学，光凑姐的学费都不够呀。英子的弟弟一想这，两眼一黑，等家人不备，拿起一瓶剧毒农药就往嘴里灌……好在发现得早，这位可怜的娃儿没出大事。

但江家老两口可作大难了。江老汉成天长吁短叹。英子的妈看着一家人这个样，横横心，来同英子商量：英儿，前几日有个媒人来说有个男娃家里挺富有，自己也一个月挣 1000 来块，还说“你们急啥？我还要念完大学呢！”这回轮到英子大声说话了。

行行，既然是一家人了，啥事都好商量，好商量。“对象”很开明，并且不无气度地一挥手，说：英子上大学的学费，还有生活费，我全包了！

英子就这样带着满腹的苦涩，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大学。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好不容易刚刚重新踏进校门，又一件愤懑不已的事正等待着她。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一幕……

英子可能是千万个穷人家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最苦命的一个，但她后来回到学校，愤然提笔同男方解除了这桩荒唐的婚约，抹干眼泪，勇敢地接受了贫穷带给她的人生挑战。然而英子不是贫困生中最可怜的一个，因为就是在发生这件事时，她毕竟在大学已经走过了 3 年时间。

而更多的贫困生发现，在他们用血和泪追求到的大学“入门券”，父母们卖牛卖地千里迢迢把他们送进校门后，迎接他们的不光是朗朗读书声、高高教学楼和浓浓学术课，还有甚至比上小学、上中学更多更沉重更无尽头的苦难在脚跟前等待着、困扰着、考验着他们。

这事发生在 1997 年某市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门前：又是个热闹异常的新生报到日。那校门前举家送子送女来上大学的人群如潮，不过惹眼的还是鸣着笛声的各式各样车流。你在这里尽可以观赏到平时在大街上都不多见的加长“林肯”、“奔驰”500 型，至于像日本的“丰田”、德国的“宝马”，此时也已风光失色。从那些车里走出的家长自然个个都是春风满面，在他们身边的那些新生才是真正的“骄子”——他们的眼里似乎根本看不到别人的存在，仿佛大学本来就是专为他们而开的……

突然，在校园马路的小树林里悄悄走出一个瘦弱的身影，在那个身影的左肩上斜背着一只书包。在那沸扬的人流车潮中，谁也没有注意他的存在，更不会留意他准备做些什么。但有人却无意看到了那惊愕的一幕：那个背书包的他，将手慢慢伸进书包，然后轻轻抽出一——天，他抽出的不是方方正正的书卷，而是一把明晃晃的刀子！随即是个飞快的动作，那刀神不知鬼不觉地狠狠扎进“林肯”、“宝马”的轮胎，一辆，又一辆……

“叫你们耀武扬威！叫你们招摇过市！”这咬牙切齿的咒语，谁都不会听到，因为发自他的内心深处。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突然，他的手颤抖了：

“老师，是你……”。

班主任的脸色异常难看。

后面的事就不用多形容。那些送完子女准备回家的“林肯”与“宝马”们惊异地发现车轱辘全塌了下去。校长们纷纷出来一面赔不是，一面愤怒地喊着：“保卫处干什么去了？”

“保卫处的人很快来了，调查结果证明：门卫防范严明，不可能有外面的坏人混进来。”

“那么肯定是我们的学生了？！”校长要求所有的老师汇报情况。但那个看到那一幕的班主任没有说话，他只是将头朝天，然后仰天长叹一声：他是个贫困生，去年这个时候，他到校报名时只带着两个塑料袋，其它一无所有。可他学习成绩很好……

老师低头时格外沉重。

比起北京某校的李老师来说，这个班主任的运气似乎要好多了。因为李老师自一接到派出所的电话后就差点没有心脏病发作。

“你是某某校的老师？”警察像连她也一起当成嫌疑犯似地审问道。

不用说。李老师毕恭毕敬地掏出工作证。

“你们堂堂大学教师，平时都怎么教的？”

“怎么啦？”

“你说怎么啦？”警察的声音拉得很长。“像她这种人已经偷了不止几十回，差不多把北京城的大大小的百货商场都偷遍了，你们就没有见她平时有什么异样？”

“真没注意。我们只知道她平时似乎很富有，穿着很讲究。”

“那当然。不用花一分钱，想要什么就伸手，当然很‘富有’了！”

警察不屑一顾地盯了李老师一眼，然后冷冰冰地说，“回去把这女学生的情况写个详细材料来，越早送来越好。快点啊！”

李老师走出派出所时，要求看一眼自己的学生。这个要求被允许了，可李老师在见到她的学生时，差点气晕。“你、你怎么会……”她想怒斥一通这个不要脸的女学生，可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后来李老师调查清楚，这个一向“很富有”的女学生原来家里穷得连一头猪崽都养不起，父亲是个跛子，母亲很早就改嫁了。她上大学是乡里贷的款，到了大学后，她忍受不住大都市的物质诱惑。有一次，当同宿舍的女同学的父亲来京看望，带着她一起上“赛特”一趟，她看到那父亲给女儿买了一大堆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一件的衣服和物品时，她惊得目瞪口呆。之后她才惊呼道：这才是父亲！这才像生活！那次她不可能也从“赛特”买回时装和饰品，虽然那同宿舍的女孩的父亲执意也要送给她一件意大利裙子，可她当时回答说：“我爸过几天也要从深圳来京……”她的老爸不可能来京，来京一次就等于扒他老人家一层皮。

但同宿舍的女同学们确实发现过了一个星期后，她真的在那个周末的傍晚回宿舍时，向同学们展出了她也是从“赛特”那儿“买”回的高级时装。“哇，你穿这一身真是太漂亮了！”

简直就是‘中国梦露’！”她本来长得就比较美，这时的她真是光彩照人。那一夜同学们的艳羡，似乎使她第一次发现了她自身的“价值”，而这“中国梦露”是需要不断更新换装才显无比魅力的，于是她就开始经常出入京城的高档百货商场——她从不带钱，但却总是满载而归。

这样的日子有大半年，终于有一天她被“请”到了派出所。“中国梦露”的败迹，不仅让教她的李老师料想不及，更使所在学校一片惊诧。

“想不到她父亲穷得连条裤子都穿不起，可她倒好，当起三只手来了！”

“啧啧，这些穷蛋蛋，真给咱大学生丢脸！”

……

大学生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如果是男同学，我一定狠狠抽他几巴掌。女同学们则说，打谁呀？你们就没想想她如果有钱还用得着做“阴阳两面人”嘛！

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

一个充满痛苦的话题。

……在又一个喧闹、喜庆的校舍里，同学们正在为有个当“公司总裁”的同学买回了一台“IBM”新电脑而欢呼、庆祝时，那个平时被同学们讪称“木头”的男生，快快地离开了这热闹的场面。不多久，屋里那位“IBM”主人突然惊呼说自己的钱包怎么不见了！

“搜身搜身！”在场的同学们嚷嚷着说不能白受冤枉。于是不管男生、女生，一律互相“净身”，结果没有发现“嫌疑”。忽然有人说：“哎，刚才‘木头’不是也在场么！”

“对，这小子平时就很蔫，说不准是他干的……”有人这么一提醒，事情就八成铁钉锤棺材——死稳了。

有人第二天开始“侦察”，发现“木头”的那张饭卡上的钱数猛涨，而这个时候学校的“副补”至少还有10来天才能“打进去”。“准是这小子干的好事！”

同学们顿时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而这一天从不吃荤的他不知何故也竟然在开饭时要了个3块钱的“鱼香肉丝”。这一下麻烦就来了——“你吃这肉丝就不感到像鱼骨刺嗓吗？”

“谁说你‘木’？你其实一点也不木！来，把肉丝端过来，让我们一起品尝一下什么叫‘耻味’！”几个同学当众三筷两夹全给消灭光了，随后他们抹抹嘴，哼着小调出了饭堂。

“木头”眼巴巴地看着那朝了天的饭盆，两眼一动不动……

上课了，老师发现“木头”没有在座位上，派人去找时，他竟依然坐在饭堂的那张桌前，不同的是那双眼睛在看人时变得发怵了。

后来他被送进医院。后来那个“IBM”主人也无意中在自己的床底下找到了那只曾经“失踪”的钱包，当他和同学们去医院看望“木头”并一再道歉时，“木头”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他说：“我饭卡上的那钱是我连续几个星期上城里的一家澡塘给人家搓脚挣来的。那天吃饭时我想对你们说明白，可我怕你们更加嘲讽我……”

在场的同学们抱住“木头”痛哭了一场。事后有人说“木头”真该早把真相说出来。一位贫困生愤怒地冲着此人斥道：你晓得个屁！

确实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和明白那些身负经济压力的贫困生们的行为与心理。也许你是一句无意的话，可在他们听来可能是一个不容宽恕的罪过；也许是一次好心的关切，可在他们看来这种恩赐是对其人格的羞辱。在他认为你们之间缺少平等时，你任何想走近他们的举动，都可能被他们理解为冒犯；至于你没有经得他的事先同意而贸然做出一件你认为的好事，有可能他会勃然大怒地与你生死决斗。

他们惧怕别人过多的打扰。即使你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事，他也认定你的打扰是充满敌意的，是带有破坏隐私权式的。他们拒绝交往，特别是与那些洋洋得意、挥金如土的有钱人交往，他们甚至认为这种交往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挑衅。

最要命的是你的言行和眼色。当心，任何一种稍稍的高傲与斜视，你就有可能深深地伤害了一个青春，甚至毁灭了一个活脱脱的生命。

绝不是耸人听闻。陕西省某市的一所民族学院里就有这样一个学生。

他姓蒋，我们暂且叫他蒋永吧。蒋永是这个学校的 95 级行管班学生，该同学来自边远地区的贫困家庭，在开学的第一年里，他勤奋学习，样样课程和学习都在别人前头，一度被学校挑选为“精神文明监督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却经不住别人一句话的刺激。有一次他看到几个班上的同学在校门外的小吃夜市喝酒划拳，他便上前劝说。

“滚滚，你这样一个连裤头都不知从哪捡来的穷蛋蛋也来管起我们！”

“有本事跟我们一起喝几杯才是好汉！”那几个酒兴正酣的同学用不屑一顾的目光和挖苦的话狠狠地损了他一通。

一向在别人面前不低头的蒋永，当时脸色涨得似猪肝，他想到酒店老板那儿包它一桌给这几个“王八蛋”看看，可当他摸摸那只穿破的裤袋时，他的自尊心变成了一滩软塌的稀泥……

蒋永感到自己受了大辱。“喂，借点钱给我。”他第一次开始向要好的同学伸手，“50 块太少，能不能多来点！”

5 张“大团结”出手，蒋永觉得还是不够派，比起人家划拳一个赌就是一张“工农兵”来，自己依旧脸上无光。于是就有 50 元借款升到了 100 元、200 元，最后直到上千元；于是就一个星期上一次大街，到后来一天不上街腿脚就痒痒。他已经顾不得把向别人借款当作一件丢面子的事，只要“场面上不丢份就够派！”

他因此也不再把那么来之不易的学业生涯当回事了，只要不被那些有钱人瞧不起就足够——他的人生目标完全沦丧。然而，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

一天，被师生们誉为“校花”的赵某正和一名男同学有说有笑旁若无人地从他身边走过，那一瞬间，蒋永心头顿起醋意地望着赵某背影骂道：不就是喜欢“傍大款”嘛！我倒要看看你小妖精跟不跟我走……

“哼，也不照照镜子自己是什么德性？”那天，赵某独自走在校园内的小道上，见蒋永死皮赖脸地跟在后面要和她“交朋友”，赵某就没有好气。

“啥？日娘的瞧不起咱！”蒋永对自己初次出击的失利怀恨在心。

回到宿舍，他真的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妈的，确实先天不够“发达”，这都是他妈的穷得叮当的老爹老妈带来的结果。先天不足何所惧？只要有钱就不怕天下的美人儿不向你走来。于是他又开始大举借钱，这回的数目可就今非昔比了，在姑娘面前特别是漂亮的妞面前不是花钱如流水、如开闸是绝不行。他坚信“有钱人终成眷属”。

“说吧，你到底愿不愿意同我交朋友！”他变得蛮横而又无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场合，只要有就会缠住赵某，并且不厌其烦地重复提出那些无聊的话题与要求。

又是一天，被堵在宿舍门内无路可走的赵某，实在气恼不过便对蒋永说：“你追吧，追到 100 个姑娘，那 101 个便是我！”

“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一言为定！”蒋永那张早已扭曲的脸顿时露出一

团光芒，他当着赵某的面，把手指向屋顶，说：“我发誓照你的话做。”

从此，这位学校的“文明监督员”，一变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追猎者”。那之后的半年多里，他像一条疯狗似的在校内外不断寻找“猎物”，凡是能成为其目标的他都不放过，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他竟然一连追了 56 名女人！有一次，他喝完酒，借着酒劲，擅自闯到女生宿舍寻衅闹事。学校终于出面对这个疯狂之徒作出了“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然而就在学校对蒋永的错误进行调查处理期间，他竟发展到连续两次持刀闯入赵某的宿舍进行威胁，从而震惊全校。

1997 年 12 月 19 日，学校作出决定：开除蒋永的学籍。

事隔半年后的今年 6 月初，在我到该校采访时，系党总支书向我讲述了蒋被开除后的情况。这位老师说：“后来我们派两名老师护送蒋永返回原籍。他的家在云南曲靖县，那是个山连着山的真正边远地区，我们下汽车后又整整在山里步行两天才到达蒋永的家。原来学校虽然也知道这个学生家庭是个贫困户，但那时对贫困概念实在极为模糊。到了蒋永的家一看，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家仅有一间破木板钉成的小屋，里面黑黝黝的连盏小油灯都没有，除了一张用木板垒起的床以外，就是一只木箱和一条连上面印什么样的花纹都看不清的被子。蒋永的父母亲根本不知道我们带他们的儿子回去是为了什么。当我们说明情况后，穿得破旧不堪、满头白发的老两口“扑通”一下双双跪在了我们面前，老泪纵横地乞求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将他们的儿子开除出大学。我们当时都流泪了，说句心里话，看在这对可怜的老人面上，看在这可怜的家的面上，也想过如有可能重新把蒋永带回学校，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们更感到心痛的是，就在这时，全寨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在门外跪着。

那个村长告诉我们，蒋永是他们寨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

叫我们看在老天的面上也要想法帮一次忙，宽恕他们几年来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蒋永的错。我们无奈，除了向这位村长摇头外，别无选择。而这个时候，像是刚从恶梦中惊醒过来的蒋永也突然跪在地上双手紧抱着我们的双腿不放，一个劲地哭喊着“老师，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爸妈……”

“已经晚了，我们能做的便是给他和他家留下身上所带的几个有限的钱……”

蒋永的行为和结局，真叫人难以料想。

或许，这也是许多贫困大学生的精神误区。

1997 年 10 月 25 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由团中央和全国学联联合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大学的近百名贫困生代表，接受恒安集团赞助一千万元设立的“恒安济困奖学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团中央、全国学联领导向出席此次会议的贫困生代表发了奖学金。这是团组织进行的最大一项济困奖学金，所以能得到这项荣誉的都是些家庭特别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会议请来了 50 多位外地学生代表，他们是那些优秀特困生中的佼佼者。这对正在采访此一主题的我来说自然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全国的高校 1000 余所，再加成人高校 1000 余所，我不可能也没办法全部跑到。

学生们参加领奖仪式后只有一天时间，我在团中央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向 50 多位贫困大学生代表散发了一份书面采访信，期望他们能把自己的心扉向我这个写作者敞开一下，以便我了解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但时过半年，

我仅收到了 3 位学生的回信，其余均杳无音讯。

可以肯定部分学生可能是由于学习紧张，但大多数则完全是拒绝式的没回信。我之所以这样肯定，是有足够例子证明许多贫困大学生极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采访，特别是新闻记者。

他们不愿自己的贫困与生活的难堪被别人当作“好素材”去炒。有位贫困女大学生对我说，本来她在学校就可怜巴巴，吃饭躲在别人后头，集体活动从来不敢参加，平时干什么都低着头，你要是再向社会一说我是贫困生，我就没法再直起脖子走路了。有位团委书记告诉我，某大学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平时瞒着学校在大都市的一家豪华歌厅当“三陪小姐”（其实据我对几个大城市的大学和娱乐场所实地采访，有些姿色的女大学生偷偷出去当“三陪小姐”，甚至直接从事淫乱的也非个别。京城一些影视艺术院校的女大学生不住学校住别墅，一个月挣万儿八千的不是一个两个），她的收入自然也算丰厚，故而在同学面前衣着花哨也十分体面。在她大三那年，一位记者在一篇专题报道中把她的父母为了供她上大学和养活家里另外的 4 个娃儿，每天只能沿街收破烂为生的现状“曝光”后，这位女大学生差点投河自尽。后来自个儿办了转学手续，从此不知去向。

谁都有自尊，贫困大学生正是因为他们有较高层次的知识和文化，因而也有很强的自尊，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的自尊心比普通人的自尊心要强烈得多。

中国人好面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愿将自己最可怜、最见不得人的一面亮在公众面前。这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和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和校园内确实也存在着歧视贫困生的现象。

在清华大学，我遇见这样一位学生，他对我说，如果你何先生不是单独来采访，我是不会坐到你面前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别看我平时学习优于别人，在入学时也是全省“状元”，但只要我一参加学校为解决我的经济困难而安排的勤工俭学，拿起扫帚在教室里劳动时，马上就有人趾高气扬地在我面前吹起口哨。那神情明显是在说你小子平时牛得很，这回也该老老实实低下头了吧！这位同学说，我从小一向自尊心特强，看不惯也受不了别人用另眼对待自己。可我又有什么办法？上大学前走过的路可以说不堪回首，现在上了大学，过去的事可以不去想，然而面对无法逾越的经济困难的现实，我不低头也得低头。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你何先生知道吗？不瞒你说，那时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做得稍微过分一点，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

有这么严重？我甚是震惊。

绝对是这样。这位学生说，我始终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在高中时也是因为我同欺负我的一个同学打架，我母亲跪在地上乞求老师不要开除她儿子学籍的可怜情景……“我妈和爸太苦了，他们为了不让我在别人面前受委屈，丢面子，几乎把做人的所有自尊和面子无一例外地丢掉了。前年我父亲送我到北京报到，交完学杂费后总共只剩下 200 来块钱。父亲把它全塞在我口袋里，说你要上学吃饭。

当时我心想 200 元我能花几天么！可我先想到的是另一件事：爸那你怎么回家呀？他说你就不用管我了，现在好人多，总会有办法的。身无分文的老爸义无反顾地走了，离开我的时候连头都没回。可我当时实在想不出没钱的他怎么能回到几千里外的老家呢！后来我放寒假回去才知道，老爸离开

我后就到了车站，连续几天站在进出口处当起了向行路人讨钱的乞丐。可那还不够，老爸说最多一天也就讨来十几块，于是他便到了一个建筑工地，正好那个包工头是老乡，便给了一份苦力。就这样，老爸起早贪黑整干了一个月，不仅有了回程的路费，而且还挣了300来块钱。他一到家就把这些钱寄到我学校。你也许想象不出来，我这个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一下感到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变得那样脆弱渺小，着着实实跪在父亲跟前磕了三个头。”

“真羡慕你有有个了不起的父亲。”我也被他的故事所感染。

“可是你不知道，在自己父亲面前做的事，在别人面前我绝对做不到。”他说，“我永远受不了别人哪怕是无意的一点点蔑视，尤其是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子弟而对我另眼相待。”

有些城里同学对像我这样学习特别好而家庭经济又特别差的同学，内心又嫉妒又瞧不起，总想从我们身上找回些平衡。金钱和物质是他们唯一可以击败我们的手段，一些这样的同学存心在我们面前刺激我们，伤害我们，装出可怜我们的样子甚至来施舍。

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从来不要，宁可不吃不喝，饿着肚子。我不排除许多同学是真诚地向我们伸出友善之手，但我也拒绝接受。”

“这是何苦？”

“你不知道，有一次学校里把社会上的一笔赞助分发给了我们几个贫困生。我刚拿着这笔钱吃了顿饭，有同学就在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这回某某某也有嘴短的时候了。当时我肺都快气炸了，心想干嘛，我在班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干嘛为了几个钱就非得比别人短一截？不，绝不！”

从此我就再也不要任何资助了。

真是个大要强的大学生。然而我知道这种学生的内心深处却比一般的同学负载更沉重的难言之痛。北京某高校还有过这样一件事：首钢的一位工程师赞助了这个学校的一名贫困生。这种“一对一”的捐助，按照有关约定，受助的学生要经常把自己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向捐助者进行汇报。这个首钢的工程师打捐助后就一直没收过受助者的回信，起初他也并没在乎，因为他说我捐助本身又没考虑什么回报。话虽这么说，但每次辛辛苦苦把钱邮出后就想知道一下对方到底收到了没有。这位工程师做了一两年的好事，却始终见不到学生的一封回信，也没任何其它音讯。这工程师越想越觉不对劲，说虽然我捐助不求啥回报，但如果我捐助的对象连最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我干嘛要捐助这样的人啊？学校老师知道此事后赶紧找到这位受赞助的学生，问他怎么回事，说你至少也得给人家回几封信吧？这个学生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从抽屉里拿出13封未曾寄出的信。老师一看，这些信都是写给那个工程师的，内容写得也极其感人，可就是没有寄出去。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寄？学生说，我就是不想寄。到底为什么，看来只有这位学生自己心里知道。

上面说到了我曾经进行的一次“书信采访”，3位给我回信的同学中有一位坦露了他自己作为贫困生的那份内心世界——建明先生：你好！

我一直想，过多地倾诉或被曝光关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实在是男人的不幸：男人，特别是小农意识浓重的男人，总爱无休止地夸大自己的沧桑。

因为以上原因，因为各大媒体接踵而至而我不得不配合，我感到极度厌倦的同时自我地封闭。事实上如果经济这玩意赏脸，我实在更愿意就一包烟、持一瓶酒独自消化这些贫困和尴尬——随着官方的关注和媒体的长驱直入，我日渐被洗劫一空。而从前，尽管我穷得叮当响，我依然穷其心力来守

护和经营自己的心灵家园。家园里生活的我有好高骛远的愿望，有张扬坦荡的个性，有苍旺凌厉的思想——最主要的，我有正常的随意的生活作风或生存方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心灵的家园破败不堪：言行举止，都得像个特困——自强——优秀的“人”所必备的气息。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适合那种模式；我为此活得很痛苦，我为此直至今日方给你提笔。

我家庭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家道中落：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中顶梁柱哥因车祸去世，接下来大姐、大哥的女儿和一生勤苦的老母摘走的最后一个果实。我双手敬奉给你的笔端，若兴之所至随你笔走龙蛇——我将不想用“死猪不怕开水烫”来解脱。

打工回来后我自学考上了大学。这部分的情况请参阅《中国教育报》×年×月×日三版和《中国青年报》×年×月×日二版。有劳。

上大学后，由于贫困所带来的生活窘事时有发生。但在媒体及官方“入侵”之前，这种贫困造成的“心灵与心理上的痛苦”我尚能勉力应付，因为我有强大的心灵家园势力做后盾，所以这些痛苦就变得远不及“内裤事件”来得深刻而尖锐。

我现在唯一想的是考研，其原因是我迫切想尽早离开目前的环境而再不愿去适应它。本来就眼高手低的我眼下最想做的事是重建自己的心灵家园。难有勇气去想象没有心灵家园的我怎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建明先生，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痛苦，虽然我内心没有理由怀疑你们这些记者、作家探望贫困大学生的动机有任何不好，然而作为贫困生的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依然保持那种“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的的心灵拥有整个世界”的近乎阿Q式的“精神富有”乞丐。

但愿这迟到的汇报能给你有所帮助。谢谢你的看重。祝你工作愉快。

此致×××1998年元月8日我所以没有把这位现在就读于海南某校的同学的真名署上，是因为这封属于我们俩人之间的私人信件未经他本人同意在这里发表的。我很遗憾至今仍没有机会见到他。这位同学不仅是个非常坚强的青年，而且很有才华，他随信寄给我的一篇他写的散文《流浪如逝》，读后叫人五肠回荡。后来我查阅《中国青年报》上有关介绍他靠打工、流浪上大学的事迹，令我一夜未眠。

那是一个真正的苦孩子。

谁还能记得10来岁时的事情？幸福的孩儿是记不得的，只有从苦水中泡大的孩子才能记住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那年这位同学的家里一连几个重要成员惨遭不幸，10来岁的他，从此像大人似的开始与有病的父亲一起支撑那个支离破碎的家。他跟在成年人身后，同他们一样的犁田耕作、一样的插秧播种、到十几里外的地方砍柴担水。在这种境况下念书似乎已不成可能，然而小小年纪的他一次次坚信：再苦、再累，书一定要读下去。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离家几十里外的县重点中学。可刚上一个学期，家庭的贫苦又使他面临辍学的危险。

正在心急如焚中的他听说学校旁边有个猪场想找个晚上能守夜的人值班，于是他赶忙找去接下了这活。他什么条件他都没提，只对人家说能给个地方睡就行。仅这一句话的应诺，他就在猪场的草堆上整整睡了3年——这正是他上大学之前的3年高中学习时期。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父子俩好一阵欢欣。可紧接着便是更多的苦恼，父亲为了给

儿子凑学费，一次又一次地出外借钱，但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空手而归。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位同学的学费却仍无着落。无奈的他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好不容易争得上大学的机会，含着抹不干的眼泪，揣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点钱，告别父亲，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打工生涯。

他先是到了广州，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可以说一无所获。他又到了武汉，在码头、火车站干起了最苦最累的搬运工。之后又浪迹至郑州、成都。在“天府之国”的首府，他身上只有5元钱时，像一个彻彻底底的乞丐似的谋得了西南交大附近一录像店的一份差使，尽管店主苛刻得比资本家还厉害——令其一个人要干3人的活，每月只给100元，且不包吃住，但这位流浪的同学还是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打工的日子里，那上大学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在这需要知识的年代，难道自己就这样甘心了一生？不，决不！求知的愿望使他顽强地重新拿起书本，在幽暗不堪的工棚内重新点亮了希望之光。这期间，他为了能适应边打工边复习的环境，屡屡换地方。也正是此时，有位姑娘爱上了他，可是为了高考，他又不得不与恋人挥泪告别。3个月后，他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海南某大学。然而就在开学的前几天，父亲突然病重被送进医院。父亲的病不仅花光了他打工苦苦积攒下准备上大学交学费的1000多元钱，又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两年前的命运又一次痛苦地摆在了这位苦孩子的面前，所庆幸的是这回他咬着牙下定了上大学的决心……对身无分文的穷人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是件近似登天的事，但踏进大学门后的日子仍然不轻松。他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终于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也成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学校《女大学生报》主编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无数磨难面前从不绕弯的同学，却依然不愿向外人吐露自己贫困的真实一面，可见贫困生们的心理负担是何等沉重！

几乎每一个贫困生身上，都有一篇催人泪下的苦难史。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进行这部作品的初期采访时，我还对这贫困生们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但越到采访的后期，我越感到自己的心情沉重。

毫不夸张地讲，之后的每一次与那些因缺钱而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学子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不幸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残忍的刽子手，因为我总是在无情地剥露这些同学深埋在心底世界的那部分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或者就根本不想再重提的隐痛，并一次又一次残忍地让其向公众抖落。这种采访谁说不是是一种犯罪式的？可我依然必须那样做，且得认真真。

有一

次在华北工学院，学校把一位壮族女学生介绍给我采访，在采访之前我知道这位学生的家境

非常的困难，她在学校的学业也处在无法想象的那种境地。但这位学生坐在我面前一直不愿先讲，直到其他同学都走后，她才开了口。可她一开口就让我感到意外。

“老师，我能不能不说？因为我……”她刚说这几个字就已声泪俱下，那双惊恐和企盼连在一起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不知怎的，我的眼泪跟着夺眶而出。我说：“行，你……可以走了。”

她真的如释重负地走了，而我同样感到心头如卸泰山。这样的情况，在我对几十所大学的采访中时有发生。有时极想得到“非同一般”的素材，

而常常又庆幸被某个同学拒绝采访，这种矛盾几乎一直交织着我完成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

贫困生们不爱向外人坦露自己的物质贫困真情，是个普遍现象。这里面既有他们自尊的一面，也有社会和别人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的因素。中国人历来好面子，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正是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一些学校和团组织想伸手帮助这些贫困生，可反而工作特别难做。

如政府和社会每年给予学校一定的贫困补助，但有些贫困生你怎么追他（她），他们就是不写申请，弄得学校和团组织无可奈何。这种结果常常使一些本来十分需要帮助的特困生反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可是这些贫困生又怎样说呢？

有位女同学对我说，她说她宁愿少吃少穿，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贫困生或者特困生，那样就等于当众把我的衣服给扒光了，我无法忍受，无法再抬起头走路。

我问这是为什么。

她摇摇头，说这种心理感受旁人是无法体味的，说也说不清。

我想可能。

一天，我在某省采访一位师范学院的贫困生，这位同学在讲述自己的往事时，坐在一旁的那位陪我出来采访的省学联主席某小姐突然失声哭泣起来，当时我不知所然，直到房间里剩下我们俩人时，这位女同学才对我说，她其实也是个贫困生，而且其程度应该列入“特困”行列。在我一再恳切要求下，她简单地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她也生活在一个贫困地区，父亲是当地乡干部，因为父亲懂得让孩子读书的道理比其他农家人多些，所以父亲一直支持她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上学。可就是因为要供3个儿女上学，他们家后来变得比别人家更贫困了。她说她当乡干部几十年的老父亲没有穿过一件毛衣，现在身上的那件是作女儿的得了第一笔奖学金后给买的。家里没有一件家电，是她毕业后到了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每月有300元补助后刚给买了一台小彩电。她说她家开始一直认为她的哥哥能考大学，可是哥哥考了三年就是没考上。她女儿家一个，开始家里并没有把她和妹妹读书放在心上。

她说她上学时一直很自卑，上高中时要到离家七八十里外的地方，每次从家出来，先得走四、五里路，再搭别人的煤车，颠颠簸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学校。当时她心里十分清楚上高中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什么苦都不在乎。上大学时因为家穷，她便报了农大。

起初到大学时就很自卑，后来看看周围的同学跟自己一样穷，于是慢慢自己有了些信心，也当上了班干部、入了党。可苦日子还得过，在大三时，妹妹和一个表妹也到了农大上预科班，她们没有补助，于是姐妹三人就吃她那张饭卡上学校发的每月90块钱。所以只能天天吃些馒头，菜根本买不起。她们就自己隔一两天上学校门外的小摊上买回一棵圆白菜，放入小铝锅内煮，没有一滴油，就这么着3人过了一年，直到她毕业……

这期间她也打过工，但平时因为她是学生会主席，社会活动很多，只能在假期里出去做工，只要有钱赚的活什么都去干，沿途做小买卖什么的她都干过。只是这些事她从来没对人说过。她说我是唯一知道她“阴暗面”的第一人……

这是又一个我没有想象到的事例。这位省学联主席小姐仪表娇美，穿着整洁，给人感觉丝毫没有半点贫困之气，但她不仅昨天是个标准的贫困生，就是在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一个月拿 300 元补助的今天，仍然可以说是一个“贫困族”。她说她现在是在省直机关工作，又几乎天天出头露面，一天忙到晚，穿着总要像个样吧，再打工去是不可能了，而出头露面总不能穿破破烂烂吧，还有，家里、妹妹那儿得支持点吧，你说我这 300 元够什么用？

她苦涩地朝我笑笑。

那几天虽然我天天忙着不分日夜地采访，但这位学联主席小姐的事一直十分“典型”地在我脑海浮现，并期望进入我未来作品中。可就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省城时，这位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走到车窗前轻轻对我说：“你可不要把我写进作品中……要写也不能说我的真名呀！”

我点点头，答应了她。

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连一个具有相当素质的学生干部也对别人将她的贫困坦露出来而感到难为情呢？这恐怕说明，所有贫困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比常人看重人性中最起码的自尊。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贫困——这两个字已经司空见惯了。成千上万的下岗人员从社会的最底层向这个世界浩浩荡荡地走来，他们擦着泪水，毫不隐瞒地真诚向社会亮出自己是贫困的一族，同时去接受生活的挑战，去端回自己的饭碗；8000 万中国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民们，不仅自己早已把干枯而颤抖的手，伸向政府，甚至伸向联合国，而且许多地方在吃了几十年“救济”后，再不愿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因为“贫困县”这只帽子实际上已成了某些人手中赖以向政府索取更多资助与挥舞某种权力的金字招牌；那些呀呀学语、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山里娃娃背起书包，走进“希望小学”时的喜悦，更没有半点因自己贫困而感到不光彩。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学生们则截然不同，一旦“贫困”两字压在他们头上，那种精神枷锁就变得异乎寻常的沉重。许多貌似在贫困面前不屑一顾的学生，其内心深处隐积着的那种恨不得重新分割这个世界的强烈意识与潜能比别的人高出几倍，只是他们为了求得最终能改变自我命运而暂且放弃或者自我克制罢了。

在校园内有句十分流行的话，叫作“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

现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晴朗的周末，北京西郊。某实验学校门前，一条长达几百米的马路上，挤满了各色各样的高级轿车，公共汽车被无奈地挤在了一边，下班的行人只能在一辆接一辆的车海间穿梭。一位老人站在马路牙子边望着黑压压的一片车子，嘴里在“啧啧”不停地称道：到底是贵族学校哟！

这是一所有几位中央领导题过词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学校，俗称“中国第一贵族学校”。

如今已开办数年，校内设学前班、六年制小学和中学部。这里的一位教师告诉我，这是所全日制寄宿制学校，凡进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得先交一笔“赞助费”，小学部以 6 万元起价，初中最低为 4 万元。

“什么叫‘起价’和‘最低价’？”我有些不明白上学还要交“赞助费”，而且还有这么多生意经！

“所谓起价和最低价，是指学校规定每位到这里上学的中小學生必须先交的基本赞助费。”

由于在报考时，一些学生离录取分数线有一定距离，或者是外地学生

想上此校，就得靠‘分不够、钱积攒’办法争取到入学权利。”

“那最多的要一次交上多少钱？”

“5万6万的都有吧！”这位老师说，“好像去年有一位学生家长给自己成绩不咋样的宝贝儿子交了8万还是10万元哩！”

啧啧。“那还要交多少学费？”我问。

“中学部学费加其他学杂费差不多1万吧。”

“一年？”

“一个学期啊！”老师纠正道。

这时正好走过来一位穿着讲究的妇女领着她的娇小姐，我便问道：“你的小孩上初几？”

“初二。”

“那你们当时入学时交的赞助费是多少？”

“4万吧。”

“这么说你家‘千金’上3年初中总共就得花上近10万元！每月平均3000多元？！”

那学生家长一听这，便张大了眼睛，说：“哪够呀！你说的仅仅是在学校里花的。每周孩子有两整天、1个月就有8天在家过的，如果加上寒暑假，等于全年还有近4个月时间，家里还得另给她花钱。少说还得几千块吧！”那学生家长说完便急急忙忙地将女儿拉进一辆桑塔纳2000轿车，一溜烟地消失在车水马龙的长街上……

被弥漫尘埃围袭的我，不由深深地长叹一声：同在一个城市，富人家的一个小学生每月的花费高出一个贫困家庭大学生十几倍、甚至二十几倍！另一种现象也极为普遍：同是大学生也有贫富差异。在南京的几所高校里就曾经有大学生开着汽车来上学的。至于学生的个人小存单上有几千元的也并非一二人，东南大学的一位老师说，她的班上就有个男生其存折上竟超过4万元。平时就餐“开小灶”，生日、谈恋爱挥洒上千元的不是少数。比穿着，比宿舍里安电脑、买电视，甚至腰挎BP机、手机的也大有人在。

然而，我们的过着最低生活保障线低下的贫困大学生，对那些“贵族学校”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并不那么在意，他们对同宿舍的富有者也并不一定那么在意。

令他们苦恼的是他们必须天天面对贫困这两个字。俗话说，眼不见为净。可天天相处在一起的同学面前，穷又变得像个十分讨厌的恶魔，它使那些精神和心灵脆弱的贫困学生们无法摆脱困扰。

南方某市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王小姐，现在已经毕业分配到省直机关当一名干部。王小姐长得漂亮高雅，白嫩清纯的肤色，以及省委书记都跟她很熟的社会地位，你不可能想象得出她曾经也因为在同学过生日时掏不出5块“凑份子”钱而差点一气之下退了学。

“现在大学生中过生日的风气很流行。几乎每月都有一两桩这样的事。”王小姐说。

“我在读大三时，被学校选为学生会主席，后来又因为我们学校是市里名牌大学，我又被推举为市学生会主席。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大型社会活动，平时我不得不注意些自己的穿着仪表，所以在那些不了解底细的同学眼里，我算得上是个比较体面的大学生吧。

可是我自己知道，大学几年里，我自己没有买过一次化妆品，每次上

台主持会议或参加社会活动时，有时脸上也抹一下妆，可用的都是一个要好的同学扔下不用了的東西。不怕你寒碜我，有一次我出席省团代会上台作报告前，知道电视台要摄像，当时刚洗完澡不久，头发乱蓬蓬的，可口袋里又没钱去美容一下，临上台前我一直不敢出厕所。

你问这是为什么？说出来笑掉你牙。因为我的头发上正用水浸着呢。时间一长就会干，一干就不好看了。为了怕影响形象，我只能算好时间，等快要轮到我作报告时就提前两分钟从厕所里出来。因为时间短了不行，可能会误了作报告，而太长了也不行，水一干头发就变原形了，所以只能是提前两分钟左右走到主席台上。这个时间里，头发上有水定着形，等我往话筒前一坐，开始一作报告，那些电视台、报社的记者们噼哩啪啦一通闪灯，等他们照完，我头上的发形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王小姐的话就差没把我眼泪笑出来。

“你先别笑，哭的还在后面呢。”她说：“我家也在农村，而且是个十年九不收的大山区。我在学校的全部生活费就是学校的那点补贴。说起来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在同学中间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物，平时同学们一起出面的集体活动如春游啊秋游啊什么的我不能不去扫大家的兴，可出去一次没一二十块钱是不成的。同学们每次出去玩后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从心底里冒出那欢乐的笑。我也要笑啊，也要乐呀，可我是皮笑肉不笑，因为出去这样玩一次，我就得饿上几天。你又问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花的钱都是从饭卡上省下来的，把饭钱玩完了，我就只能几天少吃不吃呗。而且我还不能当着同学们的面儿无故不去食堂，我就在开饭时推说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先去开个会办个事。

其实天明白我干什么去了。只有我的肚子知道是在自己骗自己。有一回，同班的女同学又要过生日了，像以往一样，大家都得凑份子。这回我实在拿不出钱了，便推说有事不能参加。谁知那个过生日的女同学偷偷派人跟着看我到底干什么去了，后来她发现我根本没去办什么事，而是一个人躲到校园内的小树林。这同学不干了，第二天当着众人的面，说我这个学生会主席避开同学自个钻进小树林里去干见不得人的事。当时我气得浑身打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我好冤呀，她哪知道我一个人饿着咕咕叫的肚子，像贼似的蹲在黑乎乎的小树林里几个小时是啥滋味？而就在这几个小时里，我差点被一群小流氓……”

王小姐再也说不下去，而这回我感到自己的眼里有一股苦涩的流体咽进了肚里。

第3章：学生工作部里的“灰色”档案

天很蓝，江很绿。走出大山的于吉磊一下省城的火车站，深深地透了一口气，觉得有一种透心的舒服：现代的大都市到底比千年不变的山窝窝不知强多少倍！也许正是这一口透心的新鲜气儿，于吉磊更加觉得自己过去的寒窗十年太可贵与重要了。

这是入学通知书。还有钱，6000 元钱。于吉磊出火车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验证一下这两样东西是否还在。他知道有这两样东西才能真正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门，而这两样东西中于吉磊明白相比之下钱更重要，入学通知书嘛即使是丢失了学校也会有存根可查，然而这天文数字一般的 6000 元钱对于吉磊来说简直重如生命。他太清楚为了筹集到入学通知书附件上所写的让每一个新生准备的这 6000 元学杂费，父亲几乎跑断了腿，即便是这样，最后还是由一位好心的落榜同学的家长借给了他于吉磊 4000 多元才算了事。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的农家人，哪有人见这么多钱！为了这 6000 元钱怎么带到几百里外的省城，全家人几乎商量了不下十几个方案，最后还是采用了母亲的办法：在内裤腰带上缝一个口袋，然而再在小口袋上系三个纽扣，钱就装在那里头。于吉磊摸了摸皮带下面的腰部，满意而又放心地登上了驶向学校的公共汽车……

“你就是于吉磊同学？请先交入学通知书。”负责新生注册的老师机械地在为新报到的学生办入学手续。

于吉磊毕恭毕敬地递上入学通知书。

“再交 5830 元钱。”

于吉磊迅速地解开裤腰带……

“哎哎，你要干什么？”那个负责注册的年轻女老师突然冲着于吉磊大声嚷嚷起来。

“我、我不干啥呀！”于吉磊不知老师为何突然对他如此厉害。

“不干什么，你、你解什么裤腰带？”

于吉磊明白了，他的脸也跟着红到了耳根。“我是取钱……”

“真是的。”女老师顿时没有好气地说：“快点快点，别让后面的同学等着。”

“多少元？”于吉磊战战兢兢地问。

“不是刚才说了 5830 元嘛！”于吉磊赶忙从那个小口袋里取出钱来，一五一十地数着。

这时他似乎才意识到交完学杂费后自己只剩 170 元钱了！170 元在家里可以过上一年半载的，但现在不行。于吉磊后来又七交八交地花掉了 100 多元，晚上再一数钱：仅剩几十元啦！这可怎么办？得吃饭呀！大学的第一夜，于吉磊是在为第二天有没有饭吃而整一宿没合眼。

“走吧。你不是也有昨天老师发的那张卡嘛。”第二天一早，同宿舍的同学见于吉磊还愣在那儿发愁，便乐开了。

对呀，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于吉磊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从此，那张金灿灿的饭卡便成了他上大学后除了课本以外最重要的东西。为防意外，还是用母亲的老办法：把金卡藏在裤腰带里面的那个小兜兜内……

从此，于吉磊每天冲着这张小小的卡在算账：早餐两个包子一碗稀饭花 1 块钱；午餐 4 两饭加一盘炒土豆或青菜粉丝——这是最便宜的炒菜，花 2 至 3 块左右；晚饭与早餐基本一样花 1 块钱。

然而，仅仅不到一两月，于吉磊紧张地发现这样的日子还是太“奢侈”——每 30 天下来没有一百二三十元过不下去哟！学校各种物价补贴打进饭卡的也就是七八十元，如此下来每月还得至少亏空四五十元！再向家里要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于吉磊知道只种几亩薄地、身上已经背了 6000 元债的父

母能维持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就很困难了。可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来呀？初入大学门，于吉磊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他选择了唯一能行得通的办法：那1元早餐就免了，中午原来2至3元的饭菜变成半菜半饭花1至1.5元，最多不能超过2元！晚餐一只馒头一碗稀饭花1元。每天必须控制在3元左右，对，不能超，只能省！

之后的一个月里，于吉磊除了上课，就是一门心思跟着这笔帐在天天算计、打仗。饭卡通过电脑可以随时显示你的卡上存有的钱数，突然有一天于吉磊看到自己的卡上一下少了80元。这这、这怎么办？还有20多天我怎么过呀！那一顿2元钱的午餐他都没买，只简简单单喝了几碗不用花钱的汤水便急步来到学校计财处。

老师抱歉地告诉他，是电脑出了毛病。

于吉磊长嘘了一口气，他一抹后背：冰凉凉地浸了一大块。

他终于有一天病倒了。医生说，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山东姑娘李某临来大学时就对母亲说：“妈，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备，我只要一缸你腌的咸菜，就像我到县城上高中那几年你备的那样……”

母亲无奈地摇摇头，泪水噙在眼眶……”李某就是这样左手提着母亲备的一大塑料包咸菜，右手带着母亲刚刚教的腌菜技术踏进了太原某高校大门。

进校的第一件事是她交完了所有该交的钱。交完后身上还有多少钱她从来没对人说过，好像她心里很有底似的。可不是，像这样的日子她在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的那十几年里几乎年年都是这样过来的。然而李某感到有些不同的是，大学里她同班的同学中有人天天换新衣穿，吃饭时也有人竟连八九元一个小炒还嫌不对味，非要上外面的馆子花上几十元甚至一二百元才算过得去。可她只能还像上中学时那样，到食堂买一个馒头，然后回到宿舍，夹上几根咸菜算是一顿。开始几天她并没有感觉什么，后来发现老有同学跟在后面看她打饭、看她打开那只气味异常的咸菜袋，这个时候她的脸才有些热起来……

她猛然发现自己长大了，猛然发现远方的大学与家乡那个大都是穷孩子的中学不同了。

而这一发现使李某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

同学们从此再也看不到她什么时候吃饭了，偶尔看到她上食堂打个馒头也是行踪匆匆，从不多呆一秒钟。不吃是不行的，要上课，要跑步，要坚持至少4年的大学学业。但李某自从见同学们用异样的目光看自己打开咸菜袋的那一瞬间的神情，她发誓再不让大家看自己吃东西的情景。她开始躲，躲到宿舍，躲到门角，宿舍里不行了，她就躲到校园内的小树林，甚至没有人时的厕所里……但这都算不了什么。

李某感到最痛苦的是她的咸菜越来越少了，终于有一天一点也没有了。她想起了母亲教给的腌咸菜的技术。可菜从哪儿来呀？在家时可以上屋后的菜地里拔几棵就是了，大学校园内可没处去拔呀！到街上去买？好几毛好几元一斤有那钱还腌什么菜嘛！她真的着急了：大学的日子咋这么难过么！

突然有一天她兴奋不已，因为她发现了学校食堂后面有不少被丢弃的烂菜叶、菜根子。

这个发现使李某连续好几个夜半时分带着从家背来的那只已经空了的塑料咸菜袋，悄悄遛出宿舍……就这样，她每天捡几把回来，在水笼头上冲

洗干净后将其腌泡起来，直到认为可以暂且不要时才罢手。

李某依旧这样行踪匆匆地每天上食堂买回一只馒头后，便回到别人很难发现的地方完成她的一日三“餐”。

终于有这么一天：同学们发现她昏倒在厕所里……

医生诊断结果与于吉磊同学一样：没有什么其它病，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广西壮族小伙子马义词怀揣中央民族大学入学通知书，来到首都北京的校园时，激动得竟然当众跳起他拿手的壮族舞，引起同学、老师们的阵阵喝彩。尤其当他看到自己的校园那么美丽，在学校的左边是每时每刻都有一群群如天仙般的女生进出的舞蹈学院，再往左则是那雄伟无比的亚洲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往右边走，则是商潮如火、满地是金的中关村电子街……

“哼，你们躲吧，我不信在北京这么好的地方自己挣钱养活不了自己！”

上学的第一夜，马义词躺在床上忍不住想起在家时父亲为了给他筹借学费的那一幕幕令人心寒的情景：父亲到一家亲戚，那一家亲戚就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原来亲戚们都怕他家来借钱，说是上大学要好多钱，而且一上就是4年，那还不知要借多少钱么！就是借了也不知啥时候还得起么！亲戚们正是因为这无期的借款而远躲马义词一家的。

躲吧，看我怎么走出这十万大山！马义词在离开那个边远的山村时心凉透了，而他到了北京后的心几乎又过于热。他带来的3000元债款由于沾了少数民族的“光”，在交完各种学杂费后还剩了1000多元。马义词是个有头脑的孩子，他想：这钱在老家可能全家七八口能过上一两年不成啥问题，可在北京光供我一个人也过不了一学年呀。他为此算了又算，甚至把每个大月小月的天数都算得仔仔细细，他知道如果不好好算准，就有可能出现“饥荒日”。中央民族大学的伙食费与其它学校没有什么特殊，农村来的孩子都唠叨学校的伙食费“贵”。一个菜要花几块钱，这在他们过去的读书岁月里是从没有过的，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大城市里，现在几乎找不到一家食堂、餐馆卖5元钱以下的一个炒菜。马义词一掐指头，便把每天的生活标准定在了5块钱，三五十五，这一个月就得150元呀！马义词算过后心头吹起一阵寒风：照此水平，1000元钱也用不到一学年！再说吧，习惯吃早餐的他不像有的家贫的同学不吃早餐，但5元钱一天，在北京你无论如何想一日三餐都进食堂是不太可能的。于是马义词就决定中、晚合餐：中午打两个馒头或4两米饭加一个菜合计4元来钱，早餐一个馒头加一碗稀饭花1元。就这样度过了“兴奋的九月”、度过了“新鲜的十月”，到了进大学门的第三个月，马义词发现自己在上课时老想睡觉。这怎么成，你不想对得起老父亲老母亲了？马义词狠狠地敲打着脑门，他警告自己不要糊涂。可第二天他还是不能自控地犯困，甚至有一天被老师当场叫醒，引得全班同学哄笑。他感到自己很丢人，也很沮丧。他弄不明白怎么回事，自己并不是故意放肆呀，可为什么一到中午前和晚自习时就想睡觉？

“你要注意饮食，否则克服不了这个毛病。”一天，有位大二的同学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他转过身去想问问清楚好困与饮食到底有什么关系么，可那个同学走了。马义词后来知道，这也是一个家里很穷很穷的学生。

明白怎么回事后，马义词决定改变一下“生活水平”，但首先得有份活干，他早听说首都北京遍地是黄金，外地来京淘金的人就有三四百万。马义

词想找份工打打，但几次碰壁证明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份工作：论做生意，无本钱无经验；搞家教，北京的家长们一听是农村来的新生尤其是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肯定不要。听说学校有个勤工助学中心，结果他报名了很长时间一直“待业”（直到现在）。

自信的马义词渐渐感觉自己与这个丰富多彩的大都市和诱人的校园有道深深的鸿沟。他开始孤独、苦恼，甚至害怕，害怕自己如此长期下去会完不成学业。

马义词觉得自己应该自我兴奋起来，像电视里有些歌手说的临场前得学会“自我调节、自我兴奋”起来。拿什么调节、什么兴奋呀？走，跑步去！

一圈、两圈……几圈下来，气喘喘的他再回到教室上课——马义词发现自己这一节课真的“兴奋”，真的没有睡意。有办法啦！马义词为自己能找到这个克服“好困病”的办法欢呼。

从此，在谁也没有注意的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每天可以见到一个瘦小的同学在操场上、走道上一圈又一圈地来回跑着。同学们奇怪的是这位瘦小的同学竟然不仅在白天的课余时间跑，在吹灯后的晚上他也跑。

“晚上的时间饿得最难受，所以我跑。跑累了往床上一躺就着了，不然我会饿疯的……”

马义词有一天公开了自己的秘密。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大学里还有好几年，他还要一圈一圈地跑下去。

马义词今天还在跑。

这是怎么啦，同学们！

——校长和老师们在发出一声声惊呼。

军训场上，农大的副校长很生气地把几个老是在队伍里拖拖拉拉的新生叫了出来，大声

责问：“为什么才跑几圈你们就像败兵了？”

“老师，我们真的跑不动……”学生胆怯地轻声回答。

“不可能！这么几圈连小学生都能跑得下来，你们一个个身高马大的大小伙子怎么就跑不下来？”

“……”学生无言。

“说，是不是平时家里给你们惯的？”老校长最恨现在那些独生子女家庭的家长教子无方，害苦了下一代。

“没人惯，……天天让我们上地里干活。”

“什么什么？你们都是农村娃呀！”校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要说城里独生子女现在娇成你说什么样就有什么样，可你们又是啥娇惯的呀？啊，我弄不明白！”

“不是的。”几位学生终于吐吐吞吞地说出了实情：“老师，我们没有吃饱饭……”

“干啥不吃饱？”校长又生气了。

“……”学生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回答。“说啊，是不是成心不想参加军训？”

“不。我们实在……没钱了。”有个捂着肚子的同学没等说完，身子歪歪扭扭地倒在了地上……

“他怎么啦？快送医院！快！”校长急忙招呼。

老校长这一夜没睡好觉，他辗转难眠地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孩子

们穷到这份上，竟然在强度军训的体力消耗中，一天只吃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么！

南京。河海大学。

班主任张老师一向认为自己的工作做得最细致、最扎实的，有省教委评的“优秀教师”和学校“文明标兵”等可以说明，但她万没想到这一年这个班的新生中竟然有人上学近半年自己的床铺一直空着。“像什么话？我们河海大学是所全世界公认的‘水利最高学府’，我们为国家和第三世界培养过无数杰出的人才。可是，就在我们这个班上竟有同学长期不归宿！

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班干部会上，张老师说话时那张向来美丽可爱的脸都变形了。

“明天你们汇报情况。”她通知学生干部。

可第二天班干部们谁也没有向她说什么。

“怎么，你们成心与我作对？”张老师胸脯起伏，声音也变了。最后，有个学生干部对她说：“老师，您晚上如果方便到一趟我们宿舍……”

班主任在熄灯号响过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了男生宿舍 B 室。她在一位男生带领下，轻轻推开门，然后将手电筒移向靠窗的那张床上停下了：那床上的被子把睡觉的主人的头盖住了，但腿却长长地露在了外面……

“天哪！”女班主任差点气晕：那条被子底下竟然露着四条黑乎乎的腿！

伤风败俗！伤风败俗！都说外国有同性恋，可现今咱中国的大学生……

唉！老师疯了似地拉亮屋里的灯，怒不可遏地叫起两个躺在一起的学生。

“今天你们给我说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屋里一片沉寂，另外几个床上被闹醒的学生也呆呆地坐在那儿谁也不作声。

“你们是想气死我呀？！”班主任用冒火的目光从这个学生扫向另一个学生，最后落在了那个不该住宿此室的学生身上。“你自己讲，我要你自己讲！”

学生在哆嗦，在发抖，就是不说话，只有眼泪不停地在往下流……

“老师，你出来一下。”那个领班主任进屋的男生轻轻叫过老师，并带她出了门。随后男生把全部事实告诉了这位班主任。

“你说什么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女老师惊呆了，她不相信自己的学生里竟然有人连床过冬的被子都备不起！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这位学生不仅如此，平时吃饭就餐也都是靠同学们的济助。

当这位女老师再次进那个男生宿舍时，B 室内已是一片抽泣声……

山西农大。学生处老师原文华，年纪轻轻的一条汉子。但在我们见面不到 5 分钟时间，他就开始泣不成声地诉说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害得农大那么多同学生活、学习还极其艰难。

“……我们有个同学是山西原平的，上大学时母亲已经 72 岁了，父亲则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上大学前，这个同学一边读书一边种地，养活他和老母亲。进了大学后，家里的地没人种了，老母亲只能每天出去卖些瓜子度日。咱农大学生每月学校发给一人 72 元专业补贴和副食补贴，这个同学就是从这 72 元中每月要给老母亲寄回二三十元，他自己仅剩三四十元。那么一点钱够什么用呀！他每顿吃饭总是去得最晚，因为这个时候食堂里的稀饭因为太稀了就不要钱了，他就靠这不要钱的一勺稀饭和两个馒头过日

子……”

原文华一边哽咽着，一边又把一个瘦得近似皮包骨的学生介绍给我。

“他叫高武军，现在是研究生了。可你看他瘦成这个样……高武军，你给何老师走走看。”原文华让这个学生在我面前走动了几下。

“你的腿怎么啦？”我发现这同学走路时一拐一跛的，便问。

“他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肌肉萎缩症。多可怜呀。”原文华老师替这位同学挽起裤腿，说道，“你看看，他这条腿都快萎缩成干干了。他惨啊，本来家里就贫，偏偏 95 年家里又发生了一场大灾，他父亲和几家本族亲戚同乘一辆拖拉机到一家远房亲戚参加婚礼，结果途中出车祸，他父亲和其它 3 个亲戚当场死亡，另外 7 个重伤。这一大家族，死死伤伤 11 人，还能有谁救谁的难么？高武军同学从此断了家里的一切经济支持。去年我看他可怜，给他介绍了一个勤工俭学机会，说好听是勤工俭学，说不好听就是给人家送终。

有个老人得了瘫病，拉屎拉尿都在床上，老人的孩子谁都不愿再管了。这样的活，连亲生儿女都不愿干，可我们小高这样的一位快读研究生的大学生，则为了能挣一二百块生活费，天天去老人的病榻前忙里忙外了整一个多月，直到把老人送终……”原文华老师又泣不成声。

“你、你说同学们这么可怜，我这个学生处的老师心里有多难受！”

我们想帮助小高，可学校像他这样甚至比他更需要帮助的同学不是一个两个。小高现在是研究生了，一月有 180 元钱，我们的本科生、大专生只靠学校发的那几十元补贴，困难不是更大么！”原文华擦一把眼泪后，将小高同学拉到身边，说：“小高，老师没把工作做好，你可不要怪谁，好好读书，有什么困难找我就行，啊？我一定尽力帮你……”

那个同学本来一直笑咪咪地很乐观，经原老师这么一说，不禁两眼汪汪。他一把拉着我的手，说：“老师，你要写就写写原老师，他自己一个月只有 400 来块钱工资，可这几年来光我知道的，他资助贫困生就不下 4000 多元……”

“你你别说这些。”原文华老师一把抢过小高同学的话，急促地告诉我，“我们这儿曾经还出现同学卖血、晚上乘人不备时偷偷溜进食堂捡剩馒头、菜叶吃……”

同学们、老师们，这是怎么啦？

这回轮到我的心在大声疾呼：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正在迈向 21 世纪的中华民族！怎么、怎么可能在我们的大学里会出现这等的事！

为什么？到底又有多少这样的事？

带着我的疑虑，带着我的痛苦，也带着我的一分责任，我走进了中国大学的一个又一个学生工作部——这是一个春天的季节，我来到北京清华园东临的北京林业大学。这是所具有悠久

历史的国家重点高校，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林科。

校园很美，既有北大、清华校园内的那种中国传统的建筑，又有更多的园林群体，耸立在林与花中央的现代化教学大楼更显几分娇美与壮观。漫步在这样的校园内，仿佛置身于诗画之中，这对居住、生活在闹市而整天淹没在污浊空气里的我来说，大有人间仙境之感。

然而在透过几口清鲜的空气之后，我又不得不把一个与此地的环境十

分不协调的词汇在心头掂量。这个词汇依旧叫“贫——困”。

美丽如画的校园本不该与“贫困”联在一起，可是在当今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却无情地结缘了，而且这种苦涩的结缘还那样“剪不断、理还乱”。

北京林业大学隶属国家林业局，现有在校学生 3500 多人。从人数讲，是所中型大学，可它却是被团中央、国家教育部列入重点“扶贫”的几所贫困生居多的高校之一。走进学生工作部，接待我的是位很干练也很热情的“女处座”于翠霞老师。

“你了解贫困生？算找对了，这摊归我管。不过以前我在校党办工作，学生工作部这摊接的时间不长，但一接管后我就觉得再也难放手了。尤其是贫困生这方面的工作。”于处长长叹了一口气后说，“你先看看材料我们再谈。”

她从另外一间办公室柜子里取出几摞厚厚的卷宗，放在我的面前。

“这都是些什么？”我问。

“贫困生自己写的救济申请材料。你先看看。”于老师直起身时顺口说道，“我当时看完这些材料后，几天都吃不好饭。唉，这些学生真可怜……”

于翠霞老师说完了，屋里只留下我一个人。于是我开始一份一份往下看……我知道自己的此次高校贫困生采访是次万里长征式的巨大工程，每一程都得争分夺秒。

我必须加快速度往下看，但从翻第一篇开始，我就发现自己过去那种一目十行的“职业编辑”看稿速度这回一点也用不上了——我几乎只能一字一字地看，一字一字地读，因为我所看到的不是普通的稿件，也不是常见的公文，而是一份份用血水和泪水写成的乞求信、呼救书。它让我感到灵魂在经受山呼海啸般的震撼，心胸在承受那种很难用词语表达的一种近似绝望的窒息与压抑——学生求助书之一：尊敬的校领导：我是财 96（1）班的学生，来自安徽东至县。在我 10 岁（1985）那年，我父母因车祸皆丧生，留下我与哥哥相依为命。

这以后，在亲戚及街坊邻居的帮助下我哥哥念了两年高中，我也读到了初二。但别人的帮助总是有限的，两年之后，我兄弟俩同时上学已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哥为了不让我辍学，借口自己学习不好进厂当工人。其实哥那时的成绩一直在班里是尖子，如果我们有个温暖的家，如果有父母的疼爱与培养，如果不是为了我，哥他现在肯定是个大学毕业生了。然而他不能。

在哥微薄工资的支持下，我勉强进了县重点高中就读。这期间，为减轻哥的负担，我背着他帮助学校附近的餐馆卖早点、夜宵等，以求得店主老板一餐半粥。

在这种情形下，我艰难地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可不幸的是我在高考时以 7 分之差名落孙山。哥哥对我的落榜没出半句怨言，相反鼓励我重新复习。18 岁的我在几年的苦难经历中已深深懂得哥哥的那份爱心外，心中也有了自己的打算。1993 年暑假一到，我便背起几本发黄的课本和几件缝缝补补的衣服，走上了打工的路——而这年下半年我哥参军入了伍，现在仍在广西北海舰队服役。

打工的路并不平坦，由于没文凭，没一技之长，更因人生地不熟的原因，我在福建石狮一带流浪了近半个月也没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到海边去挑黄沙……经过两个多月的周折之后，在同乡的介绍下，我进了晋江一家皮鞋厂打工，在那里我度过了两年半工半读的打工生

涯，其中所吃的苦头非常人所能体味和想象得到。付出的汗水终于有了回报，1996年，我以全县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北京林业大学录取。

一年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当初我打工挣得的4000多元钱已所剩无几。如今新学年已开始，对于无任何经济来源的我来说，我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为了准备第二年的学费，我没与哥商量，便决定卖掉父母留下的两间破房子（估计能卖个两三千元）。

但由于诸多原因没人买。在走投无路之下，我只好与在家务农的一位高中同学结伴利用这个暑假，到上海一家日本人开的餐馆刷盘。那餐馆实行两班制，每人每月工资300元。

为了多挣点钱保证能上得起新学年的课，我向餐馆老板提出要求一天干两个班。老板听了我的陈述，同意了，并且晚上只让我加班到9点钟。即使如此，由于假期时间有限，我才挣得600元钱便匆匆赶回学校。

要上新学年的课，就得先交学费。可我身上仅有自己挣的600元加上那位同学给的600元共1200元，这也远不够全年学费和生活费。怎么办？怎么办？我问自己，也问苍天，可谁也没有回答我。无奈之中，我只好厚着脸皮在这儿向学校领导发出恳求：请拉一把我这个穷苦的学生……

此致\$ 敬礼学生：董鹏志 1997年9月4日

学生求助书之二：尊敬的×老师：您对这个称呼可能已非常熟悉，可您认识我这个学生却是第一次，我想通过书面上的交流，作为我们互相认识的起点。

老师，暑假期间，我徘徊于宿舍内，思绪万千。想起中学时求学之艰难，考入北林大之不易，更是焦虑目前……

学生的我，中学毕业于陕西西安市户县光明中学，家在西羊村，本为农民家庭，全家以清淡度日，安贫乐勤以足。可无奈在我高一时，父亲因多年积劳成疾离我而去。打此后唯母亲操劳供我上高二，读高三，考大学。在中学毕业时我心中因念母亲体弱多病，想立即找份工作，以代母亲之劳尽儿女孝心。故后虽以706分成绩考取北林大，但我却内心无任何喜悦可言，因为我根本不想进大学——其实是无奈。母亲得知后说什么也不答应我的作法，她特意给我讲了一件在我还幼小时的事：当时因家贫，父母曾想把我送给村附近的一个部队机场的一位军官作儿子，可当人家真来领时，我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了。父亲对母亲说，贫不懒志，家再穷，儿还是他的儿。母亲那天流着泪对我说，现在儿你考上了大学却因一点难处要退却，她说就是等她百年之后也无法向我父亲交待。于是我在去年8月28日（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到本村一个人那里借了3000块钱，走上了大学之路。

当时借这钱是讲好的在我毕业后加倍归还人家，所以我在迈向大学门的第一步时就比别人多了一份沉重。

大学一年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我忘不了初入学的新奇，更忘不了交完学费后生活的困顿艰难，母亲又多病缠身，无援的我在多少个不眠之夜摸着口袋中唯一的一个硬币时，也曾想给家里发一封求助之信，可一想到母亲那苍白的脸时，我的心一下揪了起来，我恨不得抬起手抽自己的耳光。所幸的是在我极端困难的时候，学校帮助我取得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让我能安心读书，并有可能在春节时用自己省下的钱回家一趟给母亲买一点小礼物。那次是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而且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像人一样地出现在众乡亲面前，其情其景，自然也非言表。然而命运却总是对我这个苦

孩子那么不公，在我到家的第三天，我母亲怀着恋恋不舍的表情，永远地离我而去……在我欲哭无泪之后，我常想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这当儿子的大学生，到底这个春节是回来的对还是回来的错了？我反反复复问自己，但始终没有结论。

新春的爆竹仍旧那样脆响。可极度孤独和悲伤的我，一点也觉不到。

多少个黑夜里，我有意不开灯，有意不让哪怕是萤火般的光在眼前出现。我想用黑暗来沉积心头的孤苦与忧伤，我更是在让黑暗之剑磨钝太多流血的心胸……我扪心自问：像我这样一个既无独立生存能力，又日后无可向父母报孝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在那一次又一次与黑暗对话时，我甚觉自己的生命是那样轻薄无为，我想借着黑暗去见我的父母，去用儿子的整个心灵抚慰从未获得过多少幸福与快乐的父母的心……但就在我伸出双臂向死神拥抱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学校，想起了老师您和同学们，于是脆弱的我又觉得无地自容。

特别是想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对自己的帮助，我更觉自己那一闪念的荒唐。像我这样一个贫苦之家出生的人，在既未向父母报孝一份养育之恩，又未能为国为民做半点贡献之时就想逃避生命，简直就是一种可怜与无耻！

想通之后，虽然那个失母的春节使我无限痛楚，但回校后我尚能像过河小卒，有进无退。所幸在后半学期学习成绩较上半学年大有提高，心中总算稍许安慰。

老师，学生现在所虑的是目前入学学费太贵，学、杂、书费达 2000 多元。虽说我在暑假留在北京拼命打工 40 余天，也仅赚得 700 余块钱，加平时积攒共 1000 来元。眼下学校新学年注册日期将至，学生心中怎不焦虑？为解燃眉之急，日前我与一家书店经理谈定以后每天下午到她书店干活，兴许能挣回一点钱来，可这得一段时间，所以在此我请求学校和老师能否宽延一些时间再让我交钱，如果能成，学生将视为生命重现！

恳请又恳请。学生：张升 1997 年 9 月 6 日学生求助信之三：

尊敬的校领导、老师：我是园林学院森林旅游 96 班的学生，因家境贫寒加上连年天灾，实在无力交纳学费，特向学校申请减免，敬请审查。

我家住抚顺县安家乡大堡村，家中五口人，奶奶已近八旬，弟弟正读初三，爸爸体弱多病，家中全靠妈妈维持。全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那几亩承包田。如遇风调雨顺，生活还算过得去。可是 1995 年“7·29”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把我家的几亩承包田里的庄稼全部冲走；1996 年“7·23”一场更大的洪水又使我家颗粒无收。今年满希望有个好收成，但天公不作美，春旱到秋日，致使全乡全部绝产。连续三年的天灾，让我的家人怎能承受？更有何力量担起一年几千元费用的我这个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业呀？

我是 1996 年从辽宁林业学校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林业大学深造的。

当时心情真是悲喜交加，谁不渴望上大学的机会！然而一贫如洗的家庭又能拿什么来供我上学呢？带着这个不知是好还是坏的消息我回家了。爸妈听后不做声，而年仅 16 岁的弟弟却第一个表态：姐，你去吧，我供你！弟弟的话让我好一阵激动，可我知道他还是个孩子。我只朝他苦笑了一下。爸妈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同意我读大学。从此家里节衣缩食，生活更加艰难。我深知家中情况，于是利用假期四处奔走自筹第一学年的学费。我听说有个叫“寒窗基金”专为学生贷款的，便跑到教育部门，但人家不理我，说我是

中专保送生，不能享受。

无奈，我只好东家求西家磨，从远近亲朋那儿借了 3000 元钱，苦苦读完了第一个学年。

暑假了，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回家，而我却因新一学年的学费不知从何来而忧心忡忡起来。年近 50 的爸爸骨瘦如柴，出去给人做小工出苦力，一天干下来，从手到脚，浑身每一个骨节都“吱吱”作响，这病痛已经数年了，可爸就是不肯去医院瞧一次，只是每天大把大把地吞止痛片。这一切做女儿的我看在眼里，疼在心头……然而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我不仅不能给他减轻病痛，还要再一次向他伸手索要新一学年的学费！我、我不知如何办为好。新学年已经来临，我怎能忍心向这样一个父亲伸手呢？可不向他伸手我又有什么其它办法？难道忍心让我正处初三学习、年仅十几岁的弟弟供我读大学？不不，我不能。可、可我又能干什么呢？尊敬的领导、老师，请救救一个苦命女学生吧！

96 级学生：×××1997 年 9 月 1 日……

看完这一份份求助书，我说不出自己当时的那种心情。透过这些饱溢泪水的求助书，我

似乎看到一颗颗焦虑不安的心和一张张因营养不良而造成贫血发黄的充满着企盼的脸。

它们

让我感觉呼吸的急促，心跳的加剧，情感的难以抑制……没有比这更叫人揪心的，因为它发

生在我们大多数人感到阳光明媚的今天。

这时，于老师从另一个屋子进来。“这些材料都是去年 9 月新学年开始几天内收到的，这几年一到新学年交费时，我们学工部和学校领导、老师那儿都会收到一封封这样的申请减免学费和求助申请书信。”她说。

“你们学校的贫困生能占到学生总数的多少比例？”这是我很关心的一个具体的数据。

于老师顿了顿，说：“困难学生占 15%—20%，其中特困生 7%左右……”

“那你们界定贫困生与特困生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不太好说。”于老师略陷沉思。稍许，她说：“我总觉得现在定的标准有点低。比如教育部门原来把家庭平均月收入在 150 元以下的划为贫困生，把 100 元以下的定为特困生。

现在高校大部分按此标准确定。而实际上现在一个学生一个月基本生活费就要 200 元，这还没算学杂费。我认为这只能是个大概标准而已，因为现在农村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能达到 150 元左右的几乎占大多数，这还要看这一年的老天给不给面子，第一部失泪大学城《7》如果遇上天旱水灾什么的，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另一方面，这两年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多，许多城镇来的在校学生由于父母都下岗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即使是 200 元至 300 元一个月，你能说他们不是处于贫困状态？再说，有些学生还隐瞒真情。所以大学贫困生的人数比例向外公布的数字不完全准确。像我们林业大学，是属于艰苦行业院校，学生中 60%以上来自农村，有 30%左右是县级以下的小城镇。这些学生之所以报考像我们这样享受国家特殊行业补贴的院校——如农业、水利、军工、师范等等院校，就是一方面认为录取分数低一点，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看到我们这些院校收费低一些。这些因素都是经济

差的家庭的学生所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推断，你能估计出像我们学校的贫困生比例占多少呢？”

我笑笑，说不敢猜。

“再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标准掌握尺度也不同。”于老师接着说，“我所知道的北京大学对外公布的贫困生比例是 25%，应该说从他们学校的学生实际情况所确定的这一比例基本差不多。但到我们学校恐怕就不能是这样一刀切了。如果将一些重点大学划定贫困的标准拿到我校，那我们的贫困生比例可能还要大得多。其实贫困与不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所处环境有关。你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因为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相对家庭经济收入都不高，而这些学生如果把他们放在那些外贸、经济、艺术类院校去，可能都得算贫困生了，但在我们学校就不行。只有那些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的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 125 元的，才能进入我们学生处的‘特殊档案’里来，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帮这些学生解决困难。”

林业大学的于老师使我较早从层面上初略了解到了什么叫“贫困生”，以及强烈感受到的那些处在命运搏斗关头的贫困生所发出的阵阵救助声……

林业大学所处的京城西郊，几乎云集了中国最著名的十几所大学，在那连成一片的绿林中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城”。如果不是深入每所学校的学生工作部或者是各学校团委下的勤工助学中心，你所见所闻的只能是朗朗读书声和那如潮如云的“天之骄子”们。

你因此会认为，凡在这儿的学生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而有些事你却想象不到，那便是在这块几乎是集中了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学子中，有数以万计的人在接受最繁重、最先进的知识与攀登最尖端的科学同时，却过着这个城市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贫困日子！有人常年靠馒头充饥、盐水润口度月；有人捡废纸作练习本、写论文稿；有人从垃圾筒内捡出一条旧长裤剪去两条裤腿后，改成自己在一个暑期闯荡京城的全部装束……也许正是这种无法想象的反差，更使我急切地想了解清楚在这和风与绿地的大学城内，到底有多少处在难以维系大学学业的贫困生。

与林业大学仅一街之隔的中国农业大学，是中国千所高校综合研究与发展前 13 名的国家重点大学。他们那儿的贫困生情况会是怎样呢？

该校分东、西两个校区，在东区的学生勤工助学指导中心里，丁运选老师正忙着在今年暑假期间给那些准备留在北京打工的学生们联系单位。

“哎哟，人实在一年比一年多，可岗位呢却越来越少。”丁老师长吁短叹地说，“前几年我们这儿是全市几十所高校中假期学生打工最多也是最好的，今年看来不太妙，一方面社会下岗人员跟我们抢活，另一方面留校不回家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贫困生们都想利用假期把新学年的学费挣出来吧？”

“可不是！平时学校功课紧张，大多数贫困生就指望这放假的一个多月挣一把。但市场是有限的，蛋糕就那么多，一部分人抢去了，另一部分人就得挨饿。”

“那今年挨饿的会不会轮到你们学校这帮贫困生呢？”我问。

“保不准。”丁拿起三本假期勤工俭学求职登记簿，说，“去年到我这儿登记要求帮助联系打工的是 60 多个，今年这才 5 月份就已经有近 200 人了。压力大呀！”

“为什么想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是同学们自立的意识强了，还是其它什

么原因？”

“有前者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贫困比例这几年直线上升。”丁老师介绍道，“我们农大东区学校近来对特困生有个统计：1995 年按每月一个特困生所有收入 90 元为标准，低于 90 元的为特困生，统计结果为 350 人，占全校学生总数 9 1 5%；96 年按 120 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的特困生为 570 人，为学生总数的 15 1 4%；97 年按 150 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特困生为 835 人，是学生总数的 22 1 6%。今年 98 届新生到校时会不会达到 30%的比例呢？！”

我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几年的贫困生比例上升幅度都在 6% 至 8% 以上递增，而今年则可能是第一个高峰年。注意哟，上面我说的是我校的特困生人数和比例，他们都是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家庭经济来源甚至还要反过来支持家庭的学生，至于一般要靠自己独立解决上学生活费的学生数目就更大了。”

“两者加起来多少？”

“在 60—70% 左右。”

一个惊人的数目！

“现在大学校长们都在承诺‘不让一个因经济贫困而辍学的学生出现’，能做到吗？”

我极想得到实事求是的答案。

丁老师沉默片刻，说：“每个学校都在为之努力，并大多能履行承诺。但有些贫困生无论你怎么帮助，他仍要辍学，学校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

“因为学校可以帮助一个学生，却无法拯救和负担一个家庭。”

“你们学校有这样的？”

“有。97 届的一个江西籍女学生就休学快一年了。她在学校得了病，我们发动学校和社会都捐助过她，但她仍感到无法上学，因为她是个孤儿，家里只有一个近 80 岁的爷爷还需她抚养……”

“能告诉她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吗？我想请她谈谈辍学的情况。”

丁老师给我抄下这个叫张兰金同学的地址。不久，我按这个地址给辍学的张兰金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我想或许这女孩不想向外人诉说她内心的那份辛酸与痛楚，这是后话。

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多时，夜色也已笼罩“大学城”，然而在勤工俭学指导中心的办公室里电话声此起彼伏，那间始终敞着大门的办公室，则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在此时不停地进进出出。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疲惫的丁老师朝我苦笑，从抽屉里拿出他的一张工资单，“看看，我的每月工资 316 1 60 元，外加学校 200 元补贴，全月收入 516 1 6 元，去掉水电、房改等还剩不到 450 元。看到天天有那么多贫困生来求助，我个人实在无法拿出钱来资助他们，所以就只能尽量帮他们找些岗位做做，这你就得认认真真、一桩桩去落实、盯死才行。我每天不到晚上 11 点是回不了家的，有些事你想歇口气真还不行。给你看看一封刚刚收到的学生来信，像这样近似乎生死攸关的‘求救书’，几乎隔三差五地都要收到一封。听听学生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声呼救，你再忙、再心肠硬，也会停下一切其它事，去助他们一把……”

我接过一看，满满 4 大张纸。在这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这个写“求救信”的女学生自述了过去求学路上 3 次差点告别生命的辛酸经历，以及面

对社会的不公和家庭的不幸，她弄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她不明白别人家的父母40来岁跟青春少男少女似的，而她的父母也是40刚出头却已白发苍苍？她不明白她中学的同班女生十六七岁就出嫁去做人家的媳妇是那样天经地义，而她走出山村上大学反而被人戳着后背骂为“败家仔”？她不明白别人点个上百元的菜没动两筷子就“拜拜”了，而她手中不足80元的生活却要分着过30天外加为学习添笔和本？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老师，求求你，求求你助我一力吧……！”

丁老师发现我的手在颤抖，说：“走，今天我提前下班。”

我搭上出租车，从西郊的“大学城”驶向市中的家。那已是很晚的时间，但马路上依然车来人往，繁华而喧闹，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我自己感觉我的眼里老有热流涌出……

“怎么，生意亏了？还是失恋？”出租车司机一路唠叨，而我一句话也没说。

走进清华园的那一瞬，我真的有种去“打扰”的愧意。不用看校志，不用读校史，光听这名字我就有种神圣的感觉。

这是一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学府，因而在我看来它的每一寸土地都该是圣殿上的天然大理石，都在闪闪发光……

这里的每一位学子几乎都是“状元”。

“状元”们该是怎么样的雍容华贵？青史流芳？呵，几百年来，中国百姓无人不知那一旦为“状元”后的“他”是多么令人敬慕，是贵人家则更加锦上添花，是寒窗庶民则一夜之间改换门庭，那美人会向你姗姗走来，那帝皇会给你加官封爵，再不用老母灯下缝衣织布，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可以披山被海；再不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挥不尽的金银财宝可以铺路垒塔……

“状元”——中国父辈人心目中望子成龙的最高境界。

这，虽然是昨天的“最高境界”。但今天，它依旧在国人的心目中如日月昭昭。

可是——可是今天清华园里的“状元”们是怎么啦？

——那入学前领着的两只塑料袋竟伴随着你度过了四个春秋？

——那进校时穿着老乡长的那套旧西装为什么在你身上日复一日、一年四季地不换？

——那长如京沪铁路线的哥德巴赫猜想运算纸为什么是你从垃圾专业户手中苦苦乞求而得的“回收废品”呢？

还有，你完全有能力去超越比尔·盖茨的软件，可却为了下一顿饭卡上能保证买得上一盘菜而奔跑一整天去分发那几十斤重的小广告？

还有，你的聪明与智慧足可以让100个“老板”明白什么是“信息高速公路”，可却不得不在课余间的那几十分钟蹲在圆明园的出口处为一个愿给2元钱的白痴擦皮鞋？

还有……

——学生工作部专管贫困生事务的吴雅茹老师，拿出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材料与例子。

“我们清华现在的注册本科生达12000多人，这在国际上的一流大学中也是大学校了，可我们也有另一个大数字，那就是1200多人的贫困生！”这

位性情如同个好大姐的老师，一脸倦意地打开柜子，“你看看，这么多贫困生材料，就我一个人具体管，光翻一遍他们的东西就得几个钟头。可贫困生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形的，也许今天某同学还是好好的，明天他家里可能就大难临头。我们学生工作部就得随时要掌握情况，及时收集必要的材料，那样才能有效地替困难的学生解决问题。”

“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编制起来就是一支不小的军队呀！”这样的一个人事实竟然存在于堂堂清华园里，让人难以所料。

“可惜的是这支不小的‘贫困大军’散落在我们清华园的浩浩万人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甚至动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来进行追踪和管理。”吴老师介绍说，他们清华在每年新生录取时都要向每个新生家庭随入学通知书一起发出一张《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在新生到校后又有各院、系根据学生自报与组织调查的结果，再统一汇总到学生工作部，然后进入清华贫困生数据库。在进行这一程序后工作并没有完，为了保证那些真正有困难的学生得到救助，学生工作部与学校伙食单位紧密合作，因为在学生的饭卡上出现的“晴雨表”最能说明其在校的经济与生活状况。一个学生连续一段时间的低水平生活消费，正常情况下可以说明他是个贫困生。一个学生的生活消费超低水平，他就很有可能是个特困生或家庭出现了什么问题。而这些仅仅是电脑里的显示，真正的情况就必须逐个地去探访调查。也许有人很直率地向你讲明，也许有人确实很有问题可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贫困生，也许他的饭卡上是很低消费但却在平时讲究穿着、大手大脚……

“我们学生部的工作就是使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与实际相符，不让该帮助的每一个贫困生从我们的视野里漏掉，也不让不该济困的人溜进贫困生的行列。而这仅仅是学校开展解决贫困生工作的序幕，真正有难度的工作还在后头。”吴雅茹老师期望我明白这样一层事实，那就是：能在学生工作部里看得到的有关贫困生的那些“特殊档案”，仅是表象，真正的贫困生问题还在学生们的心灵深处、还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还在复杂的大千世界里……她的话，我似乎领会，又似乎领会不了。

说实话，我从清华大学出来，就不敢再去叩开毗邻的北京大学校门。我怕沉睡在这里

的一大批如雷贯耳的英魂惊醒，他们是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鲁迅、李大钊、毛泽东

……北大的历史从来是用金子铸成的，泱泱中华大国的最高学府史册里，不该有灰色的档案

。不是吗？

我没有权利隐瞒事实，无论它是哪等样的高校。

今天的北大是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所综合高校。今天的北大还是全国 2000 多所高校中贫困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

你不相信？但它是事实。

——北大的在校贫困生每年多达 3000 多人。

全国 2000 多所高校中，其实生员不足 3000 人的将占三分之一。北大一校的贫困生总数就超过了这几百所大学每所学校的总生员，难道还有谁怀疑北大不是最大的“贫困户”？

北大学生工作部有一份“内部材料”，详细解释了这 3000 多名贫困生的准确性：以 1997 年物价水平和生活费用标准，一名北大学生平均每月最

低生活消费是 250 元，加上 2500 元的学费和住宿费，全年经济支出至少在 4500 元。仍以 97 级为例，该年级的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 200 元以下的占 18%。而另一份调查统计显示，96 级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 170 元以下的为 20%，95 级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 150 元以下的为 22.15%，94 级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 120 元以下的为 25%。综上所述，北大的贫困生绝对人数始终在 3000 多人以上。

你和我一样不了解北大吧！你因此而当然更不了解啥是贫困大学生！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一个中国高校教育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特殊群体。

有人这样描述：他们的心空犹如天马在宇宙高高奔驰，犹如牛仔在旷野上冒险拓疆，尽情地享受着知识给予他们的丰富与充实；他们可以同别人一样在图书馆、课堂上体味苏格拉底的庄严，毕达哥拉斯的神秘，尼采的酒神迷狂和老子的玄妙，庄子的洒脱，刘勰“笼天地于形内”的壮观。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则因物质的困顿而如同一个痛苦的朝圣者在沙漠里徘徊，如同一个迷航的船员丢失了木舢而无所适从，更如一个失血的病体在等待无望的救援……

他们的精神与情绪组合起来，就是一股非凡的暗流、一股噪动的岩火，可以摧枯拉朽，可以排山倒海，可以……可以成为很多、很多。

因此，当我走进中国高校的学生工作部时，都能感到有种忧闷，有种紧迫。

其实，贫困生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他们不愿别人总在翻阅他们的那些“灰色档案”，他们正努力书写一种新的人生……

第 4 章：校园上岗留下我们的羞色与光彩

越过那道无形的门坎“你怎么啦？”

“没什么……”寒假归来的同学们都在宿舍里又说又笑地嚷嚷着，可高德水的心境怎么也好不起来。刚过去的一个学期是他进大学的头半年，这所大学门进来时，他就深感“圣殿”真是太难入了，不说作为一个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考大学有多难，单说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为凑那几千元的学杂费便可“一夜白了少年头”。高德水明白自己如果不是当时幸运地得到家乡洛阳的一家公司义助，就有可能失去迈进“圣殿”这一步。那时他高德水确实得意过一阵，因为整个洛阳的上万名考上大学的学子中，有许多也是贫穷家庭，但全县被资助的只有两名学生，他高德水是其中的一名。

能不得意吗？第一个学期每月有保障的 150 元这笔资助的奖学金，虽然有时他也感到手头有些紧，但丝毫没有那种“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感。这学期可就不同了，一切都得靠自己。高德水早已从几位最低生活水平的“穷仔”学友那儿了解到：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上大学，每月一般生活费在 200—300 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呀？

高德水十分清楚自己那个只种几亩薄地的家是无法供得起这巨额费用的，但放寒假时他还是期望在新学年开学时能从家里带一笔至少可以维持最基本的学业费用。

可老天爷就是不长眼。大旱造成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且不说，因

为姥姥过世家母悲伤过度而一时疏忽造成唯一能变钱财的几头牲畜死亡殆尽。高德水记不得他上大学后回家过的这头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他眼前一直浮现的是临离家时母亲抖抖嗦嗦地给他掏钱的情景：“儿啊，妈知道你上学要吃饭花钱，可家里实在拿不出，这50元还是你爸借来给我治病的……”高德水哪敢接这样的钱，他是孝子，说么也要让母亲留着这笔钱去给爸看病。但等到他上了火车后才发现，母亲还是把钱装进了他书包里。

高德水就是带着这30元回到了北京的校园。

30元，加上学校补发的每人每月的几十元副食补贴，高德水掐来掐去也觉得不可能维持新学年最基本的生活。有件事他从来没跟人说过，那就是他在新学年开始的第一天开饭时，别人都上了饭堂，而他却躲到了厕所——他不是去拉屎拉尿，而是去看看……唉，他真不想启口，因为这事太有点那个了。还是说吧，穷人的事本来就没啥面子可掩的了。他说当时突然想起了上高中时的情形，那时他也没钱，一天的伙食费压缩到1元以下。

有几次因为没了钱他就跑到厕所，因为那些粗心的同学们总常常不小心在蹲坑时把口袋里的菜票掉在旁边，甚至掉在坑内。他穷急了就乘没人时从坑边坑内捡起菜票冲一冲就去用现在是大学，同学们不用饭票使饭卡，但在上厕所时掉钱扔钢镚的还是大有人在。高德水没路可走，却想通过“重温”中学时的“厕所之道”来解燃眉之急。然而那天偏偏同学都很“精明”，他高德水从厕所出来时一无所获，不过后来他说亏得这一无所获，因为否则以后总感这是自己大学生涯里的一件难以洗刷的屈辱之事。

日子还得过，学业总得完成。高德水在走投无路时走进了学校团委，他听人说那儿正在筹建一个勤工俭学指导中心，是专门帮助有经济困难学生的。

“我们的工作刚起步。如果安排你上学校的北楼打扫卫生你愿意吗？”

那儿原先雇的临时工走了，正好需要人。”老师用商量的口气跟他说，“每天早晚扫两次，一个月100元你看行不行？”

“行！”高德水一听每月有100元的收入，他连半点犹豫都没有。事后他说当时就是老师说给50块一月让去掏粪挖沟都不会打个磕，“有饭钱了我就可以把学上下去，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天什么时候起的床，高德水现在还说不出个准点。“反正把老师分配的楼道卫生打扫干净后，我又回去眯盹了好一会才听起床号响……”

他说他起这么早一方面是第一天上岗心里特别激动，想把事情做得让人满意些，另一方面也免得被同学们看到面子上不太好看。但后来高德水打扫楼道的事还是让同学们都知道了，于是有人用羡慕的眼看他，更多的人则向他投来惊奇的目光。不管是羡慕还是惊奇，高德水从此就成了学校的一名校内勤工俭学正式上岗人员，并由开始的承包扫一层楼道到承包三层楼道，月收入固定在300元左右……1998年7月，高德水顺利完成了4年大学学业，以优异成绩被家乡的著名国有大企业——洛阳拖拉机厂接收。

在大学生勤工俭学的庞大队伍里和高等教育悠久历史中，高德水既不是最突出的一位，也不是第一位“吃螃蟹者”。“勤工俭学”这四个字也许自人类有大学起开始，它便同步诞生了。不说远的，从第一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严复、蔡元培留洋求学时当码头工，到新中国的缔造者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做工求学以及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等等传世的故事里，“勤工俭学”早已成为大学生的一种可贵精神而载入史册。至于在外国，总

统的儿子到饭店刷碗，大富豪的千金去游乐场当招待员比比皆是，不足为奇。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在上大学时就当过几年的勤杂工。

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一代中国大学生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那次著名谈话后，也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热。然而过去的这些“勤工俭学”更多的意义，是出于对大学生自我素质的培养。特别是人民翻身作主后的新中国大学生上学，一直延续了“上学靠国家”的制度，他们不用为入学后的生活而担心操劳。那三四十年里，我们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入学吃用国家包，毕业出来有国家分配，所要费心的就是好好听课用功。

然而“并轨”后的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先不说一年几千元的学杂费令许多经济贫困的学子和家长们措手不及，无所适从，单单上学后的吃饭问题就让学生们愁死了。学校有限的“奖、学、贷、补、免”，常常仅是给那些本来就不愁吃穿而成绩又好的学生“锦上添花”，至于学习基础本来就差、又要顾这愁那的贫困生们就只能“雪上添霜”，苦苦挣扎。

高德水是 94 级大学生，虽然他根本不可能算得上勤工俭学大军中的先驱，但作为一名当时“并轨试点”学校的贫困生，作为由学校出面安排和特设的“贫困生勤工俭学岗”上岗人员，他属于今天千千万万上岗者中的“先行者”。

既然是“先行”，便包含着先于别人的勇敢行动，又有打破先前传统的精神。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校“勤工俭学”上岗、学校拿不出更多的资金补免而设岗让贫困生做工——这事一经师生相传和新闻媒体披露，一时间校内外沸沸扬扬，众说不一。

先是一些教授们难以理解——“耻也，你考试出了三只‘红灯’，把这楼道扫得如此干净有何而用？”一位老教授暴跳如雷地指着正在扫楼道的学生鼻尖，从三楼骂到一楼，后来又在课堂上公开说：“再见××在晚自习时扫楼道，就让他永远别上我的课！”

其次是一些家长的不理解——江西南昌刘某是个下岗工人，每月他都要靠起早摸黑、走千家万户收破烂换来的二三百元钱寄给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上个月儿子来信说：“爸你别再寄钱来了，我在学校已经有了一份每月能得 200 多元的活做……”刘某一一看信，连夜乘火车到了武汉。跑进学生宿舍，同学们告诉他说你儿子在食堂帮厨。刘某闯进食堂一看，果不其然，儿子正系着腰围布，满头大汗地与食堂师傅们一起涮锅洗碗。刘某心头顿起三丈怒火，抄起一根木棍就朝儿子劈去：“小兔崽子，谁让你到大学来当伙头军的呀！跪下，今天你不立保证从明儿个起不再来此打工，就别再认我这个爸！”后来儿子真的跪了下来，哭着向自己的老爸保证今后不再打工。“那好，你不是怕没钱用吗？”

这 800 元是我上星期卖血得来的，你先拿着，以后我每两个月寄 800 元来！”

刘某从口袋里抽出一把钱，扔给了儿子，头也不回地出了校门。

再次是社会上的一些人不理解——上海某高校校长曾经一连接到好几封这样的来信：你枉为一个著名大学校长，听说你们那儿把我们地区的几名“状元”都从课堂上赶到了学校的厕所、食堂，还有去老师家当“小差”。请问你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们的那些学生他们是怎样上的大学吗？他们是我们全乡父老乡亲们每人一块钱一块钱凑着送上大学的呀！我们为啥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这儿从来没人考上过名牌大学，那是因为在明天还等着他

们学有所成回来建设和改变穷山僻壤……你说你不叫他们好好上课却让去干苦活，对得起谁？

呜呼！学生冤也。老师冤也。校长更冤也。

教授有传统的观念，家长和社会上的一些人不了解学校校长、老师包括学生在内的苦衷可以理解。然而令许多人不可理解的是，那为数不少的贫困生他们面对“上岗”所表现的种种行为也让人惋叹。

第5章：校外打工我们欢乐，我们流泪

不跪的他与下跪的他 1996年10月，郑州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生，他叫孙天帅。

孙天帅确实不同一般，因为他是直接从一名普通“打工仔”一跃成为名牌大学的的大学生，而能使他实现这一跨越的是在一年多前的一次打工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孙天帅打工的所在单位——珠海瑞进电子有限公司的外商女老板金珍仙，突然让正在生产线上拼命干活的全厂中国员工站队集合，大发雷霆地要求每个中国人双手举起做投降状，然后就地跪下。

金珍仙这样做是因为两年来，这位女老板时常要求员工们加班加点，就连春节都不让放假。

1995年3月7日早，连续加班几天的一位女工劳累过度，在休息时伏在工作台上打盹。外国女老板为了惩罚这位“违规”女工的行为，于是就有了要让全体员工罚跪的“集体教育”，并声称若有一人不从就罚其余人“永远跪着上班”。

许多工人迫于无奈，犹豫中淌着泪水跪下了……孙天帅是这群受辱的中国员工之一，但就在工友们一个接一个跪下时，他却像青松一动不动地挺立在原地。

“跪下！”女老板咆哮地向他吼道。

“请问：我为什么要跪下？”孙天帅压住心头的愤怒，问。

“不跪你就滚蛋！”

“我可以走，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要控告你在我们中国国土上的所作所为！”孙天帅昂头挺胸，甩下每月1300元的饭碗，大步从那个女老板身边走过，并且永远离开了那块耻辱的地方。

“我是中国人，死也不在洋老板面前跪下！”孙天帅，这位“不跪的中国人”，从此成为千千万万打工族传颂的英雄，被亿万中国同胞们所称道。1996年7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再次播出有关报道后，一时间的孙天帅又成为热点人物。郑州大学也因为孙天帅的“不跪”而破格让他当了一名大学生。

有言道：男人跪下是黄金。在中国的几千年传统文化里，“跪”字下面从来就是黄金。

在事关人格、国格面前，跪便是一种理性、道德的沦丧；在真情与亲情面前，跪便是最重的回报、最高的敬孝；然而生活中还有一种跪也是十分崇高而又珍贵的，那就是或为长远的奋斗、或为暂时的生存而跪。

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一个“跪”字，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与内涵。

“跪”字，在大学生们的眼里是一种人格的尊严、知识的等价，因而它更富于特殊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向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的许多人中，为了基本的生存与生活，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去从事他们本不该去做的那些事。在如此一个“跪”字面前，有人端正心态，勇敢地去面对现实，从而摆脱了原有的种种困难而确保了学业，这样的“跪”，同样是高尚和可贵的；然而也有人则不能摆正心态，不是在“跪”字面前退缩，便是向“跪”字投降。

“跪”，对千千万万个生活贫困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个痛苦的历程，那是种辛酸的无奈，那是笔高昂的代价，但同时又是自然界无法取之、只属于人的心灵之窑而独自铸冶的黄金！

有位大学生告诉我，他最先在学校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安排下当了一阵学校家属楼的水电收费员，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的活，一个月查收一次，但这位同学说，他负责的那3座楼里总有那么几户人家在他每次前去收费时说些难听话、做些刁难你的事。

他说有一次上一户家里收费，那主人硬不愿如数交纳电费，理由是怀疑电表不准。那同学说电表不准与我照章收费无关，我只管自己的职责。那主人就气急败坏地把一张100元的大票扔在这个同学脸上，说你收呀！你是不是穷疯了想在别人的水电费里抠出你的学费来呀！

这个同学说他当时真的被气哭了，扔下收费本从此就再没在学校上岗的机会。后来他到社会上打工，可是打工的经历使他更加饱尝了屈辱与痛苦。他说，时间一长他就明白了，因为任何一种为别人服务性的低级劳动，都不可避免地碰上这样或那样的不愉快的事，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磨难，才使得大学生的勤工俭学更为可贵。

这个同学的话有一定道理。在帮助大学生摆脱生活困难的工作中，这几年各学校和各级共青团组织，通过各自的可能为贫困生们创造了大量的勤工俭学机会。然而学校毕竟不是劳务市场，即使老师们把本来用不着设岗的许多地方也利用起来，让同学们去象征性地做些勤工俭学，但终究满足不了所在学校大批的贫困生上岗问题。能在校内上岗的人对贫困生来说，可比作那些不用愁就有饭碗的“计划分配毕业生”一般，而这部分上岗的人不管是“蓝领工”还是“白领工”，其实只占大学贫困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的贫困生想求得生存，争取自立，很大程度还得靠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打工。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也真够黑暗与残酷。”几乎每一个在社会上打工的大学生，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

确实，大学生打工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接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被贬值的问题，不是特别的好运，几乎没有一个老板是把前来做工的大学生当作有知识的人来合理聘用，而是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录用你。你不是就想得到一份饭钱吗？那你就老老实实放下你大学生的架子，我这儿可以提供出力换一份钱的差使，如果你想干你就留下，你想获得身分和知识的等值工作，对不起，请另寻高就。有些修养的老板这样对你说。如果碰上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款，那恐怕就是另一种口气了：日娘的，你以为你是什么鸟东西呀？咱这个城市里啊，硕士、博士的想刷盘子都排着队，像你这样的“笨（本）科”就是给我搓脚端尿最好先自己照照镜子配不配哩！

你气？那就自个儿受吧。你高傲地甩手起身回校，可这个城市不对“贫

民”发放救济粮，即使发了也轮不到你这高贵的“天之骄子”。你无奈，于是只好“面对现实”而降下一个大学生的身价，去从事根本不要文化只要能出力流汗的劳工，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更为突出。大量的下岗人员，大量的国家机关精简干部，加上大量的企业不景气，全社会的劳力过剩，使得人力资源几乎丧失了最基本的择业优势，大学打工族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1998年7月的暑假前，我走进首都几所大学的勤工俭学办公室，负责此项工作的几位老师，面对多于往年几倍的假期留校学生的打工问题，长吁短叹地直摇头。一个五六千人的学校，竟然有一两千名学生假期不回家，你是管还是不管？管，你就得给他们安排活，可现在社会上的下岗人员多于你想打工的学生几十倍！你不管，等9月份开学时他们都不给学校交学费，倒霉的还是学校。唉，真不知如何是好……透过这声声沉重的叹息，我们不难感受到现实的严峻。

走，我们自己找活去！同学们这样说，其实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因为长长的暑假是打工赚钱的最佳时机，非万不得已完全可以不用回家，既可省下一笔路费，更重要的是新学年的学费、生活费全看这个假期的打工结果。在中国农业大学，我进行了一次“暑假大学生打工实践的调查”，接受调查的30名同学中有28名非常明确地说，自己留在北京过假期的目的是为了挣出下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你准备在假期干些什么工作？

最好是某公司的商务，其次期望一份固定的家教。

你打算在假期挣多少钱？

越多越好，但至少必须在2000元左右。因为下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少不了这个数。

如果好的工作找不到怎么办？

那就只有看着办，到最后凡是有钱赚的，什么活都得争取呗。

——上面是我和一名假期留校学生的对话。7月初，学校的升级考试刚结束，他就加入了滚滚涌出大学门的“打工大军”，几日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运气不错，有家经济小报聘我当特约组稿人。

什么待遇？

计件工资制。一个月能拉到2万元的指标给30%的提成，不低吧？如果我组上一两个有偿的版面，新学年的学费就都有了！

接完电话，我真从心眼里希望这个同学能成功，但又不得不暗暗思忖着他干的那活其实纯粹是人家榨他油水的小把戏。京城里上千家大大小小的报刊社，玩这一类招数的早就不是啥新鲜事了。说得好听点儿是聘你当什么“特约组稿人”，说白了就是让当拉钱的业余广告跑腿员。

我身在报社、杂志社干了一二十年，这种事见得多了，心想提醒这位同学，可又不忍打碎他的“发财梦”。

果不其然，临近8月中旬，正当我此书的写作进入后期时，突然有一天那位同学又打来电话，他一上来的声音就叫我担忧——老师，我上他们当了……

别着急，先说是怎么回事？

他、他们让我跑了整整一个月，一分钱都没给我，我自己反而花掉了200多块交通费。

你说他们黑不黑？

是你没有组到稿，还是没拉到赞助？

拉了。我整整拉来了两个版面呢！

那为什么报社不付你报酬？

报社说我的两个版面应该拉回 4 万元，可只到位了 3 万元，原因是其中一家企业的经济不太景气，想不给后面的那 1 万元，我跑了不知多少趟找他们老板，可人家不是不理我，就是躲着不见我。我知道拿不回这 1 万元，前面辛辛苦苦拉来的 3 万元也等于白干，所以前些日子我天天去堵那公司老板的车，但人家就是不给钱。老师你说我还有啥办法？那天我整整在那家公司里等了一天，人家不给我坐，连口水都不给喝……实在没办法，最后我拉住那个经理，跪在他面前，求他把欠的钱付给报社……

你，你真的跪了？

真的。我实在没招了，他要是赖着不把我这辛辛苦苦一个月全坑了吗？那样我下学年上学就惨透了。

唉，你呀！他后来同意给钱啦？

老师你先听我说。那家伙一看我跪在他面前，当时就无可奈何地，说行吧，看在你堂堂一个大学生给我跪下的面上，他让我过一天去取支票。我当时一听这，简直像是见了救命恩人似的给他连磕了三个头。老师你不信？我真给他磕了呀！我当时想，磕几个头算啥，我要是得不到那几千元的劳务报酬，才是不得了的事，那下学期开学我拿什么交学费？

拿什么过日子呀？隔了一天，我早早地又到了这家公司的门口，可等了好大一段时间，就是不见公司开门。一问，才知道这个公司在前一天已经搬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上大当了，可、可我哪想到这群王八蛋怎么这样坏嘛……

先别急。有一个办法可以治他：到工商局查他们的老底。

我去了，人家说那老板是海口人，你到哪儿追他呀。老师你说，我、我这不是哑巴吃黄连么！

可不。但在这种连基本道德都没有的人面前，当初你不该给他下跪。

我有啥法？他要给我钱，就是让我跪一天也行。

……

关于这位同学，每每想起他，我心头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倒是后来他又给我打电话，说那个雇他的报社念其可怜，补给了他 1000 元报酬。他说，现在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他争取找个家教，那样就有可能解决下个学年的基本费用。

但愿老天睁眼。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某医大的小符同学。有一家青年刊物上曾经发了他一篇当“洗脚工”的短文，很有些意思。于是一个星期天，我约他聊聊他的打工经历。

“那是最下贱的活儿，可别给我‘扬名’呀！”小符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我保证不透露他的真实名字。这事不难，我答应了。

“其实咱们大学生出去打工说白了就是为了赚钱，干啥实质都是一回事，能不能赚到钱是关键。我当洗脚工就是冲着这活能比家教或送小广告什么的要赚得多，另一方面我是学医的，当洗脚工自然比别人更合适。”小符其实很健谈。

“北京听说也有洗脚店，你也去过？”

“没有，绝对没有去过。”

“为什么？你放假回郑州可以当洗脚工，可在北京又咋不干了？”

“还是有些区别。毕竟我在这儿上学，真要被同学们知道了多不好。”

小符笑笑，看来他还是有些顾虑，“再说，我一年利用两个假期在郑州干洗脚挣的钱够我全年学费和生活费的了，所以用不着再忙碌了。”

“真够？”

“差也差不了多少。不瞒你说，今年一个寒假我就赚了 2000 来块。”

“听说有的地方开什么‘洗头房’、‘洗脚房’，其实有不少是色情场所，你不知道吗？”

“有的确实是。不过我是男生，所以就不太怕了。”小符开始给我介绍他当“洗脚先生”的那段充满奇特而又耐人寻味的经历：……我家其实不在郑州，离郑州还有 200 多里。

我家这几年光景不好，不是地里收成不好，就是爹伤娘病的老有难，摊上这种情况，可想而知我在北京上大学就只能自顾自了。大一头学期最苦，交完学费口袋里剩下不到 200 元，我硬是被几位好心的河南老乡救着度过了那半年。第一个寒假回去，我从郑州火车站下来，走出车站一看，妈呀，什么时候郑州一下变成了“洗脚城”了？你最近几年没去过郑州吧？那可变化大了，其中最火的就是铺天盖地冒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洗脚房”和“洗脚城”。有人戏言：广州人爱洗头，郑州人爱洗脚，一南一北，一头一脚，中国人从此不知天高地厚了……这可能是说笑话，不过要说郑州兴起的“洗脚风”还真是一道风景线，据说现在全市大大小小的有几百家“洗脚城”。当年的“亚细亚商战”，如今变成了“洗脚大战”。说实在的我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也不想去搞懂它，我关心的是自己眼下怎样挣钱维持学业。我郑州有个亲戚，那次下火车后没赶上回老家的那趟长途汽车，当晚便住在亲戚家。就是那天晚上使我走上了“洗脚工”之路。那天在亲戚家吃晚饭时，电视里正在放某公司利用“洗脚房”搞地下色情被公安人员查抄的新闻，看到这里，我的那位大伯亲戚就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简直不像话，什么黑的禁的他总会改头换面给你弄出来，让你防不胜防。这不，现在又冒出啥“洗脚风”，说穿了还是老一套，搞色情呗！大伯的儿子不爱听，说那也不能一概而论，洗洗脚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才吸引那么多顾客，这也叫市场经济的产物嘛！大伯听儿子这么说就不高兴了，说你小子说了那么多洗脚的好处，干嘛平时不见你在家洗一回臭脚呀？儿子说家里的这个洗与外面的那个洗不一样么。老子一听火了：说你混小子别给我来这一套！要是你敢到那些鬼地方洗一次狗日的脚，老子就打断你的狗腿！我在一边听着就差没笑得背过气，忙对大伯说：洗脚本身并没有啥不好，只不过是不要到外面的“城”里去洗，其实按照中医理论，足底按摩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不，表弟是学医的，他的话有权威性。我那表哥似乎找到了理论根据，冲着老子嚷嚷起来。大伯哪听这一套，说啥理论不理论，外面他们搞的“洗脚”就跟家里的洗脚不一样？我看着爷儿俩吵个没完，便给大伯端来一盆热水，让他洗洗脚消消气。为了表示对他家的谢意，我略显殷勤地为大伯按摩、揉掐了几下。“别住手，再掐掐！”大伯惊奇地冲我看看，突然叫好不止：“嘿嘿，你小子还真有两下，这么揉掐几下蛮舒服的啊！跟我说说，是不是大学学校里学的？”他张着嘴，瞪大眼，问道。我笑了，说大学哪学这简单的活？那你咋掐我几把脚窝就这么舒服呀？看来

大伯今天非要问个究竟，于是我只好告诉他，这就是足底按摩，人的双脚、小腿上有 74 个穴位，脚穴既是神经的聚集点，又汇集了人体多种神经末梢。由于双脚的反射区直接与全身神经相连，经常按摩，可以消除疲劳，另外对老年人更有好处，如泌尿病、内分泌失调等都可以通过足底按摩得以解除、治愈。大伯一听这乐了，说你今儿个寒假也别往家里奔了，留在郑州给我一天按上两回，我大伯给你工钱。我笑了，说大伯只要您老一句话，我想伺候您都怕没个福份哩。一旁的表哥这回可有说的了，说爹你这回信了吧？城里现在流行的“洗脚”就是刚才你享受的足底按摩。大伯将信将疑地问我是不是，我只好说差不多吧。不想我这么一说，他老人家来神了：侄儿，我知你家贫，你在京城念大学也不易。可你是学医的，俗话说，只怕病死，不怕医富。我看就你这手上的功夫，郑州市里哪家“洗脚城”都得开门拱手相请。我表哥更来了情绪，说表弟你只要一句话，明儿我就给你找份活，你又是学医的大学生，一个月少不了二三元工钱。能赚这么多呀？我一听像是有点天方夜谭，不过第二天表哥跟人家一谈，“洗脚城”的老板就答应了，还说干足一个班给 100 元，小费可以归自己。

这么好的事哪儿去找呀？于是我就答应留了下来。当天下午我就在表哥的带领下“洗脚城”报到，临走时表哥还专门吩咐让带上学生证。报到时我见那“洗脚城”的老板对我格外热情，说他店就缺像我这样有高学历的“专家”按摩师。这个表哥，他不知跟人家把我吹成什么样。表哥见我向他瞪眼，就赶忙使眼色。我心想反正足底按摩也不是多难干的活儿，应聘了再说，真能一个月赚上千儿八百的下学年不就不用发愁了吗。

我心里打着自已的小算盘。

上班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被安排在“女宾部”，我哪见过那么多娇滴滴的女人们穿着浴衣浴巾在自己的眼前晃动呀！说实话，我走进老板办公室说自己最好到“男宾部”时没有说出内心的真实“活思想”——我是真的害怕自己有没有那种能力在这特殊的环境下抵挡得住“色诱”。老板根本不同意我的换岗，说聘你来就是因为“女宾部”缺“专家”级按摩师。“小伙子，别怕，她们又不是吃人的母老虎。”老板朝我挤挤眼。

可我还是感到来“洗脚城”的女人大多是“母老虎”，那些贤惠的良家妇女肯定不到这种地方。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吧，管它老虎还是绵羊，只要不少给钱就行。我下定了决心干一个寒假，反正是打工呗。“洗脚城”的程序并不复杂，客人进来后，你把她（他）引至沙发，当她坐定后先有服务小姐或服务先生给端上茶水，然后就是由我这样的“专家”上阵了：第一道是给人端进一盆用中药浸煮的药水，这药里通常用红花、蛇皮、丁香等草药调配，虽然没有特殊功效但起码能有防脚气、除脚气一类保健作用。顾客要在这药水里浸泡 20 分钟左右。其间我就要开始向客人介绍足底按摩的一些常识，这时一般的客人都会向你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你必须回答得令对方满意，因为这种对足底保健的“精神信任”，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客人相信了足底按摩的“科学性”，下一步你再在按摩技术上让她感受到了你讲的足底保健的“好处”，这等于你拉住了一个长期客户。如果是老客户，这一项便免了，但你得常常花更多的时间去静听她（他）向你讲述她（他）自己的有关脚或什么地方的毛病，当然你尽量得避免那种没了没完的家常闲聊，但有时又免不掉，因为这种带感情融通的闲聊也是巩固客源的重要方面。老板们特别要求我们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可对我们干活的人来

说就有可能麻烦从此而生。有一天一位 50 岁模样的女宾来了，一进门就躺在沙发上开始喋喋不休地讲她邻居的那几个穷人家如何如何地每天到菜市场上捡最便宜的菜买，又如何如何地只要她一在家便想方设法到她那儿沾好处。就因为这，她才来“洗脚城”尽量躲着人家云云。

我也是穷人家出身，一听这就从心里反感这些人，所以只管干活，根本没理她茬。嘿，突然这女宾无理地把一只脚搁到我的鼻子底下，怪里怪气地问我她这脚是香的还是臭的，我压住心头之火，没有答话。她又重新把脚触到我鼻尖上，声音更加尖厉地问到底是香还是臭。我火了，说臭的。不想我刚出口，那妖婆朝我就是一脚……随即就是撒泼大骂起来。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娘们会如此发威，呆在一边不知所措。后来老板来了，那女人更肆无忌惮地冲着老板说你今天不“开”了这小子明天就让你这个“洗脚城”关门。我另一个想不到的是，老板竟在这女人面前唯唯诺诺地连说了一大串“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是那片市区的工商管理局的“局长夫人”，难怪老板如此怕她。不用问，我第一回当“洗脚工”就被扫地出了门。

表哥本事就大，没过两天就又给我找了一家“洗脚城”当差。这回我也长了心眼，碰到上面的那种宾客就有心无心地跟着瞎聊呗，反正并不影响手上的赚钱差使。当“洗脚城”的按摩师其实并不是件轻松活，一扎进去就是十几个小时。老板为了多挣钱少花费，尽量少用人手，所以我常常这个没干完就去应付另一个。女宾们本来就比男宾事多，加上进洗脚房的女人不是有权有势，就是有钱有脾气，稍有怠慢，便会出些麻烦。由于老板们都愿意抬出我的京城名牌医大学生的身分，故有意欺我者后来渐少，倒是另一类宾客又让你左右为难。女宾中不乏一些有钱的“贵夫人”，她们有时也会出些难题让你难办。如有个女宾是某企业的总经理，离婚的单身女人。她几乎每天都进“洗脚城”来享受，有几次我接待，大概服务还算到位，她便塞给我 200 元小费。之后她每来必要求我专门为她服务，这种情况本来也属于正常。但后来就出了新情况：有一天她突然给我打电话来，说因为单位工作忙，不能到“洗脚城”来，问我能不能到她家去服务。我说老板有规定，不能去。她便说本来是可以来的，就因为脚脖子扭伤了，活动不便，希望我去按摩按摩，后天她要出远门谈生意。既然这样，我想救人一难算积点德吧，于是同意了。我没有自己去，是她派车来接我。富人到底不一般，她的小别墅足够住我们一个班的同学，里面的陈设更是我只能在电影电视里才见到过的。女主人的脚确实扭伤了，有些肿，但不算太严重。我自然拿出看家本领为其按摩，女主人斜仰在沙发上，看上去极感舒服。在我为她按摩时，她几乎一直是闭着眼的，只是嘴里吩咐我“左一点”、“右一点”。她又说话了：“……

往上一一点。对，再往上一一点”。我照着做。“好，挺舒服的，小符，再再往上一一点……”她仍然在吩咐，嘴里还不停地发出那种我从未听过的“哼哼”声。我的手突然停住了，并且紧张地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我知道我不能再呆下去了，于是便直起身来。

现在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当时我确实有些不能自主，但理智始终占了上风，所以非常坚决地对女主人说了声：“对不起，我、我要走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幕想起来仍有些恐怖的场面：那女主人一反往常的温文尔雅，像一头发怒的母狮，抄起沙发上的枕头，向我扔过来，随后又是小桌上的那只咖啡杯也向我飞来……“你这个小毛驴，给我滚！滚出去——！”后面一幕是我的狼狈，现在我都想不起来是怎样跑出她那个别墅，又怎样回到我

打工的那个“洗脚城”的，总之我为此连做了几夜恶梦……

“后来呢？”这回是我和坐在面对面的“洗脚工”小符问答。看得出，有过那段“洗脚城”特殊经历的大学生仍在他那魂不附体的恶梦中沉游。

许久，他恢复了常态，向我露出那学生特有的稚嫩，“后来……我还是在‘洗脚城’干，老老实实地干。”他脸色微红地朝我笑了笑，解释道，“其实当‘洗脚工’通常情况下还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女宾部’。不过有了上面的那一回，我每次干活时只敢蹲着或是跪着为宾客卖力工作，却不敢多抬头往上看……”

有意思。这是个甘心情愿下跪的特殊“打工仔”。

“那个假期在‘洗脚城’真是长了不少见识，但最主要的还是赚到了可以让我下学年踏踏实实上学的钱。”小符的内心充满阳光。他悄声告诉我：“现在郑州还有些我的固定客户，她（他）们平时常跟我通电话，希望我假期回去再为她（他）们服务，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些人，因为那是我的‘财源’。我甚至想过，如果以后毕业分配困难，干脆我也去开一家‘洗脚城’。中国人的脚病太多，足底按摩又确实能保健人嘛。”

真是一个灿烂的“跪”，我由衷为小符欣慰。

第6章：女生“有点想哭”

1997年6月5日，北京某师范大学的女生宿舍楼前人头攒动，师生们个个神色异常惊恐地相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432宿舍的女生杀人啦！”

“天，为什么要干出这等事呀？”

“听说是为了家教，那家的男的欺负她不是一天两天了，她就……”

正在此时，公安局的警车和医院的救护车一齐开进校园，整个现场的气氛更加紧张。穿白褂的医生们正把一个脖子上血流如注的中年男子担上救护车，而4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则扒开人群，向楼上的432宿舍冲锋。不一会儿，他们荷枪实弹地押着“杀人犯”、该校年轻的女学生B从楼上走下……

这一天，校园内的万余名师生都被这突其如来的“杀人事件”所震慑。他们无不都在为B而感到惋惜。

关于B这位大三中文系的学生，老师和同学们对她都很了解，B平时学习认真，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是系研究生的送报对象，然而现在一切都付之东流。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惋惜声中，师生们都在思索同一个问题。

然而知道底细的人又似乎觉得B的这一步多少有些必然。

B是个贫困生，父亲有病已多年，母亲因早年产后落下了下肢瘫痪，下面还有一弟一妹的B懂得自己上北京读大学的不易，更明白不能再因为自己而让家里负担了，事实上窘困的家庭也不会给她任何经济上的帮助。打到北京上大学的头几天，她就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奔波起来。当初她报考这所师范大学，一方面是因为热爱这个专业，另一方面也多少知道这个学校的在校生是全国勤工俭学最吃香的，有不少人上大学时空着身子进去，等毕业时小存折上有五六位数的“家底”。B心想自己不说能赚多少，但除了能把自己几年上学的学杂费和生活费挣出来外，得给上中学的弟弟那份学费也

争取挣出来。为这，她经常同时身兼三四个家教，从周一到周日，没有一天不忙忙碌碌，寒暑假里更是起早贪黑连轴转。而她平时连一个两块钱的菜都不轻易吃，至于像西单、王府井那些繁华的百货商店就更不用说去过一回。B 唯一想的是能尽量多干一份家教，最好是找那些既花力不多，又挣钱不少的家教。

北京人有钱有势的人多得很，碰上好运气你甭多费力就能比别人多赚几倍的钱。她缺钱，家里的弟弟也在等着钱念书哩。

终于有一天，她的运气来了：有个 3 年级小学生的家长请她当家教老师，女孩的母亲在外企工作，男的是北京有名的律师，姓彭。经协商，由 B 每周一、三、五晚上来教课，男主人彭大律师负责接送 B，家教的待遇是每小时 25 元。“以后你就是我们家中的一员，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你也不必客气，每次来教课时就到我家吃晚饭，啊，咱们说定了。”女主人果然爽快。更令 B 惊喜的那位名律师的男主人也气度不凡，在第一次送她回校的路上便塞给她一叠钱：“这 700 元算你这个月的讲课费，先拿着用。你们女孩子用钱的地方总多些。”瞧，谁说现在有钱的人没学问？看看人家大律师，说话体面、到位。更让 B 感动的是小女孩的母亲待她就像自己的姐妹，有一次男主人出差不在家，女主人死拉着 B 跟她睡在一张床。那晚，女主人跟 B 亲亲热热聊了大半宿，使远离亲人的 B 感受了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情。

女主人在公司里是主要角色，经常出差。那男主人就除了负责接送 B 外，还担当起了做饭的家务。每次端起热腾腾的饭菜时，B 总是有些受宠若惊：“大哥，下次您就别做了，我在学校吃了再来也不晚。”“不好，你们女孩子正在长身体，尽量要吃好些。”男主人那种兄长般的关怀，使 B 深深感激，因为 B 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呵护。

又一个家教日。B 到孩子家后才知道女主人又出差了，那大律师依旧给她认认真真地做饭，等到课讲完后他让 B 在楼上等他去发动好汽车再走：“外面正下着雨，你出去会淋着的。”仅仅这细微的关照，就使 B 内心好一阵温暖。不一会儿，他上来了，很无奈地说：“车出毛病了。要不今晚你就住在我们家吧，孩子她妈不在家，你可以同我们千金一起睡，怎样？”B 想说不行，可当她看到男主人的是那样真诚、恳切，她嘴边的话再也没有力量说出来。

关于那天晚上的事用不着过多叙述，大约 12 点钟左右，B 曾经担心但后来自己又否定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大律师一反平日里道貌岸然的样，像个乞丐似的从黑暗中突然跪倒在 B 的面前：“亲爱的 B，我真心爱你已非一两日，我、我都快要爱得发疯了，求求你了……”说着，他像一头疯狂之兽扑来。B 惧怕至极，又无反抗之力。“请相信我——B，我一定让你幸福，也要让你家庭摆脱贫困，我有能力做到，真的，只要我们俩好。”

他喋喋不休地诉说着那“动人”的词汇，仿佛要把法庭上从不运用的那些美妙辞语熟用一遍似的。B 感到全身发瘫……

往后的日子，B 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蒙在鼓里的女主人出差回来依然一个接一个电话地催“小妹”来上课，可 B 不是推说病了就是不接电话。最后无奈中她选择了辞去这个家教。然而大律师彭某照样像过去一样常来学校找她，只是不再让她去自己的家上课，而是另有“内容”。B 毕竟是在校学生，她害怕这样的日子。越害怕的她越遇到了可怕的事——她终于发现自己肚里有了“情况”。

“离婚，你必须离，否则我就让你身败名裂……” B 有些穷凶极恶，而这正说明她内心的脆弱。律师出身的他当然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只是用简单的话语来安抚了几句。

B 感到绝望，她想起父母为了她上大学而双双出去借款的一幕幕凄惨的情景，以及弟弟妹妹企盼的眼光……她的血管在膨胀，剧烈的膨胀，直到那个人面兽心的律师再次出现时，她在得不到半点信赖时，那把早已准备好的水果刀带着她久积的全部愤恨向对方刺去……于是有了前面警笛声声的场面。

4 个月零 5 天后的 1997 年 10 月 10 日，正当我正式接受团中央的这部有关大学贫困生问题的作品采写任务时，B 在法庭上被指控故意伤害罪。那警笛再次响起时，带她去的不再是熟悉的校园，而是陌生的牢狱……

B 走了，但留下我采访这部作品的第一感觉是那样沉重与苦闷。那时，我就有一种感叹：女孩们有太多的不易！不是吗，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的这种感觉愈加强烈。

到南方某市采访，每天安排得不能再紧了。这天是周末，市团委同志平时很辛苦，我对

陪我到各高校采访的小伙子说“放你一天假”，其实倒不如说我自己为自己放一天假。

晚上独自在房间看完新闻联播就显得有些无聊，于是出了招待所门。这里临近闹市，旁边有个电影院，门口很多青年男女。上前一看，电影院正在放《泰坦尼克号》，好莱坞爱情片，很有些味道。看样子快开场了。

这时，一位打扮有些入时也还算得体的姑娘向我走来。“先生进去吗？这是获了十几项奥斯卡奖的著名影片，很不错的。”姑娘说。

我看了一眼姑娘，淡淡地说：“我已经在北京看过了。”

“噢，对不起了。”姑娘退到了一边。

我依旧无目的地在电影院门口转悠，想借观赏这个城市那美丽的夜景来解解几日紧张的采访之劳乏。

“先生，我很想看这个电影，你能不能…带我进去一起看看。”方才那个姑娘又不知什么时候走近我身边，并在眼里流露出几分乞盼。“我是学生……”。

见我警觉的目光审视着她，姑娘便从斜挎的小包里掏出一个证件。

没错，是 x x 大学的。这可能又是一个十分想看电影却口袋空空如也的贫困女大学生，我心想算她碰上了，满足她一回吧。“你去买票。”我把一张百元的钞票和两张“大团结”交给她。姑娘高兴得飞步买回了两张影票，进去后电影已进入那位老妇人的回忆镜头。

“先生你已经看过这部片子，觉得怎么样？”黑暗中，坐在一边的女大学生轻轻问道。

“单纯从商业的角度看，绝对是部超级好片，不过有几个情节从艺术讲不算佳作。”我应付了一句，照样只管看影片中出现的那张迷人的素描。

“比如说……”她的声音，看样子真的想没话找话。

“比如说那结尾，让男女主人公还重新出现在会面的镜头，还有老妇人把项链扔进海里的情节处理得都很拙劣……”

“天，看来我的看法不只我一个人哪！”女学生一下惊叫起来，我不知所措，因为四周的人全都把目光从银幕转到我们这边。

我感到有些恼火：“原来你早已看过这部影片了！”

“对不起先生，我、我是看过了，而且不止一两次……”这回她说得很轻。

“看来你是个超级影迷。”我带着几分讥讽道。

“如果你真不想看下去，我陪你一起出去？”

“算了。”我原本以为今晚有意无意帮助了一个“贫困生”满足了一回影迷，没想到反给人家刷得不轻。120元干什么不行！

今晚的《泰坦尼克号》在我的印象中更次。散场后，大概我的脸色并不怎么样，于是那女学生像哄孩子似地用身子挡在了我的前面：“先生别那么感到不合算嘛，这个影片真的还是不错的，就是看十次八次也还是有收获的呀。给，你的钱还都在这儿。”

这回轮到我很不自在了。清清爽爽，还是那张百元大票和两张“大团结”。“小姐你……

真的就那么爱看电影？”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是爱看，但它是我一一份固定的课外‘打工’职业。”女大学生说。

没想到前些年在小报上看到的有关“某些地方女大学生以陪看电影现象”还真给我碰上了。当我亮出自己的身份时，姑娘很爽快地同意了我对她的采访。

“其实这在我们这座城市的高校里，像我这样的女学生利用晚上和节假日上电影院、录像厅‘陪看’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的女生从大学一年级到4年级，上了4年大学，干了4年‘陪看’。据我所知，有的女同学上了研究生后仍没放弃这个特殊职业。”

“你指这为‘特殊职业’具体是什么含义？”我越来越被这事所吸引。

“说‘陪看’电影、录像节目是特殊职业，是因为过去从没人做过，而现在在我们一些经济拮据的女大学生中把它作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怎么讲？”

“你已经知道在高校中有相当部分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供不起我们在大学读书。

怎么办？我们当子女的总不能逼着本来就过着不是人生活的父母去上吊吧！于是只好想尽一切可以想的挣钱办法呗。‘陪看’作为无数种打工挣钱中的一种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能细介绍一下这种‘陪看’的形式与内容？”

“当然。”女大学生希望给她找个能与我长谈的地方。

“OK。我们到对面的咖啡厅如何？”

她微笑着表示同意。坐下后她接着说：“就从我自己说起吧。我的家与很多贫困家庭的苦孩子差不离，只是我属于父母下岗的城里的新出现的苦孩子罢了。

上大学本来就不容易，到了大学又必须每年支付高额学杂费和支付每月的生活及各种其它费用。父母在国有企业下岗多年，早拿不到工资了，靠做些小买卖最多能 一个口。

尽管他们也想千方百计给上大学的我帮把手，但总是力不从心。开始他们每次在信上说是流着泪告诉我这些情况，后来干脆就不来信了。我不怪他们，知道与其让他们每写一次信就得向我忏悔一次或说那些令人心酸的话，倒不如我独自吞噬这贫穷的滋味。有一天我又发现自己的口袋里空如被

劫，而第二天我们班里的几位女同学则已经说定到一个同窗好友家为她过生日。说好的，我们4个人每人出20元凑成80元这个吉利数，作为献给同窗好友的一点意思。说好的事是不能变的，可当我一摸口袋时突然紧张起来——我哪来这20元钱呀？就是把饭卡上的那些填肚子的菜费全部退出来也不够呀，再说饭卡上的钱是不能随便退的。

那晚我感觉很闷气，一个人走出校门在大街上瞎逛。不瞒你说，当时我两眼盯着柏油路，真希望在路面上能见到谁掉的钱包什么的。我走着走着，突然有人一把拉住我，问我愿意不愿意陪他看电影。我当时吓得浑身哆嗦，奋力挣脱。那是个与我年龄十分相仿的男孩，他见我如此惊恐，便连说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他原来约好的一个朋友没来，手头就多余了一张票，再说一个人看又没劲，所以想邀请我。不知为什么，当我看那男孩一脸无所适从的样子时，竟答应了他。

男孩一听这，简直两眼发光。那晚的电影是美国影片《生死时速》。影片虽然很热闹，但我却因为一直在想着怎样出席第二天好友的生日一事，根本没有记下影片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倒是那男孩不停地在中间忽一会问男主角奇洛李维斯除了这《生死时速》还演过其它什么电影，忽一会又大惊小呼说好莱坞怎么可以把核武器也一起搬到银幕这一堆堆问题。出于应付，我把学校选修课上学到的有关艺术欣赏知识转灌给了这位老兄。没想到电影结束散场时，这老弟连连说谢谢我使他今晚看了一场高水平的电影艺术欣赏。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的钱票塞到我手里，说是小姐算你今晚的‘陪看费’吧。我当时都没反映过来，当明白怎么回事时，就再也见不到那男孩子了。我拿着这50元‘陪看’费，整一夜没睡着，心想这世界真怪噢，陪人家看电影还能赚钱哟！我好兴奋，因为最主要的是我第二天可以像同学们一样地为好友送20元钱的生日礼物了！在大学两年多来，我觉得那一次是我这个家贫的女孩能与其他同学平等坐在一起享受快乐的最高兴的一天。从那次起，我一有空，便开始正式做起了到电影院、录像厅‘陪看’的特殊打工……”

“真有那么多人像你第一次碰上的那男孩一样手中有多余的票？”

我有些难以置信并且话中有话。

“不。”她肯定听出了我的潜台词，便答道，“大部分愿意出钱给你买票让你陪他看电影、录像，并在最后付给你钱的人，都是些单独到影院的男人，或者是成群结队的男人。他们请你陪他或陪他们看电影、看录像，多为是一种满足感。”

“满足什么？”

“有多种多样……”

“比如？”

“比如是现在到电影院的大多是结伴的情人、恋人和一家人，他身边有你一个女人就不感到与众不同了。”

“再比如？”

“再比如有人文化不是很高，对一些外国片的内容和艺术上的理解缺乏水准，而我们大学生对这些问题和知识，就像给几年级的小孩搞家教一样轻轻松松。”

“还有没有其它比如？”

女大学生笑了。“我知道你所指。当然有了，比如有的单身男人想借机

泡一回女孩，或沾点小便宜什么的。”

“你没有碰到过？”

“碰到多了。”她十分坦率道，“可以说十有八九是这类人。”

“他们会对你做些什么呢？如果不介意的话能说说吗？”

“没什么，因为凡是想了解我们干过‘陪看’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问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她此时的目光只盯着已经冷了的咖啡杯。“一般来说，这些人总怀有一种邪念。他们常常会借电影院或录相厅内特殊的场所对你动手动脚，有的人很紧张，有的人则有一种居高临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管是那些紧张的还是狂妄大胆的，看着看着，都会把手向你伸过来……”

“遇到这种情况你如何处理？”

“不算复杂，将其手推开。”

“如果推不开呢？”

“也并不难。你可以起身。”

“可这样不就没工钱了吗？”

“是没有。但我们是大学生，不是‘三陪女’。”

“从广义看，同为是‘陪’，很难让人区分你这个陪与现在一些饭店、歌厅里的那种陪客有什么不同——请千万别把我的话视为对你的不尊重。”我忙解释。

“不会。但我还是要明确告诉你：我们的‘陪’虽然与一些歌厅、饭店里的那种‘陪’同为一个字，但其内容和本质不同。我们只陪‘看’而不陪其它……”

“难道绝对没有或可能出现另一种内容和意义上的‘陪’？你也说过凡与你们一起进电影院、录相厅的男士十有八九是想沾点女人便宜的人嘛！”

“并不排除。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参与‘陪看’的女大学生不是一个两个，我也见过个别女同学从开始的‘陪看’，到最后‘陪吃’、‘陪睡’……甚至把青春和学业全赔进去的。但那绝对是极少数。因为我们大多是穷苦家庭出来的大学生，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自己大学学业的重要。我们可以去吃苦，可以忍受暂时的一点委屈甚至是耻辱低下的事，但我们清楚绝不能毁掉前程。所以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包括有时难以脱身的情况下竭力保全自己。当然这过程常有落泪和辛酸的事，或者有时还有无可奈何的事发生，但这难道全应该怪罪于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孩？”

那晚，我遇到了两个“意外”，一个是在我采访贫困大学生过程中意外地遇到了另一种特殊的“打工族”，另一个意外是这位女学生与我不欢而散。她说到后来情绪越显激动，到了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所以不等我结账，就起身离我而去。第二天早晨她给我住的招待所打来一个电话，表示歉意。她说每当有人向她提起“陪看”的经历与过程时，她常常“有点想哭”。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点想哭”，她在电话里给我补充了两个细节，一是她说有一次因为拒绝“雇主”提出的“陪看”之外的其它非份要求，结果那个无赖扬言要到学校给她“坏菜”，最后是她整整倒赔了500元才了结此事。她说这500元钱是她父亲下岗3年后重新找到工作后第一次领到的工资，结果给她全都白白折腾掉了。“为这，我整停了一个学期的‘陪看’。但后来还是无法解决学费等其它上学所要花的钱，不得不继续重操旧业。”她说。第二个细节是，她说她的“陪客”中有一批固定的朋友，这些人也都是穷人家的孩

子，也是因家境贫穷连小学、初中都没念，而今远离故乡和家人，只身在外打工卖苦力。她说她的这些朋友平时在建筑工地没日没夜没命地干活，唯一的精神快乐是一两个月由她陪伴他们上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甘心情愿地义务为他们讲解电影中那些他们不懂或不太懂的东西，而他们也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或麻烦时挺身而出保护我。有一次几个小流氓欺负我，我的这些朋友前来相救，结果警察看他们是外地人，竟以‘盲流人员’把他们遣送到老家，砸了我好几个朋友们的饭碗。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想哭……”电话的那头，我清楚地听出其抽泣的哽咽声。

我久久没有放下电话筒，心里在说：姑娘，想哭你就哭个痛快吧。

在我接触诸多的贫困大学生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女学生们要比男学生更封闭自己的经历，由于性别与性格关系，她们一般很少向一个外人谈论自己的隐秘一面，她们的自尊心也比男生更强烈，即使你跟她们非常非常贴心，甚至是她们的亲人好友，也未必都能清楚了解其全部的真实情况。记得不知谁说过这样的话：“在多彩的生活里，女人总比男人有更多的幸福与美丽。”那么我要说，在同为贫困的条件下，女人则比男人有更多的苦水与悲怆。

一个烈日炎炎的周六中午时分，我到离家很近的西四书店，因为又一辆不知从哪儿窜出的警车“哇哇”直叫，而偏偏这一日的西四十字路口交通格外拥挤，警车便在长长的车流后面使劲地按着警笛，那刺耳异常的声音反而令普通的行人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那警车也不是吃素的，大道走不了就向自行车人行道上挤，就在这个时候，自行车潮和人流潮出现了本不该的骚乱，本来就拥挤的街道人流、车流开始向台阶倾斜。就在这时，一件与我本文有关的事发生了：几辆自行车压向一位正在行路的老太太，而这位老太太则又倒向一块写有“家教”的牌子……“哎哟哟，我的胳膊哟——！”老太太拼命地连叫带喊地嚷着，等她被一位女孩扶起时，那挤道的警车和自行车流早已过了十字路口。老太太突然醒悟似的指着那块木板做的“家教”牌：“这、这牌子是谁的，把我的胳膊硌坏了！我的胳膊直不起来了，哎哟哟……”在见有人过来给她搭把手时，老太太更加气急了：“你们帮我看看这牌子是谁的，硌伤我啦哟！”谁的牌子？没人答应。“是、是我的。”

那个扶着老太太的女孩慢慢吞吞地说。“啥？是你呀！难怪你这么讨好扶着我啊？走，你得陪我上医院！”老太太不由分说，拉扯着那女孩就要走。女孩却怎么也不肯走：“大妈，不是我撞你的呀，是你往我这边跌的……”“啥，我还没老花眼呢，我干吗要跌到你的牌牌上呀？你是干啥的？”

你拿块牌牌搁在大街上干啥？没有你这块牌牌我的胳膊就不会有事，你想溜咋的？没门，今天不给我上医院你就别想走！”老太太越说嗓门越大，引来马路上一堆围观的人。那些初来乍到没看见前面一幕的围观者都向着那老太太说话，女孩子一下成了惊弓之鸟，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站在一旁的我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便上前对老人说：“刚才我都看到了，要不是那警车和马路牙子边那么多自行车，您老人家也不会倒在这块木牌牌上，这事不能怪这位学生。”老太太一愣，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过神，不无怒气地冲着我：“你怎么知道她是学生？”我一笑：“这不写了家教嘛！”老太太还是不甘罢休：“要是大学生就更应该讲道德，噢，你们都走了，我的胳膊伤了咋整？”“那我陪你去医院行吗？”

北医就在我家后面……”听我这么一说，老太太嘀咕了一句什么话后反问我道：“你就住在这边？”我点点头。

“那你得给这个学生作保，要是我明儿个上医院查出个啥，你得负责给我治。”“行，我保证。”我给这位老人写了个我家的地址和电话，老太太接过纸条又看了看我，对那女学生说：“算你碰上了好人。”老人走后，我转过身正要进书店，那女孩冲着我哭了起来：“叔叔，谢谢你了。”“别别，这事本来就不是你的错。”我看到了她胸前的校徽：“你是北师大的？”

“是。”我心头暗喜：正好本来我就想到北师大采访，这不是好机会么？“你们北师大搞家教的学生到处都是呀！”我没话找话。女学生说：“是。可人太多了也不怎么好找人家。”

“你是几年级的？像是新生呀。”女学生有些不好意思地：“我大二了。”“大二照例就很有经验找家教了，也不至于蹲在大街等着人家来找你呀。”“可我以前没有当过家教，因为大一时我的外语不行，就拼命学习。现在大二了，又要交学费，家里寄不来钱，所以就想找份家教……”看来我没看错，她也是位贫困生。“我发现你们这些女孩胆子都挺大的，把‘家教’的牌子往大街上那么一竖，还真像回事。”也许因为刚才我救了她一难，这位女学生答应与我说说她的街头求职遭遇：“……我们师大的学生差不多都搞家教，而且听说是北京高校中要价最高的，一般每小时15到25元，有的辅导高考的还不论时间论成绩，考上一类重点大学的，给两三千元，普通高校的也有一两千元。我不像有的同学靠这家教‘致富’，我家境不好，父母都下岗了，两个人才拿400多元钱，我下面还有个上中学的弟弟，家里不可能给我钱了。”

第一学年有个亲戚借了几千元钱给我，这学年我就不想再要人家的了，借了总还要还的，找家教，可我啥时能还得起么！所以我也出来碰碰运气。都说北师大的学生好找家教，可我觉得也挺难的。学校的‘家教中心’在排队，不知什么时候轮到我。

我的同学他们说直接上街‘招商’快，于是我就跟着试试，这不，今天是第二天，可就两天时间我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昨天是周六，我便去新街口丁字路口。我早早等在岗亭那儿，看有没有哪位家长来找家教的。等了约两个小时，我茫然地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却不知怎样才能看出哪家的孩子父母是来求家教的。我想学街道两旁的那些摆摊的小商贩吆喝，可怎么也喊不出声。我喊啥呀？人家有货在旁边，不用喊也能让路人明白是干什么的。

难道我也该在自己的背上或胸前贴块招牌，写上‘我是大学生，有谁要找家教请前来洽谈’的一类的话，那不羞死人了！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看见了马路对面有两个男生高高地打着一块写着‘家教’的大牌子，我感到自己像是傻子似地，瞧人家多有办法，招来好多家长前去询问与洽谈。我焦急而又无奈地一直朝他们那儿望，大概‘师兄们’也瞅见了，于是其中的一个朝我走来。他说一看你也是来寻家教活的，问我哪个学校的，我说是北师大的。他说他们是我们北师大附近的某某大学的，并说你这样呆呆地站在街上谁都不知你干什么，怎么会有人来找你呢。至少你得打个牌子，像我们一样。我一听这，脸都红了，说那不成‘出卖自己’？师兄笑了，说这不叫‘出卖’，叫‘自我推销’。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干。

我一听当然高兴，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壮壮胆。但谁知他接下来提了个条件让我退缩了：‘你能向那些找家教的家长介绍我们也是你一个学校’

的，没其它意思，因为人家信你们北师大的。’我一下犹豫了，说这恐怕不太行。好在那师兄并不计较，说不行就算了。他回到对面的马路，又马上返回到我这边。‘这个给你，把它高高地举起，要不谁会知道你是搞家教的嘛。’那男生把一张大大的‘家教’硬纸招牌塞到我手中后转身便走。

我心里深深地感激他，但双手就是举不起那块纸牌，我觉得那纸牌仿佛有千斤重。我抬起的目光正好与对面的两个男生相遇，他们向我微笑着竖起大拇指，而我更感到脸上烧得滚烫……

我的头就是抬不起来，只敢看自己的脚尖，我知道一个低着头，手里举着一块大牌牌的人有多难堪。当我用眼睛的余光向对面一扫，就一眼看到那两个师兄在使劲挥动着让我脸朝上的手势。不知咋的，他们的手势越往上，我的头就越像支持不住似的往下沉。最后我实在像个无地自容的逃兵，扔下牌子钻到一条没人的小巷，我发现自己的脸上热乎乎的流着两行泪……这是昨天的事。

晚上回到学校我又不好意思跟同宿舍的姐妹们说，只回答没找到合适的家教对象。有个女同学说你站的地方不对，新街口离我们学校太近，一方面到那儿的学生多，那一带的家长有的直接上我们学校里来找家教，所以建议我到离新街口远一点的地方。

这不，今天我跑到了你们西四这儿。哪想一来就遇上了刚才的倒霉事，要不是你还不知……”

女学生说到这里眼里又噙起泪水，声音开始哽咽。

“得，明儿我到你们学校采访时跟学工部的老师说，先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家教。”

我安慰她道。

“叔叔请你高抬贵手，我不想让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我这么笨。我、我还是想自己找……”

“她的脸又绯红了。”

“祝你成功。”我离开她后尽量不回头，知道这女孩正不好意思看到有熟人瞅见她。但我还是用心看到了她那副畏畏缩缩站在牌子底下的可怜样……

唉，不知怎的我感觉自己的自行车轮子突然变得沉了起来。

几日后，我到北京师范大学采访，跟学校老师们谈起这位不知其名的女学生时，他们说这样的事在他们那儿简直太多了，曾经有个女学生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家教却又不敢独自到雇主家去，后来又不得不辞掉。老师们说你要这方面的素材，可以给你用筐装。然而我却一直未敢提及本章开头的那位因家教惹出囚狱之罪的女生是不是他们学校的，只说了辽宁某高校一女生外出家教一去不回长达一年多的事。北师大的老师听后脸色也变得很不自然，原来他们这儿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他们有个女生在家教中与男主人关系暧昧，女主人知道后便来校大闹，最后学校不得不勒令那女生退学才算了事。

“现在社会上啥样的人都有。说实在的，也真难为我们这些想赚钱的女生。”一位主管勤工俭学的老师长长地叹着气说。

可不，这就是现实。

某校一个女生在我保证不把她的名字“公布于众”的前提下，给我讲述了她在两年多做家教过程中所经历的“想哭也哭不出”的另一幕经历：……我是学理科的，在学校的课堂我不敢说门门都能考个满分，但优秀则是绝对

的。可我就是不会如何处事，尤其不会与城里人打交道。我第一个家教对象是个3年级的小男孩，特顽皮，你给他苦口婆心把舌头讲烂了，满怀期望地问他一声：“听懂了没有？”小家伙像刚睡醒似地反问你：“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两个小时的课下来，你觉得自己过去念十几年书也没费那么大的劲，可小家伙却伸伸懒腰冒出一句：“等于没学。”不把你气死也会使你像全身散了架似的彻底失去信心。

可气的是这个城里独生子还有许多坏毛病，便是贪吃，而且外加好说谎。我每次一到他家上课，他的父母便出门或上街干其它什么事去了。我这个“学生”对知识从来像是不愿装进脑子似的，但对一切食物却从不拒绝，所以10来岁年纪其胳膊则比我粗出几圈。大概平时他父母对他特别节食，好东西总要东藏西放，生怕宝贝儿子长成超人。小家伙到了我给他上课时不是赖着想睡觉，就是精神格外兴奋，因为此时此刻的两个来小时中，他可以在不受父母监管下放开肚量东偷西摸地把一包包巧克力、奶油糕拿出来饱餐一顿，然后等听到父母上楼开门声响时赶紧一擦嘴，趴在桌上假装看书。

终有一天当爹当妈的发现放置的食品没有了，问儿子看见了没有？这时儿子装得特别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没有，绝对没有看见也绝对没有吃。于是这时的我就会发现那两个大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向我，而我这个人天生易脸红。平常一件与我根本无关的事，只要有人有意无意朝我瞧一眼，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红起脸。在人家家里我的这个毛病就犯得更剧烈了。每次碰到这种时候我都想向这个小男孩的家长申明，可越想申明自己的脸就胀得越红，越红脸我就越说不出话。一件与我无缘无故的事竟似乎变成了完全是我的责任似的。有几次我像一个小偷似的在别人咄咄逼人的目光下，“逃”出他的家门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后，第二次上课时，在我和小男孩俩人时我曾警告他：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行为，必须向父母说明东西是你偷吃的，而且与我无关……。你知道那小家伙说什么？他听后哈哈大笑，说怎么无关？我是你的学生呀！这个小兔崽子！我心里气得直骂，可就是没办法治他，便恐吓他说你再不老实我就告诉你父母。小家伙根本不怕，反倒威胁我道：走着瞧，看谁治谁。

我后来发现城里的小孩念书不一定行，但心眼就是比我们农村的小孩精，就连我这样的大学生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事情是在这之后的一次家教时发生的。那天我的“学生”父母依旧在我给他们的儿子上课时便出了家门，而只会吃不会学的小公子就开始像不知饱受了多少天饿似地翻箱倒柜起来，真是见什么吃什么。有了上几回的教训后，这次我想先来个“阻击战”——不让小家伙偷吃得逞，于是便与他“穷追猛打”一通，硬从饿狼口中夺食……。我不知那两个小时是怎么过来的，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累得瘫在椅子上时，门外楼道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了。

正在兴冲冲啃着芒果的小家伙说了一声“不好”，便连跳带滚地从里屋奔到外屋，装出又在上课的样。就在他父母开门的一瞬间，这个小兔崽子顺手把一只吃了半截的芒果往我嘴里猛一塞……。在我还根本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的父母像凶神恶煞似的站在了我面前。

“我、我……”这时嘴里含着半截芒果的我极力想说明真相，却由于紧张而变得更加语无伦次，脸也比以往胀得更红。“好啊，说了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这段时间我们家里有什么好吃的转眼就没了，敢情是养了一只大耗子！”只听那个当母亲的女人尖着嗓门，一边叫着一边瞪着两眼像要

吞下我似的，她身边的男人也帮腔朝儿子怒吼起来。无所适从的我尽管当时想努力辩解，可就是说不出一句话，只有眼眶里的泪决堤而出……

那天我不知自己是怎样从这个小男孩家走出来的，我只记得我回到学校时已经很晚很晚了。

见我像落汤鸡似的回到宿舍伏在铺上便嚎啕大哭，同宿舍的同学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赶紧过来安慰和询问，她们越问我就哭得越伤心，吓得大家不知怎么办。那次，我整整在床上躺了3天，也从此再没到那顽皮的男孩家去上课了。

可是对没有任何其它经济来源的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不去谋一份家教什么的你又怎么想完成4年的大学学业呢？之后没多久，我又重新在别人的介绍下找了一个家教差使。这家的孩子是个女孩，我能成为她的家教老师也是因为我重新找家教时所提出的特别条件——必须是女孩我才去，小男孩我坚决不教。可小女孩也并不是就没问题呀！

事情偏偏还都给我碰上了。

这个小女孩是个初一学生，学习还是很认真的，但由于父母对她的期望值太高，反而使得这位小妹妹学习的效果失之正常。这个女孩的家长是一对苦知青，回城后在同一工厂工作，都没有上过大学，我感觉中他们因此对孩子的要求格外严格，是想把当年他们没有实现的大学梦寄于女儿身上。我看他们也很不容易，吃的穿的都很简朴，但却把女儿的学习安排得不能再满。双休日两天，有半天是我给上的数学家教，另半天是另一位没谋过面的大学生上的英语家教，还有半天是家长自己带着孩子上外面的音乐辅导班，留下的半天是女孩子自己做作业，总之我觉得这小妹妹很可怜。小小年纪戴了副眼镜，说话办事都像一部被已经输入程序的电脑。很少看到她脸上的笑容，很少听到她说出一句属于孩童那种年龄的话语。

你说学，她就打开书本；你说做作业，她就拿起笔……然后我发现她缺乏一般孩子的那种基本灵气，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孩子的智慧之门虽然开着却没有那种吸纳的旋流与热情，相反冷漠的成分却很多。父母们对她的要求越多越高，女孩的这种冷漠就越严重。我曾经对女孩的家长专门谈过这件事，但他们并不理会我，说要让小孩出成绩就得不断加压，尤其是女孩。尽管我无法同意这种观点，但当他们反问我你考上大学除了发愤苦读外，还有什么其它窍门。我想想确实除了苦学什么窍门都没有啊，而且我上初中高中时哪有城里孩子这样条件，想要什么父母就都给你准备好了，就是你还没有想到的也都为你准备齐了。城里的孩子与我们农村的穷家孩子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想想这些，再看看我的“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我真的觉得她父母的话似乎也很有道理。可怜的小妹妹，学吧，谁让我们都是家长们的“希望”呢！我父母为了让我能实现“跳出农门，光宗耀祖”的希望，可以撕破脸皮跪在别人面前磕头为我借上大学的学费。相比之下，我又觉得我教的这位小妹妹要幸福得多。来吧，为了父母们的共同希望，我们努力学习，发愤学习，拼命学习，直到用尽我们最后的一点力气……。

又是一个星期天，早晨起来我觉得头昏脑胀，因为我们女孩子每月总有一回的那件“倒霉”事，而一到这时我浑身不对劲，加上学校又要考试，所以那一日我特别打不起精神。

想给我家教的家长打个电话，又一想我的饭卡上已快出现“赤字”，便咬咬牙上了路。

我好不容易换了一趟又一趟车，又一步一步登上 6 层楼，当我费力推开门时，迎接我的竟是两张要吃掉我的脸。“你上次都给她说了些什么，啊？快说！”女孩的家长一把将我扯到几尺远的墙边，一边吼着，一边问，连唾沫腥子都喷到了我的脸。我不知是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她出走了！”我一听也着急起来：“为什么呀？”孩子的母亲哭泣着向我叙述道，说今天一早起来后，他们让女儿准备等家教老师来了上课。谁知从来大人说什么就做什么的“小孽种”，今天不知哪来一股邪劲，说我不能把“最后的一点力气”再用在读死书上，我要把“最后的一点力气”用在像别的同学那样痛痛快快地玩一回上，说完她打开门就走了。“你说说她这个小东西哪学来的这些邪气？谁教她啥‘最后的一点力气’屁话？啊？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心一下紧缩起来，这孩子怎么这样理解我的那句话呢！看像丢了魂似的孩子父母那无所适从的样，我说当务之急把孩子找回来才是。这会儿他们手忙脚乱开始又是给派出所、亲戚和孩子的学校、同学打电话，又寻思着孩子可能去哪些地方。我说分头找吧。孩子父母到那些没有电话的亲戚、老师家找，我便负责到那些小孩子们常去的公共场所。我找啊找，跑了一个公园再走另一个公园，走完一个游乐场再跑另一家影院……直到夜幕降临，再也不能在大街上看清什么时，我不得不拖着一双发麻的脚往回走，有几次差点被身边飞驰而过的车子刮倒。等我好不容易爬上那女孩家的楼梯，想叩开门看看我的学生有没有回家时，只听里面一男一女像发疯似地在怒吼着：“……噢，你以为我们辛辛苦苦供你上学容易吗？你知道为了给你请家教，我和你妈结婚时买的上海牌手表都给卖掉了！”

“你真是越活越不知天高地厚！我跟你爸都下岗了，每一次给你付家教的钱你知道怎么来的吗？都是我们半夜上人家饭馆澡堂拖地擦碗挣来的苦命钱哪！你这没脑子的，不好好学习也就罢了，还竟敢独自硬着脖子往外跑。好你个没良心的，从今天起，家教也不给你请了，你就天天跟着我们去打工吧。呜呜呜……”后来是不停的哭闹声和乒乒乓乓的摔打声。

我知道我再不能进去了，也没有力气再去叩开这位小妹妹家的门了，自然也不可能要回我已经教了一个月的家教费。我只记得在下楼后的回校路上，我一搭上那辆公交汽车就睡着了，直到乘务员硬将我推醒时我才发现自己竟到了这一路车的总站。当时我全身没一点力气，我求公交乘务员说能不能让我在车里睡一晚。可人家说像你这样的“上访人员”应该到派出所去报到。我一听这，心里好一阵凄凉，瞧人家都把咱当成上访的了。我再看看自己那连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样，可不像个上访者么！

第 7 章：垒筑精神家园

清华园里涌“清泉”1995 岁末的一天午饭时，从不在学生食堂就餐的几位老教授突然来到异常拥挤的学生食堂打菜处，正准备就餐的学生和打菜的大师傅们觉得很奇怪。

“先生们也想尝尝这儿的饭菜味道？”掌勺的大师傅半开玩笑问地这群“不速之客”。

“不，我们看看。”老教授们脸色凝重，既不像是来此参观检查，也不像是闲逛。

哪是来干什么呀？

“有什么特色小炒吗？怎么老是那几个破菜，没劲。”学生们只管打自己的饭菜。这时有几名站在前边的学生正在跟大师傅们说着话。

老教授们看看这几个嚷着要买“特色小炒”的学生，没有说话。

“给半个豆腐白菜，加一个馒头……”又一位学生来到卖菜窗前。

他话说得很轻，又几乎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买完饭菜后出了食堂。

“追追，快追上去问问是哪个系的……”几位老教授忙不迭地互相催促着，但两位跑得气喘喘的老先生不一会儿回来沮丧地报告同伴：没追上。

“先生们为什么要追刚才那位同学呀？”大师傅们好奇地问。

“我们听说学生中竟然有人常年一天只吃两顿饭，每次还只打半个菜、一两个馒头，所以来考察一下到底情况是否真实。”老教授们终于讲出了自己的“秘密行动”。

“哈，你们问一声我们不就全知道了吗？”掌勺的大师傅们觉得教授先生们就是有股学究气，啥事都自个儿跟自个儿较真。

“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呀？”老教授们冲着掌勺的大师傅瞪眼。

“嘿，那你们就小看咱掌勺的了。”一个年轻的大师傅说起劲儿来：“不是海吹，我的勺上，可对学生情况的了解要比校领导和学工部的人清楚得多，谁是富家子谁从贫家来，谁是本份人谁是败家子，谁今儿个成绩好谁明儿心不顺，我这小小的勺上都记得哩！不信，咱就说说你们想打听的刚才那位打半个菜的学生……”

“是啊是啊，你说他是哪个系的？几级几班？”老教授们迫不及待地问。

“我不但知道那学生是哪系哪级，还知道他是四川人，去年考上咱清华后整整乘了4天车才到了北京。他家贫，来上大学时就背了半袋花生米，身上的那件西服是乡长临送别时给他的……”

“现在呢？现在这同学怎么生活的？”

“刚才你们不是都看到了，他几乎天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只打半个菜还是最便宜的，打那么一两个馒头……”

“果不其然，果不其然！”老教授们神情更显凝重，之后，他们又分头到了学生宿舍……

不几日，校报《新清华》以醒目的位置刊发了这几位老教授以“清华大学侨联”名义向清华全校和全体清华校友发出了一封援助贫困生的“倡议书”——清华大学——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输送了成千上万的高级科技人才，全国人民对她寄予越来越高的期望。

“争取在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时，建成世界一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这一宏伟目标，正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全校教职工奋发工作的强大动力。广大清华校友无不关切母校的发展，海外侨胞和华人也时刻注视着祖国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华大学历年招收的新生都是来自全国的好苗子，有许多是各省、市、区的高考“状元”或前10名，他们在老师的帮助下，为把自己培养成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而勤奋学习。

我们还注意到，在全校一万多名学生中，生活处在难以自给的，即平均每月生活费只有150元者，约占8%，特别困难的学生，即每月平均生活费不足90元者约2%。据我们所知，虽然学校已采取了许多补助措施，但仍

有相当一批学生的困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他们常为生活所困扰，影响他们健康成长。听说有一位困难学生每天只能买一个菜，其余两顿饭只吃主食。这样优秀的学生，生活这样困难，我们心里难受。

我们特向全校教职工和广大清华校友呼吁，希望大家都来为这部分学生的生活困难伸出援助之手。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捐助一点钱，积少成多，为困难学生排忧解难……

没有华丽，只有硕果。清华人从来都是这样的品质，然而从这发自肺腑的呼吁中，谁能不为老教授们那殷殷赤子心而激动、而感染！

“老先生们的建议多好，我们清华人都应当像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援助那些生活还困难的学生。哪怕是每个教职工每人拿出几块钱，让学生们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在考试时不至于因饥饿而昏场嘛！”校长王大中在校务会上激动地站着高声说道：“清华大学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贵族学校。今天，也绝不能让一个同学因家庭贫困而失去学业！”

这是多么庄严的承诺！

那些经济困难的学子们，你们听到了吗？

正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素以沉稳著称的清华校园内涌动起了少有的滚滚热潮。

有人说，那是重师生情的清华人心与心撞击的“心潮”。在校领导和众多清华人的直接关注和参与下，中国高校第一笔专门为援助贫困大学生的基金——清华大学“清泉”困难学生基金，在清华园宣告诞生。

“今日一滴清泉，明天一片桃李。”1996年4月28日，这是清华大学85华诞之日。

阳光明媚的清华园内彩旗飘扬，歌乐此起彼伏。当校庆的序幕刚刚拉开，王大中校长激动地向万余名师生和来宾宣布了一件事：请在场所有心中有爱心的人给我们的贫困生们捐上一份你的爱！说完，王校长第一个来到已经摆在长桌上的一只捐款箱前，庄重地向箱内投进了300元。“谢谢校长。”一位同学代表走到王校长面前，端正地给他胸前别上一枚精制的徽章，那上面闪亮亮的正是本节开头的那12个字。

“泉水清清，泉水清清，流到你心田……”美妙的歌声，动人的旋律，把节日的清华园里的每一寸绿地都催醒了。在校长后面，是望不见边际的捐款队伍，他们中有享誉国际的中国科学泰斗，有白发苍苍的退休老教授，有刚从国外回国的年轻博导，有专程而来参加校庆的海外校友或出差顺道回母校“探亲”的国内校友，更有同是学子的青年团员、学生干部……

“那场面太感人了，那些在清华园里住了几十年的老教职工们都会告诉你，这是自有清华园以来让人感到真情的少有的动人一幕。”两年后的1998年“五一”前，当我来到清华园采访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人时，这位当年作为“清泉”基金捐款仪式组织者之一的老师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而感慨道。他说就那一天，他们的“清泉”基金便收到捐款20余万元。他拿出当时的一份登在《新清华》上的捐款名单，我忍不住将目光从长长的名单上停在了下面的几个名字与数字上：陈浩凯1000元凌瑞骥1000元李传信1000元顾涵芬10000元耿涛0.10元熊强5元……

“陈浩凯和凌瑞骥两位都是老先生，也是‘清泉’基金的倡导者，李传信是我们的老党委书记，他跟上面的几位老教授都是第一批捐款者。捐10000元的顾涵芬是位在教育一线的老教授，她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都拿了出來。

那位只捐了一角钱的自己就是位贫困生的耿涛，他本来是受捐者，可那种场面他说太令他感动，他把当时口袋里仅有的一角钱捐了出来，并郑重其事地在捐款者留名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天感人事例太多了，譬如捐5元钱的熊强，他是个中学生。他在捐出这5元钱时还专门附了一封信，谁看了都会掉眼泪，他说‘在我15年的人生岁月里，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我常常想，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呢？当我得知全国著名大学、我心目中的圣殿——清华大学竟有许多大哥哥大姐姐们连饭都吃不起，我难过极了。我想：他们考上清华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因为生活拮据，而在营养方面跟不上，就会损害身体，也将耽误学习。因此，今天我把自己上周参加勤工俭学得来的5元钱捐给你们，希望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帮助某一位大哥哥大姐姐买一份好菜，从而更有精神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钱虽然太少，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恳请一定收下……我祝愿清华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早日成为祖国的栋梁。’老师们的事迹就更生动了，精仪系的老师还在自己系里设立了一个‘精仪系希望工程’，200多名老师人人捐款，并用这笔款长期援助本系的几位特困生……”清华教育基金会的这位老师告诉我，清华园内的师生共同积攒起的这“清泉”济困基金，从那次捐款之日后，学校每年4月28日的这天校庆日，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全校师生自觉自愿的“济困日”，真是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这一校风后来渐渐被校友们都知道了，故现在时常收到海内外诸多校友及他们的亲朋好友给“清泉”基金捐款。这位老师透露，清华全校贫困生约1100人，在不久的一次抽样调查中表明，清华现在的普通学生的伙食费平均每人每月280元左右，而特困生的月经济来源过去不足90元，一般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到120元。如果仅这么点钱，就把它都放在吃饭上，一日三餐每天才不到4元钱，况且学生们总还要买些生活和学习用品。

目前约有六至七成的贫困生在勤工俭学，约每月增加100至150元收入，加上一部分人享受学校的“奖、贷、免”，这样就有仅一半的贫困生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剩下的一半左右，便是享受“清泉”基金了。清华大学现在募捐到社会各界的教育基金总额约11.1亿元，包括其中的“清泉”基金，学校自有了这项专门基金，每年就可以发放“临时困难补助”（专发那些因家庭或自己突遇不测的）、“勤工俭学补贴”（学校设立的勤工俭学岗，一般每天可得12元报酬，另学校加发12元补贴）、“励学奖”（奖励那些生活困难而努力刻苦学习的，每人200至400元）等约130万元至150万元，这几年清华大学年年这样做，这笔金额等于全校贫困生平均每人每年享受学校发的贫困补助金达1000元之多。清华园的学子是幸运的，即使是常年得不到家庭一分钱的经济来源，他们依然可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如果能再稍稍勤快些谋一个勤工俭学岗，那日子将是宁静和平和的。

校长王大中在评价他们的“清泉”基金所产生的效应时，用了这八个字：惠及清华，功在中华。

第9章：流金的呵护

我记不住哪一天的电视节目，但有两个镜头却永远刻烙在我的记忆之中：一个镜头是一位患癌症的女教师在她临离开人世的前几个小时，她用极

其虚弱的声音，在断断续续地向家人叮嘱：“你们……一定要、要继续给、给广涛按时寄钱，让他在清华……读完大学。还有、我死了……千、千万别、别告诉他，那样会影响他学习的……”

镜头里的这位女教师说这些话时，泪流满面。看得出，她是多么留恋这个美好的人世，而她心中最放不下的似乎还是那个在她生命最后时刻仍在千呼万唤的一个叫“广涛”的人。

第二个镜头是：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里，学生赵广涛蹲下身子，吃力地从床铺下拉出一个木箱，他从这唯一的“家当”里取出一叠信件，随后含泪向记者说：“……这都是李妈妈写给我的信。整整几年时间里，她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我巨大支援，每月寄钱来，而且更多的是慈母的关爱。可是她现在已经离我而去……我、我到现在还没见过她一面，我还没来得及当面叫她一声‘妈妈’，她就……”

我看这镜头时流了许多泪，因此我也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女教师的家和这位在清华读书的赵广涛同学。后来我如愿以偿，后来我听屏幕之下的主人公讲述那段超乎寻常的人间真情后，更是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

现在就读于清华大学精仪系的赵广涛同学是河南鄆城县龙城镇仲李村人，那个离他而去的女教师是湖南娄底涟钢子弟学校的李赛明女士，这二位后来认作“母子关系”的人素不相识，也平生未谋过一次面。却因为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使他们之间演绎了一段情深似海的母子之缘。

那天我到清华去见赵广涛，我们开始几乎没说上几句，虽然客观上还有另外几名贫困生在场，但我看得出赵广涛似乎已不太再想谈他与李赛明老师之间的事。

等对其他的学生采访完毕后，我约他单独在清华园的一块绿地上倾谈。那已经是晚霞落地的时间，只有我们俩人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不太愿意提及李赛明妈妈的事，他说李妈妈的不幸去世本来就使他非常非常的悲痛，电视上把事情一播后，隔三差五地有记者什么的找他谈这件事，各地来信的也特别多。赵广涛说，正是因为他与李赛明妈妈的特殊“母子”关系，本来李妈妈去世后他一直把这巨大的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每天尽量地用满满的学习来填补这一心灵的沉重打击，另一方面他决心通过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毕业后抽个时间到湖南的李妈妈坟前磕几个头……

“现在不行，我越是不想提的事越老有人来左问右问的，我实在受不了，每提一次李妈妈的事，我就会好几天缓不过劲。你们这些当作家记者的就知道找素材，可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挖我的心？”赵广涛瞪着一双略带怒色的目光看着我。

“真对不起了，广涛。”他让我有种负罪感。顷刻，我把手搁在他垂下的双肩，然后说：“好，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事……”

“不不。”赵广涛同学又突然抬起头，抱歉地说：“对不起，刚才我不是对着你的。你是学校学工部老师安排的，我当然得跟你好好说一说的，不过我是想通过你对新闻界还有社会上的人说一说——其实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报导我，还有很多人寄钱给我。可我愿望的是自己能够安下心，努力学习，用优异成绩来报答李妈妈，同时也报答所有关心我的人。我只是不想别人再打扰我，顺便也想通过你的笔，对所有关心我的人说清一件事：当初我接受李妈妈一家的资助，是因为我那时太困难。现在已经几年过去了，我自己已经能自立了，所以不想再接受别人资助，而且我已经做到了。可是有个记者

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还在接受李妈妈家的资助，我觉得心里挺难受的，事情已经不是那样了，真要那样我就太没出息，更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李妈妈了……你理解我的心思吗？能答应帮我做这件事吗？”

我十分郑重的点点头。

“好，那我就从头跟你说……”赵广涛的脸侧仰着，正好一缕金色的晚霞打在他的眼上，于是他双目微眯，那神情一下陷入了无边的思恋之中……

1994年9月1日，赵广涛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带着家乡龙城镇的数万名父老乡亲的厚望，踏上了进京的路。从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书那天起，赵广涛一直成了当地的“名人”，因为在他之前全镇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生。虽然郾城是个穷地方，但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父老乡亲们却都知道中国有个清华大学。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能考进清华的那就是正正经经的“状元”。那阵子乡里的干部、乡里的百姓都感到光彩，要是出家门往外乡走一趟，谁都要提及“俺乡有个娃考上了清华”这句话。但是乡干部万万没想到的是，赵广涛家却因儿子考上了这么个大学而整天满脸忧愁，一问，说是为了几千块一年的学杂费。上了大学不就可以吃国家了嘛？乡亲们还是老观念，他们不知道从这一年开始大学实行双轨制，所有上学的人都得交学杂费，除此个人还要承担生活费。“凑！”

俺们全乡人就是每人捐出一毛钱也要让我们的‘状元娃’上清华！”乡长把袖子一捋，对着广播向全乡百姓发出号召。就是在赵广涛上路的这一天，乡长代表全乡数万名乡亲把一笔钱交给了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状元’。赵广涛呢，他正是用这笔钱进了首都北京的清华园。

但是，令赵广涛这位乡下孩子不可思议的是，要踏进现今的大学门，除了要交一笔高额学杂费外，还得至少每月200来元的生活费。哪儿来那么多钱？他太清楚自己的家是个什么样，别说每月200元，就是一年到头也难得见200元的现钱呀！一个早已年迈的奶奶，久病不治的父亲，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弟弟……赵广涛知道要从这么个家里每月抠出200来元现钱，就等于扒家人的皮。清华园里的“状元”陷入了窘境。这时，一位记者把面临几近失学的赵广涛的困难情况录入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得帮帮这个有出息的苦孩子呀！”在中央电视台这一节目播出的那一短暂的时间里，有一位远在湖南娄底市的中年女老师心头刹那间被紧紧攫住了。那一夜，这位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女老师辗转难眠，伟大祖国的最高学府里的一位孤苦无助的学子的影子一直在她眼前晃动着……不行，我得帮一把这孩子，考上清华大学多不容易，不能让他因为家境的困难而影响学业！

第二天，这位女老师悄悄来到邮局，给远在北京的赵广涛同学汇去100元钱，特意在附寄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一个真诚的心愿：“你就当自己是我的一个孩子吧！”

邮局工作人员清清楚楚地看到汇款人一栏上写着三个秀美流畅的字：李赛明。

没几日，李赛明一天中午回家吃饭，看到有封自己的信。她拿起一看，就兴冲冲地对老伴欧游说：“你看看，北京给我回信啦！”

“北京？你啥时候有了北京的亲朋好友？”

李赛明老师见老伴一脸狐疑，便开怀地公开了一个心中的“秘密”。

老伴欧游一听，就把儿女叫到一起，很是郑重地说：“你们妈做了一件好事，也是善事。”

我们都要支持她的行动，把赵广涛同学当作你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

“嘿，这回咱家可就出了个清华大学生啦！”孩子们也十分高兴地议论开了。

从此，李赛明每月领完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邮局汇款，而且从不拖时，从不间断，就连寒暑的假期依旧将一张一张汇单寄向清华园……

清华园内的赵广涛同学开始接到这一张又一张的汇款单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愧疚感。要强的他终于忍不住给这位“李妈妈”写信，并婉言表述了自己再不好意思收取资助的心境。他哪想到，这封信不仅没“冷却”对方，反而收到了“李妈妈”更情深意切的来信——赵广涛承认在这之前他对“李妈妈”的称呼也纯粹是出于礼貌，而绝非等同后来他所称之的“李妈妈”之真切。

“李妈妈”的信上这样对他说，广涛，我的好儿，你这么想了让妈我心里都不好受。我不能看着你在大学里为了一顿饭钱、为了买个本子而总是那样愁眉苦脸。如果真是那样，我每天生活在又有冰箱彩电、又有音响空调的家里会极不舒服的。好儿啊，你知道吗，当妈妈的假如不能为自己的儿女做些什么，心头都会有种负罪感，那更不用说她自个儿偷着一人在享受安乐富裕的生活了。明白吗？只要儿在外面受苦，当妈的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不会有丝毫的幸福可言。

赵广涛哭了，他从这位平生根本不相识的“李妈妈”信中，看到了自己亲生妈妈的那种发自母性最原始、最崇高的珍爱与呵护。“李妈妈，看了您的信，我一下有千言万语想对您说，可我不知从何说起，我唯一能说的就是一句话：让我像对亲娘一般地叫你一声妈妈——”打这以后，赵广涛的内心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归宿感，他说那时开始他叫“李妈妈”完全与叫自己的母亲一般，面对的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亲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超过了亲生母亲，因为这个李妈妈有时几乎一个星期就要给他写一封信，这种心灵间的异常频繁的交流与融汇，时间一长就慢慢变成了一种亲情，一种两相牵挂的、不可消失的永恒的亲情。赵广涛直到李妈妈去世后才从由长沙专程到北京来采访他的记者那里知道，李妈妈一家根本不像她在信中向他所描述的那样富有，当时李赛明老师就是为了打消赵广涛接受资助的内疚感而有意这么说的。当老师的李妈妈当然懂得这一点，所以她在赵广涛面前也做得纹丝无缝。其实李赛明的家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家，也可以说是个生活水平低下的家庭。她和老伴二人各拿每月四五百元的工资，3个儿子中大的未成家，小的正在发育年龄，中间的儿子与赵广涛同龄，也是属于能吃和长身体的时候。李赛明本人又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一家5口挤在30来平米的房子里，唯一的两件最现代化的家什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单缸洗衣机。

两个低收入的父母要带三个又在读书又在长身体的大孩子，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李赛明不仅从来没有向赵广涛透露过一丝一毫，相反每一次向北京汇款时总刻意表现出一位有钱的母亲向一位有难的儿子施恩时的那种豁达与大度。如此长久的“美丽谎言”，使一南一北的“一家人”共同进入了一个无比幸福的童话世界。

亲情不仅仅来自血缘，它还属于那些相互关爱的人。时间一长，已有3个孩子的李赛明总是特别惦记北京的赵广涛。有一次，李赛明的小儿子对妈半开玩笑地说：“妈，我们感觉在你心中广涛哥好像比我们更亲似的……”母亲笑了，说：“傻孩子，你们天天在我身边，还用得着我那么牵挂嘛？广

涛就不一样了，他一个人孤身在外，自然得多为他想点儿。”在清华园上学的赵广涛呢，也慢慢心头老有一种对远在湖南的李妈妈及一家人的牵挂。有时倘若晚收到一两天的信，他便有些坐不住了，回去赶紧重新发一封信问问为什么，是不是“妈妈”身体又不太好啦，总之是那种无法割舍的惦念。平时，赵广涛也不时把学校和自己在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写信告诉李赛明。李赛明呢，则用她母亲的那般特有的细微关怀着远方的“儿子”。只要她稍稍从赵广涛的信中感觉到他正需要什么时，就赶紧倾其所能地去办。

冬天到了，她忙着向北京寄去棉大衣；夏天来临，她便把本来给亲儿子买的衬衣汗衫邮到清华园，另外总有一笔特殊的“回家费”。“你出来又快一年了，该回去看看父母了。如果不打算回家，那这笔钱就算你在北京打工的本钱吧……”李赛明信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周到。1995年的春节前4天，赵广涛的奶奶突然去世，为了办丧事，本来就清贫的赵广涛一家犹如雪上加霜，一下多了不少新债。李赛明得知后，一面给赵广涛写信安慰，一面忙着筹钱。本来每月给赵广涛寄100百元，加上李赛明其实除了清华的这位“儿子”外，她还一次又一次地向好几个孤儿及一群无家可归的乞丐们施舍捐助。一个本来就极低收入的家庭，要是整天摊上那么多事，谁都感到极其为难。但当李赛明知道赵广涛家里出事后，便毫不犹豫地在全家所剩的200元伙食费给汇走……“妈，咱一个多月了，老吃地瓜加茄子，我一闻家里的饭菜就反胃，么子就不能换换口味呀？”面对儿女们的抱怨，李赛明只得无可奈何地苦笑着向他们许了个永远难以实现的愿。

又一个暑假到了，李赛明把该汇出的“回家费”汇走了，也把该备齐的衣物寄出了，然而却一晃近两个月没收到赵广涛的回信。是他没回家？可学校的人说他没留在北京打工。

难道他回到亲人身边就把我这个“妈妈”给忘了？不像，广涛这孩子不是那种人。那他到底怎么啦？李赛明心里好着急也好担心，她猜想一定是广涛这孩子的家里又出什么难事了。

不行，说什么我也要找到广涛听他说说是怎么回事，就是天大的困难，还有我这个妈妈给你顶着嘛！一不做二不休，李赛明一连发出三封信和一封加急电报，催着广涛给回音。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赵广涛家里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奶奶死后的债务，5月份，多病的父亲又离开人世，年仅49岁。赵广涛一面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一面不想再让李妈妈一家跟着承担他和他家的不幸。从每一次湖南邮寄来的用旧布做的包裹和一件件不新不旧的衣物中，赵广涛隐约多多少少感觉到了李妈妈一家的生活并不像她信中所描绘的那样富裕。正是因为这个，他不想再由于自己家庭的不幸拖累李妈妈一家，他也不想让好心的李妈妈跟着为父亲的病逝而悲伤，所以一直没有回信。现在看到李妈妈一封又一封的信件与电报，赵广涛只得将注满泪水的话倾诉给远方的李妈妈听……赵广涛说，这一封信他写得很长很长，也很悲伤忧闷。信发出没几天，他就接到了李妈妈的信，李妈妈的信比他写得还长，整整密密麻麻的十几页纸，那每一页字里行间都刻着一位慈母的伟大的爱。她告诉广涛，从现在开始每月给他的生活费由原来的一个月100元，提高到300元。“好儿呀，你不用为我们家里想，妈妈一家人长年过着要吃啥就有啥、要穿啥就有啥的生活，可你呢，情况就大不相同，你要读书，你家又频频出事，我这个当妈的担心的是你因沉重的困难而影响学业，你千万要顶住，你也完全可以放心地相信有我这个

妈妈作后盾，纵然有天大的困难，也一定能克服……”信中，李赛明一方面继续编织美丽的谎言，一方面用中外名人的奋斗事例鼓励赵广涛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完成学业。

赵广涛就是在李赛明的鼓励下重新站立了起来，而且学习成绩也由入学初期的全班中游水平，跃入前五六名。他的班主任说：“是李赛明老师所给予的那种人间至诚的特殊精神力量，为清华大学重塑了一个赵广涛。”

1997年春节过后的新学年已经有一段时间，然而赵广涛却奇怪地一直没有收到李妈妈的亲笔信，虽然钱还是准时收到，可他一看这不是李妈妈的字。赵广涛焦虑起来：莫非李妈妈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事实正如他所猜，李赛明本来一直身体多病，这年3月开始她就再也支持不住，到医院一查，竟是晚期肺癌并发肝硬化。病魔的痛苦折磨使李赛明连动手写信的力量都失去了，她不得不躺在床上让老伴代写，并吩咐信上一定要说明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而由人代笔的。“广涛这孩子心细又敏感，不然他会发觉什么的。”李赛明对老伴特别说明。其实这微妙的变化，赵广涛还是感觉到了。他回信说，等暑假一到就去湖南看“妈妈”。但是，赵广涛没有等到这一天，1997年5月3日，李赛明老师与世长辞。这对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母子亲情的两代人却因此而永远失去了见面的机会……

期间，当地有一位电视台的记者知道了李赛明与赵广涛的事，便在李赛明的生命最后时刻录下了这位伟大母性的形象，那就是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里出现的镜头。镜头里有记者与李赛明的一段对话：记者：“您现在想不想见见赵广涛？”

李赛明将头侧到一边，流起了泪。片刻，她毅然道：“不想！让他把5年的书念完再说！”

记者：“可您的病……难道您就不想先见他一面？”

李赛明重新把头侧过来，她的脸上尽是泪痕。“我不相信医生说的我只有3个月时间了。我有信心等到他毕业的时候见他……可现在不想打扰他，他太不容易了，他爸爸死时他都没回家……”

良久，记者又问：“您这样关心赵广涛，有没有想等他以后有了出息报答您呢？”

李赛明肯定地摇摇头：“我不要他报答，只要他能够独立，能够自己保自己就行。我最大愿望是他能顺顺利利读完五年大学，然后走上工作岗位能为国家做点出色的事，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生……”

这段话说完没几天，李赛明带着她对赵广涛的无限惦念永远地离开了人间。在办丧事时，有人提出应该给清华大学的“儿子”发封电报，但被李赛明的老伴阻止了，他说：“在生命最后一刻，她还一再叮嘱不管自己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去惊动和打扰广涛，让他安安心地读书。她唯一让我做的是继续要给广涛寄钱、及以她的名义写信……”后来如果不是赵广涛坚持在暑假上湖南去看李妈妈，李赛明家人是绝不会将他心目中的一位形似泰山的母亲已入天国的噩耗向他告知。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李妈妈这么好的一个人会溘然死去，老天竟是如此不公！”当赵广涛向我讲述完他与“李妈妈”之间的故事时，清华园里已是一片灯火。

“何先生，现在你大概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别人老在我面前提起李妈妈的事了？”赵广涛忽然说。

我点点头。“你内心还有一份别人并不懂的愿望，就是尽量地少去打扰九泉之下的李妈妈，让她不要再多为你这个清华学子操心了……”

赵广涛突然把我的手紧紧握住：“谢谢你。谢谢你的理解！”

分手时，赵广涛告诉我一个心愿：“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的清华大学毕业证书去湖南，去李妈妈的坟前喊一声：‘妈妈，你的儿子完成学业后看您来了！’”夜色下，我分明看到这位清华学子瞳仁内的闪闪泪光。

比起赵广涛来，杨虹的几年大学学业可以说是自始至终被特殊的爱与温暖沐浴着，而当

人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后，有谁还能说人的本性不是善良？

杨虹现在已走出校门，在沈阳市某交通局客运集团公司上班，他是作为特批对象落户在

这座北方城市的。其实如果不是与这座城市早有的一段情结，杨虹也许今生今世成不了一个沈阳市民，也许根本不可能与大学有缘。

杨虹的老家在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边远山村。这里的人受传统和客观条件等方面的影响，一般的年轻人上完初中就开始务农，能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念高中的娃儿几年也出不了个把，在娃儿的父母眼里，那些想上大学的都是在做梦。与其做梦，还不如早些拿起牛鞭粪桶置个家业。所以当那年杨虹把上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拿出来时，父亲一脸的不悦：“家里连拿出一分钱都费劲，你还念啥子高中么？”

“我就要念么，将来还要上大学！”杨虹与父亲顶完嘴，就开始走自己的路。

他到同学那儿借了150元路费，买了一张站台票便坐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结果乘了几天几夜车子准备在哈尔滨找个工打的杨虹落了空，于是他辗转到沈阳。这回他运气不好，半途被查出没票而赶下了车。后来他一路徒步，到沈阳时口袋里只剩5块钱。走投无路的他突然想起自己的舅舅在沈阳东陵沙场工作，便搭了一辆车子赶到那儿。此时天忽然下起大雨，又饿又乏的杨虹再也支撑不住了，在一棵避雨的树下，他刚落足便昏死了过去……第二天醒来时，杨虹好像感觉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似的。他拼出全身力气，挥动着手臂，以示过路的行人与车辆注意。最后还是一辆开小货车的师傅拉他上了车，并将他送到东陵沙场。

杨虹一问，人家说他的舅舅早已不在这儿干活了。当时杨虹一听这，又一下昏了过去。

沙场上好心的人看这孩子太可怜，便留下了他。杨虹后来说，当时他好比一个乞丐，别人留了两碗面汤他吃得却如山珍海味一样惬意。

打工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杨虹他们干的活是帮人家拆旧房，偏偏这是个要力气的活儿。杨虹个小，没有人跟他搭帮，于是他被安排在工地做饭。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老天开眼，杨虹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后来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沈阳市民项士信一家。项士信的家当时就在杨虹做工的附近，他儿子项鑫比杨虹小几岁，每天中午回家吃完饭后就喜欢上工地那个地方玩一阵子。时间一长，项鑫便与杨虹熟了。杨虹见项鑫经常从工地那儿担水回家很吃力，就帮小项鑫挑，这样杨虹也认识了项鑫的母亲郭淑杰。项家的人都是老实本份又善良，见杨虹聪明热情，便经常请他到家里来吃个便饭什么的。有一天，小项鑫的母亲郭淑杰正在家里忙活，见杨虹愁眉苦脸地靠在她

家的门槛上，一问，原来杨虹打工的这个工地上已经没活了，人家甩下他换到别的地方，他杨虹一下又成了孤独的流浪者。

“阿姨，我想到您这儿借点米吃……”杨虹终于开口了，他说他现在跟一个老乡俩人一起蜗居在工地上的一间小破房子里，靠捡砖头卖过日子。因为旧砖不好卖，他与老乡两天没吃啥东西了。

郭淑杰二话没说，找出一个小口袋便给杨虹装了 10 来斤米。“有难，你就说一声。阿姨一家只要能做得到的一定帮你。”郭淑杰随口说了一句，杨虹却把它牢牢地烙在心上。

项鑫的家要动迁，杨虹第一个来帮忙。在运货的一路上，杨虹见项鑫的父亲是个大好人，便半真半假地说：“项大哥，要是我认你爸，你能不能供我读书？”

项鑫的父亲项士信憨厚地一笑，说：“你上学要花多少呀？”

“一个月 50 来元就够了。”

项士信一思忖，说：“读书是好事，我一定帮助你。”

当时杨虹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嘴上说说，不就图个快活嘛！但是杨虹虽身在他乡，心里却一直惦念着高中快要开学的时间。想想眼前的境况，杨虹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没了重进课堂的希望，为此他写信给老家的同学，流露出走绝路的念头。偏巧，郭淑杰在给杨虹洗衣服时无意看到了那个同学给杨虹的回信。郭淑杰吓坏了，把这事赶紧告诉了丈夫项士信。夫妻俩都是心地善良的老实人，一商量，说什么也要帮这孩子一把。

可是家里哪有钱呀？

项家 3 口人，其实挣钱的就项士信一人，郭淑杰是沈阳头一批下岗的人，他们的儿子也在上学，3 口子本来日子就过得够紧巴。

“杨虹这孩子实在太可怜，容我想想办法。”项士信说完就出了门。

他是去朋友家借钱去。

“怎么样？借着了没有？”半夜，老伴给项士信开门后的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成了。”项士信说。

第二天，项家夫妇找来杨虹，当面把 1000 元钱交给他：“这钱是给你上学用的，赶紧收拾行李，还来得及赶上开学……”

杨虹愣了很长时间才缓过神，眼泪禁不住哗哗直下。他“扑通”跪在项家夫妇面前，泣不成声：“我……我这辈子永不忘记你们！”

再说杨虹回家跟父亲把自己离家出走后的前前后后的事一说，老父亲大为惊讶，对儿子说：“项家真是天底下的大好人。虹儿，你能重新上学，这事我跟你妈作亲爹娘的都帮不了再说杨虹回家跟父亲把自己离家出走后的前前后后的事一说，老父亲大为惊讶，对儿子说：“项家真是天底下的大好人。虹儿，你能重新上学，这事我跟你妈作亲爹娘的都帮不了你，项家的义举对你来说就是再生父母。以后你得改口，叫他们爹妈才是。”杨虹呢，这回跟父亲想到一起了，其实他内心早有此愿，只是经父亲这么一提就更加迫切。当晚，杨虹含着泪水把久存在心头的愿望连同上学的喜讯，一起写信告诉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沈阳那个新家……

之后的 3 年，村里人都说杨虹交上了好运，因为他有一个沈阳的“好爸好妈”每月寄钱来供他上高中，而且寄钱的数目从最初的 50 元，升到 80 元、100 元和 200 元……逢到新学年开学，甚至升至五六百元还多。杨虹一

家和村上人真的以为遇上了一家有钱的好心人。说好心不假，但说项士信是个有钱的人家那实在离谱了。那时项士信一人上班挣 500 来元的工资，为了保证给四川的杨虹每月寄钱，老伴郭淑杰一等丈夫把工资领回家，不管家里有什么大事难事要办，她总先留出一半钱来放在抽屉，第二天又匆匆寄走。

郭淑杰说她是怕钱在家里多留一天，就可能被别的急事挤用掉了。“从我认识杨虹后的这五六年间，我心里一直提着弦，生怕有一天突然自己家里出件什么大事把给杨虹的钱挪作它用了……”郭淑杰每每谈起此事，心中总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负重感。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丈夫的 500 来元工资，却要把其中的一半留出来给别人念书用，而仅用剩下的那么一点点钱维持一个 3 口之家的生活，这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恐怕除了郭淑杰和她丈夫项士信能说得出来，再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1993 年夏，项家又接到四川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杨虹写的，里面还有一张沈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入学录取通知书。“孩子他爸，杨虹这回有出息了，考上我们沈阳的大学了，你快看呀！”丈夫项士信下班刚踏进家门，妻子就激动地把这一喜讯告诉了他。

“好啊，这孩子总算没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血！”项士信其实比妻子还要高兴，因为他曾跟杨虹半真半假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哪一天你真考上了大学，我就正式认你这个儿子。”

看到丈夫从心底里都在乐的样，一边的妻子郭淑杰则双眉慢慢紧锁起来：“杨虹上大学的费用就更大了。你看，光上学报名时就得一下交 1700 元呢！”

“还能凑一凑吗？”

“拿什么凑？咱鑫儿的学费这回也得出去借了……”妻子“唉”的一声，忍不住两眼直流泪水。

“杨虹已经到这份上了，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帮他进大学门。”

黑色夜幕下，丈夫一把搂过瘦弱的妻子，有些哽咽地，“只是又要苦了你……”

天亮后，项士信叫妻子去给杨虹发电报让他先到沈阳来，自己又去到朋友那儿求情借钱。这回他把该想到的人都想到了，但仍然只借到了 600 元……

开学报到的日子已到。那天郭淑杰特意给杨虹换了一套新衣服，但领杨虹去学校报到的丈夫项士信那天脸上却显得很沉重。

“老师，我们杨虹的家就在沈阳，离学校不远，能不能让他走读，这样他的住宿费啥的我们不出行不行？”来到学校，项士信把杨虹安顿到一边，自己便带有乞求地问正在登记的一位学生处工作人员。

“那怎么行？上大学有规定，必须住校。”

“您高抬贵手给通融通融……”

“不行就是不行，你别浪费时间好吗？来来，让一让，下一个！”

忙得不亦乐乎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时间跟项士信多说什么。

头一回没办成，项士信只好带着杨虹回了家。第二天他没让杨虹去，自个儿又去找那个管报名的学生处工作人员，那人一见项士信又来提这根本“不着边”的事，就干脆回答道：“要是交不起钱，就别上了嘛！”

项士信气得掉头就往回走。气归气，人家学校有规定么。妻子好言劝道：明儿找找学校的领导，把事挑明了，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照顾照顾。

还有啥法子，只能这样呗。报名的日子只剩最后一天了，项士信再次来到学校。这回他直接找到了学生处的杨处长，并把他一家与杨虹的事全盘倒了出来。

“竟有这样的事呀？”杨处长听后项士信的讲述，激动得站了起来，并当即表示，“如果情况属实，我一定促成领导批准你的这个特殊要求！”值此，项家7年含辛茹苦帮助一位贫困生上学的事才被旁人所知晓。杨虹也顺理成章地被学校破例允许走读并免去了一切学杂费。

有人说杨虹太幸运了，幸运遇到了像项士信这样天底下最好的人家。

这话其实一点不过份，先不说过去的几年里项士信一家为了帮助杨虹这个对前途、对人生失去信心的苦孩子怎么重新树立信心、上完高中的那片苦心，单单在杨虹上大学的3年时间里，项家曾几度倾家荡产、高筑债台。有一次杨虹入学后需要办个30元的图书阅览证，当时“妈妈”郭淑杰手里别说30元，就是3毛钱都拿不出。可孩子在大学里有个阅览证是必需的，郭淑杰想来想去也没招，最后她想到了自己有件没穿过的新呢子上衣，于是毫不犹豫地拿到自由市场廉价出手卖了50元钱。当她看到自己还没有穿过一回的新衣服被人无情地拿走时，竟坐在马路边上哭了起来。项士信自打添了个“大学生儿子”后就更不用说了，因屡屡借钱他把朋友都给得罪了，“老实、仗义”的名声也变成了“可怜、可气”的骂名。

至于在邻居的眼里，他项氏一家是抠门抠到了自个儿的皮肉。这话咋讲？人家说你没注意他项士信脚上那袜子？咋？是从垃圾箱里捡的！还有你没看他媳妇，倒也天天上菜市场，也筐里常满满的往回提，可那都是别人扔下的烂菜根烂菜叶哩！

我们再来听听项士信一家是怎么说的。问男主人，可他不愿提这些事，大老爷们的说不出口呀！女主人并不在乎人家怎么瞧不起她所做的心事，她说得也平淡：“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本来就靠他爸一个人赚工资，后来虹儿进了我家，4张嘴吃一个挣的钱，自然只能过苦日子。可咱心里亮堂、踏实，因为看到虹儿能有出息，能上完大学，现在又能找到一份能发挥他才能的工作，我们全家一点儿不感觉冤。虽然为了他我们背了一身债，但现在两个孩子都大了，他爸也还能干，我也可以腾出空了，准备办个托儿所，再苦干两三年，欠的债就差不多可以还尽了……”

听，本是滚烫、激昂的豪言壮语，却在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嘴里说得那么平平淡淡。这才是我们中国百姓的真实情怀！

第10章：驮在车轱辘上的丰碑

我知道白芳礼老人的事是从团中央学校部一位负责人口里听得的，他告诉我，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现已八十五六岁了，十几年来靠自己蹬三轮车赚来的血汗钱，资助了近200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曾受到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领导的赞誉和接见。

初听这事，我除了强烈的震惊外，心里怎么也不大容易接受这件事实。

我觉得让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而且还是蹬三轮车的老人，用自己那么一脚一蹬踩出来的血汗钱，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吃饭、穿衣和上学，

实在太有点残酷了，也太……总之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

去采访之前，我给天津团市委打了个电话，请他们帮助找到这位老人。5月19日，我正在北京参加一次文学研讨会，会的中途传来天津方面打在我寻呼机上的消息：“天津无你打听的那个白大爷……”这怎么可能！我走出会议大厅，急忙给天津方面打去长途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帮助寻找。下午对方告知“已找到”。这消息让我的心像放下了一块石头。第二天一早4点我就睡不着了，5点“打的”赶到市郊的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因为来得太早，白白在晨露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启程到天津。

9点半左右，市学联的一位同志带我在大街上转来转去走了好多路，来到了天津火车站。

“白大爷就在那个广告牌后面。”学联的同志指着火车站西侧的那块巨型广告，对我说，“白大爷平时没有固定地点，到处都走。为了今天你的采访，昨天下午我专门来了一趟，让他今儿在这个地方等着。”

越过川流不息的车潮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们来到巨型广告牌后面的一个三角地。我远远看到在那个三角地的路边，堆放着一摊破破烂烂的东西，有各种瓶瓶罐罐、纸屑废桶等，在这些废品堆放物的中央，有一个用旧编织袋片搭成的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棚。在棚的后面，只见一位衣衫穿着极为破落的老人一只小盆里洗刷着两顶旧鸭舌帽……

“这就是白大爷？！”

“是他。”

这时，老人正抬起头。我心头一颤：这不是油画《父亲》的翻版吗？

瞧那一道道刀刻般的深深皱纹和充满沧桑的脸……

“你是北京来的作家？”老人直起身子，那张黑黝黝的脸盘顿时绽出那憨厚的歉意：“看看，我嘛没干，又让上面重视了。”

老人家原来是个一开口就叫人能见得着底的人哪！

“可你这阵来看我啥都不像了……”老人颤微着身体，皱起眉头，指指点点地对我说，“以前我在这儿有13个小卖铺，前阵子政府号召要整治车站、街道环境，我们这些小卖铺、小亭子都得拆掉。我是劳模，当了几十年的老劳模，得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呀，所以我就让政府先拆了我的这些小卖铺。13个小铺哩，他们那天来了三十七辆车、100多号人哪，拆了近一天，全给拆掉了。现在我就成了这个样，一点不像样，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生意好着呢！”老大爷还是个做过大生意的人呢，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哎，以前生意大着呢。”老人一提起这，顿时神情飞扬起来。他说他这儿是前些年张立昌市长亲自给批的一块地用来让他建小亭子，卖些水果、包子什么的。“我是老劳模，嘛事就得想多为国家做点事，多做点贡献。你等着，我给你看看材料……”

老人转身钻进那个小棚棚，很吃力地拎出四个塞得满满的包包给我看。“都是材料，写我的，还有照片。好多好多呢。我当劳模十几年，你想十几年了给我写的材料有多少！多去了，家里还有好多好多……”质朴的老人拿起一张张绉巴巴的、早已发黄了的各式各样有关介绍他的报纸和新闻图片，如数家珍似的给我看，那张沧桑的脸上裸露着一种童真般的笑容。而我正是从这些早已发黄和模糊了的点点滴滴材料上，了解了这位蹬三轮车老人那令人俯首称颂的事——白芳礼老人生于1912年，祖籍河北沧县白贾村，祖辈贫寒，他从小没念过书，如今也不认得几个字。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

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一名卖苦力的三轮车车夫。从那时起，他一跨上三轮车就没停过，一直到 50 多年后的今天。解放后的白芳礼，靠自己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三轮车拉扯大了自己的 4 个孩子，其中 3 个上了大学。从小不认字的老人，对自己能用三轮车滚出的一条汗水路上，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是件最欣慰的事。1986 年，相当于绕地球蹬了几十圈的 74 岁老人正准备告别三轮车时，一回老家的过程使他改变了主意，并重新蹬上三轮，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娃儿，大白天的你们不上学，在地里泡啥？老人在庄稼地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干活，便问。娃儿们告诉这位城里来的老爷爷，他们的大人不让他们上学。这是怎么回事！老人找到孩子的家长问这是究竟为啥。家长们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们上学。老人一听，心里像灌了铅，他跑到学校问校长，收多少钱孩子们上不起学？校长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儿八十的，不过就是真的有学生来上学，可也没老师了。老人不解，嘛没老师？校长说，还不是工资太少，留不住呗。老人顿时无言。

这一夜，老人辗转难眠：家乡那么贫困，就是因为庄稼人没知识。

可现今孩子们仍然上不了学，难道还要让家乡一辈辈穷下去？不成！其它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学这事不行。

“有件事跟你们说一说：我原打算回老家养老享清福，可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回城重操旧业。”家庭会上，白芳礼老人当着老伴和儿女们宣布道：“另一件事是，我要把以前蹬三轮车攒下的 5000 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这事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一样，我主意已定，谁也别插杠了！”

别人不知道，可老伴和孩子们知道，这 5000 元钱，是老爷子几十年来仅存下的“养老钱”呀！急也没用，嚷更不顶事，既然老爷子自己定下的事，就依他去吧。家人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孝顺的儿女们担心的是父亲蹬了一辈子三轮车，如今这么大年纪了，本该享享清福，可他……唉，阻是阻不住了，老爷子的脾气家人最清楚。

“爸，咱再说别的啥是没用了，您老可悠着点，腿脚感到有点累了就早点儿回来歇着。”

“像往常一样，儿女们在老爷子出门，给他备好一瓶水、一块毛巾，一直目送出街的尽头。”

白芳礼呢，这回重新蹬上三轮车虽然还是那么熟悉，那么转圈圈，但心里却比过去多装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孩子们上学的事。是的，毛主席都解放我们几十年了，咋还有念不下去书的？！不能，绝不能让小娃儿们再像我不认得几个字而只能蹬三轮车。74 岁的老人想到这里，他的双腿重重地提了一把劲，而就是这么一提劲，又整整绕地球转了 6 圈……

面对如此一位执着、坚韧的耄耋老人，我的心无法不强烈颤动。那辆伴着老人走了几圈地球的三轮车就停在旁边，这是很普通的一辆人力小车。与天津火车站附近千百辆三轮车区别不同的是，这辆小车前面有一面十分醒目的小三角红旗，红旗上面有三行字：老弱病残优待，孤老户义务，军烈属半价。

“你看看咱车站四周有多少蹬车人哪！竞争了不得哟。可我从不挣黑心钱，为了给孩子们多挣些钱念书，我就争取每天多跑几趟。这面旗打出去后，好多以前的老伙计朝我白眼，说你又是压价又搞义务，我们生意怎么做呀。我说你们说错了，车站那么多人要车，我哪顾得过来？你们挣钱是为了养家

口和发财，我不一样，所以我可以搞些义务，当然我也要赚钱，可赚了钱是为孩子们上学用的，好生意你们抢去了，我只能找些便宜的或者半价一类的活。

听我这么一说，那些老伙计们就不再跟我过不去了。”老人擦着车，开心地说着。然而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看看眼前这位苍如古柏的三轮车老人那身破陋得与街边要饭的乞丐无两样的行头，谁能想得到他在这 10 余年里竟无偿向教育事业赞助了 30 万元巨款，长年支援了天津、南开等好几所大学里正在读书的 200 多名贫困大学生和几十名有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上学！

“大爷，您给学生们捐了那么多钱，自己却生活得如此艰苦！”我实在无法忍心看一眼这位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的生活：从头到脚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吃的是冷馒头加一瓶白开水，那张他说已经在此住了 10 个年头的所谓“床”，只不过是两叠砖上面搁的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没有“屋”，唯一的“屋”是块摊开的塑料编织袋布和四根小木杆支撑的一个弱不经风的小棚棚。我来的夜晚，京津两地正下过一场暴雨，老人说他昨晚就是在雨中过的，他拿起一床正在晒着的被子给我看，那上面有一大摊水迹……

“以前这儿是小亭子，7 平方米，能有个栖身之处。现在不行了，给拆了，不知啥时候能好起来……”老人似乎对我没能看到他以前曾经“辉煌”的小亭子感到有些遗憾。其实有人告诉我即使是那时，老人过的仍是俭朴得叫人不堪入目的生活。

为了能多挣一点钱，他已经好多年不住家里，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就以车站边的小亭子为家，很多时候由于拉活需要，他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张报纸往地上一铺，一块方砖往后脑一放，一只帽子往脸上一掩，便是他睡觉前的全部准备“程序”。“我从来没买过衣服，你看，我身上这些衬衣、外裤，都是平时捡的。还有鞋，两只不一样的呀，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样吧！

还有袜子，我都是捡的。今儿捡一只，明儿再捡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出钱买的。”老人说到这儿很神秘地对我说，“那么多记者采访我，我都没给他们讲这些事，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忙说谢谢您老了。于是老人接着说：“我哪舍得花钱！蹬一次车赚一二十块钱不易啊，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天天心头惦记着在我赞助的那几百学生。我就不能花钱，只能往里挣才是。孩子们考上大学多不易，可考上大学还念不起，你说这事咋整？那年我听人说咱天津几所大学有不少学生考上了却没钱买书，没钱吃饱饭，我想孩子们的家长没办法给他们挣来钱，可我蹬三轮车还能挣些呀，所以我就重操旧业，一蹬就蹬到现在，一蹬就下不了车了，你想几百个学生光吃光出学费一年就要多少钱！我是劳模，没文化，又年岁大了，嘛事干不了了，可蹬三轮车还成。一天蹬下来总还有几十块钱么，孩子们有了钱就可以安心上课了，所以一想到这些我就越蹬越有劲……”

老人说得我眼睛直发酸。

现今的社会上有大款儿一出手可以给哪个单位赞助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虽然赚钱也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那么容易，但无论如何他们要比白芳礼容易得不知多少倍。可是我眼前的这位津门老人为学生们送去的每一分钱，却是用自己的双腿一脚高一脚低那么踩出来的，是他每日不分早晚，栉风沐雨，用淌下的一滴滴汗水积攒出来的，它是多么来之不易，来之

艰辛呵！

一日，老人正蹬车回“家”时，见路边躺着一位昏倒在地的妇女。

他赶紧下车将这位 40 来岁的妇女扶上自己的小三轮，之后直奔医院。谁知在颠簸中苏醒过来的这位妇女说啥也不愿让老人往医院送。“大爷求求您了，我要赶回学校，您给我把车转过来。”

老人听妇女说这话后有些不解，便问嘛回事。当这位妇女告诉他自己是位老师，身体不好，有贫血症，眼下得要赶去给学生批改作业呢。白大爷听到这里，心头一阵发热，从此更坚定了他支持教育的那片赤诚之心。而且似乎每每想起这位因劳累导致贫血的女老师，老人不仅一方面更拼命蹬车，另一方面对自己俭朴的生活更苛刻。除了不买衣帽鞋袜外，连吃的东西他都尽可能地不买不花钱，有人常看到他在拾他人扔下的馒头、面包或半截没有吃完的香肠……

白芳礼的事迹后来被新闻媒体广为宣传报导，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一次他正在 5 路汽车站小憩时啃着一块馍。有人认出是“当代武训”白芳礼老人，便一下围了过来。有人就问他：“您老捐别人十万八万的，为嘛自己这么苦？”

老人举起如今到处可见的弃馍说：“这又嘛苦？这馍是农民兄弟用一滴一滴汗换来的，人家扔了，我把它拾起来吃了，不少浪费些么！”在场的好几位人被感动得直流泪。

老人为了让孩子们能安心上学，他几乎是在用超过极限的生命努力相助着。老人告诉我，有一年他到南开大学给贫困生捐款，学校要派车来接他，老人说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钱给穷孩子买书。后来他自个儿蹬着三轮车到了南开大学。捐赠仪式上，学工部的老师把这事一讲，台下一片哭声。许多同学上台从白芳礼老人接过资助的钱时，双手都在发抖，说我们一个个青春年华却让如此一位日子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的蹬三轮老人供学费、供生活费，实在过意不去。当场有一位来自新疆贫困地区的大学生，门门功课优秀，道德品质也好，没毕业就被天津一家大公司看中，并以高薪相聘。在这捐赠仪式上，这位新疆学生情不自禁地走上台，激动地说：“我从白大爷身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这种精神使我的灵魂得到升华，现在我正式向学校、也向白大爷表示：毕业后我不留天津，我要回目前还贫困的家乡，以白大爷的精神去努力为改变贫困落后做贡献。”那位同学说完深深地向白芳礼鞠了一躬。这时全场的情绪激昂起来，紧跟着—批安徽、贵州等地的大学生们纷纷上台表示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南开校园里的这一幕是白芳礼老人最感欣慰的事。他说有人说我傻，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送给了别人，自己却过得不像人过的日子。要说人家的话一点道理没有也不对。我过得是苦，挣来的每一块钱都不容易。可我心里是舒畅的，看到大学生们能从我做的这一点点小事上唤起一分报国心，我高兴呀。你都看到了，像我这样一大把年岁的人，又不识得字，没啥能耐可以为国家做贡献的了。可我捐助的那些大学生他们就不一样，他们有文化，懂科学，说不定以后出几个大人才，那对国家贡献多大！老人说到这里，从其中的一只包里取出一叠资助的学生名单给我看，他说他不认得字，不知上面都写些啥。但他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从穷地方来的好孩子，不是好孩子咋能考上南开、天津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老人说这些时，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睁得特别大，仿佛他已经看到自己用汗水换来的辛苦钱有了满意的回报。

“我给这些孩子捐些钱让他们买书学知识，买点吃的补补身体。嘿，他们一转眼大学毕业，上了工作岗位，搞出个啥科学发明，你说那该给国家建设做多大贡献哩！”我看到老人说到这儿，脸上光彩异常。

1994年，时值82岁高龄的白芳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会上，他把整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辛苦钱交给学校后，这个学校的领导说要代表全校300余贫困生向他致敬。

老人一听这话，久久思忖起来：现今家里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得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儿呀！这可咋办？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来。回到车站他的那个露天“家”后，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还未亮他就把儿女家的门给敲开了。

“爸呀，您这么早来没出啥事吧？”儿女们看老人气喘吁吁地挂着一身霜露，不知老爷子有啥急茬，忙让进屋。

老爷子要过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落尘，说：“我准备把你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钱办个公司。”

“哈哈，我的老爷子，您昨晚没多喝吧？”儿女们一听这就忍不住捧腹笑起来。

老爷子板起了脸：“我给你们说正经的，有嘛好笑？我就是办个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芳礼支教公司’。”

“啥啥？子饺还是水饺公司？”

“支——教，支持的支，教育的教，支持教育的公司。”老人一个字一个字给儿孙们念清楚。

这回都听清楚了：老爷子真是着了魔，敢情自个儿卖老命还嫌不够，还想当个“专业”赞助户！

“你们看咋样？啊，说呀，是支持还是反对？”老人心急地问了这个又问那个。

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异口同声地：“爸，只要您老看咋合适就咋办。”

“哈哈，我说我的儿女就像我么。”这回轮到老爷子乐不可支了。

“爸，我们嘛不担心，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岁还……”

白芳礼朝儿女们挥挥手，说：“啥事没有，你们开口支持我办支教公司比给我买罐头、麦乳精强百倍。走喽——”老人猛地一按车铃，伴着清脆悦耳的“叮铃铃”声，便消失在晨雾之中……

不多时，由市长亲自给白芳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全国唯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礼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84岁的白芳礼当上了公司董事长。

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20来名员工庄严宣布：“我们挣来的钱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不知道的人以为这下白芳礼老人可以坐享清福了，其实他的那个“支教公司”实则仅是火车站边的一个7平方米的小售货亭，经营些糕点、烟酒什么的。

“可别小看我的小亭子，这儿可是黄金宝地哩。”与我面对面坐着的白芳礼老人指指如今那块成为他露天栖身之地的地盘，不无自豪地说：“我就是凭着卖掉老屋的1万元和贷来的钱作本钱，慢慢滚雪球越滚越大，由开始的一个小亭子发展后来的十几个小亭子，连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钱和税啥的，还余1万多元哩！”

“那可比您老一个人蹬三轮车多赚不少哟。”我听后打心眼里为老人高兴。

“多好几倍呢！”老人发出朗朗笑声。

不过有一件事我不禁要问他：“您老这么一大摊都是自己管呀？”

“不不不，我是董事长，不管具体的，我雇一个经理，他帮着我管事。我还是蹬自己的三轮车……”老人连摆了几回手。“我懂嘛做买卖？再说蹬了几十年三轮，你这回一下让我真像皇帝那样坐在太师椅里，看着伙计们流着汗吆喝着，可不是自己给自己折寿吗？要不得要不得。”老人乐呵呵地开怀大笑之后，接着说道：“再说想想那些缺钱的孩子，我也坐不住呀！我还是像以前天天出车，24小时待客，一天总还能挣回个二、三十块。别小看这二三十块钱，可以供10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全部内心世界。他靠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着一片灿烂天空，温暖着无数莘莘学子。

我知道自办公司起，白芳礼老人每月向天津的几所大学、中学、小学送去数额可观的赞助费，这些所谓的赞助费实际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税后利润，他因此而由开始资助的十几名学生，到后来的几十名、100多名，直到200多名……并且成为名扬津门和海内外的“支教劳模”。

老人讲到这段辉煌历史时，情不自禁地又翻腾起那几口袋有关他的报导材料，并嘴边不无自豪地夸耀起来：……我到中央、到市里作报告，13个机子对着我，录相的电视机呀。

我对学生们讲，我说你们花我白爷爷一个卖大苦力的人的钱确实不容易，我是一脚一脚蹬出来的呀，可你们只要好好学习，朝好的方向走，我供你们学习也越干越有劲么。我干啥支持教育？支持你们学生？我晓得我们国家落后就是因为教育没上去，所以我要支持教育，支持你们学生好好上学。我是上面挂上号的人哪，不干出些事来，嘛向上面交待？你看你从北京大老远的跑到我这里来，我没有点事迹，没有点材料给你写，你就不好回去写了，我就算嘛先进？算嘛劳模么？所以我越干越有劲。我对孩子们说，你们只要好好学习，就不要为钱发愁，有我白爷爷一天在蹬三轮，就有你们娃儿上学念书和吃饭的钱。

我这么一讲，台下的孩子们全哭了……

能不哭么！老人在一边依然沉浸在他那幸福的回忆之中，而我却无法平静如波澜起伏的心海世界：一个坐在你面前形似乞丐恰比丰碑更巍峨的老人，十几年来从不间断地蹬着三轮，行程50余万里、捐出30多万元帮助贫困生，其本身的壮举便足够让那些大有能力却从不愿向社会、向公益事业施舍的人汗颜，当然对那些不仅不会向社会、向公益事业施舍且还想尽心思沾便宜、伸黑手的人，就更无法与白芳礼老人的精神境界可比。照理像白芳礼这样高龄的老人不仅无需再为他人做些什么，理当完全可以接受别人的关爱。可他没有，不仅丝毫没有，而且把自己仅能再为别人可闪耀的一截烛光全部点亮，并点得如此亮堂，如此光耀！

末后，老人告诉我，虽然他有赖于能为诸多学生提供赞助的主要生财之源的“支教公司”，其经营地盘因整治城市环境而被拆除了，但他的三轮车还在，他的双脚还健壮，他的那颗爱国、爱教、爱学生的心还在“扑嗵扑嗵”地跳，他就要尽快恢复每月向200多名学生的资助。

“大爷，允许我在这里代表所有受过您老资助的同学向您致意。”

我觉得再在老人面前呆下去我就会哭出来。

“好好，让同学们放心，我身体还硬棒着呢，还在天天蹬三轮，一天十块八块的我还要挣回来。”老人吃力地从小凳上坐起来，向我伸过双手。

“您老的手怎么啦？”在我触摸到那双粗糙的手时，心头一阵颤动：老人的两手背上都有一大块发紫的溢血斑！

“被前天夜里几个小偷打的。”老人说：“他们看我这儿乱哄哄的，就想沾便宜。我出去拦，他们就用木棍打我……”

我抚摸着老人手背上的伤痕，又是悲愤又是心疼，就像抚摸我自己爷爷的手。

“您老快去医院去看看呀”“我不去不去，一去的话他们就要让你住院咋的，我这摊嘛咋整？”

真无法明白老人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总那样毫不在乎。

临别时，我向他要几份资料带走。老人显得有些为难。我马上明白过来，便说：“大爷，我要的资料我自己去复印，顺便给您多复印几份，以后有记者什么的来了您就可以给他们了。”

老人听后，似乎一下激动起来，脸都有些胀红了，他把手伸过来握着我连连说：“你是我碰到的好人。以前他们来写我，一来就拿走好多材料，我一印就是好几十块哪！可人家是来宣传我的呀，我嘛有话说么！那会儿我做买卖的那些小亭子没拆，也有钱应付得起。现在不行了，我断财源了，资助的那些学生有的一两个月没拿到钱了，所以你看你大老远的来宣传我还让你掏钱，怪叫人那个的……”

“大爷你可别当一回事，比起您这么高龄还一脚一脚地蹬车为学生们捐钱，我们算什么？大爷千万别……”我感觉自己的鼻子阵阵发酸，再也说不下去了。

“再见了，大爷。”

“欢迎再来。”身后，突然传来老人的一声叫喊：“……等文章出来了给我捎上一份啊！”

“哎，一定。”

当时已经走出几步的我，真想再回头看一眼津门的这位令人无比尊敬的老人，可是我没勇气。

我发现我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我猜想这是第一次、或许又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我一生中最最值得尊敬的人，我多么渴望转过身去再看一眼他，但就是没有那种力量，没有那种可以让我失声痛哭的力量……

离开天津，我到了山西。

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天地。一个是海与河的天地，一个是山和丘的世界。在喧闹的大都市街头，当白芳礼老人蹬着他的三轮车艰难地穿梭奔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时，人们几乎谁也不会注意或听到一声是属于一位 80 多岁老人所辗出的那个车轱辘声。在太行山脉的崎岖小道上，人们同样不会注意或听到一位普通农家妇女推着她的那辆两轮板车的轱辘声……

但，我却听得清彻、悦耳，甚至那么动情。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可以在咖啡馆里随意听一出富豪们为情人或美女的一个笑脸而一掷百万的绯闻，也可以垂手捡一篓有关腐败官员费尽心机地替自己添金博彩而丧尽天良的佐证。然而你或许不能相信和明白这样一件事：一位山区妇女和她已经死去的父亲二人，前赴后继 20 年，靠推小车养猪致富来济助一大群

从不相识的贫困学生。令我感动的是，这对许多年间每次出手都是几万几万的“济困父女”，自己家中却穷得一贫如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不会相信这对经常出现在京城、省城的大会堂、电视台里的慷慨资助者家中，不仅见不到半点儿“富裕”，就连基本的生活家什都难见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几间农舍，农舍里面是方字形排着的3个立柜，主人说这还是曾祖父传的；一张方桌，两把老式椅子，其中一把还短了半条腿；唯一的奢侈品，是斗桌上摆着的一台17英寸电视机，那是死去的父亲在他当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从省里得奖抱回来的。主人见我们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盯在那只老式立柜上的那把铜锁，便不好意思地掏出钥匙，当着众人面打开了——没有金银财宝，更没有绫罗绸缎，只有上下两层补丁摺补丁的旧衣破褥。

毕腊英说她从来不愿有记者、作家什么的到她家采访，她说她宁可披红戴花地站在主席台上，让人们认为她真的是财主什么的“吹”着、“抬”着，那样那些贫困学生就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捐助，否则她说她的一份心意别人就不敢领受了。

与太行山的泥土一样质朴的毕腊英，不善言辞，更不善装腔作势，除了当她推起二轮车给一群猪崽喂食扫圈时所勃发出的那一股麻利劲外，你见到的她只会是一脸憨厚的笑容和大山女儿那特有的举止。然而这只是你所看到她的表面现象，你看不到她的那颗对生活、对贫困学生的恋惜的滚烫之心！

毕腊英和她的父亲都是农民，也没有特别的能耐，他们靠一个庄稼人能做的仅有一点种粮养猪的本领，一个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父亲），一个是省人大代表和第一届国际家庭年“五好家庭”金奖得主（毕腊英）。

“咱是农民，农民除了身上有力气外就没其它啥本事。力气虽不是金银钱财，但却能生金银钱财。咱有力气呀！力气用完了会再生出来。出点力，少睡会儿，多收几百斤粮就少掏钱买饲料，少掏钱买饲料一年就能省出万儿八千块来资助那些贫困娃娃上学、读大学。”让毕腊英谈帮困助学的“思想境界”，你就会发现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你又同时会发现她是位真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没有高深的智慧，没有闪烁的辞藻，毕腊英则跟着她那位可敬的父亲整整走过了近20年的助学历程，而这条漫长的助学历程既非惊天动地，又非常人所能。

毕腊英对自己为何走上一条“养猪助学”人生路的最初印象并不深刻，她说还在她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时，就亲历过父亲做的一次当时让她难以解开的谜：那时“文革”刚结束，因受不白之冤而蹲了几年大狱的父亲为洗刷屈辱，在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进行了长达10年的上访生涯。小腊英那时不知父亲求的是什么，她只知全家人为了父亲能出行上访，可以几天几宿不起灶、不热炕，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喂成六七十斤重的小猪崽总被提前出栏卖掉，换得几十块钱给父亲上省城、京城。那时小腊英也像别的女孩想上学，可她不敢开口，知道全家唯一能生钱的小猪崽是为父亲上访而饲养和准备的。她清楚记得，每次父亲从省城、京城回来时总要带回一只病央央的小猪崽子，而且父亲总说那猪崽不是买的，是路边捡的或是别人送的。小腊英一见这病秧秧的猪崽就生气，一则这半死不活的猪崽总是那样难养无比，娇得比婴儿还难侍候，二则只要有这小猪崽的存在，父亲那上访的心思就断不了。

恨死你这狗猪崽！

有一次小腊英乘父亲不在家时，有意把一堆猪饲草放在露雨天里淋湿后再给猪崽喂吃，那猪崽一吃便拉个不停，小腊英觉得十分解恨。可第二天她发现父亲竟累昏在猪栏里——他老整整一宿用自己的体温和草禾给小猪崽子取暖哩！那次小腊英哭了，她哭父亲可怜，也哭自己的不幸命运。后来的她不仅对小猪崽子渐渐有了感情，而且发现父亲在养猪崽上极有一套，什么样病弱的猪崽，一经他手没有不被养得体胖膘肥的。小腊英似乎从父亲对养猪的专注中看到了老人家在上访问题上那义无反顾的执着和对美好人生的无限希冀，于是她也开始学养猪，直到后来父亲或家人不在的时候她能独立喂养几头猪崽。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近 10 个春秋，小腊英也变成了大腊英，而父亲也在一位老将军的帮助下昭雪平反了往日的冤屈。

“爸，你现在不用上访了，咋还养猪崽？而且是一大窝崽？”一日，腊英见刚刚宁静了不足半年的猪圈里又热闹非凡，便问。

父亲嘿嘿一笑，没理会女儿的话，照常用他往日的养猪本领一天一天地精心饲养他的那些小猪崽。半年过后，小猪崽养得又肥又壮，该出栏了！邻里们都来观摩，并在一旁七嘴八舌地说这回毕家可再不是“上访贫困户”了，而马上是养猪致富户啦！腊英听得也高兴哟，她想跟老爸全家苦了几十年，咱毕家也该有出头日子了！

晚饭时分，父亲从镇上回来，腊英和母亲、丈夫及孩子们欢欢喜喜把老人家让到上坐，等待着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激动时刻……可是直到碗空锅朝天时，这激动的时候仍不见到来。腊英和全家人大眼小眼直瞪着父亲，问你卖掉猪崽的钱哪去啦？

我都给邻村的那几个辍学的娃儿送去了呀！父亲眯着堆满煞纹的老眼笑嘻嘻地说道。

腊英和全家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呆了。先是老母亲的一声撕人心肺的啼哭，接着是娃儿们的哭闹……

咋啦？我做错了？父亲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放，说：你们咋忘了？

忘了我是为什么坐监狱吃劳苦的？忘了我为啥上访 10 年才平冤的？不就是我、我们全家没有人识文认字嘛！一个家，不认字、不识文，全家就没有出头的好日子过。一个国家，没有文化、没有科学，就是全国的人没有好日子过。我看到村邻的娃儿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考上了重点高中，却因为没钱而半途退学，可惜啊！我想我老农民一个能做啥呀？不能。可我能养猪，养好几栏猪崽，我就这点本事，我就这点能耐。那就把这点本事和能耐给那些能上大学、上重点高中的好娃儿尽一份心、一份力，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你们说，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英儿，你说爸是老昏了还是老得有出息了？你说呀，爸要听你的话。

腊英哭了，哭得双肩抖动。许久，腊英抬起泪眼，重重地向父亲点点头：爸，你做得对。我、我们全家支持你！

英儿……。父亲顿时老泪纵横，哭得比谁都动情，后来又在儿孙们劝导下破涕为笑。

父亲选定的济困助学路并不好走，尤其对缺乏经济来源的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严重的是不被人理解。最早有关助学的事都由父亲一手操办，腊英和家里人只管把地种好，把猪喂大，至于外面的事她们一概不太清楚。1987 年父亲资助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的一批贫困大学生

时，在临上省城时父亲便叫上了腊英，说我年岁越来越大了，可咱家助贫济学的事才刚开始，以后怕你得替我多走走了。腊英是孝女，父亲说啥都听着。那是腊英第一次上省城，在向山西经济管理学院贫困生捐助的仪式上，她不仅深深感受到了父亲选择济困助学这条路的意义，而且也被另外一件事触痛了自己的心。那是她和父亲刚为大学生们捐款结束，准备返回高平老家的前一夜，突然她和父亲住的小招待所里来了好几位“募捐者”，他们有的是报社记者，有的是省直某某单位或什么基金会的，牌子都很大，他们共同的一句话是：希望毕家父女为他们的“事业”掏钱，而且一开口便说得那么轻松随便——三万、五万不嫌少，十万、八万凑整数。腊英哪见过这种场面，说我跟爸到省城几天除了受捐助单位请客吃上两顿好饭，其余我们吃的都是方便面和自己家中带来的干馍馍，别说三万五万，就是三、五百也没有呀！那些伸手者哪相信腊英的话，说你别逗了，谁不知你们毕家是“大富翁”，说句痛快话，我们这些单位办的事也跟救济贫困大学的事差不多重要，你到底给还是不给？腊英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她想说可又嫌自己嘴笨。最后还是父亲见识广，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回我们出门没多带钱，只准备了给几个念不下书的大学生带了些钱，下回一定也多为大伙想着些。来来来，捐款的事留着下回，咱们先上馆子喝一杯。父亲叫腊英跟着一起去，腊英哪有这份心境，推说不舒服留在招待所。晚上 10 来点钟时，父亲踉踉跄跄回来了，一头栽在床上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苏醒过来。

“英儿，本来我留了 300 元钱想给你和娃儿扯几块花布做件新衣服，不想昨晚都给那几个人吃光了……爸对不住你和娃儿。”父亲喃喃地说。腊英啥都没埋怨，说爸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太原吧，保不准呆一会有更多的人来向我们伸手哩！于是父女俩连早饭都没顾上吃便“逃”出了省城……

其实，腊英父女俩“逃”回老家高平方村后，仍有人不远数百里追来向他们毕家伸手要赞助，只是当那些充满欲望的人走进毕家亲眼目睹了这家“富裕户”的贫困程度才一个一个甘心自愿地主动放弃了募捐的念头。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相信，毕家捐助给学生们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它来自毕家人的每一滴血汗啊！从 80 年代中期父亲靠三百五百捐助到现在的毕腊英能两万三万地拿出手，毕家一共资助了贫困生 10 余万元巨款。可所有的这些钱，毕家人除了靠养猪生钱外，没有一分钱来自其它途径。有人给毕腊英父女算过一笔账，一年毕家饲养 50 头猪，每顿至少要喂 30 担饲料，一天就是 90 担；每一担饲料约 40 勺，从磨房一勺一勺舀好，担到猪舍再一勺一勺地舀进猪食盆，每天毕腊英一家人就要舀 7200 多勺。一年 365 天，毕家人几乎重复着同一种繁重而单调的劳作。从早晨东方泛白到皓月当空的夜晚，毕家人忙里忙外地或是在磨房磨粉、沥浆、搅兑猪饲料，或是大担小勺地在猪栏前一伏一起地喂食清圈。毕家是个大家，腊英的父亲和二叔老兄弟俩没分过家，这样毕氏一家便有了祖孙三代十几口人。但如此三代人并没有影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养好猪、挣得钱去资助那些念不起书的穷学生。

1992 年，腊英的父亲、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毕生才老先生不幸惨死在一起交通事故中。

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等几所曾获得过毕家捐助的大学时，好几所大学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那些接受过毕家资助后重新获得学习的贫困学生们，在悼念会上泣不成声朗读着一篇篇情深意

切的奠文，学子们为自己过早失去一位可敬可爱的农民老伯而无限悲伤。可是同学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时隔两个月，逝者的女儿毕腊英只身带着家中全部的 9000 元积蓄和新近卖猪所得的 11200 元钱，又来到了经济管理学院。这回她是代表父亲及全家人的心愿，专程来与校方商量设定一个以先父名字命名的“救济贫困大学生奖励基金”。

“……我父亲不幸去世了，但他生前担起的支持教育事业、资助贫困生的这份责任，从现在开始由我和全家人接过来。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也没有啥本事，还是一句话，我有力气，有力气就能种地养猪，种了地养了猪就能生来钱。我向同学们保证，只要我毕家能拿得出一分钱，就不会让没有半分钱的同学挨饿辍学！”这段话是腊英在为父亲设立的教育奖励基金仪式上说的。她说这话时，台下的许多大学生们忍不住上台把这位个头不足 1 米 55 的妇女，高高地簇拥起来。

呵，毕腊英，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可在大学生们的心目中，你和你家人是一座耸立云端的擎天丰碑。

第 11 章：为了祖坟上的那颗“弯弯树”

大千世界，草木繁茂，但到底是否有种“弯弯树”，我没有进行考证。

但小时候在农村时，我见过荒坟上常有那种长得很奇特的树木，它们一般都为一丈把高，杆枝细弯，皮表粗裂，当然也有个别长得参天笔直、叶茂葱郁的。老百姓有个说法，凡是坟头长着这种无论是笔直的参天大树，还是只有丈把高的细弯干树，其后代子孙都能千秋万代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这种说法，所以在死者的坟头栽棵树木，是一种被认为是重要的出殡内容。这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如果死者在世时鞠躬尽瘁，那他的后代便能金榜题名、飞黄腾达，其坟头也能长出根深叶茂的“弯弯树”，反之则休想长出什么“弯弯树”，只能长些荒草朽木。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已有几千年，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从来就没有断过。至于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期望子孙后代出人头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人比历朝历代的祖先还要看重得多。

现在比过去条件好了，不管穷人富人，男儿女娃，在读书问题是平等的。而时代的发展，国家建设又越来越看重“科教革命”。具有传统重教美德的中国人，自大学门向自己开放之后，年年岁岁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高考的日子里，如潮似山的家长们那焦虑地等待在考场门前的感人场景，也可以从每个周末与星期天里见到父母驮着儿女去补课的匆匆行踪。1998 年 7 月的 7、8、9 三日，我天天在上下班时可以看到北京四中校门前那一幕幕你想象得到和你想象不到的场面：有的家长背着氧气袋在烈日炎炎下的校门外一整天一整天地在等候；百米之外的某三星级宾馆突然暴满，入住的竟都是本市高考学生与家长……有位家长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如果需要家长们为子女能考上大学而去赴汤蹈火、倾家荡产，他说所有的家长都将毫不犹豫。

我听后心头感到强烈震撼。难道不是吗？所有儿女都是父辈的希望所在。当人类进化至 20 世纪末的今天，这一“定律”仍颠扑不破。尤其是独生子女占绝对多数的中国城市居民中，父母们为了能让子女上大学而不惜一

切代价的现象，越显突出。在中国广大农村，上大学则更是“跳出农门进龙门”的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道路。尤其随着高科技越来越强大的冲击，社会职业的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今天不上大学，明天就没有饭碗”的现实已经残酷地摆在了人们的眼前。我们无疑地相信一个事实：每一位大学生的成长路上，他们的父母与家庭则是这个学生最坚固的脊梁与后盾。而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困难的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子女能跃进“龙门”和完成学业所付出的代价，更令天公动容、地母拂泪……

在渭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山村，有个驼背的农妇，叫杨秀茹，今年 53 岁，她和同为农民的丈夫俩人在一座窑洞内带大了 4 个儿女。后来丈夫病逝了，杨秀茹一个人靠种地、卖鸡蛋和挖药硬是让 3 个女儿、一个儿子全都考上了大学。儿女上大学后，她又以自己那副瘦弱的肩膀，挑起了 4 个大学生儿女的全部学费与生活费。杨秀茹的儿女实在不忍心看着自己母亲那越来越驼的后背和颤巍巍的双脚，便一次又一次想“逃学”与退学。7 年前，杨秀茹刚刚借钱处理完丈夫的丧事，二女儿晓莉从咸阳师专闻讯急回。

一到家，晓莉直奔父亲坟头，母女俩抱头哭成一团。入夜，少了父亲的窑洞平添了几分冷森。

女儿突然一板一眼地说：“妈，我不想上大学了，回来帮你种地还债，供弟弟和妹妹上学。”

母亲一愣，随后便“噌”地站起身来，说：“家里的事就是天塌下来，你甭管，明儿就给我回学校去！”“我就不。”女儿第一次强硬地违抗道。“你敢！”母亲火了。第二天，她趁晓莉不注意时，“哐当——”一声把她反锁在里面。“娃呀，你好好在里头想，啥时候想通了妈就给你开门。”

晓莉知道犟不过母亲，只好在第 3 天背起行李，一路抹泪地回到了学校。

此事刚过两三个月，杨秀茹因过度疲劳，在抢打夏麦时连人带车从坡上翻进了几米深的山洼里，被好心人抢救过来送到医院头部缝了 57 针。从昏迷中醒来的杨秀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给我用贵药”。那是正值三女儿亚梅上高三，女儿看到母亲伤成这个样，发誓再不上学，不声不响地跑到地里干活。母亲出院后，见此情景，便拖着虚弱的身子骨把亚梅叫到身边：“孩子，你是不是心疼妈？如果你真心疼，那就去上学。妈要看你能像大姐二姐一样进大学，啊，听妈的话，快去上学，过几天就要高考了！”亚梅就是不搭腔，也不回学校。

母亲急了，她又一次使出“关禁闭”的手段，趁三女儿不备时又将其锁在里头。她知道三女儿脾气倔，便一连 3 天不给她送饭。第 3 天晚上，亚梅终于顶不住了，只好流着泪向母亲屈服。然而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的亚梅却在过后的高考中竟以 30 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

“妈，这回你该放心让我跟你一起下地了吧？”亚梅丝毫没有因失利而不悦，相反显得异常得意地对母亲这样说。母亲呢，只觉得内心很内疚，认

为是由于自己的伤病影响了女儿的考试成绩，于是等新学年一开始，她便走出窑洞，连连找了好几个学校，总算把亚梅送进了一个高中班复读。但在次年预考时，亚梅再次落榜。母亲这回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把亚梅叫上，然后带她到了已长满荒草的父亲坟头：“梅梅，你今天当着你爸的坟头给我说说清楚，你这样成心不好好高考到底对得起谁？你说！”亚梅望着母亲悲戚而苍凉的脸庞，终于跪在母亲面前，哭诉道：“妈，家里这么穷，就你一个干活，我们姐弟4个如果都去上大学，万一把你累出个啥好歹，我们作儿女的对不起老天啊！妈，我求求你，别让我再上大学了……”

“这回轮到母亲心疼了，她蹲下身子，一把搂过女儿，爱抚地为亚梅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咋不明这理：妈再苦，可要能看到你们一个比一个出息，我心里比啥都甜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用心，没出息，妈可是一辈子心疼，你该明白这理吧？”

亚梅一听，顿时伏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末后，她仰起脸向妈保证道：“妈，你放心，我一定考上大学！”“这就对了。”母亲搂紧女儿，脸上充满了幸福。

1994年，三女儿亚梅一举考上了汉中师范学院。同年，最小的儿子赵军也考上了省重点高中，3年后的1997年，赵军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轰动了贫穷的偏僻小山村，当然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杨秀茹。尽管杨秀茹现在仍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和身体也显得过早的苍老，但每每想到儿女们个个如此出息，她终于可以在丈夫的坟头欣慰地说一句：“孩子他爸，我心头比过去踏实多了，你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母亲总是最伟大的，在贫困生的庞大群体中，像杨秀茹这样以其瘦弱的躯体和浩瀚的母爱，编织与恩泽着一群儿女们的大学，并非少数。在北国辽宁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有个同为母亲的农妇，在过去12年间极其困苦的条件下，竟靠养鸡的双手，将6个儿女送上了大学。这6个儿女分别是：长子魏广平考入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现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博士；次子魏广利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光学系；长女魏秀玲考入东北大学自控系；二女魏秀霞考入阜新师范专科学校；三女魏秀云考入辽宁银行学校；小女魏秀娥考入辽宁中医学院。

魏家六兄妹的母亲叫侯俊荣，现年62岁，但是从她那张满是白发和布满绉纹的脸上，以及佝偻的身影，你几乎找不到这个年龄的妇人们应有的任何风韵。除了苍老，便是一种残烛的感觉。然而又有哪一个风韵依存的同龄妇人可以像她那样分享如此多的幸福与宽慰？没有。这一切，只属于侯俊荣一个人。

侯俊荣跟渭北的杨秀茹一样，都是山村农妇加文盲，她们自然都不比城市那些有高等学历、有丰厚经济条件的贵夫人有什么高明之处，在培养自己的子女方面却有独到之处。

那就是无法用价值观衡量的精神力量。

魏家的兄妹6人不属于“计划生育”的超标范围，因为母亲侯氏生儿女时还没有到全党大抓人口生育的年代。但如此多的子女毕竟是个沉重的负担，而孩子们的母亲侯俊荣，字不认几个，理懂得却不少。大儿子头一个上大学，当母亲的侯俊荣格外看重，她说不出啥大道理，但知道“头羊”的作用。所以为了解决大儿子广平上大学的费用，那时没有家庭副业的侯俊荣就靠打草换钱。1斤干草可以卖3分钱，10斤鲜草只能晒1斤干草。广平上北

京到学校报到时拿了家里给的 150 元钱，这正是母亲打的 5000 斤草换来的。

另一件东西广平现在即使在美国读博士仍一直留在身边，那就是母亲用 144 块边角布亲手一针针缝成的那床褥子。大儿子上北大时还没有赶上“并轨”，学校收费没那么多。但后来几个孩子上学时就不同了，除了学校要收取的不同费用外，娃儿的生活费也逐年随着物价的猛涨而直往上蹿，侯俊荣真的感到了沉重压力，有时手头好不容易刚积攒三五十元钱，大娃儿小娃儿一分就见不着啥数。大女儿秀玲印象最深刻，她在上大学时就遇到了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的窘境。母亲侯俊荣头一回急坏了，因为前天她刚刚从信用社贷的钱才给了秀玲的几个弟妹交学费了，这会儿哪有人再借钱给她嘛！秀玲默默地含泪看着快急疯了了的母亲满头大汗在屋里翻箱倒柜，可还是没找到一样值钱的东西。“这可咋办？这可咋……”母亲一边凄苍地将自己的头往土墙上撞，一边嘴里绝望地念叨着。突然，秀玲听母亲“哈哈”大笑起来：“有钱了！这回有钱了！”母亲说完这话，就拼命用双手猛抠那面土墙……秀玲吓坏了，以为母亲疯了，便带着哭腔扑过去拦住她：“妈，你别这样，我不上大学了好不好！我不上了……”

“不想母亲脸色一沉，说：“谁准你不上大学呀？啊，你这死丫头，说呀！”秀玲只好说：“咱家没钱就别……”母亲不等女儿说完，就像变戏法似的从土墙里取出一大包东西：“这不是钱嘛！死丫头，你点点！”这回惊呆的是秀玲，可不是一大包钱嘛！但她马上发现：“妈，这钱早没用了！”“啥？这可是我跟你爸结婚时我悄悄藏的呀，怎么会没用？”这一夜，娘儿俩一惊一乍的没少劳神，不过有一点还是让她们很开心，那就是第二天她们把这些建国初期的钱币拿到银行还真兑换了一笔现款，这使上大学的秀玲缓了一难。儿女们还在一个接一个地上大学，可土墙里不可能再出现“奇迹”了。打年轻时就手脚麻利的侯俊荣思忖着老靠地里的几亩庄稼和自己零打碎敲也出不了大钱，得想点法子“致富”才行嘛！做生意是不成的，那是大老爷们干的；打草吧，钱来得太少，累死累活，也就百八十块，救不了大急。养鸡吧，听说有人养鸡能当“万元户”、“十万元户”哩，对，咱也试试！于是，没有文化的侯俊荣选择了认为最适合她的副业——养鸡。头一年，她养了 80 只，纯收入 150 元；第二年养了 100 只，收入 728 元。有了前两年的经验，侯俊荣开始“宏图大略”起来，第 3 年一下养至 2000 只，第 4 年增至 3000 只……侯俊荣乐了，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更重要的是，她靠鸡崽生下的蛋换来了可供儿女们上大学的钞票！就这样，侯俊荣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前后 12 年间成功地将全家 6 个儿女全部送进了大学，并又让他们一个个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她还让大儿子越洋到美国读了博士。值得一提的是，侯俊荣不仅依靠自己那对长满老茧的双手使儿女们圆了大学梦，而且难能可贵是，她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地为每一位上大学的儿女都缝了一床用 144 块布角拼成的褥子。她以这独特的方式告诫儿女们：啥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曾经是个苦孩子。

我下面要讲一位下岗女工为了上大学的儿子所付出的艰辛经历。

她叫陈秀凤，儿子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秀凤原来是哈尔滨恒丰纸箱厂工人，1995 年被下岗，那时她才 40 岁，按厂里规定，只有 35 岁以下的人仍留在厂里，她陈秀凤是“老龄”，厂里发了 200 块钱就把她和一大群姐妹兄弟打发回了家。开始陈秀凤还觉得下岗就下岗，正好儿子快要考大学了，丈夫为了还掉过去借的几万元债而日夜在外面开出租车，自己离岗回去

撑个安宁的家也不算是件太过不去的事。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出了大难：1996年春节初三，出车的丈夫被一群抢车的歹徒把车子抢跑后又残忍地焚尸并抛至在几百里外的荒野……

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一下遇到如此打击，失去工作和失去丈夫的陈秀凤，面临丈夫留下的一大笔债务和一个正要考大学的儿子，度过了浑浑噩噩的无数个黑夜白昼，那颗惨遭重创的心灵无人能安抚。

“妈，高中毕业后，我不准备考大学了……”一天，儿子轻声地对母亲说。

陈秀凤仿佛一下清醒起来：“为什么？你怎么能不上大学？”

“我已经17岁了，我要自己养活自己，不能再让您辛苦了！”

在陈秀凤的眼里，儿子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那一日，连遭打击的她，有一种对儿子的特别感激，因为是儿子的话使她重新扬起了生活之帆。陈秀凤觉得自己该到振奋起来的时候了。她一面坚决制止儿子的打算，一面开始寻求自己的谋生之路。

陈秀凤来到劳务市场，经过一段周折终于被一家餐馆聘用当洗碗工，月工资400元。她觉得这已经很满足了，加上原来厂子里给的200元，母子俩有600元钱便可以紧巴过日子了。

后来，餐馆里有位专门负责拎泔水脏桶的男打工仔嫌活又累又脏而溜了，陈秀凤找到老板说由她包下这脏活。老板正愁没人干这份差使呢，于是答应每月多给陈秀凤150元。为了这550元的钱，陈秀凤每天就像是在拼命。

这年，儿子在她的勉励下终于考上了北航。可没等陈秀凤送走儿子缓口气，丈夫欠下的3万元债务的债主找上门来了。“已经过半年了。这是说好的事——还不了，房子就归我。”

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可以赎回嘛。”债主早已不耐烦了，就这么一挥手，便使陈秀凤唯一的栖生之地也失去了……那一夜，陈秀凤想往河里一跳就万事了结，但她放心不下刚进大学门的儿子。

为了儿子她必须活下来。为了儿子4年的学业必须活得好好的。

城里的房子租不起，陈秀凤只得到郊区的一个农民家与房东合住了一间房，一切都为了省几个钱。而所有这一切远在京城读大学的儿子并不知道，母亲在被赶出自家门时，唯一求到的是让债主帮她接一下儿子的来信，这样她可以留下原来的地址而不被在外的儿子知道已经发生的变故。

刚刚有了栖身之处的她为了能每月按时给儿子寄生活费，马上又开始了寻找工作，以前那餐馆由于她换了郊区的住处就无法再上班，陈秀凤便在城乡结合部的一家浴池谋到了一份搓背的活。刚到浴池上班时，面对顾客那高傲、鄙视和挑剔的目光，陈秀凤真想甩手走人，但最后还是强打着笑脸留了下来。那时的她已经顾不了自己的脸面和自尊，她唯一想到的是自己有份工作，而儿子能把大学上好这是她全部的精神寄托与力量支柱。

第一个月发工资，她给儿子寄去了300元，并特意写信说她在一家商场站柜台，工作还算不累，待遇也挺好什么的说了一大堆，意在让儿子花她的钱少心疼些。但即便陈秀凤编织的如此“好境”也不长久，她干活的那个浴池因有人举报说是从事色情被查封了。

陈秀凤第三次失业了。

这可怎么是好？那些日子里，陈秀凤急得天天往外寻找工作，可偏偏哈尔滨市的下岗人员一拨又一拨，好像这个世界就不再有她可以谋生的饭碗

了。一日，陈秀凤在市里不知跑了多少家劳务市场，累得她实在支撑不住了。她不得不在马路边上捡了张旧报纸垫着坐下歇歇。望着车水马龙的闹市，她陈秀凤无奈地低下痛苦与自卑的头颅……

嗯，这是什么？“……一浙江修鞋匠靠在城市里几年修鞋挣得的钱，在家乡盖起一座楼房，并使全家走上了小康。”陈秀凤看着看着，忍不住拿起报纸读了起来。对呀，人家乡下人跑到城里修鞋还发了财，咋我们城里人就不能也当一回修鞋匠？也发它一回财呢？陈秀凤的这一发现不亚于当年牛顿发现苹果落地的“牛顿定律”，她顿时眼前一亮，拾起旧报纸大步融入急急赶潮的人流。

陈秀凤尽管什么苦都吃过，可她自己觉得若在人后干再脏再累再低下的活都不在乎，可当她头一回摆摊时，面对那么多行人看着自己，特别是偶尔还碰到几个熟人时，她真的有些抬不起头，更主要的是由于起初并不熟悉修鞋技术，一向麻利的她对自己在众人面前表现出的那笨手笨脚的活计羞死了。第一天，拿锤子的右手酸得直不起，而被锤子砸了不知多少下的右手则早已皮开肉绽……

日子长了，有一天一起在街上摆摊的一位小师傅向她建议，如果想多挣点活，就得到人多的地方比如大学门口什么的，那儿人多，大学生们好动，又远离家人。陈秀凤一下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对呀，他们当大学生的鞋袜是破得最多的，何不上校门口去！陈秀凤说搬就搬，到校门口一摆摊生意真红火，特别是下课时和周末节假日里，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围起来要求修鞋。看着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陈秀凤呢，像是见了自己的儿子，既心疼又喜爱：“你们只管拿来，有钱的给多少算多少，没钱的算阿姨做了人情……”没想陈秀凤的实心实意，更使大学生都喜欢来找她。积少成多，小生意的收入也还可以，陈秀凤除去自己的必要生活费外，每月给儿子寄的300元钱又有着落了。

陈秀凤从此与大学结下了好缘。许多与她一样的下岗或做其它小买卖的人也曾曾在大学门口设摊做活，但最后留下的并不多，唯独陈秀凤一干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门。他们不理解陈秀凤为什么能在同样的地段、同样的生意上却做出与众不同结果？

其实那不同点正是因为陈秀凤的眼里，那些大学生们就好比是她自己的儿女，也正是她发自内心的那份爱，才使得学生们都喜欢上了这个热情服务的“陈阿姨”。

“陈阿姨”后来成了“陈老板”。

新年开学，陈秀凤发现她原来摆摊的那个大学的学生们也搞起了修鞋一类的勤工俭学活动。她知道参加这一活动的都是些跟她儿子一样的贫困生，所以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摊位。

不过她并没有离开校门，经历了放假和开学的两个高潮，陈秀凤发现学生们买箱用包特多，尤其是一些外地学生，放假、开学时，身上少的也有那么一两个箱包。这可是个好市场呀！

如果在学校附近开设一家专门从正规渠道进货的箱包店，价格和款式上又能与年轻人合拍，生意一定不错。这时的陈秀凤已经有了不少经商意识，她拼凑了2000元钱，从十几里外的一个箱包市场批进了十几个包，第一天就在校门口卖掉了6个，第二天又跑到另几所大学门口，不想手中的货全都脱销了，虽然她出手的价格比商店里的要便宜得多，但毕竟还是赚了不小一

笔。

就这样，陈秀凤批一回卖一回，学生们也知道“修鞋陈阿姨”变成了“卖包陈阿姨”，批发商们也慢慢把她看成“大户”客客气气待她。一日，陈秀凤又一次来到箱包市场，一位浙江温州的箱包厂经销科长把她叫住了：“大阿姐，我们看你做生意蛮好，想请你当我们‘金龙箱包厂’的业务总代理，在哈尔滨开个箱包行。你愿不愿意？”

“我？我给你们开箱包行？先生你没搞错吧，我可只是个下岗后摆小摊的呀！”陈秀凤吃惊不小。

那温州人笑了，说大姐你再看看这个包怎么样？

“这、这不是我前阵子给一个老板瞎比划的包样吗？”陈秀凤做梦也没想到，她半个来月前试着让人问问有没有她想象中的那种款式的一个包样，现在竟成批地放在了她的面前。

“没错，这正是你设计的。我们只是在用料和装饰上稍稍改了一下，看看，这款式我们刚上市就有不少人订货！”温州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但绝不是假话，“我们这个箱包行，实际上你是设计者加经销商，我们是生产厂家，利润嘛按营业额分成，你看怎么样？”

还有什么说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不吃也是白不吃！

不久，陈秀凤的“金龙”箱包行正式开业，她特意还雇了3个同为下岗的女店员，自任总经理。箱包行开业之后，生意果真像温州人预测的那样好。此时的陈秀凤，被这意外的收获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1997年春节，陈秀凤怀揣3万元巨款，怀着不同寻常的心情，敲开了那位占她房子的债主的大门。

“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你必须马上将我家的房子腾出来！”陈秀凤强忍着不让泪水从自己的眼眶里流出。几天后，当她以主人的身份再次回到失而复得的房内时，久溢在眼内的泪水夺眶而出……

第12章：走来的一个与溃退的九十九个

我们了解了大学，便了解了我们的目的。

9月10日，是研究生院新生报到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江南著名学府南京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研究生新生，他叫张宗友，23岁，来自安徽。张宗友的到来，给南京大学引起不小的震荡，原因是他是我国声势浩大的“希望工程”培养出来的第一位研究生。当张宗友在南大中文系研究生报到处签上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间，人们看到他眼泪夺眶而出。是啊，从大学到研究生，这一大步多么来之不易——对一个全靠社会来资助的贫困学生！

张宗友想起了几天前自己离开位于大别山的家乡——安徽金寨县汤汇镇茅畈村时的情景。那是个晴朗的早晨，全村的父老乡亲站在雾霭流岚的村口，燃起串串鞭炮，为山村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研究生送行。坐在机动三轮车上的张宗友忍不住噙泪与乡亲们挥手告别。而这一次他是无比幸福的告别，因为有6年前一次完全不同的告别，所以张宗友格外激动。是啊，同一条茅畈河，同一座大别山，但6年前的告别与今天的告别是多么不同——那是个完全绝望的日子。一场洪水把所有的庄稼与房屋给淹没了，年迈的祖母呆呆地坐在倒塌的房子边等待死亡的日子早些降临，有病的母亲伸着无援的

双手扒拉着几个未被冲走的土豆，妹妹上学的路断了，父亲坐在石板上抽着旱烟眼巴巴地望着家门前的一方天空……快要开学了，17岁的张宗友正摩娑着手中的书本，想往离家100里外的金寨县一中的教室。知道知道，父亲的心里全知道，儿子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孩子，父亲还知道进这个学校的孩子十有八九将来能上大学。可孩子，你都看到了，咱家就这个样！你不听这？你还想念书去？唉，穷人家的孩子能有这样的机会难得呀。父亲从石板上坐起，看了一眼儿子，背着双手朝小镇上走去。晚上回来，父亲把两张一大一小的票子交给儿子：这150元是从信用社贷来的，明儿你去县中报到吧！

第二天，儿子出发了，带着异常沉重的步履，沿茅畈河轻轻走动，他怕走得太急会撞痛父亲的心……可仅一个月后，儿子又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茅畈河：150元钱交完各种费用后所剩无几，随身带的一坛腌菜也很快吃完，宗友觉得自己的路走到了尽头。

这次是他自己决定的：辍学。永远地与学校告别。

令张宗友没有想到的是学校和县“希望工程”办公室得知后，及时把他重新接回学校，并告诉他以后每学期到县“希望工程”办公室领取60元的特别救助。

那时“希望工程”还不像现在如此深入人心，张宗友有些不敢相信这事，后来他发现真的有人每学期那么做。他因此成了中国亿万苦孩子中的幸运儿。

仅仅60元钱，但对一个山里娃来说，已经是改变他一生的宝贵财富！

1992年夏，最早得到“希望工程”资助的张宗友，接到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入学通知书，成了全国“希望工程”救助下而考上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之后的4年里，张宗友破例继续得到“希望工程”的资助，并且每学期可以领到400元的资助款。为此，张宗友感觉远方的父亲的腰杆稍稍直了，而他本人则肩负了更重的担子，那就是他必须拿出最优异的成绩与出众的品行来报答社会。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大学的4年里，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1995年又光荣入了党。1996年毕业之际，张宗友面临参加工作和考研的两种选择。

前者自然会对减轻家庭负担非常有益，但张宗友深知：我的身后有一支长长的贫困生队伍，如果我考上了研究生，无疑对那些受过“希望工程”救助的弟妹们是一种鼓励与促进。

于是他选择了考研究生，并又一次将命运之神握在了自己手中……

张宗友的到来，使本来就已经热闹的南大校园更加不平静。特别是那些仍在与贫困奋争中的大学生们，他们不约而同地来找张宗友讨教战胜困难的经验与意志。张宗友呢，也乐意同众多新谋面的师弟、师妹们侃侃而谈。一时间，他的那句“贫穷不能抹杀我们对知识的渴求，我心中永远燃起希望之圣火”的话，成了南大校园的名言。

说张宗友是千千万万苦孩子中最幸运的一个，这话没错。他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幸运，有他努力勤奋的一面，再有便是“希望工程”的功劳。据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介绍，自“希望工程”开始至今日，共收到各种捐款多达十几亿元，全国建立“希望学校”4000多所，受助学生有170多万人。毫不夸张，在中国曾经有过的爱心活动中，“希望工程”是最成功的，它的规模、它的影响力、它的运营机制、它的深入人心度、它所维系的时间之长，都可

以堪称全国第一。“希望工程”，是我们新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雷锋精神的最伟大的体现。

在中国 20 世纪末的最后 10 年里，我们的国家有一项特别重大的任务，那便是自 1994 年至 2000 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这个纲领性文件里的第一句话如此写道：“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文件里的第二句话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全社会力量，力争用 7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 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共和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沉重的负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本世纪末最艰巨的任务。

“到 2000 年，共和国建立了半个多世纪，经过了两代人的奋斗，如果仍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生活在贫困之中，怎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这些身负重任的共产党人，一想起这个问题就会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共和国总理对此思虑忡忡。

“到本世纪末，我们解决了 8000 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这个最大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从此就彻底解决了。这不仅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壮举！”党的总书记如此说。

从 1994 年到今天，国家的扶贫攻坚计划已经走过了 4 年多。4 年多里我们又已经脱贫了多少呢？2000 万？还是 4000 万？是真的全部脱贫了还是昨天摘了贫困帽明天更贫困呢？有官方的消息说，至 1997 年底，各地已有近 6000 万人口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

“初步”是个什么概念？“初步”实际便是个可算也可不算的概念。据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副主任高鸿宾在第一线考察后估计，目前一些边远地区的“返贫率”为 10%至 20%左右。

在甘肃，曾有一年统计贫困率下降到 45.17%，岂料这年一场自然灾害又把贫困率反弹至 56%。如此预测，中国目前到底还有多少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看来绝不是一个小数，看一看今年南北大水灾的灾情，官方公布的受灾人口不是达到 2 亿多人吗？……

中国广大地区的贫困依旧，这是不容置疑的。

再看一看中国的贫困是个什么概念。这里有段关于朱基同志在 1995 年 11 月 17 日考察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时的报道：……群山环绕，车子在弯曲的公路上盘旋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七百弄乡牙外屯。

半山腰一间半截茅草搭起来的破房子，住着村民蓝桂忠五口之家。

朱基走进昏暗的屋里，打开衣箱，没见到像样的衣服。看看谷桶，只剩下小半桶玉米面。

五口人有一床旧棉被、一顶蚊帐。

朱基问蓝桂忠：“承包几亩地？”

“两亩一分山地。”

“粮食够吃吗？”

蓝桂忠摇摇头：“今年玉米和木薯加起来，一共才收了 400 公斤。每年一般要缺四、五个月的口粮。”

朱基心情沉重地又走进另一户 3 个孤儿的家。

四面透风、空空荡荡的茅草屋里，摆着几只盛雨水用的瓦盆、木桶。

山上吃水困难，这些雨水只够吃两个来月。

十几年前，3个孤儿的父母先后去世。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一直靠民政部门救济。由于长期得不到温饱，3个孤儿如今已是二十好几了，却长得又小又瘦。

初冬，山风硬得透心寒。老二只穿着件薄薄的单衣，还敞开着怀。

朱基伸手要帮他扣子系上，才发现整件衣服竟然没一个扣子。

泪水盈满了朱基的眼睛，他怜爱地把3个孤儿搂了过来……

这仅仅是总理所看到的情景，致于百姓自己的眼里那就更凄怆了。

回过头我们看看中国的这些贫困对教育事业造成的影响吧。虽然我们已经有“希望工程”等等措施，然而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上学问题仍是个极其艰难的事。

据说每年仍有1000万左右的孩子在校门口徘徊。这就是说像张宗友这样的幸运儿仅是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

1998年春，新华社一记者在湖北恩施地区采访，他走访的一个村子上，本来上学的110名学生，可新学年开学时到学校报到的仅为30多人，老师们分头动员了好几天，大部分学生还是因为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停学。这个村有史以来还没有人上过大学，高中生也寥寥无几。

贫困地区的孩子，与当年的张宗友情况基本差不多，但是能像张宗友走出山村上了大学的，更是百里挑一，千里仅一，甚至万里独一。据中国青基会介绍，挽救这样的一位失学孩子1993年时为30元，后来由于通货膨胀因素，1995年为40元，1996年为60元，现在约为80元。

因为缺少几十元钱，中国的上千万孩子上不了学。

那么，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贫困孩子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大学的孩子们，现在他们又面临的是什么呢？

他们面临的不再是60元、80元，也不是100元、200元，而是2000元、4000元甚至更多的高额费用！

根据目前教育部门提供的数字表明，实行并轨制以后的高校，平均每个学生一年需要个人承担的学费、加学杂费和生活费将在4000元至6000元左右。到2000年，每个大学生每年个人承担的各种费用将为10000元左右。

这就是中国高校中约占五分之一的总数为100万的贫困大学生们所面临的现实。张宗友成为庆幸地走过这个大山的一位，但他身后剩下的99个贫困生们又能不能走过呢？

他们是溃退还是前进，这便是中国大学所面临的世纪末大挑战。

本来就曾经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家庭，几乎是不可能担当起这么一大笔钱。那么无援的他们靠什么来上完大学？即使他们留在了大学，但心头又时刻承受的是什么呢？

1997年3月4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黑龙江某大学发生了：大学4年级学生曲铭悄然从学校图书馆5楼坠下，等到人们发现时，他的头已经深插在早春潮湿的泥土里，同学们永远无法将他唤醒……

曲铭是个贫困生，但他学习优秀，是“三好学生”，几度得过奖学金。可他却仅在仅有3个多月后便能完成学业时，却选择了与这个世界永别之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后来老师和同学们从他写得十分简单的遗书中找到了答案：“这些年我欠大家的情太多了。今生今世无以回报，只有等来世……”

在遗书中，曲铭特意提到了两件事：一件是他在上学期向班上一位同

学借了 400 元生活费没如期还上，致使那位也是贫困生的同学没能如期交上学费；第二件事是有关一张向他捐助过的人名名单。

师生们反映，曲铭平时很开朗，不属于那种心理有明显忧郁症的一类。至于他的贫困早已众所周知，大家还一直在帮助他。刚入学一个月，学校根据他的情况便将其列入了特困生名单之中。一开始，他就得到了像打扫卫生、整理资料、治安巡逻等勤工俭学机会，并是全系 4 名有固定岗位的特困生之一。老师说，就在他自杀之前，学校先后给他安排工作有 17 次之多，每次的特困补助也基本都有他的份。但同学们说，曲铭仍对每年 3100 元的学费忧心忡忡，特别是在接受别人的帮助后这种忧心不仅没减少，常常反而加重了。1995 年秋，在他又一次交不起学费时，同学们主动发起募捐活动。为了不伤他的自尊心，捐款是秘密进行的。等到大家把 2935 1 5 元的钱交到他手上时，曲铭好一阵激动，可他一再表示谢绝。

直到同学们同意按记名的方式捐款并把名单留在他手上时，曲铭才接受。

这样一位同学突然自杀，校园内的冲击波可想而知。其实曲铭之死原因并不复杂，他在告别人间的前几日曾对一位同学表述过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说因为自己上大学，妹妹不得不辍学，连结婚都没结成；在学校，他又成了老让同学们捐款的包袱……

曲铭死于他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内心太重的负疚感。

贫困是一种直感的痛苦。接受社会和别人的帮助是一种具有负担的痛苦。直感的痛苦加上心理负担的痛苦，这便是贫困大学生与那些接受“希望工程”的贫困儿童，及其他如贫困母亲、贫困残疾人的不同之处、复杂之处、严重之处。

你可以拿 50 元或 100 元，就能拯救一个失学儿童。但你却常常难用 5000 元或 10000 元拯救一

个贫困大学生。

东北林业大学学生李静明说：我读第一年大学时就靠吃馒头、咸菜过来的，是很苦，是

很难。天天开饭时，我总最后一个到食堂，悄悄买点东西就走了。但那时我心里还是踏实的

。后来呢，学校和同学都知道了我贫困，于是就都来捐助，我也很感激。可以后总觉得走到哪儿别人都在背后指着议论说：他就是贫困生，我也给过他捐助！

我反而觉得不如自己过去吃馒头、咸菜香。

中国农业大学女学生李颖说：开始有人给我们资助，让我们介绍自己的贫困情况还挺觉得是那么回事的。记者采访、电视摄像，你在接受捐助时还要感激地说些话。后来一次又一次后就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的猩猩在给人家展览，那种心理感觉特不好。

现在我就不大愿意接受别人的捐助，宁可自己苦一点，倒也落个心里清静。

这就是贫困大学生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完全特殊的贫困群体。

中国大学“希望工程”比任何工程都为之艰巨，因而更迫切。否则走过来的真可能就张宗友一个，而溃退的也许是 99 个……

第 13 章：漂泊的高级盲流与依旧的贫瘠秃丘

1997年7月初的一日，北京白石桥路边的某高校的毕业典礼刚刚开完，毕业生赵小刚激动地双手捧着盼望4年之久的红皮烫金大学毕业证书，他面对西北方向，泪流满面地断断续续说着：“……爸，你儿子终于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了！你那年在小煤窑用生命给我换来的两千元学费没有白花呀，爸——！”赵小刚“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地上，久久没有起身……等他从悲喜交加中清醒过来时，发现同宿舍的人都不知到哪儿去了，连床上铺盖也不知何时不翼而飞。赵小刚本来也准备下午离开学校，只是觉得同学一场，该相互打个招呼，于是便留了下来。入夜，往日热闹异常的宿舍里顿时变得静悄悄，这更勾起了赵小刚的浮想联翩——是啊，4年的日子，对赵小刚来说太漫长、太不堪回首了。他情不自禁地想起4年前，自己捧着大学入学通知书又不敢给父亲看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天气非常晴朗的日子，可赵小刚觉得自己像是犯了什么罪似的，站在父亲面前半天不敢说话。“啥事？”

快说嘛，我还要去矿上干活呢，要不全家就快掀不开锅了。”父亲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儿子。赵小刚不得不把揣在怀里的大学入学通知书拿出来：“我考上大学了。”

儿子早知道父亲听这事后不会兴高彩烈，但他还是没有想象出父亲竟会朝他发怒：“你、你咋考上了么？”赵小刚眼泪夺眶而出：“爸，你就让我上大学去吧。家里的债等我上大学后也像城里人那样赚了钱，我保证全部还掉它！”

“真的？”父亲一脸严肃。“真的。等大学毕业后我再挣不了大钱我就不是人！我也再不回这个山寨！”儿子跪下双膝，面朝父亲，对天发誓道。父亲受感动了：“成，你就去念吧，把大学里的书好好念，我兴许也能看见咱赵家的祖坟上也能长大树了！去吧！”

父亲转身从里屋那个谁也不能动的箱子底取出2000元钱，交给儿子：“这是我刚刚从矿主那儿借来的，本来就准备给你念大学用的。我没跟你说，是不相信你会上，说实话心里确实也不想让你再去念书了。你莫怨爸，谁叫咱们这家小的小，病的病……”那一夜，从小不爱跟父亲说话、打心里嫌父亲目光短浅的赵小刚，一下对父亲有了重新认识。

他终于明白，父亲平时常打他骂他，但心里同样是深爱着他的，就像别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一样。

赵小刚就是拿着父亲从矿主那儿借来的2000元，走进了大学门，并且艰难地跑完了对他来说是太漫长的4年血路。他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因为自己是“贫困生”而屡遭的冷眼与歧视，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最刻骨铭心的是，在他第一年回家过寒假时父亲为了还矿主的那2000元债的事。那天已是大年三十了，儿子问父亲为什么还要到矿上干活？父亲告诉他，矿主要让他还钱，因为还不出就只好给人家加班出苦力呗。父亲临走时，朝儿子重重地看了一眼，说：“以后就看你的了，爸这一辈子只能给人做牛做马，可也没养活好一家人。唉——！”

“长叹一声后，父亲驼着变形的腰背，消失在晨雾之中。那一天，赵小刚有一种预感似的，他觉得父亲这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后来父亲真的就再也没有回家。几小时后，矿上的人前来报信：小煤矿崩塌，包括赵小刚父亲在内的5个人埋在百米深的井里……”

日后，矿主还曾为 2000 元的借款找过赵小刚的家人和他本人。这种黑了心的要求理当被拒绝，但此事却一直像一团阴影跟踪了赵小刚的 4 年大学岁月。在赵小刚的潜意识里，父亲的生命就是他上大学的 2000 元学费，如今他捧着这鲜红的毕业证书犹如捧着父亲的那颗埋在九泉底下的滴血的心。此时此刻的赵小刚思绪万千，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贺兰山，在埋下父亲的那片凹陷的墟土前磕上 100 个头，以奠亲情。

“小刚，你怎么还没走？”突然，一位同学闯入宿舍。

赵小刚从遥远的思绪中回到了现实。他有些发愣地问同学：“我们宿舍的几位都跑哪儿去啦？招呼也不打一个……”

同学笑了：“人家都快当上某外企主管了，你倒好，一点也不愁呀！”

赵小刚觉得奇怪：“我愁啥？现在大学毕业证书都拿到了，有啥发愁的？”

“哈哈……看看，我以前就说过，我们现在的大学方向有问题，专门培养高智商而忽视社会实践能力。眼前的你不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吗？”同学犹如在课堂里高谈阔论开了：“赵先生，你以为一张大学文凭就可以救你了？可以使你一个山娃娃一夜之间变成大富翁？错了！尊敬的赵先生，你要清楚地明白，现在的你，跟 4 年前那个土得身上掉渣的赵小刚丝毫没有多大区别。一句话，你依然是个穷光蛋！不是吗？”

“我？我怎么还是个穷光蛋？你看看，我的毕业证书少别人一个角吗？”赵小刚急了，拿着红皮毕业证书像要说明一个几千年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回轮到同学摇头了：“赵先生呀赵先生，真没办法跟你说。我问你，你现在身上除一张毕业书外，还能不能拿出 100 块钱去买张回家的火车票？我再进一步问你，你即使回得到家，你想过没有，你是骑着毛驴在那美丽的贺兰山小村庄上走‘信息高速公路’，还是扛着扁担去进行‘网络’耕作？想一想，我亲爱的同学！”

是啊，我回贺兰山能干什么呢？是带着一个鲜红的毕业证书去与那矿主讨回父亲的生命？还是拿着这鲜红的大学文凭放在屋里的台桌上每天让全家人供着？

不，我不能这样空着双手回家，我要成为一个富有者！赵小刚想起了他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曾经在父亲面前许下“日后要像城里人一样赚大钱”的愿，顿时他有些激动地拉住同学的手：“你一定帮帮我，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发财……”

从此，茫茫人海的北京城内，又多了个每天匆匆忙忙又不知在干什么、收获些什么的“盲流”。而赵小刚则是京城百万盲流中的几万“高级盲流”之一。

所谓“高级盲流”，有位社会学家对此作了这样的定义：泛指那些脱离人事关系、户口关系，在外地工作或找工作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而这中间，高校的毕业生则居最多。

据某高校学生部的一位老师介绍，现在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已渐趋自由择业，所以学校除国家部分指标外，一般已不管你毕业后的去向，换句话说，只要有能耐，就是留在皇宫当天王老爷，也没有人管你。因此，大学目前实际出现的又一种情况是，辛辛苦苦 4 年间动员各方力量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而一旦帮助他们走完这 4 年学路后，至于再下面的路，学校一概不管，也管不了了。

我们济困助学，挽救贫困，让苦孩子能读完大学到底为了什么？

一个天大的误区！

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

在赵小刚毕业近一年后的某一天，我在军博后面的一个俗称“京城白领雅士”的居住区见到了他。现在他与一位同乡合租一间老乡的房子，很小，一看就是属于临时建筑。房子内除了两张床外，便是一大堆各种广告宣传材料。小赵告诉我，他现在与几位同是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原籍而留在京城的“哥们”，一起在为中央电视台几个栏目块拉广告、做专题。

“这儿离中央台近，走几步就到‘梅地亚’了。我们几乎天天要与客户们谈生意，可我们自己又不是中央台的正式工作人员，进台里不方便，所以利用‘梅地亚’这块宝地做事。”

看来走出校门后的小赵早已脱胎换骨，不再是那种傻乎乎的书呆子，变成很有一套的“商务专家”。他一听我的奉承话，赶忙谦逊道：“只能算刚刚入门。”

“能介绍介绍经验？”

“哪是啥经验，教训倒是挺多！”赵小刚说：一开始，我跟着几位同学就像瞎子摸大象似的，在北京城内到处转悠，就是不知哪是头来哪是尾。在校时，还吃不上饱饭，但毕竟有人管呀，总不愁半夜被民警叫起来查你身份证。这会儿可不行了，开始我们没有找到一份正经的活儿，就五六个同学合住在一间10来平米的小房子。白天你睡，晚上他睡，反正我们有人是干白天的活，有人是整夜去录制节目，倒也能对付。但主要还是为了省些钱。我们搭帮的6个人中都是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原籍的，而且基本都是在学校靠吃特困补助过来的。你问他们为什么也不想回老家？想法跟我差不多，就想在外面挣点钱。大伙儿说，过去我们这些从穷地方来的学生想得太简单，以为拼死拼活跳出“农门”，把大学文凭拿到手后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一生。可一到现实社会，才发现我们的思维太落后了，比时代发展至少慢了几个节拍。换句话说，如果在前五六年，可能是这样，现在就不行了。我们中间有人还是硕士毕业的，他说他毕业那阵子以为自己在大学苦读六七年后就可以安安稳稳给安排个什么国家科研部门或大型企业的科研岗位。结果他等啊等，就是没等到，后来他自己跑，一跑才发现像他这样的硕士生满北京城都是。好不容易有家单位愿聘用，他上班一看，是让他给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科长当助理。他气得找头头说理，人家告诉他你是个外地户口，又没正式工作关系，这个位置给你已经是照顾的了，像你这种情况，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正式编制单位，你就是博士也永远是“打工仔”。我的这位哥们气坏了，从此就打消了再找正式单位的念头，开始自己独闯天下。后来他靠自己的经济学硕士的渊博知识与吃苦耐劳精神，赢得了中央台几个经济栏目编辑的好感，就开始给他些活儿，干了干就一直干到现在，成了我们圈里的老大。

你问我？嗨，比他差远啦，一辈子可能没法跟上人家。我与这帮哥们合伙时间不长，过去干过许多活，比如在昌平给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当过助理，也在延庆的一家饭店搞过促销，后来在一个连锁店搞过派送，多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到底干过多少地方。但有一点你不知发现没有，我一般都找那些有住的地方和管饭的活儿。刚开始打工你没有钱呀。如果自己再租房、买饭，你在北京就是最次的农民房一个月也得二三百吧！打工一个月才赚多少工资？

五六百元，你花去房租、饭钱不等于白干了么？可要找那些既管饭又管住的单位，活儿肯定是苦力。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大学生，只要有力气就行。有一次在一家矿泉水公司干活，一天在烈日下要跑十几个单位，还是蹬大车的，累得你晚上睡觉被推到火葬场烧了都不知道。你问这么累又不赚钱咋没想回原籍？我想咋不想！有一阵还真回了一次老家，可一到家里我就想哭，咱那儿，没法提。别的不说，光吃水这一条，祖祖辈辈的人都要赶着毛驴走上三四十里弯弯曲曲的山路。那次我回家重新拿起赶毛驴的鞭子，一路赶，一路就有大爷大妈的问我，说小刚你在大外面见得世面多，知道不知道我们这儿啥时候吃水不用毛驴赶哪？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们又问，说你是大学生咋会不知道？要不你读了那么多书，帮着村上修口井吧！看着乡亲们一双双企盼的目光，我就差没掘地三尺。是啊，我是读了十几年书，是个大学生，可我哪会打井找水？但大学生在我村上的百姓眼里是无所不会的才子呀！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呆下去了，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大学生是不会给乡亲们找出水井来的，如果我留在老家结果连口水井都找不出来，老乡们会对大学生多失望呀！他们还在为了儿女或孙辈能像我一样读上大学而不辞劳苦地拼着，我不能让他们对儿女、孙辈们的企盼落空。另一方面，我想自己用父亲的生命换来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崇高荣誉，结果我连一口小井都不能帮乡亲们打成，这不是脸面都丢尽了？再说，即使有人把井打成了，有没有水呢？如果有又能怎样呢？还不照样见不到“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世界”嘛！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回到了京城，带着对故乡那种说不出滋味的情感回到了至少可以随便能喝上自来水、可以不花钱上一回“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世界”的大都市……

“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很茫然。”赵小刚抓过一把广告宣传材料，说：“这些活倒是能赚点钱，但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学农艺技术的。在首都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这门技术用不着，可这儿能赚到钱，可以让我随时随地看到未来世界的最新发展动向。我的老家虽然可以用上我学的农艺技术，但没有钱呀！连口水井的钱乡政府都不知勒紧了多少回裤腰带，我这一身技术又有什么用？与其那样，还不如先给老家那儿减少一个吃国家救济款的人……”

我无法断定赵小刚的理论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提醒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回到边远和贫困地区，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以追求个人前途与改善自我生存环境为中心的这部分学生，从他们发愤读书想跳出“农门”的那时起，就已经失去了对故乡的回报之心；另一部分大学生确有志愿到大学里好好掌握知识后，将来回到贫困的家乡改天换地干一番大业，然而贫困落后的故乡却无能为力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战场，使之慢慢丧失了原先的那份改造与建设家乡的热情与抱负。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在进行对贫困生帮助的工作中提出更深层次的要求。

单一的为解决他们在大学完成学业而去为其减免学费、为其寻找勤工俭学岗、甚至为其不辞劳苦地到社会上求爷爷告奶奶地拉赞助远远不够，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给他们在理想与人生观上进行“精神帮困”。有资料表明，1997年教育部直属院校共有本、专科毕业生64990人，到广东、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和留在北京、上海的就达3450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53%，而回到十大边远省区的只有3793人，仅占总数的5%。如此巨大的反差说明

了什么？说明了至少约有一半以上的贫困地区出来的贫困大学生没有回到他们本该回去的地方。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有 78.13% 人明确表示不愿到贫困地区工作。我也曾对中国农业大学的 10 名贫困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 10 人中有 6 人表示只要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可以每月赚到 800 元以上工资的工作，就不会再回老家了——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所指的工作都在不能解决工作关系和户口的前提下。那天在林业大学采访时，正好有两位女生在与老师商量留在北京自谋职业的事。这两位小姐都是林业大学的“委培生”，现在她们毕业了，照理应该回原籍，可她们说：“我们宁可出几千块钱还清委培费也愿意留在北京。如果毕业回去给你分配到一个永远出不来的地方，一辈子不就完了！”我问她们在北京有没有工作意向，她们说还没有找到，“反正慢慢找呗。”看来她们的决心很坚决，大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气概。其中的一位说：“留在北京一方面能赚点钱，另一方面我们还想考研。假如回到老家，这种机会几乎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在北京是可能的。我们的师姐们有好几个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子。”原来她们心目中还有另一番天地，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追求？

可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在“可是”上，可是如果我们国家每年为贫困地区培养的 20 来万学生（全国高校每年招生约 100 万，贫困生的比例按官方所说的 20% 计算），都不回原籍，那么我们那些贫困地区是否就永远的不辞辛劳地送出一批批秀才又永远的照样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我不禁想起有篇报导说，甘肃有个贫困县，每年都培养出许多大学生，乡亲们年年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离乡求学，但几乎不见一个学子毕业后回来，小县依然一贫如洗……

说不清是我们的帮困工作是否助长了贫困生们更加立志离开故土的心愿，还是济贫本身就在造就人们追求富有的心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有些贫困生在被别人的真诚帮助与关心时，他的思想和意识却在悄悄发生另一种变化——南开大学学生处的刘老师给我讲了这样一位学生：此人姓洪，是 95 级学生，家在江西农村，是个孤儿。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迟迟没来校报到。我们就写信打电报告诉他不管什么情况，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妥后来学校报到再说。后来他果真来了，一看是个非常可怜的苦孩子，什么东西都没带。我向领导反映这学生的情况后，学校一路开绿灯为他注册免学费。我们南开大学的党委书记那天正好看到这个学生，便问寒问暖，又把他领回自己的家，让老伴给他做好吃的，用自己的钱给这学生添置了许多必备的物品。当时这个学生感动极了，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社会和所有关心他的人。因为是个贫困典型呀，所以这学生后来时时处处受到资助和照顾。后来发现资助他的钱老是不够，一查，倒好，他竟抽烟喝酒都学会了。学校组织贫困生勤工俭学，让他去干点活，那么简单轻松的活他干几下就甩手走了，你说哪像个经过贫苦家出身的孩子嘛！

上海高校里出现了更出奇的事：有位贫困生多次得到学校的补助与社会赞助，反正学校有什么贫困生好处的事他都比别人伸手伸得快，可是在毕业时这位学生为了不去教师岗位，脱离师范生身份时，竟一下拿出了一笔不小的现金。与师范大学毗邻的上海某大学这几年为了援助贫困生，该校从 1994 年以来，每年给贫困生们提供无息贷款，可是不少人宁愿不要毕业证书也不还贷款，至今这个大学有 1000 多个毕业证书锁在学生处的铁柜里。

上海还发生了一件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前年香港某公司到某高校兑现自己每年向 25 名贫困生发放每人每月 150 元生活补助费的承诺。这天公司老板派代表前去学校向贫困生发钱，学校为了让贫困生们接受一次爱心教育，便把几个年级的贫困生都召去一起参加兑现仪式。

公司代表向 25 名大学生发完助学金后说：尽管我们今天只发给了 25 个同学，但你们中间确实还有非常困难的同学，我们公司也将视情况予以考虑。他的话刚完，台下的学生竟在没有任何指挥下排着长长的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台上走去。那公司代表惊得目瞪口呆，站在一旁的老师们则面红耳赤地冲上去拦住自己的学生，但为时已晚……

曾有一位教育家早已这样呼吁过：贫困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贫困而扭曲了的心态。我们全社会现在都在济困，都在向贫困挑战，但那些贫困地区的县太爷、乡干部，则心甘情愿地坐在那儿被人高高地戴上“贫困县”、“贫困乡”的帽子，为什么？因为有了“贫困”这顶高帽子值钱，可以坐吃不愁，伸手来钱来物。我们的大学贫困生中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且为数不少。因此在解决这些学生的物质贫困同时，解除他们的“精神贫困”工作更为重要。因为物质贫困是暂时的，精神贫困将是一生的。

此乃警世之言。中国的高校“希望工程”一大内容，便是解决贫困生们的心理贫困，这个心理贫困集中体现在人生观的教育上。阳光和雨露，可以使小苗长成参天大树。但高耸的大树未必能成栋梁，如果是棵空心的树干那只能当作付炬的禾柴。我们所要扶助的是一代健康无私并勇于接受挑战的新时代大学生，当然不是那些目光短浅、极端自私的庸才。

不然，我们学校的领导、老师的爱心与苦心和社会上那么多挚爱与善良，只能付之东流，我们的许多广袤山区也将永远的依旧贫瘠下去，父老乡亲们欢送的小锣鼓最终也会不再响起……

其实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一些贫困生们的“心病”并不全是他们内在因素。社会分配的不公、就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使他们受伤的心灵又一次次地重创。

我看过一位自称是患了“忧郁症”的大四学生给报社写信诉说的自己心头的万般无奈：……已近毕业的我，本应该忙于找工作的事了，但现在我只能默默看着来招聘的十几个单位把同学们招去，而我不能参加。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来自边远省份的，有规定必须回原省工作。有人会说：“回去建设家乡，有什么不好？”其实，我心中何尝不想回去？而实际情况是，每年有数万名毕业生回省工作，由于省内就那么寥寥几家比较景气的单位，因此关系网“广”不“广”，后台“硬”不“硬”便上升为第一条件，而成绩、在校表现只能退居次要。我一想自己几年学习的成绩被人忽视与践踏，就感到心里有气。每当我回想起 4 年大学寒窗，自己苦下功夫，从班尾升至班级前列，在班上也担任过干部，校级、国家级的奖励也拿过，就觉得自己应该不比别人做得差。但为什么在就业时就被无情地剥夺了与内地省份的同学的平等权利（他们中间有相当的人条件远不如我，却能去待遇好、发展前途大的单位）？我知道来自边远省份的同学中有的条件比我还好，剥夺他们与内地学生竞争的权利同样不公平。……一说到工作艰苦的地方，我们这些贫困地区来的学生，似乎就要理所当然地打头阵，凭什么我们就天生该得有这样的“特殊待遇”？如今已不是那个论出身的年代了，但“生源”这个出身却时常在提醒着我：“你来自边远地区，是与人不同的！”

这坦诚的女大学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而严肃的问题，这便是不容忽视的大学生分配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政策性，常常照顾了“强者”，却忽视了“弱者”，这也是当今中国大学贫困生面临的一大难题。

他们由于“出生”不好，在内地就业时，无论你成绩多好、表现多佳，还是拿过什么奖项，但只要一看你是边远省份的，就会一连串“不要！不要！不要！”

为此，他们满怀希望地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熟悉地区。可是当那些单位看着他们一张张金色的证书与奖状时，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要不起，要不起！”偶尔也有要得起的，但却轮到我们的大学生自己要不起，因为进一家打破头都想挤进去的好单位，你没有当局长、书记的爸爸，你至少得送上千儿八百。如此种种，贫困大学生们就会发现，当他们满怀喜悦手揣毕业证书走出大学门后，自己却依旧是个赤条条的穷汉！

……你问我是谁，我也不知我是谁。

你问我到哪儿，我也不知我到哪儿。

于是，他们又一次漂泊在人生十字街头……

第 14 章：日进斗金的学府与举目无援的校族

1998 年 4 月 30 日，一列特殊的火车从深圳出发，沿着新建成的京九线飞速向北，直驰祖国的心脏北京……

“到了，快到了！”在临近北京的时候，全车人顿时沸腾起来。当他们走出车站时，无数彩旗与喧天的锣鼓声使得站前的广场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

“老兄，你们真够款的！”

“师弟，你们创下中国列车旅行史上一个奇迹！”

“那当然，要不我们怎么叫‘北大人’！”

“是啊，我们是儿独一无二的‘北大人’！”

这一天，中国和诸多外国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有关一趟特殊列车的消息。原来这是在深圳和广州工作的 600 多名老北大学生为参加北大百年大庆而特意包下的一辆“专列”。

北大人真牛！那几天，我一连听到好几位北京市民在评说有关此次“专列”时如此感叹。

北大人确实很牛，像这样包着专列去参加校庆，恐怕只有北大人才有这般气魄。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为北大人的这种气魄而自豪。因为北大人“包”之无愧，我想如果有一辆能载千人的“空中大客车”，北大人定会毫不犹豫地登机腾飞……

1998 年 5 月初的那几天，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与喜庆，这就是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那几日，从共和国的主席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总理，从第一代北大人的百岁老翁，到刚刚踏进未名湖畔的年少学子，都在为同一件事兴奋。不夸张地说，北大百年校庆的隆重程度是中国几千教育史前所未有，或许也是空前绝后的。如果孔圣人活着，肯定不亦乐乎。先不说国家元首携全体中国主要领导者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集会，也不说世界著名百校校长云集一堂的盛典，我所关心的是另一点，那就是北大百年大

庆时所收受的“红包”有多少！

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在北大筹备校庆开始校方有关方面就公开明确原则：百年校庆不流俗，拒绝商业味。给许多单位和校友的一份《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指南》上，更加清楚地标明校庆的宗旨是“弘扬传统，繁荣学术，面向未来，促进发展”，力图把校庆办成一个“教育节”、“文化节”和“艺术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北大的百年校庆确实办成了全中国的“教育节”、全中国的“文化节”和全中国的“艺术节”。我强调“全中国”，是其声势、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中国曾经举办过的历届此类全国性的节庆。

但是北大人很会玩，他们虽然把如此规模盛大的校庆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名校校庆，同时，却又喜气洋洋地在后台大大的收受了一串数目惊人的“红包”。

下面是校庆办对外公开提供的一个数目：至校庆前一个月的 1998 年 3 月 31 日，25 家中外企业向北大共捐助总额达 11.5 亿元人民币。其中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为北大图书馆新楼捐助 1000 万美元；香港泛华老板何柱国先生捐资 3500 万人民币；香港企新公司捐资 200 万人民币；日本企业捐资 21.7 亿日元；戴姆勒-奔驰公司捐资 100 万人民币；美国宝洁公司捐资 100 万人民币；三金公司捐资 100 万人民币……除此，校庆办还透露了另一笔“红包”帐单：至 4 月 9 日，北大已与 20 多家厂家签订了价值共约 3000 万元的自负盈亏性质的制售纪念品合同。读者可以注意到，上面总约为 11.8 个亿人民币的捐资中，都是百万元以上的大“红包”，至于那些几十万、几万元的小“红包”则完全上不了榜。另外一个情况是上面这些数目都是在离校庆高潮还有很长一段时期内收受的，可以想象，中国人过节都有一个传统习惯，那就是带礼参庆。北大在后来的 4 月 30 日至 5 月 9 日的 10 天大庆时间里，几乎先后接待了万人以上的各界名流与校友，那么这些人中所带的“礼”是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只听说许多企业与许多北大校友--现在也都是大亨，他们此次对北大的捐资，全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低调处理，即不张扬、不宣传的做法。像印尼金光集团捐资的 200 万元，其集团杨丽珠小姐把钱一放，只说“捐资教育”4 个字后绝不多吐一个字……

北大校庆到底收了多少“红包”，是对外公开的 2 亿？还是实际的 3 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认真地去探密。但有一点是可以认定的，那就是北大确实在校庆的那些日子里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中国之所以举国为北大百年校庆欢呼，就是因为它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它的百年也正是中国百年进步的历程，而中国的百年进步有很多动力便来自这个“皇家学府”。

北大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理所应当。北大天天“日进斗金”是我中国人的骄傲。

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现象，那便是在中国现有的两千多所高校中（其中包括 1034 所普通高校，1000 所成人高校）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异”，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迈进，高校与高校之间的这种差异已日趋严重。这一现象，同样也反映到了解决贫困生的问题上。由于穷校与富校之间每年所获得的资金来源差异之大，致使在各自的教育与发展、投入与保障方面也出现了巨大差异。

我们先来说说一些像北大、清华的“富校”。如果按照比例划分，他们的贫困生比例也在 10%至 15%左右，然而他们这儿的贫困生，基本不存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情况。理由是，他们的生源几乎差不多全是全国各地的高考“状

元”，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高考“状元”，一旦成为事实后，一般都能得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社会或政府部门的奖励。特别是前几年，像江苏、上海、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一个学生成了全省、全市的“状元”，乡里要奖一笔，县里也要奖一笔，到市里、省里还要奖一笔，江苏的一个“状元”生最多曾拿到过 30000 元。这还不算了结，到大学后，你如果是“状元”，还会得一大笔奖金。如果你是贫困家庭出身的“状元生”，你除了享受上述奖励外，还将免去一切学费，如此里外里，一个原无分文的“状元”一夜之间成了小“富翁”。至于高考成绩的第二名、第三名也随潮船涨，总还也能有它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进账。有了这么多钱，别说一年学费，就是 4 年大学也可基本对付了。这是其一。其二，那些名校、富校，他们的生源相对而言，更多的是家庭富有的孩子。那些家里一贫如洗而又能考进北大、清华的毕竟是凤毛麟角。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些高校中，校长们都早已向社会发出响亮的承诺，即决不让一名家庭困难的学生因经济而辍学。校长之所以有如此坚实有力的底气，是除了他们自身的教育责任感外，重要的原因是在他们的口袋里拿得出这么一些“小数目”来解决本校负担不算太重的贫困生经济困难问题。

在地处南国古都的南京采访时，东南大学学生处给过我一份该校“关于解决经济困难学生及解困措施”的材料。不妨我们公布一下：东南大学现有全日制本专科生 8000 多人，月平均生活费在 150 元以下的约占 4%，计 350 人左右；月平均生活费在 200 元以下的约占 15%，计 1300 人左右。应该说，东南大学对特困生和贫困生的划分标准是略为放宽的，一般高校的划分标准比他们月生活费平均低出 50 元左右，即把特困生的生活费月平均算至 100 元甚至更低以下的水平。再看东南大学是如何解决 20%的贫、特困生的。以 1997 年为例--该校第一个措施是“面广钱重”的奖学金。面广是指他们每年会有 70%的学生可享受每年 1000 元至 4000 元不等的奖学金（本科生），即你只有学习努力些，争取达到 70%以内的人数之中，你就有了基本的生活费。这笔奖学金在东南大学叫“综合奖学金”，除此还有“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奖，每年每名获得者可得 1000 元。第三笔奖学金是“企业、校友”专项奖学金，即社会捐助的钱，获得者可年得 500 至 3000 元，以 1997 年为例，全校共有 243 人获得此项奖。第四项是企事业单位捐赠的奖学金，约五六项，每年有近百名学生可获得，年人均得 1000 至 2000 元不等。第五项是单项奖学金，每年初，学校根据各系院的学生人数，以毕业生每人每年 27 元，非毕业生每人每年 44 元下拨至各系院，由下面根据学年成绩评选出的优秀学生奖励，全校每年此项奖金共约 35 万元。第二大措施是专门用于解决贫、特困生的助学金。也分两大块：学校给各系院按在校学生总数下拨，平均每年约为十几万元；另一块是由学生处直接使用的定期与临时发放的困难补助。凡在没有获得上面 70%的大面积奖学金的贫、特困生，可享受每月 100 元的补助。

每年用于突发性的困难补助约 3 万余元。第三大措施是学校组织和设立的勤工俭学岗补贴，每年约 20 万元。能成为学校勤工俭学岗的人员一律都是贫、特困生。除上面三大块外，他们的最后一项是贷款制度。

如果那些贫、特困生从以上的三大措施中尚再不能解决困难的，便可向学校贷款。1996 年，东南大学准备贷款金达 40 万元，实际贷出 18 万元；1997 年准备贷款金为 61 万元，实际贷出 18 万元。为什么实际贷的少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的贫、特困生们已经有了上述几大措施，基本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笔或几笔的奖学金与助学金，他们用不着再为生活而发愁。

在中国最高学府之称的北京大学其实也有一支 3000 多人的“贫困大军”东南大学的贫、特困生们是幸运的，即使在这所著名学校内也有 1300 多人的一支庞大的“贫困生”大军，但他们因为有学校雄厚的经济实力而省去了不少苦与愁、汗与泪……然而我还是要说明一点的是，东南大学还不是最好的“富校”，它比起北大、清华、复旦、中山、南大等学校，还只属于“小康水平”。

可是当我向山西农业大学、华北工学院等属于“高校贫困族”的学校介绍东南大学的情况时，我看到这些校长们不是目瞪口呆，就是羡慕得要流口水。

“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要是他们把那几位来不及接待的赞助者让我们学校，我也就可以睡几个好觉了！”当听我说北京某高校学生部的人有一天因为连续接待好几位捐助者而忙不开身，竟把两位带了 10 万元巨款捐助者给气跑了的事后，山西农大党委副书记王杰敏十分感叹道。

“你想得到多少捐助？”我开玩笑地问王书记。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慎重地说：“5 万元。5 万元我就能基本解决贫困生问题了！”

“5 万元就够了？”我吃惊不小。因为我刚刚从他们学生处了解到，山西农大这座拥有 4000 多名学生的农校，其 9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而这些学生之所以上农大，一是录取分数线要低于其它重点高校，另一方面就是知道农业大学是国家给奖学金的（其实并轨制后农校等专业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要交学费的），所以他们才冲这样的学校而来。

我还知道，这个学校的近一半学生在上学时是家里拍卖掉了家产才进了校门。

王书记很歉疚地苦笑说，我们全校六七千师生员工都是些苦惯了的可怜人，你都看到了，虽说我们山西农大也是省重点高校，离太原不算远，走高速公路也不到一小时，但我们是真正的“村办大学”——学校四周全是生产队的农民，两年前学校的教职员工的户口还都是在离这儿好一段路程的太谷县城上。我们许多农村来的学生一进农大门，就叫冤道：这大学怎么跟我家那儿差不多呀！你问我们的贫困生比例？怎么说呢？如果按照北大、清华的标准，或者按东南大学的标准，我们的学生可能都得算贫困生。现在各高校划分贫困生的依据主要看学生饭卡上的消费来衡量，当然还有个地区消费水平不一样问题，但现在有些情况也在变，你说我们学校就在农村，可物价并不比你们北京便宜多少。肉菜供应也不是要啥有啥，反而有的比大城市还贵。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们的学生平均每月生活消费是多少吗？告诉你吧，我们的男生月生活水平是 140 元，女生是 90 元，这是平均水平啊！

说起那些困难生的生活消费，你可能听都没听过，我们有个同学 3 个月没吃掉 100 块钱！

你问怎么吃的？你想能吃什么呀！有人看他每顿就吃一个馒头和一碗不要钱的稀饭！他是学农艺专业的，学校每月发给他 72 元补贴，照理也不至于这么惨嘛！可我们一调查，这学生每月得向家里要倒贴三四十元寄回去。我们的学生大多是农村来的，而且又是那些贫困山区来的孩子，他们的家庭

不仅不可能给任何经济资助，相反还要学生给寄钱。有的学生家长说你娃儿上大学了，就是国家给钱了，有好吃好穿的了，你就得往家里寄钱嘛。那都是些没有文化又穷得叮当的国家重点贫困地区的农民，你摊上这样的一大批学生，学校能救助得过来吗？肯定不行。学校本身的教育经费就紧张，再加上校舍已经老化陈旧，早需要改造修缮，这些都等着要钱。可国家给的钱又基本只能维持“人头费”，想干点其它事就难了。你问有没有社会捐助？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咱这儿离省城有一段路，又是农业学校，有钱人是不会到我们这儿来的，他们捐钱是讲究回报的，我们要名没名，要利没利，自然人家不愿把钱扔到我们这儿。

我们学校这么穷，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笔捐助 2 万元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位老教授拿出来的，他在八十大寿时不为自己祝寿，而把这笔钱拿到学校让捐助那些贫困学生。精神可贵啊，我们也是十分看重这笔钱的，专门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奖励那些家庭贫困又能自立和学习好的学生。话得说回来，这 2 万元钱要用于我们这么上千人的贫困生身上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所以说，我们多么想呼吁呼吁那些有识之士，不要总把目光放在那几所名校上，我们是农业大国，农村的人才才是关系我们民族能不能振兴的大业。再说，农业实际上也是非常具有远景经济意义的。要说起贫困，像我们这些专业学校才真正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解困的。

因为我们这样的学校贫困生是最多、最集中的地方。

王书记有倒不完的话，他所反映的问题，也正是中国高校中目前存在的事实。我到过农、林、渔还有地质、石油、煤炭等专业学校，这些院校的贫困生问题是最严重和突出的，而他们由于往往既受到国家产业调整的大局影响，又受到行业自身机制的局限，加上环境、地理等条件的不利因素，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匮乏，故根本很难有力量像那些著名的高校大量投入资金用于对贫困生的奖、贷、助、补、免等工作。这些高校又基本都不会得到社会的赞助，所以，贫困生的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几乎又在短期内难有改观的可能。

据资料表明，我国目前的专业高校在大学总数中占三分之一多，而这些学校的贫困生总数约为全国高校贫困生总和的三分之二还多。重视和关注这一层面的高校贫困生问题已迫在眉睫。

因为单靠国家和学校自身，这些专业院校是很难真正趟出困境的。

1998 年 7 月初，就在高校放暑假前夕的两三天内，我分别对同在首都的北京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再次进行走访。我先到北大的“昌平园”，这是他们分校，每年文科的大一学生都在这儿。去之前我已经翻阅了 97 年考上北大的几位“状元”贫困生的材料，所以一到那儿我便期望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些贫困的感觉，但我“失望”地没找到。第一个是黑龙江的文科“状元”刘某某，他在考大学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极为悲惨的经历，母亲重病几年里他或打工辍学或跳级以缓家庭负担。这样的学生如果在某个农大什么的高校，也许可能在进入“龙门”后又不得不退学，或者即使在校继续学习也肯定十分艰难。但我见到刘某某后，他第一句话便说：“我现在不是贫困生了！我不贫困，真的，我没什么说的。”第二位是位山东女生白小姐，也是 97 年的“状元”。她的家在沂蒙革命老区，靠玉米面长大的白小姐家里至今仍很穷，父亲在她上中学时就病逝了。因为是“状元”，所在的中学奖给了她 3000 元钱，她靠这个钱到了北大，后来学校马上给她按特困生免去其所交的 2500 元学

费。

白小姐告诉我，这一年中她没花过家里一分钱，她说估计以后也不会要家里再负担了，因为她每年的学费学校基本都可以给免，她的生活费便是学校的奖学金。“加上每月 80 多元的副食补贴，我的生活费足够了。只要好好学习再拿点奖学金，4 年学业就不成问题了。”白小姐非常自信地说。最后一名被采访者是“昌平园”有名的“贫困族”朱峰，小朱是河南信阳人。老家也是个贫困地区，当年为了跳出农门进“龙门”，小朱从初中时就咬破手指，在自己的小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两个血字：“北大”。他用心中的信念时刻勉励自己，并终于在 1997 年的 9 月圆了北大梦。我问他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说按照苦孩子的标准已经没问题了。学校减免了他的学费，又发了他 2000 元的助学金，加上每月的副食补贴和交通补贴，“生活绝不会成问题了，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看自己能不能保持‘状元’的成绩优势了。”

这就是北大，虽然这里也有许多需北大人要做的贫困生工作问题，但与那些无援的贫困校族相比，这已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到了曾在四五月份采访过的八亿农民的最高学府--中国农业大学。此次我去的那天已是暑假期间，但这儿的校园内仍然有很多学生，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些不回家的学生。其间 95%以上的人是为了省一笔路费而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同时他们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那就是争取利用一个多月的假期，把下学年的学费挣出来。

“打工活好找吗？”

“太难了，今年比任何一年都难。”一位同学说他从 5 月份就开始跟有关公司或单位联系，可至今没有落实一个地方。

“如果假期打不上工，你新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怎么办呢？”

那同学一脸茫然，又摇摇头：“愿上帝保佑。”

身在北京的农大学生是这样，地处省(区)和边远的农大就更不用说了。至于那些全行业都处低迷的纺织、煤炭、地质、铁道等等专业高校的日子就更不言而喻。

但是农大一类学校还并不是最可怜的。1998 年 5 月初的一天，我来到华北工学院这所原兵工专业大学，才发现还有一类更困难的“贫困校族”。

这所学院在对外的通讯地址上标的是太原市某某路，实际上是个离太原还需开上好一阵子车的偏僻山洼洼里。弯弯曲曲的公路，起伏连绵的大山，一看便是“三线”时期的产物。

如果不是早有所知，你绝对不会相信在那大山弯里还有一所上万人的大学。主人则告诉我，他们的学校已经有 50 年历史，是一所曾为建立共和国和保卫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勋的兵工大学。就在十几年前，谁能走进这样一所用番号的大学，那是一种无法比喻的光荣与自豪。那时北大、清华与他们相比也不过如此。然而历史仅仅多走了 10 来年的光景，这所令每一位校人骄傲的兵工大学出现了十分尴尬的处境：皇帝女儿从不愁嫁的华北工学院，其兵工专业已渐失优势，当兵和到“机密单位”对大多数人不再感兴趣。改革开放后还有更璀璨的世界与地方可以去，何必要到那些又艰苦又边远的老山沟呢！于是学校只能根据行业低萎缩的实际与社会需求，调整扩展其它专业，并面向全社会招生。而这时候他们发现，往日的那些优势现在全变成了劣势。过去山洼洼里的神秘，现在成了“傻人才去的流放地”；过去红星

闪闪的高政治待遇、高工资收入，现在一提起人们甚至觉得可笑，有个方便的留洋出国机会、或在外企谋个职难道就拿得比你少？兵器大学失落了，没人再被他们的金牌子所迷惑，就连招生也只能招些不想出学费的、最好还能倒贴一点的边远的、贫困的农家子弟或城市的下岗子女……好可怜哟，国家的政策则是一样的，该实行并轨的就得实行并轨，该交多少学费的还得交多少。结果，来报到的学生们发现上这个学校没占任何“便宜”，而学校则更加发现他们肩上的负担比别的大学要重得多！

那日，我是不到下午 6 点从山西省团委出发的，但一路堵车使二三十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晚 8 点 20 分左右到学院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校党委副书记杨波与学生工作部的吴俊清部长、团委李树雪书记一见我，就像见了哪一位高级首长似的热情、客气，直叫人感动。

“同学们等您来已经在会议室有一个多小时了。”主人说。

我一听便大为受宠若惊，忙说：“那就随便吃点咱们就去见见同学？！”

“毕竟都是当兵出身的，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失去 10 年前的那种部队生活习惯。”

草草吃过晚餐后，我被前呼后拥般地带进了会议室。一间三四十平米的大房子里，整整围了一圈人。主人说，他们都是贫困生代表，他们听说你是专程来了解大学贫困生问题的，所以都想跟你说说。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那么请同学讲吧！”

我只说了几句开场白，便打开了笔记本。

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因为我无法记录下去--第一个同学还没有讲完，接下去便就哭成了一片……我至今仍无法忘却那晚的一幕，这也是我生命中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很遥远的感受的再一次复现，那便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经常遇到的“忆苦思甜会”。

我丝毫没有半点夸张。也根本没有考虑这相隔二三十年的类似的集体式的哭泣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只是感到我们的大学生们太艰难了！我只是感到共和国都快走过半个世纪了，为什么我们的人民有些还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尽量让每一位参加座谈会的同学都能详细讲一讲自己的情况，然后我想法在作品里都把他们的写进去，之后再希望有钱人都出来帮助这些困难同学……

这一夜，我进行了少有的最紧张和最漫长的采访。从晚 9 点一直到午夜。第二天早晨 6 点刚从床上起来，就又开始接待同学，直到中午。之后，我又参观了一下学校环境以及仅有的一个学生勤工俭学社团。在这里的采访和亲眼目睹，使我完全证实了学院几位领导反映的问题：华北工学院是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学，校园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变迁与革新，都得他们自我消化。像贫困生问题，他们是个最无援的高校之一。由于这几年兵器行业的不景气，国家对学院的实际投入有减无增。学校有限的如一些辅助设施的管理，基本只考虑安排本校教职员工的家属子女等就业人员。因而贫困生的勤工俭学岗就只能是很少了，绝大部分需要帮助的贫困生无岗可上。这里想做家教或打工什么的，也几乎是不可能。有个同学说，他曾在前几个月走出校门找一个家教，得走十几公里的山路，还是个农村的孩子，每小时才给 5 元，后来他不干了。华北工学院离城里几十里路，学生打工、家教，只能像这位同学的结局。而学校也同样像山西农业大学一样，没有人给过他们一分钱的社

会捐助。几位学校领导因此对我说，现在社会上有些现象真太不正常，

富的富得流油，穷的穷出肋骨。越富越有人锦上添花，越贫越有人雪上加霜，我们欢迎你作家同志来，就是希望通过你的笔，给社会和有关部门提个醒，要想做件善事，那就多做点雪里送炭，而少去做那些锦上添花的活计。像我们华北工学院这样的“贫困户”才真正需要帮助。你作家同志就帮我们做一回广告吧，我们有言在先：只要有人捐助，就是一两万元，我们学校也会让第一把手出面隆重接待！

我答应照办。至于有没有人向华北工学院这样贫困大学生很多的“贫困大学”捐助，那就要看上帝是否开眼了。

从华北工学院出来，我以为有关高校中那些“无援校族”的话题可以了结。但我又错了。

第 15 章：世纪涅槃歌

1994 年 9 月中旬的某一日，国家教委大门口来了两位穿着破旧衣衫的青年学生，不顾门卫的阻拦，高声朗颂起来：当金质钟锤在你们的公馆里敲响，呵！你们是否想到也许有一个穷人，挨着饿，停留在阴暗的十字街头，从金碧辉煌的客厅的透明的玻璃窗上，望见你们婆娑起舞的身影？

他在灵魂里把你们的华宴和他的家相比，在那里从来没有一丝炭火燃烧的火焰，他的孩子们饿着肚皮，他们的母亲衣不蔽体，老祖母躺在几根稻草杆上，沉默无语，真可怜！

严寒的季节已经把她冻得足够入土归天！

施舍吧！为了得到为人类受难的基督的抚爱，为了使恶人也称道你们，向你们致敬，为了你们的家庭永远和睦与安宁：施舍吧！

为了有朝一日，在你弥留的时刻，你们在天上有一位强大的乞儿，为你们祈祷，超度你们的灵魂！

……

“喂喂，报告报告，门口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大声喊着内容不好的反诗，要不要处理他们？”年轻的门卫紧张地抓起电话。

“先不忙，等我出去看看。”

不一会，教委大院内走出一位某部门负责人。他已经远远看到了那两位学生：“就是你们俩？”

“没错，就是他俩。”门卫十分严厉地报告道，“刚才他们在这儿大声念着不好的诗！”

“是这样吗？”

“我们是念了诗，但那是好诗，是伟大诗人歌德的那首《为了穷人》。”

“学生开始反驳，并重新又向那位教委官员朗诵了一遍。“他不懂。这是坏诗吗？”

“对，这是首好诗。可你们有什么事吗？”官员问学生。

学生激昂地：“我们只想问一句：国家教委为什么提出让我们交学费？我们是山区来的，根本交不起。请问先生，难道社会主义大学要把穷人赶出大学门？”

原来如此！

教委的官员和言悦色地把学生请到接待室，因为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

多起了。

是啊，为什么突然要让学生们自己交学费！收了学费又是为什么呢？

回答只有一个答案：一切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

〔BT2〕 震荡最后的堡垒

20 世纪末的中国是什么？

是一头已经昂起头在呼啸的雄狮。

是一列已经启程并在快跑道上飞速前进的战车。

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革命风起云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就让全世界为之惊叹！

开放与革新，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然而在这伟大历史进程中，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一向缔造革命理论与改革模式的中国教育界，则仍然拖载着那辆旧体制的老破车，与时代格格不入。

谁都知道，中国的每一场伟大变革总是先来于教育界，但而今的教育战线为什么走在了中国体制变革的后头？

原因只为两个字：缺钱。

可有谁能不承认这个事实：自改革开放近 20 年的每一年人大会议上，“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议案，年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又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最终的解决？

原因还是两个字：太穷。中国仍然太穷。

12 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有 2 亿多人要接受义务教育，几千万人的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500 多万人的高等教育。还有近亿人的扫盲工作，近千万教职员工的待遇……

统而言之，国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国家的人均标准，则至少将我国 50% 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进去。怎么？就不管 12 亿人的吃饭啦？

于是研究来研究去，每年的教育经费仍然像是大饼上撒落的芝麻——看得着而吃不饱。

不去说全民教育，单说高等教育。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上大学后就是国家管了，既然“管了”，当然连连住连学习连分配就该全管。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真做到了这“全管”的“统一招生，免费入学，困难补助，统一分配”的大包大揽。应当承认，在人民的经济收入很低的情况下，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阶级差别，鼓励工农子弟上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确保国家重点行业需要等等，这样的办学模式起到过积极意义。但随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的变化，原有的国家大包大揽已经跟不上形势，且日益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如把大学当作社会福利事业，国家出钱，学生免费，学校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样极大挫伤了教育单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随之而来的便是宏观教育机制、办学机制到微观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等的严重滞后与社会发展步子的停滞。国家教育经费长期徘徊在 12% 的水平只能维持教育单位的“人头费”，所有其它想做的事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教育部门曾经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探索推行过委培、代培、自费等制度，并以此想缓解教育经费的不足。结果不是出现“分数不够钱来凑”的问题，便是有的大学坚持教学质量而拒之推行这一类的“委培生”，加之委培生在分配上也带来诸多毛病。

1994 年，国家终于屡经调查论证，决定由开始的试点到最后的高校全

部实行收费上学制度。

为了什么？很清楚，为了国家不能永远背大包袱。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学校仅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们一个发展中的穷国家，竟百分之百的全是由国家出钱来办高校。一座大学一年需要多少投入且不论，光一个学生一年平均就是 10000 元，500 多万学生就是 500 多个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家日益为这样的学生包袱感到喘息的时候，另一方面全国居民的家庭银行存款却每年以 30% 的速度在增长，至 1997 年底个人存款总额达 50000 亿！

个人的腰包在不断膨胀，却不愿为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掏一分钱，这样的国家最后不被拖垮几乎没有可能。

再看看这样一个现象：1997 年 7 月浙江温州的一家酒店老板在当地报上刊登广告，为其女儿公开招聘一名专职家庭教师，许诺执教后学生年度成绩跃居班级前 5 名的，奖家庭教师 30000 元，成绩居年级前 10 名的奖 8000 元。如果最后考取大学，一次性重奖 15 万元。

家庭教师平时的待遇：包吃包住，卧室配空调、电脑、电视，月工资 1200 元以上。

可以为了儿女上大学出巨金请家教、找好中学，这几乎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你只要看一看“中考”那激烈的硝烟和家长们为了给子女择所好校而不惜代价的举动，谁能说有几个不是为了儿女能上大学？既然上中学愿意或完全承担得起几千、几万的高额费用，那么大学收费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政府和教育部门出于大局和国民的实际情况，最终作出了今后再上大学就得交费的重大决策。

这对中国百姓来说是个惊雷。其实它已经来得晚了，它之所以要响起也实出无奈，它之所以迟之今日才响起同样出于无奈——中国还有上亿家庭仍处在经济不能自足的低水平上。

国家因此而仍然承担了每个学生 80% 左右的教育总费用。

人民共和国想的是人民。国家同时考虑到一些特殊行业的专业高校情况，规定对农林、师范、地质、石油、体育、航海、民族等专业学校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大学生免缴学费。

据教育部门和有关社会调查机构测定，收费后的每个大学生，每年的各类费用在 6000 元至 10000 元之间，这个数目对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教育部门以为，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相比之下在大学期间所花出的两三万元投入则很小。

国家的帐目，清白优惠，无可非议。

然而大学收费仍是震荡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惊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震荡，是来自两个原因：传统的习惯意识和确实难以承担的经济困难。前者是一种观念更新，是可以靠说服教育能解决的问题。后者则是非一日能跨越的沟谷，谁来为之填平？

据资料表明：在大学中来自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占总数的 60% 以上。

同样有份资料表明：我国目前农村的人均年收入在 1200 元左右。

两项资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农村，如果一个家庭中出了一名大学生，那么全家的全年经济收入基本都将用于这个学生身上。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凡是农村出来上大学的孩子家庭里，至少有一半将因此而受到经济的困扰。注意：这里我们并没有说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另一个不可小视的现象是：近年城镇居民中下岗人员的大幅度增加，10%以上的城镇家庭的大学生子女也面临交不起学费和没有生活费的困扰。

大学的贫困生因此而这样产生，其面涉学生总数的 20%左右，其中 5%至 8%为特困生。

五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不可谓是小数，100 万的贫困生如果每人每年国家助困 100 元，就是 1 个亿。100 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能解决问题的则需要每月助困 100 元左右，这便是 10 个亿。

10 个亿对国家来说并不是大数，但全年的教育总经费才多少？于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最后堡垒”——教育改革要突破，100 万的贫困生是其“堡垒”中的“堡垒”。

出路何在？

出路只能是两条：社会与学校自身。

哈佛真的学不到？

市面上有本叫《哈佛学不到》的书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哈佛作为世界著名的商业管理人材摇篮，有其了不起的卓越天才式管理机制。单看看那见不到校门的开放式校园，到处都充满学术氛围，以及学生们那气昂昂的步履、目不斜视的神色，你就会有种这里是“世界第一”的感觉。

是啊，哈佛为什么就如此牛？1997 年 12 月的一场冬雪后的一天，我站在哈佛大学的缔造者哈佛面前，默默地请教这位半身披着雪花的学界斗士。哈佛没有回答我，只有阵阵寒风吹得我吃不惯西餐的肚子难受不堪，并不得不速速离开。一趟哈佛，除了留下几张照片外，什么也没有学到。

所有旅游者大都是这样。

但教育家难道也是这样？

哈佛确实不同寻常，每年光从政府那儿可以获得 10 亿美元的经费，这还仅仅是个零头，哈佛所获全世界各种社会资助高达 100 多亿美元。这便是哈佛最强大的后盾。虽说 100 多亿美元绝不能说明与产生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必然联系，但哈佛大学的教授的年薪绝对是世界高校中最丰厚的。在这里，教员的工资超过美国总统薪金的大有人在。哈佛的学生奖学金最高奖过 10 万美金，一般学生的奖学金也有几千、上万之多。这里的学生是真正的“不因为贫困而辍学”。这里的学生要进哈佛校门，一年没有四五万美元就别往这个地方探头探脑，当然假如你是富翁你还必须有个天才的脑袋。

哈佛是所典型的社会办学楷模。你想获得哈佛的荣誉，这里的大门敞开着，什么某某研究中心、什么某某教学大楼、什么某某图书馆，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在这里建立永久的丰碑。像中国小富翁们扔三万五万人家当然不要，但上线却从不限定，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的赞助，哈佛从来“笑纳”。不像英国牛津，1996 年沙特阿拉伯富翁瓦菲克1 赛义德基出于感激要资助 3400 万美元给学校，牛津大学的董事们竟以 259 票反对、241 票赞成而拒绝如此一大笔款项。哈佛不会这样做。这便是美国绅士教育家与英国绅士教育家的区别所在。

中国大学能从哈佛大学学到什么？有人也许马上会说根本不可能。

但这样的结论下得太早。

社会办大学过去在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教育界是不可想象的事，而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办大学已经初见端倪。李嘉诚出资 40 亿

元建起的汕头大学就是中国经济特区内的第一个“小哈佛”，这里的学生就没有贫困一说，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园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凡是校园内最新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说都是某某人赞助而建的。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清华自 90 年代初开始，每年社会和学校自筹的资金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拨款。以 1995 年为例，清华的总收入中，政府的事业费拨款只占 29%，学校的社会资助与科研、生产、委培等的收入占 70% 多。可见，争取社会捐助已经是中国目前那些著名大学之所以能过上相对好一点日子的重要途径。

这位负责人说，清华大学的贫困生数量并不小，每年有 1300 多名。这几年清华之所以能做到使这支庞大的“贫困军”没有一位因经济贫困而辍学，很大程度上他们除了按照政策减免学费外，还从社会资助中拿出大量经费保证贫困生们人均不低于 1000 元的各种补助。

在清华大学基金会小楼里，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清华人太清楚育人之计，所以他们把建立社会捐助为主要来源的教育基金看作是“大树”培之植之。“大树”叶茂，“大树”底下的人便好乘凉。

值得欣慰的是像清华的情况，并非一家。许多高校如今都已纷纷把争取社会资助当作办好学校、减轻贫困生压力等资金筹集的重要渠道。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社会捐助搞得好的学校，那儿的贫困生工作就会做得扎实有效。反之则不然，像上面我提到的那些“无援的贫困校族”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他们没有“源头”，没有“大树”，赤条条下的贫困生们只能更加艰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学校本身应加强工作之外，社会的捐助者也要注意捐助的投向面，不应光把目光盯在那几家著名学府，盯在可以提高眼前的名声、名义上。

其实，一桶水对已经盛茂的参天大树可能并不起什么反应，而一桶水对那些干旱垂死中的禾苗来说，将是生命的重新复活。一切有识之士应当多做些雪里送炭的事。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众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纵观中国大学在改变自身经费压力问题上，真正运用此话的并不突出。目前我们的高校大部分只把眼睛盯在“港澳台”那些巨富身上，还很少有序地注意运用自身的特殊优势，将目光投向国内的那些富有阶层。中国的穷人很多，但中国现在的富人也很多。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曾载文说中国现在至少有 4000 万人进入富有阶层，有 1000 万户家庭的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上。这些家庭与富有者光每年的存款利息收入人均 5700 元左右。早听说有人一桌饭花去十几万元，一个澡也能“泡”掉万儿八千。通过多种方法，让这些人从牙缝边省下那么几餐，我们的百万贫困大学生就能一年不愁了！

这，并非是梦。你到国外走一走，就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到处可以找到众多关于私人奖学金的信息手册。入册的捐助者未必都是富翁，相反大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退休军人、神职人员，甚至还有继承遗产的小孩。很有点像中国的“希望工程”，但他们则更加规范，更加让捐助者视之为一种神圣的义务和对所捐款采取了透明的追踪而放心。

西方人在组织社会公益事业的捐助活动时，与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

几乎不采取任何运动式的声势，却十分注意科学与规范。中国人要学的东西很多，这便是一例。

中国暂时没有阿拉拍的石油巨富把堆山的黄金，用大“林肯”向哈佛送去，但中国有比世界上任何都多的众人之手，每一人拾一根柴禾，那么拾起的可能就是几个哈佛的金山！

呵，话到此处，便不要以为哈佛就那么容易轻轻松松地学到了，哈佛还有它那永恒的魅力。

曾经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软件公司的总裁，以每年 1 亿美元为条件要求哈佛接收其不学无术的孙子以正常学生的身份进入 HBS，并且要求今后两年中课堂案例应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有关他的公司或计算机行业的。哈佛校董事会当即拒绝，他们说，招收一名不学无术者进校，便意味着另一个本应进入哈佛的优秀青年被拒之哈佛门外，这是对哈佛的一种侮辱。

这一例子，使我想起了全国学联负责人曾经提到的一件事：即作为校方和贫困生本身，在“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前，如何合理处置社会捐助，这同样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国是个具有行善积德优良传统的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美德，时时处处可见。而今，当贫困大学生问题被摆出来后，社会各界慷慨解囊者亦非少数。

面对“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绝大多数贫困生能正确对待，也能善于处置所得捐助，并以自己刻苦学习、走上工作岗位以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之心而报答人们的爱心。但也确有一部分受助学生一旦有“馅饼”吃后，“食欲”越来越高，胃口越来越大，当手中有了未费吹灰之力而得的巨款后，即忘了过去的贫苦，也失去了意志自控，有的甚至走上邪路。

为此，全国学联负责人指出，希望社会各界在为贫困生献爱心、做捐献时，最好能直接

通过如“全国学联济困助学中心”等专门机构。这样不仅可以采用形式多样的途径保证每一笔捐助款落到实处，而且可以避免个别受助者因一夜间突然“致富”所带来的弊病。规范、科学、合理和有效的使每一分钱捐助发挥作用，这也是“哈佛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不妨同样拿过来。

校园自有黄金在

唱完了中国“哈佛”的美妙之曲，我们还应不该忘却大学自身的优势。几乎一切权威人士都这样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最终决战的战场在校园。作为决战内容之一的贫困生问题，最终出路自然也在校园。

校园能提供什么？有人问。

校园能提供一切。有人答。

这是狂想。有人说。

这是事实。有人道。

其实，狂想与现实之间仅为进一步之隔。那就是：穷则思变者，大路通天；穷则懒怠者，有路亦为沟。

1998 年 7 月 10 日，我到高校勤工俭学最早并最具优势之一的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我得到的一个简单数据是，这个学校 6000 余名本科生中，贫困生占 16%，即 930 名左右。而这个学校自 10 年前建立“家教中心”以来，仅此家教一项勤工俭学，每年就有 1200 人左右参与。这还不算另约 1000 人左右自己联系的家教。一个家教学生一月所得的收入在 200 元，一年按 10 个月计算，全校学生们每年仅家教一项可获取至少 240 万元的勤工俭学收

入。这里的贫困生们绝大多数是靠从事家教“脱贫”，甚至“小康”。

北师大得天独厚的优势非旁人所及。那么身处下岗“重灾区”的鞍山钢铁学院则可以让那些同为“无援的贫困校族”在思维上冲击一下了吧。

鞍山钢铁学院除了学校内部有限的一些岗位让贫困生们承担起来之外，校门外的所有勤工俭学岗几乎被社会上的下岗大军吃尽占光。怎么办？学院领导灵机一动，校区北边不是有块荒地一直闲置在哪儿！对，开荒种地。于是学院上下齐动员，很快开辟出了 80 多亩可种蔬菜作物的耕地。“种子和耕作经费由学校出，劳务和耕作管理由你们来……”校长一声令下，那些贫困生们学着当年的“南泥湾”精神，每天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举镐挥锄，施肥除草，无限情趣。春天，他们播下种子，秋天收获硕果，学校的食堂因此而增添了美味佳肴，贫困生们则用劳动的汗水换得了可喜的报酬……

有人会说，我们校园没有荒地可垦。

那就比比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吧。

生活费从来就是贫困生们最大的一笔开支，每月 150 元以下的生活费可以统归为“贫困族”了。但学生们感到沉重的是，这 150 元一月的生活费又能解决多少饥荒呢？有限的钱，填不饱饥饿的肚子，贫困生们莫不痛苦于此。许多学校对此束手无策。

但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不这样。他们大举改革，把后勤管理人员精简下来，伙食部门不留一个闲人；食堂化整为零，由个人独立经营；学校不给食堂下拨一分钱，只管煤、电、水费；所有摊点、食堂的价格与利润、种类与质量，必须按照规定之内执行，超一罚十，损一扣百。如此一来，学生们真正成了上帝，经营者为了吸引众多每月生活费在 100 元左右的学生，便尽量压低成本、增加种类、提高质量。如今的校园内，你每月 100 元左右的钱，可以吃得并不寒酸，颇能自在；你如果花 150 元，则能吃好有余。不信，你可以到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走一走，那 100 多种小炒、30 多种主食，任你享用。如此低价美味，贫困生还求什么呢？

以上仅仅是一种借鉴。然而滴水之中可见太阳影子。校园是个小社会，一所万人的大学便会带来一个万人的小社会，他们依靠校园的万人在生存，甚至在致富。地处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可以说是中国千所高校中最底层的学校，那儿的贫困程度触目惊心。但就是靠他们墙外那条马路繁荣起来的“十字街”，在当地十分闻名。每当夜幕临至，此处便灯红酒绿，热闹非凡。据学校的人讲，光这一条街，当地街道一年所得税收就达 230 多万！而西藏民族学院的院长说，他只要每年有其十分之一就可以使全校贫困生们基本“脱贫”。

为什么就在眼皮底下的肥水被别人截去了？这固然有地方上的问题，难道与学校本身缺乏开拓精神无关吗？

北大的一个“方正”可以打到美国去赚“洋钱”回来花，那么我们的“东大”、“西大”是否可以动些脑子挖掘自身的优势，弄点“土钱”给穷学生们添个菜、送件衣呢？

都有可能。只要我们真的努力了。

后记：一次落泪的心理历程

都说 40 岁以后的男子不易落泪，我想除了没有遇到伤心处外，再就是没有碰上值得同情与痛苦的事。过 40 岁的我，这一年却异常变得多泪，而且为的是一件原本与我毫不相干的事。

1997 年 9 月，当一位领导同志向我介绍中国高校的贫困生情况，并希望我能写一部反映这方面问题的作品时，我感觉自己的肩上一下沉了起来，倒并不是惧怕题材本身，而是觉得我无法抽出那么多时间，去完成一件工程浩大的“调查”，之后是提笔写成“报告”，且还必须具有打动人的“文学性”。但后来我还是接了。接下之后的第一次采访，我就直感到我无法放弃这一特殊使命了，因为它超出了我原本所能想象到的调查意义：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正直作家不干这样的事，还干什么呢？我终于开始了漫长的大学路。为了一部作品，要用一年时间走访几十个单位和二、三百位人士，这样的苦差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的。但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有几次在去大学里采访的路上，我困得实在睁不开眼……可我必须准时到达采访地点，因为那儿的学生在等着。作品中我曾提到过走访山西高校的日子，为了倾听一批又一批贫困生们的诉说，有一天我连续进行了 21 个小时的采访，而事实上这种情况还不止发生过一次。我说这些事并不想自我标榜自己的敬业精神，而是在我与大学生们成为朋友后，再也无法摆脱一个个挣扎在痛苦之中的学子们对我所寄予的一种特殊企盼。而我自己认为虽然当不了什么“救世主”，但用笔向社会呼吁的力量还是有的。我断定，只要你深入高校，深入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列，你就会马上发现，任何走马观花的轻率态度都无法对得起自己，更不用说对得起成千上万名正在与命运抗争的贫困大学生们。应当承认由于长期的压抑，有些贫困生的心理被严重扭曲，但绝大多数人仍是处于积极抗争的旅途上，因而，他们特别期望社会能关注他们的命运。兴许平时长期被歧视与冷落，贫困生的内心世界基本上是封闭的，你只有像朋友似的接近他们，并满怀理解地倾听他们的诉说，你才能发现这是一群太非同寻常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篇催人泪下的故事。他们的心灵创伤很重，极需医疗与抚慰，是拉一把还是推一把，对他们来说完全可能是两种命运。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都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努力。重视高等人才培养，也就是重视了中国未来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贫困大学生的生存命运，将直接影响中国下个世纪的前途问题。因此，我有理由认为自己一年的苦可能没有白吃，陪着贫困生流了那么多眼泪也算值得。

《落泪是金》的题目想了很久，这纯粹是整个采访过程的经历所得。

诸多贫困大学生们的经历叫人落泪，他们与命运不屈抗争的精神叫人落泪，社会上有那么多好心人无私地援助他们的动人事迹，同样叫人落泪。我相信，这些用金子凝成的泪水，会让更多的人像关注山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那样来关注高校贫困生。因为正如团中央领导所说，救助一个失学儿童，中国就少一个文盲；扶助一名贫困大学生，下世纪就多一个建设国家的栋梁。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邓勇先生和全国学联有关朋友的帮助，没有邓勇先生及其同事的大力支持，我很难顺利完成如此艰巨的采访任务。匡满兄和责编龙吟(萧立军)先生的指点，使作品增辉不少。

